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巴金 (下)


e-BOOK
网络资源 中国风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巴金

寒 夜

—

紧急警报发出后快半点钟了，天空里隐隐约约地响着飞机的声音，街上很静，没有一点亮光。他从银行铁门前石级上站起来，走到人行道上，举起头看天空。天色灰黑，象一块褪色的黑布，除了对面高耸的大楼的浓影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呆呆地把头抬了好一会儿，他并没有专心听什么，也没有专心看什么，他这样做，好象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时间仿佛故意跟他作对，走得特别慢，不仅慢，他甚至觉得它已经停止进行了。夜的寒气却渐渐地透过他那件单薄的夹袍，他的身子忽然微微抖了一下。这时他才埋下他的头。他痛苦地吐了一口气。他低声对自己说：“我不能再这样做！”

“那么你要怎样呢？你有胆量么？你这个老好人！”马上就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反问道。他吃了一惊，掉头往左右一看，他立刻就知道这是他在自己在讲话。他气恼地再说：

“为什么没有胆量呢？难道我就永远是个老好人吗？”

他不由自主地向四周看了看，并没有人在他的身边，不会有谁反驳他。远远地闪起一道手电的白光，象一个熟朋友眼睛的一瞬，他忽然感到一点暖意。但是亮光马上就灭了。在他的周围仍然是那并不十分浓的黑暗。寒气不住地刺他的背脊。他打了一个冷噤。他搓着手在人行道上走了两步，又走了几步。一个黑影从他的身边溜过去了。他忽然警觉地回头去看，仍旧只看到那不很浓密的黑暗。他也不知道他的眼光在找寻什么。手电光又亮了，这次离他比较近，而且接连亮了几次。拿手电的人愈来愈近，终于走过他的身边不见了。那个人穿着灰色大衣，身材不高，是一个极平常的人，他在大街上随处都可以见到。这时他的眼光更不会去注意那张脸，何况又看不清楚。但是他的眼睛仍然朝那个人消失的方向望着。他在望什么呢？他自己还是不知道。但是他忽然站定了。

飞机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他到这一刻才想起先前听到过那种声音的事。他注意地听了听。但是他接着又想，也许今天晚上根本就没有响过飞机的声音。“我在做梦罢，”他想到，他不仅想并且顺口说了出来。“那么我现在可以回去了，”他马上接下去想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脚已经朝着回家的路上动了。他不知不觉地走出这一条街。他继续慢慢地走着。他的思想被一张理不清的网裹住了。

“我卖掉五封云片糕、两个蛋糕，就是这点儿生意！”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墙角发出来。他侧过脸去，看见一团黑影蹲在那儿。

“我今晚上还没有开张。如今真不比往年间，好些洞子都不让我们进去了。在早我哪个洞子不去？”另一个比较年轻的声音接着说。

“今晚上不晓得炸哪儿，是不是又炸成都，这们(么)久还不解除警报，”前一个似乎没有听明白同伴的话，却自语似地慢慢说，好象他一边说一边在思索似的。

“昨天打三更才解除，今晚上怕要更晏些，”另一个接腔道。

这是两个小贩的极不重要的谈话。可是他忽然吃了一惊。昨天晚上……打三更！……为什么那个不认识的人要来提醒他！

昨天晚上，打三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解除警报，他跟着众人离

开防空洞走回家去。

昨天那个时候，他不止是一个人，他的三十四岁的妻子，他的十三岁的小孩，他的五十三岁的母亲同他在一起。他们有说有笑地走回家，至少在表面上他们是有说有笑的。

可是以后呢？他问他自己。

他们回到家里，儿子刚睡下来，他和妻谈着闲话，他因为这天吃晚饭时有人给妻送来一封信，便向妻问起这件事情，想不到惹怒了她。她跟他吵起来。他发急了，嘴更不听他指挥，话说得更笨拙。他心里很想让步，但是想到他母亲就睡在隔壁，他又不得不顾全自己的面子。他们夫妇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吵，他母亲带着他儿子睡在另一间更小的屋里。他们争吵的时候他母亲房门紧闭着，从那里面始终没有发出来什么声音。其实他们吵的时间也很短，最多不过十分钟，他妻子就冲出房去了。他以为她会回来。起初他赌气不理睬，后来他又跑下楼去找她，他不仅走出了大门，并且还走了两三条街，可是他连一个女人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更不用说她。虽说是在战时首都的中心区，到这时候街上也只有寥寥几个行人，街两旁的商店都已关上铺门，两三家小吃店里电灯倒燃得雪亮，并且有四五成的顾客。他在什么地方去找她呢？这么大的山城他走一晚都走不完！每条街上都可以有她，每条街上都可以没有她。那么他究竟在哪里找得到她呢？

不错，他究竟在哪里找得到她呢？他昨天晚上这样问过自己。今天晚上，就在现在他也这样问着自己。为什么还要问呢？她今天不是派人送来一封信吗？可是信上就只有短短的几句话，措辞冷淡，并且只告诉他，她现在住在朋友家里，她请他把她随身用的东西交给送信人带去。他照样做了。他回了她一封更短更冷淡的信。他没有提到他跑出去追她的事，也不说请她回家的话。他母亲站在他的身边看他写信，她始终不曾提说什么，关于他妻子“出走”的事（他在思想上用了“出走”两个字），他母亲除了在吃早饭的时候用着怜惜的语调问过他几句外，就没有再说话，她只是皱着双眉，轻轻摇摇头。这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平素多忧虑，身体不太好，头发已经灰白了。她爱儿子，爱孙儿，却不喜欢媳妇。因此她对媳妇的“出走”，虽说替她儿子难过，可是她暗中高兴。儿子还不知道母亲的这种心理，他等着她给他出主意，只要她说一句话，他就会另外写一封热情的信，恳切地要求他妻子回来。他很想写那样的一封信，可是他并没有写。他很想求他妻子回家，可是他却信里表示他妻子回来不回来，他并不关心。信和箱子都被人带走了，可是他同他妻子中间的隔阂也就增加了一层。这以后，他如果不改变态度写信到他妻子服务的去（他不愿意到那里去找她），他们两个人就更难和解了。所以他到这时候还是问着那一句老问话，还是找不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说不定小宣会给我帮忙，”他忽然想道，他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也只有几分钟。以后他又对自己说：“没有用，她并不关心小宣，小宣也不关心她。他们中间好象没有多大的感情似的。”的确小宣一清早就回到学校去了。这个孩子临走并没有问起妈，好象知道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似的。无论如何，向父亲告别的时候，小宣应该问一句关于妈的话。可是小宣并没有问！

他在失望中，忍不住怨愤地叫道：“我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呵！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各人只顾自己。谁都不肯让步！”这只是他心里的叫声。只有他一个人听见。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忽然以为他嚷出什么了，

连忙掉头向四周看。四周黑黑的，静静的，他已经把那两个小贩丢在后面了。

“我站在这里干什么呢？”这次他说出来了，声音也不低。这时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自己”两个字上面，所以他会这样发问。这句问话把他自己惊醒了。他接着就在想象中回答道：“我不是在躲警报吗？——是的，我是在躲警报。——我冷，我在散步。——我在想我跟树生吵架的事。——我想找她回来——”他马上又问（仍然在思想上）：“她会回来吗？我们连面都见不到，我怎么能够叫她回家呢？”

没有人答话。他自己又在想象中回答：“妈说她自己会回来的。妈说她一定会回来的。”接着：“妈显得很镇静，好象一点也不关心她。妈怎么知道她一定会回来呢？为什么不劝我去找她呢？”接着：“妈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妈趁着我出去的时候到那里去了呢？说不定现在她们两个在一块儿躲警报。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在警报解除后慢慢走回家去，就可以看见她们在家里有说有笑地等着我。——我对她先讲什么话呢？”他踌躇着。“随便讲两句她高兴听的话，以后话就会多起来了。”

他想到这里，脸上浮出了笑容。他觉得心上的重压一下子就完全去掉了。他感到一阵轻松。他的脚步也就加快了些。他走到街口，又转回来。

“看，两个红球了！快解除了罢？”这不是他的声音，讲话的是旁边两个小贩中的一个，他们的谈话一直没有中断，可是他早已不去注意他们了，虽然他几次走过他们的身边。他连忙抬起头去看斜对面银行顶楼上的警报台，两个灯笼红亮地挂在球竿上。他周围沉静的空气被一阵人声搅动了。

“我应该比她们先回去，我应该在大门口接她们！”他忽然兴奋地对自己说。他又看了球竿一眼。“我现在就回去，警报马上就会解除的。”他不再迟疑，拔步往回家的路上走了。

街道开始醒转来，连他那不注意的眼睛也看得见它的活动了。虽然那一片墨黑的夜网仍然罩在街上，可是许多道手电光已经突破了这张大网。于是在一个街角，有人点燃了电石灯，那是一个卖“嘉定怪味鸡”的摊子，一个伙计正忙着收拾桌面，另一个在发火，桌子前聚集了一些人，似乎都是被明亮的灯光招引来的。他侧过头朝那里看了两眼，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看那个地方。他又往前面走了。

他大约又走了半条街的光景。眼前突然一亮，两旁的电灯重燃了。几个小孩拍手欢叫着。他觉得心里一阵畅快。“一个梦！一场噩梦！现在过去了！”他放心地想着。他加快了他的脚步。

不久他到了家。大门开着。圆圆的门灯发射出暗红光。住在二楼的某商店的方经理站在门前同他那个大肚皮的妻子讲话。厨子和老妈子不断地穿过弹簧门，进进出出。“今晚上一定又是炸成都，”方经理跟他打了招呼以后，应酬地说了这一句。他勉强应了一声，就匆匆地走进里面，经过狭长的过道，上了楼，他一口气奔到三楼。借着廊上昏黄的电灯光，他看见他的房门仍然锁着。“还早！”他想到，三楼的廊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们都没有回来。”他在房门前站了一会儿。有人上来了。这是住在他隔壁的公务员张先生，手里还抱着两岁的男孩。孩子已经睡着了。那个人温和地对他笑了笑，问了一句：“老太太还没有回来？”他不想详细回答，只说了一句：“我先回来。”那个人也不再发问，就走到自己的房门口去。接着张太太也上来了。她穿的那件褪色的黑呢大衣，不但样式旧，而且呢子也磨光了。永远是那张温顺的瘦脸，苍白色，额上还有几条皱纹，嘴唇干而泛白。五官很端正，这一个二

十六七岁的女人，现在看起来，还是并不难看。她一路喘着气，看见他站在那儿，向他打个招呼，就一直走到她丈夫的身边。她俯下头去开锁，她小声同她丈夫说话。门开了，两个人亲密地走了进去。他目送着他们。他用羡慕的眼光看他们。

然后他收回眼光，看看自己的房门，看看楼梯口。他并没有看出什么来。“怎么还不回来？”他想，他着急起来了。其实他忘记了他母亲往常出去躲警报，总是比别人回家晚一点，她身体不太好，走路慢，出去时匆匆忙忙，回来时从从容容，回到家里照例要倒在他房间里那把藤躺椅上休息十来分钟。他妻子有时同他母亲在一块儿。有时却同他在一块儿。可是现在呢？……

他决定下楼到外面去迎接他母亲，他渴望能早见到她，不，他还希望他妻子同他母亲一块儿回来。

他转身跑下楼去。他一直跑到门口。他朝街的两头一望，他看不清楚他母亲是不是在那些行人中间。有两个女人远远地走过来，其实并不远，就在那家冷酒馆前面。高的象他妻子，也是穿着青呢大衣；矮的象他母亲，穿一件黑色棉袍。一定是她们！他露出笑脸，向着她们走去。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但是快要挨近了，他才发觉那两个人是一男一女，被他误认作母亲的人却是一个老头儿。不知道怎样，他竟然会把那个男人看作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他的眼睛会错得这样可笑！

“我不应该这样看错的，”他停住脚失望地责备自己道。“并没有一点相象的地方。”

“我太激动了，这不好，等会儿看见她们会不会又把话讲错。——不，我恐怕讲不出话来。不，我也许不至于在她面前讲不出话。我并没有对不起她的地方。不，我怕我会高兴得发慌。——为什么要发慌？我真没有用！”

他这样地在自己心里说了许多话。他跟自己争论，还是得不出一个结论。他又回到大门口。他听见人在叫他的名字：“宣。”他抬起头。他母亲正站在他的面前。

“妈！”他忍不住惊喜地叫了一声。但是他的喜色很快地消失了。接着他又说：“怎么你一个人——”以后的话他咽在肚里去了。

“你还以为她会回来吗？”他母亲摇摇头低声答道，她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他。

“那么她没有回来过？”他惊疑地问。

“她回来？我看她还是不回来的好，”她瞅了他一眼，含了一点轻蔑的意思说。“你为什么自己不去找她？”她刚说了这句责备的话，立刻就注意到他脸上痛苦的表情，她的心软了，便换了语调说：“她会回来的，你不要着急。夫妻间吵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还是回屋里去罢。”

他跟着她走进里面去。他们都埋着头，不作声。他让她提着那个相当沉重的布袋，一直走到楼梯口，他才从她的手里接过它来。

他们开了锁，进了房间，屋子里这晚上显得比往日空阔，零乱。电灯光也比往常更带昏黄色。一股寒气扑上他的脸来，寒气中还夹杂着煤臭和别的窒息人的臭气。他忍不住呛咳了两三声。他把布袋放到小方桌上去。他母亲走进她的房里去了。他一个人站在方桌前，茫然望着白粉壁，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思想象飞絮似地到处飘。他母亲在内房唤他，对他讲话，他也没有听见。她后来便出来看他。

“怎么你还不休息？”她诧异地问道。“你今天也够累了。”她走到他

的身边来。

“哦，……我不累，”他说，好象从梦里醒过来似的。他用茫然的眼光看了她一眼。

“你不睡？你明天早晨还要去办公，”她关心地说。

“是，我要去办公，”他呆呆地小声说。

“那么你应该睡了，”她又说。

“妈，你先睡罢，我就会睡的，”他说，可是他皱着眉头。

他母亲站在原处，默默地望了他一会儿，她想说话，动了动嘴，却又没有说出什么来。他还是不动。她又站了几分钟，忽然低声叹了两口气，就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他还是站在方桌前。他好象不知道他母亲已经去了似的。他在想，在想。他的思想跑得快。他的思想很乱。然后它们全聚在一个地方，纠缠在一起，解不开，他越是努力要解，越是解不开。他觉得脑子里好象被人塞进了一块石头一样，他支持不住了。他踉跄地走到床前，力竭地倒下去。他没有关电灯，也没有盖被，就沉沉地睡去了。

这不是酣睡。这是昏睡。

二

他做着连续的梦。他自然不知道自己是在梦中。

他和妻住在一个平静的小城里，他们生活得并不怎么快乐，还是常常为着一些小事情争吵。他们夫妇间的感情并不坏，可是总不能互相了解。她爱发脾气，他也常常烦躁。这天他们又为着一件小事在吵架，他记得是为着他母亲的事情。这天妻的脾气特别大。他们还在吃饭，妻忽然把饭桌往上一推，饭桌翻倒在地上，碗碟全打碎了。母亲不在家，孩子躲在屋角哭。他气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用含糊的声音咒骂自己，用力打自己的头。

正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听见一声霹雳似的巨响。这声音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可是他们的屋子摇动了两下，震动相当厉害。

“什么事？”他吃惊地说。他的脑子比较清醒了。

妻默默地站在房门口。孩子的哭声停止了。

“我出去看看，”他说着，就往门外走，打算到楼下去。

“你不要去，要去我们一块儿去。有什么事我们在一块儿也好些，”妻不再生气了，却改变了态度，关心地阻止他出去。

他听从她的话，就在门前廊上站住了。可是他也不说什么。他望着楼板上的碎碗剩菜，带了一点懊悔，等着她讲话。

她不作声。他仍旧在等待。忽然他听见了大炮声（他想，这应该是大炮声），一声，两声。又静下去了。孩子又哭起来。妻发出一声尖叫。

“敌人打来了！”他惊惶地自语道。接着他叫了一声：“妈！”就沿着走廊跑到楼梯口去。

“宣！”妻在后面唤他，“你到哪里去？”

“我找妈去！”他头也不回地答应一句，就一口气跑下了楼。

妻拖着孩子也跑下楼来。“你不能一个人走，你不能丢开我们母子。就是死，我们也要跟着你。”妻哭叫着。

“我要去找妈。我们不能丢开她。万一有事情，她一个人怎么办！”他

一面说，一面打开大门。

门外人声嘈杂。马路上全是人，他只看见万头攒动。大家疯狂地背向着城奔跑。他们有的抱着小孩，有的拿着包袱，有的搀扶着老年人。小孩在哭，女人在唤她们的亲人，男人在催促他们的同伴。

南面的天空被浓烟盖满了。这烟还不断地一股一股朝上卷腾。爆炸声接连地响着，一声高过一声，一声比一声可怕。他知道危险就在面前了。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妈！”他立刻跑下石阶，他要跨过门前草地到马路上去。他要进城去找他母亲。

“你要到哪里去！你不能够丢开我们！”他妻子从后面拖住他的一只膀子，哭嚷起来。“要逃难，你不能一个人逃，不顾我们母子死活！”

“我不是逃难！我去接妈回来，她还在城里！”他站住分辩道。

“你还想在城里找得到她！”妻子冷笑地说。“难道她没有脚没有眼睛，自己不会走路。”

“你快进去收拾东西。等我去接妈回来，大家一块儿走。就说逃难，也得随身带点东西。”他着急地挣脱了她的手。

“你妈不是在那边！”妻指着马路旁沟边一丛牵牛藤说。他顺着她的手指望过去。他母亲就站在牵牛藤下面（牵牛藤是沿着一棵老树干爬上去的），头发蓬乱，脸色惨白，额上好象还有血迹。她正张大眼睛向四处看，显然她是在找寻他。他抬起头大声叫“妈！”他挥着手。可是没有用。他想跑过去。然而他得穿过面前这条人挤得水泄不通的马路。他跑到马路边。人们不给他留一个缝。他用力挤，人们总是把他推开。他似乎听见他母亲的叫声。他也在叫。可是有一只手拉住了他的左膀。那是他的妻子，她手里提着一个小皮箱，孩子跟在她后面。

“我们走罢，不要管她！”她着急地说。

“不行，我要过去接妈回来，”他生气地答道。

“这时候还要去接她？我看你发昏了，我问你性命要不要？我可不能等你！”他妻子板起脸厉声说。

“你让我去。我一定要去接她。她就在我面前，我不能丢开她，只顾自己逃命，”他说，一面抽出他的左膀。

“那么好，你去接你那位宝贝母亲，我带着小宣走我们的路。以后你不要怪我！”她赌气地说。他觉得她在竖起眼睛看他，并且她的眼睛竖得那么直，他从没有见过一个人的眼睛生得这样！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

她果然转过身牵着孩子走了。她没有露一点悲痛的表情，不，她还用她那高傲的眼光看他。

但是他还想她会回来，回到他的身边来；或者他以后可以追上她。然而一转眼她的影子就看不见了。人们好象从四面八方向着他挤过来，仿佛有无数只手在推他，他只觉得身子摇来晃去，似乎立在一只受着大浪颠簸的船上一样。他的脑子发热、发昏。他也用力推别人，用力挤上去。

于是他醒了，醒来的时候，他的手还在动。

这不过是他的一个梦。他这一晚却做了好几个跟这类似的荒唐的梦。

三

他睁开眼睛，天已经亮了。屋子里没有声音。母亲的房门开着。他平安

地躺在床上，心扑冬扑冬地跳着。眼前隐隐约约地现着那些可怕的影子。一种疲乏的、昏沉的感觉压住他。他没有动，也没有想。他慢慢地移动他的眼光，他努力睁大他的眼睛，可是他并没有看清楚什么。他不知道现在和先前，哪一种梦，哪一种是真。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情形里面。他只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他头痛。痛得不厉害，但是他头痛。他在挣扎，他也弄不清楚他在跟什么挣扎。他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一會兒。

忽然什么东西刺了他的脑子一下。他一跳就下了床。他站在屋子中央(就算是中央罢，因为他不靠近一样家具)，惊愕地向四处望。他又用力搔自己的头发，绝望地自语道：“我应该怎么办呢？”他记起昨天的事情了，记起前天的事情了。

“这是我的错。我昨天应该亲自去向她解释，向她道歉。事情是我闹出来的，难怪她生气，”他又说。

“为什么我昨天要写那封信？为什么我不对她讲老实话？为什么我不自己去找她。为什么？……”想到这里他下了决心：“我现在就去。”

他母亲回来了，手里提着菜篮。她看见他还在房里，便惊讶地问：“九点半钟了，你怎么还不去上班？”

九点半钟！他应该去上班！可是他忘记了。他已经迟了半点多钟了。怎么办呢？

“你还没有洗脸？你脸色不好看。你有什么不舒服吗？要不，请一天假也好。你写个字条我给你送去，”他母亲关心地说。

他吃了一惊，慌张地说：“我很好。我就去。”

他不愿意再听她讲话。他拿着脸盆在走廊上水缸里去舀了一盆冷水。他捧着脸盆进屋，刚把它放在方桌上，他母亲又说：“你洗冷水？这怎么要得？快去换热水。锅里头还给你留得有热水。我给你去倒。”她说着就伸手来拿脸盆。

“妈，我已经洗好了，”他连忙说，他的脸给冷水一浸，脑子倒清醒多了。他把脸帕绞干往椅背上一搭，也不倒掉盆里的水，就匆匆走出房去。他并没有刷牙，也忘记戴上他那顶旧呢帽。他走得这样急，显然他不想跟他母亲多谈话。

“真没有出息！跟自己老婆吵了架，就象失掉了魂魄一样！”母亲在屋里这样批评他，可是他已经听不见了。

他走下楼。他走到街上。街上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尘土。这一天是这个山城里少有的不冷不热的好天。

“我先到哪儿去？”他站在人行道上问自己。

“先去找她！”这是第一个回答。他顺从这个意见，朝她办公地方的那个方向走去。他走了几步。他站住，想了一下。他又朝前走几步。

“不对，我应该先去办公，我那个鬼地方连请两点钟假，也要扣薪水，”他最后这样决定了。他又掉转身子。

不久他到了他服务的地方。那是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的总管理处。他的办公桌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楼下的签到簿已经收起来了。这是他三年半以来的第一次迟到。他默默地走上楼去。编辑部主任兼代经理周××忽然在主任室里抬起头来，朝外面看，看见了他，也不说什么话，却露出一一种轻视的表情。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他的整个心思都放在一个人身上。那是她，仍然是她！

他的工作开始了。还是那单调沉闷的工作。他桌上一堆校样（他进来时就看见它们躺在那儿）并不比昨天那堆高。那些半清晰半模糊的字迹，那些似乎还带着油墨气味的字迹，今天并不比往常更叫人厌烦。他机械地移动眼光，移动手，移动笔，他在校样上写下好些字……而且他始终埋着他的头。他们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旧式大挂钟。他听见钟敲了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他没有记住校样上面的一个字。可是钟声他却听得很清楚，特别是这坚决的十二下。他懂得它们的意义。下班了！

他站起来，简直可以说是不知不觉地就站了起来。但是别人比他更快，他们都已经离开办公桌了。他把没有看完的校样和原稿折叠起来，放在一边。他站在桌子前面，眼光迟钝地望着那几扇临街的玻璃窗。窗户全关着，玻璃上积了不少尘土。他也没有想过要看什么。他是在思索。不，他也不能说是在思索。他的思想停滞在一点，停滞在一个字上面——就是“她”！

铃声早已响过了。但是他没有听见。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时候他应该下楼去吃饭。别人好象也忘记了他的存在似的，没有人上楼来叫他。他们更没有想到他还在楼上。

但是他的脑子终于活动起来。他醒了。他离开了办公桌，走下楼去。

饭厅里碗碟狼藉的桌上还有人在吃饭。

“怎么！你在上面！”一个同事惊讶地说，同时用了类似怜悯的眼光看了看他。

他含糊地答应了一句，想了想，也不坐下吃饭，就走出饭厅，往门外去了。

他好象听见了同事们的轻蔑的笑声。

“他们一定知道我的事情，”他这样想道，他觉得脸上烧到耳根了。

他不饿，他也没有想到“饿”同“饱”的事情。他只有一个念头：去找她！

可是走了不到十步，他忽然想：他们会跟在我后面吗？“他们”指的是他的同事们。这个念头使他放慢脚步，他感到踌躇了。不过他并没有停止脚步，或者转过身来。他开始在想象他就要同她见面的情景：她会用怎样的面孔，怎样的话对待他。

“她会原谅我的，”他对自己说了两遍。他温柔地微微一笑。他觉得他是在对着她笑。他的勇气又增加了。

他不知不觉地就到了她办事的地方。

四

她是一家商业银行的行员。大川银行就在附近一条大街的中段。他刚刚走到街角，就看见她从银行里出来。她不是一个人，她和一个三十左右的年轻男子在一块儿。他们正朝着他走来。的确是她。还是那件薄薄的藏青呢大衣。不同的是，她的头发烫过了，而且前面梳得高高的。男人似乎是银行里的同事，有一张不算难看的面孔，没有戴帽子，头发梳得光光。他的身材比她高半个头。身上一件崭新的秋大衣，一看就知道是刚从加尔各答带来的。男人带笑地高谈阔论，她注意地听着。他们并没有看见他。他觉得心里发冷。他不敢迎着他们走去。他正想躲开，却看见他们走下人行道穿过马路到对面去了。他改变了主意，他跟着他们走到对面去。他们脚步下得慢，而且身子

挨得很近。他看得出来，男的故意把膀子靠近女人的身体，女的有意无意地在躲闪。他起初不敢走近他们，害怕她觉察出来他是在跟她。这时他忽然有了勇气，他跟在他们后面。那个男人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话，她声音清脆地笑起来。这熟悉的笑声刺痛他的心。他的脸色变了。他的脚也不动了。他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她的丰满的身子显得比在什么时候都更诱人，这更伤了他的心。他望着，别人的身体遮了他的视线。他忽然向前走去。他一张脸通红，心跳得厉害，他想伸出手去抓她，或者大声唤她。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她同那个男人走进前面一家新开的漂亮的咖啡店去了。

他站在门口，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他想：进去找她讲话罢？——不好，说不定会把事情弄糟。那么回书店去，等着另一个机会，再找她谈话罢。——不好，他放不下心。他应该争取时间，早点同她和解。那么就站在门口等候他们出来罢。——不好，这会伤她的面子。并且要是她不理他呢？要是另一个人帮忙她对付他呢？万一争吵起来，他没有什么权利约束她。他们中间只有同居关系，他们不曾正式结过婚。当初他反对举行结婚仪式，现在他却后悔他那么轻易地丢开了他可以使用的唯一的武器。她始终有完全的自由。这样一想，他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

一路上尽是妻同那个年轻人亲密讲话的影子，偶尔还听见她的笑声，他差一点被一辆人力车撞倒了。

他走进公司，两个同事坐在楼下办公桌前看报。

“怎么啦，老汪？你今天气色不好，连饭也不吃，有什么心事吗？”那个姓潘的年轻人带着讽刺的调子说。这个人一定知道了他的事情，他想到。

“没有事。我肚子不大好，”他连忙做出笑容，临时编出一句假话来。

“肚子不好，吃点药罢。今天下午不要办公了。汪兄，你就请半天假罢，”另一个姓钟的同事说，这个人年纪在五十左右，身子肥壮，头顶全秃了，两腮的肉重重地垂下来，使他的脸成了方形。鼻子特别大，鼻头发红色。这是一个有趣的人，脸上常带笑容，和同事们处得不错，爱喝酒，爱说话。他在这里没有家室，也没有亲人。这里的同事们都称他做“钟老”，并且赞他“会生活”，“会享乐”，“会安排生活”。

“不要紧，我精神很好，”他（现在我应该写出他的完全的姓名了：汪文宣）敷衍地答了一句，就要上楼去。

“老汪，在下面坐一会儿罢，现在还不到办公时间，你何必就上楼去？”姓潘的笑着挽留道。

“你近来瘦了，应该多休息。为这点薪水卖命，也太值不得，”钟老关心地看他一眼，劝道。

他在一个空凳子上坐下来，忍不住低声叹了一口气。

“什么事？什么事？”钟老惊问道，接着就在他的肩头拍一下：“你们年轻人，看开点罢。不要太认真啊！这个年头谁又真正高兴啊！要紧的还是保养自己的身体。”

“靠这点钱连自己的老婆也养不活！哪里说得上保养身体！”他沮丧地答道。

“我懂罗，你跟你太太又闹过架了，”钟老省悟地说。

“不是，不是，”他连忙摇头分辩道，但是看他的脸色，人便知道他是在掩饰。

“汪兄，你不必否认，”钟老微笑道。“夫妻吵架也是平常的事。要是

真的吵起来，你让她一点，尊夫人也就会体贴你的。这种事何必放在心上！”

他没有做声，心里思索着，却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钟老这种说法，我不赞成。一味让步岂不成了‘惧内懦夫’吗？”小潘笑着说。“夫妻吵架，男人不应该让步。女人有什么本事，除了哭，除了骂，难道她们还打得过我们！”

“不要讲了，谁不知道你是怕太太的！”钟老挥着手笑道，“这里又没有外人。”

小潘一张脸通红，掉开头不作声了。汪文宣抬起头看了小潘一眼，嘴一动，似乎要讲话，却又闭紧了。

“汪兄，这里有句俗语：听人劝，得一半。这个年头，大家都在吃苦，还有什么好吵的！女人不及男人会吃苦，有时候闷不过，发点牢骚，也是人情之常。你就让她讲几句，不去理她，什么事都不要紧了。对付太太的最好武器便是沉默。”

“钟老这是经验之谈啊！”小潘大声笑着说。汪文宣吃了一惊。他似乎听懂了这番话，似乎又没有听进去。他忽然站起来，低声自语了一句：“我再去找她。”他就往外面走。

“老汪，去哪里去？”小潘在后面问道。

“我就回来，”他匆匆答道，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了。“他去干什么？”小潘好奇地问道。

钟老默默地摇着头，过了片刻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五

他到了大川银行。没有到办公时间，大门还关着。他又没有胆量从侧门进去。要是她还没有回来呢？要是她拒绝见他，或者见到他不给他一个笑脸，不回答他一句温和的话，他怎么办呢？他的笨拙的口舌能够表达他的感情么？他能够使她了解他的苦衷、明白他的胸怀么？他能够说服她，感动她，使她满意地跟着他回家去么？……他想着，他的决心动摇了，勇气消失了。他迟疑着，不知道应该把脚朝前放或者向后移好。他在侧门前立了两三分钟，终于垂着头转身走开了。

他已经走了十多步了，一阵高跟皮鞋的响声使他抬起头来，她就在他面前，还是先前那一身装束。她迎面走来，认出了他，便停了脚步。她惊讶地看他，动一下嘴，好象要说话，但是忽然把脸掉开，默默地走过去了。

“树生，”他鼓起勇气叫了一声，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他等待她的表示。

她转过头来，带着诧异的眼光看他，不作声。他声音战抖地再叫一声。她向他走来。

“什么事？”她冷冷地问了一句，连她的眼光也是冷峻的。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刻钟的时间？我有话跟你谈，”他埋着头说，声音还有点发颤。

“我要办公去，”她简单地答道。

“我有点要紧事跟你谈，”他红着脸，象一个挨了骂以后的小孩似地说。她软化了，停了片刻，她低声说：“那么你五点钟到行里来找我。”

“好的，”他差不多要流泪地感激说。

她又看了他一眼。他望着她的背影在银行的侧门里消失了。

他跟她不过分别了一天多，怎么就显得这样生疏了？——他忽然有了这个疑问。他等着什么人给他一个回答。他等待着。他的脑子变得十分沉重，好象有一块坚硬的东西放在那里。一只膀子迎面撞过来，他的身子摇晃了两下，他差一点跌倒在人行道上。他仿佛从深梦中醒过来一般，“哦，”他轻轻地叫出一声。他连忙站定身子。人们在他的眼前来来去去，汽车和人力车带着尘土狂奔。他想到：“我也应该去办公。”他跨着大步走了。

他一路上还在想那个问题。走到公司门前，他忽然自语道：“都是我不好。今天下午我应该向她道歉。”

他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周主任不在。另外两个高级职员李秘书和校对科吴科长抽着香烟在谈闲话。他们低声在笑，斜着眼睛看他。他们一定在谈他和他妻子的事情，他暗暗断定道。他觉得脸在发烧，便把头埋在校样上面，不敢看他们一眼。

他校的是一位名家的译文。原作是传记，译文却象佛经，不少古怪字眼，他抓不到一个明白的句子，他只是机械地一个字一个字校对着。同事的笑声愈来愈高，他的头越埋越低，油墨的气味强烈地刺戟他的鼻子，这闻惯了的气味今天却使他发恶心。但是他只有忍耐着。

周主任来了。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非常不高兴，刚坐下就骂起听差来。一个同事去找他，谈起加薪的问题，这样说：目前这点薪金实在不够维持生活，尤其是低级职员，苦得很。

“公家的事，这有什么办法？他们不在我这儿做事，也得吃饭啊！”主任生气地高声答道。

“那么你一个钱也不给，不是更好吗？”汪文宣在一边暗暗骂道。“你年终一分红，就是二三十万，你哪管我们死活！要不是你这样刻薄，树生怎么会跟我吵架？”可是他连鼻息也极力忍住，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怕周主任会注意到他心里的不平。

好不容易忍耐到五点钟。他不敢早退，他听到打铃，才站起来，把校样锁在抽屉里，急急地走下楼去。钟老在后面唤他，要跟他讲话，他却没有听见。

他走到大川银行门口，大门已经关上，侧门还开着。他刚走进侧门，就看见她从办公室转到巷子里来。她看见他，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她略略点一点头。他的勇气增加了，周围突然亮起来，仿佛春天马上就到了似的。他堆着一脸笑向她走过去。

“我们到国际去坐坐，”她低声提议道。

“好的，”他感激地答道，他没有想到国际就是几个钟点以前她同另一个男子进去的那个咖啡店。他觉得心里很轻松，好象谁把这两天来压在他心上的石头拿走了似的。

她在他的右边走着，和他离得并不太近。她一路上闭紧嘴，一共只轻轻咳了三声嗽。

“你不舒服吗？”他实在不能忍耐了，关心地问道。他又看她的脸，她的脸上没有病容。

“没有什么，”她略一摇头，短短地答道。她的嘴又紧紧闭上了。

他发问的勇气也就消失了。他一直沉默着。不久他们就进了国际的厅子。

他还是第一次进国际咖啡店。他觉得厅子布置得十分好看，尤其是天青色的窗帷使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柔和的光。家具全是新的，狭长的厅子里坐满

了客人，可是谈话声并不嘈杂。只有靠里一张临街的桌子还空着，他跟着她走过去坐下了。

“这个地方我还是头一回来，”他说不出别的话，就这样说了。

她的脸上现出了怜悯的表情，她低声说：“拿你那一点薪水，哪里能常到咖啡店啊！”

他觉得一根针往心上刺，便低下头来，自语似地说：“从前我也常坐咖啡店。”

“那是八九年前的事。从前我们都不是这样过日子的。这两年大家都变了，”她也自语似地说。她又小声叹了一口气，她也许还有话说，可是茶房过来把她的话打断了。她向茶房要了两杯咖啡。

“以后不晓得还要苦到怎样。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过今天这样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他做梦似地微微一笑，但是马上又皱起眉头来，接下去：“奇怪的是，不单是生活，我觉得连我们的心也变了，我也说不出是怎样变起来的，”他带了点怨愤的口气说。

茶房端上两杯咖啡来，他揭开装糖的玻璃缸，用茶匙把白糖放进她面前的咖啡杯里，她温和地看了他一眼。

“从前的事真象是一场梦。我们有理想，也有为理想工作的勇气。现在……其实为什么我们不能象从前那样过日子呢？”她说。余音相当长，这几句话显然是从她的心里吐出来的。他很感动，他觉得她和他中间的距离缩短了。他的勇气突然间又大大地增加了。他说，仍然带着颤音：

“那么你今天跟我回家去罢。”

她并不答话，却望着他，眼里有一点惊讶的表情，又带一点喜悦。他看出她的眼睛在发亮，但是过了片刻，光又灭了。她把头掉开去看窗外，只一分钟，她又回过头，叹息地说：“你还没有过够这种日子吗？”她的眼圈红了。

“过去都是我不好，”他埋下头负罪似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脾气变得这样……”

“这不怪你，”她不能忍耐地打岔说。“在这个年头谁还有好脾气啊？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的脾气也不好。”

“我想我们以后总可以过点好日子，”他鼓起勇气说。

“以后更渺茫了。我觉得活着真没有意思。说实话，我真不想在大川做下去。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做个小职员，让人家欺负，也够可怜了！”她说到这里，眼圈都红了，便略略埋下头去。

“那么我又怎样说呢？我整天校对那些似通非通的文章。树生，你不要讲这些话，你原谅我这一次，今天就跟我回家去，我以后决不再跟你吵架，”他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哀求地说了。

“你镇静点，人家在看我们啊！”她把头朝着他伸过来，小声警告说。她拿起杯子放在唇边，慢慢地喝着咖啡。

他觉得一瓢冷水泼到他的头上，立刻连心里也冰凉了。他也端起杯子喝着，今天的咖啡特别苦。“很好，越苦越好，”他暗暗地对自己说。他把满杯咖啡喝光了。

“你不要难过，我并不是不可以跟你回去。不过你想想，我回去以后又是怎样的情形。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

分去她儿子的爱；我呢，我也受不了她的气。以后还不是照样吵着过日子，只有使你更苦。而且生活这样高，有我在，反而增加你的负担。你也该想明白点，象这样分开，我们还可以做个好朋友……”她心平气和地说，可是声音里泄露出来一种极力忍住的酸苦。

“可是小宣——”他痛苦地说出这四个字。

“小宣跟他祖母合得来，他有祖母喜欢，有父亲爱护，也是一样。反正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现在年纪也不小了，用不着我这样的母亲了，”她一字一字十分清晰地说。

“但是我需要你——”他还在要求。

“你母亲更需要你。我也不能赶走她。有她在，我怎么能回去！”她坚决地说。

“那么我怎么办？我还不如不活着好！”他两手捧着头悲苦地说。

“我们还是走罢，你也该回去吃饭了，”她短短地叹了一口气，柔声说，便提高声音叫茶房来收钱，一面把钞票放在桌上，自己先站起来，推开椅子走了一步。他也只得默默地站起来跟着她走了。

他们走出咖啡店，夜已经来了。寒气迎面扑来，他打了一个冷噤。

“那么，再见罢，”她温和地说，便掉转了身子。

“不！”他不能自主地吐出这个字。他看见她回转身来，抑制不住，终于吐出了这个整天都在他的脑子里打转的疑问：

“请你坦白告诉我，是不是还有第三个人，我不是说我母亲。”

她的脸色和态度似乎都没有改变。他的问话并不曾激怒她，却只引起她的怜悯。她明白他的意思，她忧郁地笑了笑。

“第三个人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不过请你放心，我今年三十四岁了，我晓得管住我自己。”她点了点头，便撇下他，毅然朝另一个方向走了。

他呆呆地站在原地方望着她的背影。其实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眼里只有一个景象：她同那个穿漂亮大衣的年轻男子在前面走着，永远在前面走着。

“失败了，谈了许多话，一点结果也没有。我真不晓得她究竟是什么心思。我应该怎么办呢？”他这样想道，他觉得眼前只是一片黑。

“回家罢，”他好象听见自己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没精打采地转过身走了。

“家，我有的是一个怎样的家啊！”他一路上不断地念着这句话。

六

他回到家。大门里象是一个黑洞，今天又轮着这一区停电，也没有一个好心人在门口点一盏油灯。他摸索着走完了漆黑的过道，转上楼梯。他上了二楼，又走上三楼。

他的房门开了一条缝，漏出一点光来。他推门进去。母亲坐在方桌前垂着头吃饭，听见门响，抬起脸来，高兴地说一句：“你回来啦！”他点了点头。“快来吃饭。我等你到现在，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吃饭了，”她絮絮地说。

“我有点事情，所以回来迟一点，”他有气无力地说。他走到饭桌前，在母亲对面的一个方凳上坐下。母亲站起来，给他盛了一碗饭放到他的面前。

“快吃罢，趁现在饭还热，”她坐下望着他带笑地说。“我下午在二楼方经理那里分到一斤肉，煮了一碗红烧肉。这是你爱吃的，我放在饭锅里，

刚才拿出来，还是热的。你尝尝看，这是你爱吃的菜。”她匆忙地把自己碗里的饭几口吃光了。

他静静地听着母亲的慈爱的话，眼光在菜上盘桓了一会儿，他看到粘在碗边的零星的饭粒，他觉得一阵心酸，他只想倒在床上痛哭。可是他仍然低着头用唯唯的答应口吻敷衍他母亲，并且不管自己有没有胃口，他还是一口一口地咽着饭，一筷子一筷子地挟着红烧肉。他在母亲的面前还是一个温顺的孩子。

“你今天不大舒服，是不是？”母亲注意到他这种忍受性的沉默，她感到不安了，便关心地问道。

“没有，”他摇摇头答道，接着添一句：“我很好。”他又低下头不说话了。

他母亲关心地望着他，她希望他对她多讲几句话。但是他连看也不看她一眼。她忍不住又说：“菜没有冷罢？”

“没有，”他机械地答道，也不抬起头来。

她感到失望，等了他这一天，他回来却这样冷淡地对待她！她明白了，一定是那个女人在他的心上作怪。她更留心地看着他。他放下碗筷，默默地站起来。

“吃饱啦？”她压住刚刚升上来的怒气，温和地问道。

“是，”他答道。他动手收拾饭桌。

“你才吃一碗嘛，”她又说。

“我刚才同树生喝了咖啡，”他大意地老实说了出来。

她的怒火立刻冒上来了。又是那个女人！她在家烧好饭菜等他回来同吃，他却同那个女人去喝咖啡。他们倒会享福。她这个没出息的儿子。他居然跑去找那个女人，向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低头。这太过份了，不是她所能忍受的。

“你怎么还会去找她？……她还有脸见你？”她大声说。

“我要她跟我回家，”他低声答道。

“哼！她还好意思回来！”她冷笑道。

“她虽然不肯回来，不过我想，过几天她会回心转意的，”他胆怯地说。

“她还会回来？你真是在做梦！我如果是你，我就登报跟她离婚，横竖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的，”她涨红脸生气地说；“我十八岁嫁到你汪家来，三十几年了，我当初做媳妇，哪里是这个样子？我就没有见过象她这样的女人！”她气得没有办法，知道儿子不会听她的话，又知道他仍然忘不了那个女人，甚至在这个时候她还是压不倒那个女人，树生这个名字在他的口里念着还十分亲热。

“我看她也有她的苦衷，不过她不肯讲出来，——”儿子似乎并没有听母亲讲话，他只顾想自己的事，说出的话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可是话说了一半，就被母亲打断了。

“你现在还替她辩护，真不中用！她背着你交男朋友，写情书，还有什么苦衷可说！”母亲也站起来，拿右手的食指指着他的鼻尖说。

“那不见得就是情书啊，”他解释道。

“不是情书，为什么害怕拿给你看？为什么要私奔——”说到“私奔”两个字，做母亲的人也讲不下去了，她瞪着两眼站在他的面前。

“妈，”他哀求地唤一声，眼里已经装满了泪水。他半晌接不下去。

“你说嘛，”过了片刻，她和蔼地说。他的眼泪赢得她的同情，她的恨消失了。她爱怜地望着他，仿佛他还是从前那个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来向母亲哭诉似的。

“妈，你太不了解树生，她并不是私奔，她不过到朋友家里住几天，她会回来的，”他痛苦地说。

“哼，我不了解她？”她冷笑道。“老实对你说，我比你更了解她。她不会永远跟着你吃苦的。她不是那种女人，我早就看出来。到现在你该明白了罢。只有你母亲才不会离开你，不管你苦也好，闲也好。你说我不了解她，是不是她对你那样说的？”

他看见母亲又动气了，对她的最后一句问话，便不肯老实地回答，他只是摇着头说：“不是，她没有说什么。”

母亲瞪了他一眼，过了片刻，才长长地叹一口气，她说：“你去休息罢，等我来收拾。你一天也够累了。”

“不要紧，我不累，”他没精打采地说。他的确很倦，但是他终于支持着，帮忙他母亲把碗筷洗干净了放进碗橱里去。母亲把瓦烛台放在屋中央方桌上，吩咐他说：“我在这儿缝点东西。你没有事，还是躺一会儿罢。”她走进旁边小屋去拿了一件男孩的大衣出来，坐在方桌前，将就着烛光，开始补衣服。她的头埋得低。眼镜也戴上了。烛光摇晃得厉害，过不多久，光线又暗淡了，她的头似乎也埋得更低了。

他本来到了床前，也想躺下睡一会儿。可是他只在床沿上坐了一下，又站起来，走回到方桌前，默默地立在那里。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头上，她的头上象撒了一堆盐似的。他才注意到她竟然这样衰老了，头发全变了颜色。她忽然取下眼镜，用力揉了几下眼睛，又把眼镜戴上，继续工作。“小宣也可怜，这件大衣穿了三个冬了。就是不坏，明年也穿不上身了。论理今年该给他做件新的，不过他爸爸这样苦，能够给他上学读书已经不容易了。……唉，蜡烛越来越坏了，三十块钱一支还是这样的，一点也不亮，又伤眼睛。我究竟老了，人简直不中用了。也只有这几针，花了我这么多的功夫。他妈又不管他。也是他命苦，才投生到我们家里来，”她唠唠叨叨地在自言自语，她似乎没有觉察到他站在她旁边看她。

“妈，你晚上不要做了，你眼睛近来更坏了，你要好好保养啊，”他感动地、痛苦地大声说。

“我快完了，没有几针了，”她抬起头看了看他，回答道。“晚上不做，白天又要买菜煮饭，哪儿有功夫做啊！我这双眼睛也没有别的用处，还要保养它们做什么？”她右手拿着穿了线的针打颤地在那件旧大衣上面动着。“比不得他妈，象鲜花一样，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只顾自己打扮得漂亮，连儿子也不管。说是大学毕业生，受过高等教育，在银行里做体面事情，可是就没有看见她拿过几个钱回家用。”

“妈，还不说贴补家用，单是小宣的学食费也就亏她了，这学期已经花了两万多，快三万了，”他插嘴说。

“那还不是她自己招来的，她一定要把他送到那种贵族学堂去。他同学都是阔人子弟，只有他是穷家小孩，处处比不过别人。她又不肯多给他钱花。小宣常常叫苦，”她说。

他实在听不下去。不管他怎样倦，他心里烦得厉害。他不能安静地睡去，也不能安静地做事，他甚至不能安静地看他母亲工作。屋子里这样冷，这样

暗。他的心似乎飘浮在虚空中，找不到一个停留处。他觉得自己痛得不够，苦得不够，他需要叫一声，哭一场，或者大大地痛一阵，挨一次毒打。但是他不能安静地站在母亲的身边。

他大步走向门。他拉开门出去了。“宣！宣！”他听见母亲在屋子里唤他，他连应都不应一声，就匆匆走下楼去。他在黑暗中把右眉碰肿了，可是他并没有感到痛。他只有一个思想：“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应该受罚！”

七

他走到大门口。对面人行道上水果摊和面担子旁边几盏电石灯星子似地在黑暗的街中闪光。他感到冷意，把肩头耸了一下。“到哪里去呢？”他问自己。他找不到回答。他大步走下街心。

他无目的地走过三条街，差一点被一辆飞跑下坡的人力车撞倒。车夫骂了他两句，他也没有听进耳里，仿佛他周围的一切都和他隔得很远似的。他心里空虚得很。

他又走了一条街，还是不知道应该走到哪里去。对面那条街灯光辉煌，不知道有多少盏电灯。两条街成了两个世界！他便朝着灯光走去。

他刚走到街角，忽然一个声音在唤他的名字：“文宣！”他吃惊地侧头一看。他发觉自己站在一家冷酒馆的门前。就在靠门一张方桌旁边，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立起来招呼他。

“你来得正好，坐下来吃杯酒罢，”那个人大声说。他认出这是他一个中学同学。他们有半年光景没有见面，那个人却苍老了许多。要是在平时，他至多站着谈三四句话就走了。现在他却默默地走到方桌旁，拉开板凳，在那个同学对面坐下来。

“来杯红糟！”同学掉转脸向着柜台大声吩咐道。

柜台那面有人答应着，于是一杯香喷喷的大曲酒端上来了。

“给我再来一杯，”同学一口把杯里的残酒喝干了，红着脸拍着桌子叫道。

他说话了：“柏青，我记得你从前不会喝酒，你几时学会的？”

“我没有学过，我没有学过。我想吃，我非吃不可，”同学摇摆着头大声说。“你先干一杯。”

他望着同学，并不答话。过了片刻，他拿起酒杯，默默地喝了一大口。他放下杯子，长叹了一口气。一股热气直往喉管冒，他压不下去，打了一个嗝。

“干一杯，干一杯！你没有干，不行！”同学做着手势接连地催他喝酒。

“我干，我干，”他激动地说，他真的一口把剩余的酒喝干了。他觉得心跳得厉害，脸也烧起来。

“再来一杯，”同学拍着桌子叫道，一面从桌子中央几个瓦碟子里拿了一块豆腐干，又抓了一把花生放在他的面前，说：“你吃。”

“我不能喝了，”他连忙摇手拦阻道。

“老兄，怕什么！吃醉了有什么要紧！我觉得醉了还比醒着好些，”同学说。酒已经送到他面前了。

“可是人不能一辈子喝醉啊，总有醒的时候，”他寂寞地苦笑道。他望着同学的脸，他发觉这个三十岁的人在半年中间至少老了十年，额上现出好几条皱纹，两颊深陷进去，眉毛聚在一起，眼睛完全失了光彩，两颗眼珠呆

呆地望着他。他心里一阵难过，又加上一句：“醒来岂不是更苦吗？”

那个人不作声了，埋下头喝了一口酒，又抬起脸看他一眼，然后又喝一口酒。“我心里真不好过，”同学摇摆着头自语似地说了。

“不好过，为什么还到这里来喝酒？早点回宿舍不好吗？我送你回去，”他关心地说。

“不吃酒又干什么？吃多了至多也不过病——死，我不怕。死了也好，”那个人带着痛苦的表情说。“我完了，我什么都完了。”

“你不明白，你的处境总比我好。我都能忍下去，你还不能吗？”他同情地说。他望着那张瘦脸，觉得自己的伤痕被触动了，心里一阵痛，他差一点掉下泪来。“你太太好吗？是不是还住在乡下？”

他换过话题说。他想到那个孩子面孔的女人，他们一年前在百龄餐厅结婚，他同树生还去参加了那个简单的婚礼。他后来也到他们乡下家中去作过客。那个年轻太太笑起来多么甜，树生也喜欢她。他想到自己的痛苦，就想到树生，于是联想到那位太太的身上。

“她过去了，”同学低声说，掉开脸不看她。

“她不在了？什么病？”他吃惊地说，他仿佛坐到了针尖上一样，差一点要跳起来了。

“她没有病，”同学摇摇头冷冷地说，脸色却十分难看。他难猜出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她——”说到“她”字他连忙住了口，他自己也害怕听下面的话：自杀？惨死？好象一根锥子在钻他的心。

同学不作声，他也不作声。这沉默太叫人难堪了。别的桌上的酒客们似乎都不快乐，有的人唠唠叨叨地在诉苦，有的在和同伴争论一件事情，右边角落里桌子旁边一个中年酒客埋着头，孤寂地喝着闷酒，忽然站起来付了酒钱走了。这个人出门后，堂倌告诉一个白脸客人说，这是一个每晚必到的老主顾，不爱讲话，喝酒也不过量，两块豆腐干便是他的下酒菜。他按时来准时去。谁也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干什么样的职业。

汪文宣听得厌烦了，昂起头长叹一声，酸苦地说：“无处不是苦恼！”

那个同学吃惊地望着他，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下来。“今天是她的头七。”歇了一下他又说：“十天前她还是很好的，一点病也没有。她怀着小孩已经足月了，我陪她到那里的卫生院去检查，医生说她还不到月份，最早也要在半个月以后，不让她住院。我不能够在乡下多住半个月，我那个机关的科长跟我合不来，他故意捣乱，不准我的假。我进城来了。第三天我女人就发作了。她痛了大半天，没有人管，后来同院子住的太太发觉了，才送她进卫生院去。从前检查的时候，说是顺产，一切都没有问题。到了卫生院，孩子却生不下来。接生的医生把我女人弄来弄去，弄到半夜，才把孩子取出来，已经死了。产妇也不行了。我女人一晚上叫着我的名字，她叫了一两百声才死去。据说她叫得很惨，她声音连楼下的人也听得见。她只想在死去以前跟我见一面，要我给她伸冤。可是我住在城里哪里知道！我得到电话，立刻赶去，她已经冷硬了，肚皮大得吓人，几乎连棺材也盖不上。我还是跟没有结婚以前一样，一个人。我葬了我女人，进城来第一件事就是请长假。我一天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只听见我女人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不管我在家里，在街上，我都听见那个声音。你听她在叫：柏青！柏青！说话的人用两根手指敲着右边太阳角。“是，的确是她的声音，她叫得多惨！……所以我只想喝酒，我

只想醉，顶好醉得不省人事，那时候我才听不见她的声音。活着，活着，真不容易啊！以后除了酒，我还有什么伴侣呢？”这个人用右手蒙着脸，轻轻抽泣了几声，然后象睡去似地寂然了。

汪文宣听完了这个人的故事，他觉得仿佛有一只大手把他的心紧紧捏住似的，他尝到一种难忍的苦味。背脊上一阵一阵地发冷。他的自持的力量快要崩溃了。“你这样不行啊！”他为了抵抗那越来越重的压迫，才说出这句话来。他心里更难过，他又说：“你是个文学硕士，你还记得你那些著作计划吗？你为什么拿起笔来？”

“我的书全卖光了，我得生活啊，著作不是我们的事！”同学突然取下蒙脸的手，脸上还有泪痕，两眼却闪着逼人的光。“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再去结婚，再养孩子，再害死人？我不干这种事。我宁愿毁掉自己。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这种人的。我们奉公守法，别人升官发财……”

“所以我们还是拼命喝酒！”汪文宣大声接嘴说。他完全崩溃了，他用不着再抑制自己，堤决了一个口，水只有向一个地方流去。他悲愤到了极点，他需要忘记一切，醉自然成了他唯一的出路。“拿酒来，拿酒来！”他喝着。堂倌又送来一杯酒。他望着杯里香喷喷的液体，心里想：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咬着牙吞下去，立刻一股热气冲上来，他受不住，打了一个嗝。“我喝不了酒，”他抱歉地说。他想：我真不中用，连酒也不会喝，就该永远受人欺负。于是他反抗似地把余酒接连几口就喝光了。

“你脸红得跟关公一样，你吃醉没有？”同学好意地问道。

“没有，没有！”他用力回答道，他觉得脑子凝成一块重重的硬东西，他一用力讲话，脑子就痛。脸烧得厉害，身子轻飘飘的。他想站起来，没有立稳，又颓然坐下。

“怎么！当心啊！”同学大声说。

“我一点也没有醉，”他说着，想笑一笑，可是他连笑也不会了。他只想哭。他觉得一切可悲的事都涌到了他的心头。他也分不清楚是些什么事情。他头晕得厉害，心里也很难过。他忍不住。他觉得那个同学的眼睛变成了许多对，在他的面前打转。他用力一看，还是那张忧郁的瘦脸孔。但是过了片刻，他又看见许多对眼睛了，连电灯光也在旋转。他挣扎着，终于支住桌子站起来。“我醉了，”他认输地说。他朝同学点一个头，就跟跄地走出了冷酒馆。

他东歪西倒地走在人行道上走了一条多街，忽然想起了家。好象看见一道光照亮自己的身子，他有点清醒了。“我怎么会这样啊，”他懊恼地想道。他掉转身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他刚走了两步，一个庞大的黑影迎面撞来，撞得他眼前直冒火星，大半个脸发巨痛又发烧，他的身子摇晃了两下，差一点倒下去。

那个人凶狠地骂了两三声。他没有听进耳去，仍旧歪歪斜斜地走了。他想走得快，可是他心里很难过，似乎有一肚皮的东西在向上翻腾。他还想忍耐，但是他终于张开口，喷泉似地吐出了他先前在家里吃的晚饭。

他觉得吐够了，也不揩干净嘴，便又往前走。那种酒臭连他自己也厌恶。他只想回家静静地睡一觉。他恨不得两步就走到家。可是他的心越急，脚越是走不快。走了大半条街他又吐起来。这次他吐得不畅快了，仿佛未吐尽的

饭菜都塞在他的喉管里，他心里烧得难过。他用力挣一下，才吐出一口来。他一路走，一路呕。过路人中间有几个好奇地望着他。那些眼光并不曾引起他的反感。周围的一切都跟他不相干了。这时候就是有人死在他的旁边，他也不会掉头去看一眼。

可是就在这时候两个女人从一家灯光耀眼的下江饭馆里谈着话走出来。他的眼光无意地触到她们的粉脸上，他大吃一惊，连忙掉开了头。他的动作十分不灵活，两个女人中年纪较大的一个已经把他看清楚了。她叫了一声：“宣。”

他不答应她，却大步走向黑暗的地方去。但是走了不多远，整个身体已经不由他控制了，他就站在人行道的边沿上弯着腰吐起来。他大声呕着，吐出来的东西不多，可是心却象被熬煎似地难过，满口都是苦味。他慢慢地伸直身子，靠着旁边一根电线杆喘气。

“宣，”他听见这一声柔和的呼唤，不自觉地掉过脸去。他的眼里泪水模糊，她又背了光立着，他匆促的一瞥，只看见她一个轮廓，但是他已经认出树生来了。“你怎么了？”她惊问道。

他喘着气，望望她，觉得有满肚皮的话，不知道怎么说起，实在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生病吗？”她关心地说。

他摇摇头，觉得气顺了，但是眼泪又流了出来，先前的泪水是呕吐时挣出来的，现在流的却是感激与悲伤的眼泪。

“你怎么不回家去？看你吐得这样难过！”她又说。

“我喝醉了，”他悔恨地答道。

“你怎么去喝酒？你本来不会喝的。快回家去睡觉，看真的闹出病来，”她着急地说。

“在家里妈也不了解我。我心里很烦，到街上走走，碰到一个同学拉我去喝酒，就喝醉了，”他抱歉似地解释道。“谢谢你，再见。”他觉得好了些，便离开电线杆走下街心去。身子仍然在摇摇晃晃。

“当心，看跌倒的！”她在后面大声叮嘱道。她马上又跟着他走下去，走到他的身边，说一句：“我送你回去，”便挽着他的左膀往前走了。

“你真的送我回去？”他声音发颤地问道。他胆怯地看看她。

“我不送你，我怕你又会跑去喝酒，”她含笑地说。他感到一丝暖意，心里也舒服多了。

“我再也不喝酒了，”他孩子似地说，便让她扶着走回家去。

八

他们走到大门口，他看见那个大黑洞，就皱起眉头，踌躇着不进去。

“你看不清楚，当心，慢慢走啊！”她并不离开他，反而偎得更紧，她关心地嘱咐他，一面用力抬他的膀子。

“你？你不进去？”他耽心地问。

“我陪你上楼去，”她在他的耳边小声回答。

“你对我真好，”他感激地说了一句，他真想搂着她高兴地哭一场。可是他只看了她一眼，就默默地低下头，移动脚步，走进大门，踏下他极熟悉的台阶。“当心啊，”她不断地在他的旁边说，她还用了全力支持着他，

可是她的扶持只有使他走得更慢。“上楼啊，”她又在叮嘱。他暗暗高兴地又答应了一声。他们终于走上了三楼，刚踏完最上一级楼梯，就看见隔壁那位公务员的太太举着一支蜡烛从房里出来。

“汪太太，你回来啦！”那个苍白脸的女人含笑招呼道，脸上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不过人可以看出这是带善意的。她对这个温顺的女人点头笑了笑，然后应酬说：“张太太，你下楼去？”

张太太一面应着，一面惊奇地看了他一眼，温和地问道：“汪先生有什么不舒服吗？”

他垂着头站在妻子的身旁，答不出话来。她代他答道：“不是，他喝了酒。”

“我们张先生也吃醉啦，我出去给他买几个广柑。汪太太，你快陪汪先生进去罢，让他睡一会儿就会好的，”这个小女人亲切地微笑道，她的笑容并不是虚假的，不过就在笑的时候，她额上几条忧郁的皱纹还是十分显露，双眉也没有完全开展。“这个小女人，生活把她压得太苦了！”汪太太每次看见她，就要起怜悯的念头。小女人走着慢步子下楼去了。他们夫妇借着她的烛光，走到了房门口。

门并没有上锁，他一推，门就大开了。屋里还是那样阴暗，蜡烛仍然点在方桌上，母亲仍旧坐在方桌旁，戴着眼镜，补衣服。她显得那样衰老，背弯得那样深，而且一点声息也不出。烛芯结了小小的烛花，她也不把它剪去。她好象这许久都没有移动过似的。

“宣，你到哪里去了？也不先对我讲一声。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女人？你也是……我劝你还是死了心罢。现在的新派女人，哪里会长远跟着你过这种苦日子啊！”母亲一面说话，一面动针，她并没有抬起头来。她还以为她儿子是一个人回来的。“宣，不要难过，那个女人走了也好。将来抗战胜利，有一天你发了财，还怕接不到女人！”她没有听见儿子回答，便诧异地抬头一看，她满眼金光，什么也看不出来，眼睛干得十分难过。她放下针线取下眼镜，用手在眼皮上揉了几揉。

他母亲说到“那个女人”的时候，他便痛苦地皱起眉头，一面伸手去紧紧捏住他妻子的一只手，他害怕他妻子会跟他母亲吵起来。可是他妻子始终不作声。到这时他不能再忍耐了，便叫了一声：“妈！”声音里含着恳求和悲痛。

“什么事？”母亲惊问道。她把手从眼睛上拿下来。这次她看见了，在他的身旁就站着那个女人！

“我陪他回来的，”树生故意装出安静的样子说。

“好，你本领大，你居然把她请回来了，”母亲冷笑道，她又埋下头动起针线来。

树生带着微笑看了母亲一眼，后来才说：“并不是他去请我回来的，他不晓得在哪里喝了酒，在街上到处乱吐，我看见，才送他回来的。他走路都走不稳了。”她故意用这样的话来气他的母亲。

“宣，你怎样不给我讲一声就偷偷跑出去吃酒？”母亲差不多惊得跳起来，她把衣服针线全丢在桌上，走到儿子的面前，她仔细地看他。“你不会吃酒嘛，怎样忽然跑出去吃酒？你不记得你父亲就是醉死的！我从小就不让你沾一口酒。怎么你还要出去吃酒！”她痛苦地大声说。

“他心里难过，你让他睡觉罢，”树生打岔道。

“我没有跟你讲话！”母亲掉过脸带怒地抢白道。

树生冷笑一声，赌气地不响了。

“宣，你告诉我你怎样吃酒的，”母亲象对一个溺爱惯了的小孩讲话似地柔声说。

他疲倦地垂着头不答话。

“你说呀！你心里有什么事，你说呀！”母亲催促道。“你尽管直说，我不怪你。”

“我心里难过，我觉得还是醉了好些，”他被逼得失掉了主意，老老实实地答道。

“那么你什么时候碰到她的？”母亲还不放松地追问，另一种感情使她忘记了她儿子的痛苦。

“你让他睡罢，”树生忍不住又插嘴说了一句。

母亲不理睬，还是要儿子回答。

“我——我——”他费力吐出了这两个字，心上一阵翻腾，一股力量从胃里直往上冲，他一用力镇压，反而失去了控制的力量，张开嘴哇哇地吐起来。他自己身上和母亲的身上溅到了他吐的脏东西。

“你快坐下来，”母亲慌张地说，她把那些问题全抛在脑后他仍旧立原处弯着腰呕吐，妻子给他捶背，母亲为他端了凳子来。他吐出的东西并不多，可是鼻涕眼泪全挣出来了。他坐在凳子上喘气，两只手压在两个膝头上。

“真是何苦来，”妻子立在他背后怜惜地说。

“你照料他去睡罢，”母亲终于心软了，让步地对她儿媳说；“我去弄点灰来扫地。”

母亲出去以后，妻子便扶着丈夫走到床前，她默默地给他脱去鞋袜和外衣。他好些年没有享过这样的福了。他象孩子似地顺从她。最后他上了床，她给他盖好被。她正要转身走开，他忽然从被里伸出手来将她的右手握住，并且握得紧紧的。

“你好好睡罢，”她安慰他道。

“你不要走啊……我都是为了你……”他睁大眼睛哀求地说。

她不答话。她在思索。她在他旁边站了好一阵子，泪珠从两只眼角慢慢地滚了下来。他不久就睡着了。可是他的手始终没有放松。

这晚上她留了下来。他的一个难题就这样简单地解决了，他自己还不知道。

这一夜他睡得好，一直睡到天大亮他才醒过来。他妻子正坐在窗口小书桌前化妆。

“树生，”他惊喜地唤道。她回过头看他，脸上绽出灿烂的微笑。她柔声问他：

“你好了？要起来吗？”

他点点头，伸一个懒腰，满意地答道：“我好了。我就起来。”

她又转过头去继续化妆。她脑后烫得卷起的头发在他的眼里显得新鲜，好看。她轻轻地咳了一声嗽。

她回来了。这并不是梦。这是真实的事。

这一对夫妇过了十几天平静的生活。两个人都是按时上班，按时回家。妻子也不再提离开的话，连那个箱子也从友人家拿回来了。就在拿回箱子的晚上，丈夫陪妻子在国泰戏院看过一次电影；他们后来又去看过一次，可是这次刚看到三分之二，电影就因警报台上挂出一个红球而停止放映了。

母亲常常躲在她那个小房间里。她似乎故意避开她的儿媳，不过两个人要是遇在一处，她也并不对树生板面孔，说讽刺话，她只是少讲话罢了。

星期日早晨小宣回家来，下午搭最后一班汽车回学校去。祖母见到孙儿，特别高兴。她自然把她亲手补好的大衣给小宣试穿了。为了这件大衣，她儿媳也对她含笑地说过几句感谢话。

天永远是阴的，时而下小雨，时而雨停。可是马路始终没有全干过。有时路上布满泥浆，非常滑脚，人走在上面，很不容易站稳。人行道上也是泥泞的。半个月很快地过去了，汪文宣某一天上午去公司办公，刚走到十字路口就跌了一跤，把左边膝盖皮擦破一块，他忍住痛，一歪一拐地走到公司门口。还没有到办公时间。钟老坐在办公桌前，两眼望着路上行人，看见他进来，便问：“你怎么啦，跌了跤吗？”

他点点头，不答话，签了到以后就往楼梯口走。

“你请天假罢，不要把身体累坏了啊！”钟老关心地说。

他在楼梯口站住了，回过头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轻轻地答道：“你晓得的，我有多少薪水好扣啊！”

“这种时候，你还耽心扣薪水！你还要替公司拼死命！你知道我们还能够在公司吃多少天饭！”钟老有点激动地埋怨道。

“有什么办法！我们既然吃公司的饭，”他疲倦地答道。他想笑，却笑不出声来。

“吃公司的饭？我们这个不是铁饭碗啊，”钟老冷笑道。

他吃了一惊，连忙走近钟老的办公桌，小声问道：“你听到什么消息吗？”

“日本人打下了桂林，柳州，来势很凶啊。听说总经理有过表示，要是敌人进了贵州，就把公司搬到兰州去，他已经打电报到兰州去找房子了。要是真的搬兰州的话，什么都完了。我们这般人还不是只好滚蛋！”钟老又发牢骚地说。

会有这样的事！他发呆了。他的眼前一片黑暗。他疲倦地摇着头说：“不会罢，不会罢。”

“也说不定。不过他们那种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拿公司来说：一些人一事不做，拿大薪水；象你整天拼命卖气力，却只拿那么一点钱，真少得可以！”钟老还没有把话讲完，看见周主任大步走进来，便收了话头，低声对他说：“他今天怎么来得这样早！……你上楼去办公罢。”

他没精打采地上了楼。他走过吴科长的办公桌前，吴科长忽然抬起头把他打量了一下，看得他毛骨悚然。他胆战心惊地走到自己位子前坐下，摊开那部永远校不完的长篇译稿，想把自己的脑子硬塞到那堆黑字中间去。“真没有出息啊，他们连文章都做不通，我还要怕他们！”他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做他的工作。

腿不断地痛，他的思想不能够集中，他不知道自己一上午干了些什么事。他想到家，想到这里的工作情形，想到刚才钟老的话。他好些天没有看报了。

他个人的痛苦占有了他的整个心，别的身外事情再也引不起他的注意。过去，湘北战事爆发，长沙沦陷，衡阳苦战，全州失守，都不曾给他添一点苦恼。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着他，这几年他一直没有畅快地吐过一口气。周围的一切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人人都在对他说，世界大局一天一天地在好转，可是他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地更艰难了。

开饭的铃声惊醒了他，把他从那些思想的纠缠中救了出来。他仰起头吐了一口气。一个同事马上走到他面前，说声：“你签个字罢，”就摊开一张信笺在他的桌上。他吃惊地一看，原来是同事们发起的给周主任做寿的公启，每人名下摊派一千元。一千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踌躇一下，但是那个同事轻蔑地在旁边咳嗽了。他惶恐地立刻拿起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同事笑了笑走开了。他站起来，觉得不仅左膝还在痛，连周身骨头都酸痛了。他勉强支持着走下楼去吃中饭。

在饭桌上同事们激动地谈论着桂、柳的失陷，和敌人的动向。他埋着头吃饭，不参加讨论，也不倾听他们谈论。他觉得浑身发冷，疑心是“摆子”发作了。他放下碗离开饭桌，钟老望见他，便走过来说：“你不舒服罢？你脸色很难看，下半天不要办公了。回家去睡个午觉也好。”

他感激地点一个头，回答道：“那么就请你替我请半天假罢；我自己也觉得精神不大好。”他走出门去。一辆人力车正拉到门前，车夫无意地看了他一眼。钟老在门内劝道：“你坐车回去罢。”

“不要紧，路很近，我可以慢慢走，”他回过头答道，便打起精神走下马路，到对面人行道上去了。

他走得很慢。身子摇摇晃晃；头变得特别重，不时要往颈上缩。走路时左漆的伤处仍然在痛，他只好咬紧牙关，三步一停地埋着头走，终于走了一大段路。前面就是国际了。他忽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分明是他的妻子在说话。他吃惊地抬起头。果然是她，她同那个穿漂亮大衣的年轻男子站在玻璃橱窗前，看里面陈列的物品。但是她马上跟着那个人进里面去了。她没有看见他，也不会想到他离她就只有三四步的光景。

他看到她的背影，今天她的身子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动人，她丰腴并且显得年轻而富于生命力。虽然她和他同岁，可是他看看自己单薄瘦弱的身子，和一颠一簸的走路姿势，还有他那疲乏的精神，他觉得她同他相差的地方太多，他们不象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这样一想，他感到一种锋利的痛苦了。那个身材魁梧的年轻男人使他苦恼。她和那个人倒似乎更接近，距离更短。她站在那个人旁边，倒使看见的人起一种和谐的感觉。他的心不安静了。他本来已经走过了那个咖啡店，现在又转回来，也站在橱窗前，看看里面放着些什么东西。大蛋糕、美国咖啡、口香糖、巧克力糖，真是五光十色。他们在看什么呢？——他想。“Happy Birthday”，蛋糕的奶油面上红花绿叶中间现出这两个红色的英文字。他忽然记起来还有半个多月便是她的生日。他们刚才在看的，是不是这个生日蛋糕呢？那个年轻男人在准备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吗？可是他自己呢？他又有什么礼物送给她？他不自觉地把手伸进衣袋里去。他掏出一把钞票来。他低头数了一数，一千一百几十元！这是他的全部财产。他明晚还得拿出公宴主任的份子钱一千元。他再看蛋糕，他看见了旁边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四磅奶油大蛋糕法币一千六百元”。他叹了一口气。他连一磅也买不起，多寒伧！他躲避似地掉开了头。他刚把身子转开，忽然想道：“他一定买得起的。”

这个“他”指的是里面那个年轻人。这个思想伤害了他。他已经走过了咖啡店，又回转来，走进大门，站到玻璃货柜前，假装在看里面陈列的糖果点心，却偷偷地侧过头朝咖啡厅看去。树生正拿起杯子放到唇边小口地呷着，她的脸上带着笑容。妒忌使他心里难过。他又害怕她会看到他。他不敢再停留，便急急地走出了大门。

一路上他只觉得心在翻腾，头在燃烧，他耽心自己会倒在这条倾斜不平的泥泞路上。他总算支持着到了家。

母亲系着围裙，立在方桌前挽起袖子洗衣服，抬起头惊讶地问他一句：“你吃过饭没有？”

“吃过了，”他疲倦地答道。他勉强地在母亲旁边站了片刻。

“你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早？脸色又这样难看！你不舒服吗？”母亲吃惊地说，她把两只手从盆里拿出来，在围裙上揩干了。“快去睡下来，快去睡下来！”她半扶半推地把他送到床前。

“我没有病，”他还在解释，但是到了床前他再也支持不住，连鞋子也不脱，便倒下去。

“你把鞋子脱掉，舒服点，”母亲站在床前说。

他挣扎着刚要坐起来，马上又倒下去了，同时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

“你好好地睡，我给你脱，”母亲说着，真的弯下身子去解他的鞋带。他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母亲把他的两只皮鞋都脱掉了。她伸直身子带着痛苦的关心望他的脸。“我给你盖床毯子罢，”她又说，便把那幅叠好放在床脚的毛毯打开，盖在他的身上。

他睁开眼睛望着她，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我恐怕在打摆子。”他的脸色白得象一张纸，连嘴唇也是灰白的。

“你睡罢，你只管睡你的，等一会儿我给你吃奎宁，”母亲安慰他说。她脸上的皱纹显得更多了，头发也好像没有一根是黑色的了。她刚回到四川来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她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这些年她也苦够了。完全是他使她受苦的。可是她始终关心他，不离开他。“她真是好母亲啊，”他暗暗地称赞道。

后来母亲拿来三粒奎宁丸给他吞下了。她把剩下的半杯白开水放到方桌上。

“妈，”他感激地唤了一声，泪水从眼角掉下来了，他望着他母亲，半晌说不出话。

“什么事？”母亲又走到床前俯下头亲切地问道。

“你真好……你对我太好了……”他断断续续地说。

“你睡罢，这些话等你好起来再说，”母亲和蔼地安慰他。

“我不要紧，”他摇摇头无力地说。他看见母亲并不注意听他的话，又解释道：“我只请半天假。明天他们公宴周主任，给他祝寿，我还要去参加。”

“你只请半天假？”母亲不以为然地说。“其实你可以多休息一天，不必耽心扣不扣薪水。”

“我明天一定要去，不然他们会看不起我，说我太‘狗’，想赖掉份子钱，”他用力说，脸都挣红了。

“‘狗’不‘狗’是你自己的事，跟他们有什么相干？周主任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母亲气愤地说。她忽然又问一句：“你看见树生吗？”

“我刚才还看见她，”他不加思索地回答。

“那么她不陪你回家？她很可以请假回来看护你，她们当‘花瓶’的，不怕扣薪水。”她的妒忌和憎恨又被他那句话引起来了，她只顾发泄自己的怒气，却没有想到她的话怎样伤了他的心。

他呆呆地望着母亲，过了一会儿才露出微笑（多么痛苦的微笑！），自语似地小声说：

“她，她是天使啊。我不配她！”

母亲只听清楚他的后一句话，便气恼地接嘴说：

“你不配她？明明是她不配你啊！说是在银行办公，却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状，又不是去做女招待，哪个晓得她一天办些什么公？”

他不答话，只是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十

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个下午。将近七点钟他才醒过来，躺在床上，没有一点力气，汗背心湿透了，冷冰冰地贴着背上的肉。他知道自己淌了不少的汗，便动一下身子，想把汗背心从肉上拉开，又想下床来找一件汗背心换过。可是他刚把身子一动，就觉得浑身酸痛，好象骨头全脱了节似的，他不由得发出了一声呻吟。

母亲走到床前，问他：“你醒来了？不舒服吗？”

这一晚没有停电，黄黄的电灯光涂在母亲的脸上，她的脸也带着病容。而且她显得多么孤寂，多么衰弱！

“还好，”他答道。他睁大疲乏的眼睛，在屋子里各处找寻。“她不在？”他失望地问道。

“她？你在说树生吗？”母亲轻蔑地说，“早晨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过。”

“她也该回来了，”过了片刻，他才叹息道。

“是啊，她哪天不该早回来？”母亲气恼地接嘴道。她看见他不做声，便改了口问他：“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不想吃，我不饿，”他说。

“吃点稀饭好不好，我给你煮的。家里还有皮蛋下稀饭，”母亲说。

“吃一碗也好，”他感激地说，勉强笑了笑。

母亲满意地转身走到碗橱前，拿了一个碗，又在门边小泥炉上瓦罐里舀了稀饭。

“究竟是自己的母亲好，”他小声对自己说。他的心不象先前那样空虚了。他正要拿出勇气抬起身子下床去，母亲已经把稀饭和皮蛋端过来了。她说：“你不要起来，就坐在床上吃罢。我给你拿着碟子。”她等他坐了起来，就把饭碗和筷子递给他，自己在旁边端了碟子守着他吃。

他并没有胃口，但是为了母亲的缘故，也勉强吃了一碗稀饭。他吃完饭，母亲又拿了脸帕来让他揩了脸，说：“你还是睡下罢，今天不要起来了。”

他听从了母亲的话，又躺下去。但是他不肯脱衣服，他还想醒在床上等候树生回来。

有人在敲门，离他躺下的时间不过十多分钟。母亲把门拉开。一个男人的影子闪进来，粗声说：“汪先生在家吗？曾小姐有信给他。”他惊了一跳。他听见母亲在问：“哪里送来的？”可是没有人回答，送信人已经退出去了。

他看见母亲手里拿着信，呆呆地立在房中，仿佛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似的，他忍不住，叫了一声“妈”。母亲立刻走过来，用一种不在意的口气对他说：“她送了封信来，不晓得又有什么事情。”她并不把信交给他，只顾自己咕噜道：“曾小姐？儿子都有十三岁了，还好意思叫小姐，真不害羞！”

“让我看看她写些什么话，”他说着，便伸出手去拿信，母亲只好把信递到他的手里。

他接过信，战战兢兢地拆开来读。是树生的亲笔，写着：

宣：

朋友约我参加今晚胜利大厦的舞会，我会回来很晚。请你不要等我，也不要上门。不必对母亲说我去跳舞，省得明天听她发一番陈腐议论。

妻即晚

他看完信，一声不响，信纸还捏在手里，他望着天花板，好象在思索什么事情。

“她信上怎么说？”母亲不能忍耐地问道。

“她在一个同学家吃饭，说是有些事情，回来晚一点，”他声调平平地答道。

“什么事？还不是看戏，打牌，跳舞！你想她还有什么正经事情！我做媳妇的时候哪里敢象她这样！儿子都快成人了，还要假装小姐，在外面胡闹，亏她还是大学毕业，学教育的！”母亲咕噜地抱怨道。

“她倒并不打牌，”他不知道母亲这时候的心情，却只顾替他妻子辩护，他并没有想到他的辩护只会增加母亲对树生的恶感。

“不打牌？她不是打外国纸牌吗？你生病她也不赶回家来看一下，做太太的规矩也不懂！”母亲又说。

“她不晓得。如果晓得，她一定早回来了。其实我这并不算生病，”他继续替他妻子解释，他的眼前仿佛还晃动着她那张带笑的脸。

“你这个人太软。她对你那样不好，你还要替她讲话。我说，她那些脾气都是你养成的。我要是你啊，她今晚上回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顿，”母亲指着他的前额大声说。

“夫妻间吵架多了，也不大好。常常为了点小事会闹出大问题来的，”他小声答道。

“你怕什么，这又不是你错。明明是她没理，她不守妇道，交男朋友——”

他忍不住痛苦地呻吟一声。母亲吃了一惊，连忙把下面的话咽在肚里了。她俯下头看他，关心地问：“你怎么啦？”

他摇了摇头，过了半晌，才无力地吐出一句：“妈，她决不是一个坏女人。”

母亲听到这句意外的答话，起初有点不懂他的意思，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她恼怒地说：“她不是坏人，那么我就是坏人。”

“妈，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他着急地央求道。“我并不是在袒护她。”

“哪个说你袒护她！”母亲的脸上微微露出笑意来，她的怒气渐渐地消失了。“我看，她把你迷住了。”

“不是这样说，”他认真地解释道，“你们都是好人；其实倒是我不好，我没有用，我使你们吃苦。想不到我们现在会过这种日子，你自己烧饭……洗衣服……”他觉得一阵鼻酸，眼泪进出来了。他呜咽着，再也接不下去。

“不要讲了，你好好睡罢。这不怪你。不打仗，我们哪里会穷到这样！”母亲温和地说，她心里也难过。她不敢多看他：他脸色那么难看，两边脸颊都陷进去了。他们初到这里的时候，他完全不是这样。她记得很清楚：他脸颊丰满，有血色。“听说战争明年可以胜利了，这倒好，不然大家都——”这句话是随便讲的，她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他。可是他不等她说完，便打岔道：“妈，你说胜利？看着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说不定我们马上就要逃难……”他说到这里又忽然耽心起来。

“你听见哪个说的？”母亲吃惊地问，但是她并不害怕。“没有这样严重罢。他们都说日本人这次打湖南、广西，不过抢点东西。他们守不住，自己会退的。”

“那就好，”他带点疲倦地回答，母亲的话又使他心安了。他并没有自己的明确的看法，他觉得她的话也很中听。他又说：“我也弄不清楚，不过公司里有人在讲，时局不好，公司方面有搬到兰州去的意思。”

“兰州，那样远的地方！又不是充军，哪个肯去！住得好好的要搬家，那些有钱人胆子比耗子还小。日本人这两年炸都不敢来炸，哪儿还有本事打过来！”母亲只顾在咕噜，仿佛要把她对媳妇的不满（因为儿子的缘故，她忍了一半在心里）另外换一个对象尽量发泄出来。

“我也是这样想，不过这些事也难说，”他答道，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脸上，仿佛在寂寞、彷徨中找到了一个支持。他感激地说：“妈，你歇一会儿罢。你太辛苦了。”

“我不累，”母亲又换了语调温和地答道，她在他的床沿上坐下来。

“你现在舒服吗？”她问他。

“好多了，”他答道。可是他觉得非常疲乏，却又没有一点睡意。

“这几年总算是熬过去了，以后不晓得还要过些什么日子。我耽心的就是树生——”她埋着头一个人自言自语，说到树生这个名字，她的声音立刻低到除了她自己以外，再没有人听得清楚。但是“树生”这两个字他一定听见了，他半晌不开口，忽然小声叹了一口气，又把嘴闭上了。

母亲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望了他一两分钟，看见他闭上眼睛不出声息，以为他睡熟了，便轻脚轻手地走出去。过了一阵她又进来，掩住门，不上门，却端了一把椅子抵住门，关了电灯，然后回到她的小屋子去了。

他其实并不曾睡熟。他闭上眼睛，只是为了使他母亲可以放心地回到她的小屋去休息。他不能睡，他的思想活动得厉害，他前前后后想了许多事情，在那许多事情中间总有一张女人的脸庞在摇来晃去。她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发怒，时而忧愁。他累极了，头痛起来，出了一身汗。他的耳朵始终在等着一个人的脚步声。

房间暗而不黑，从母亲的房里透出一线微光。他的眼睛看得清楚房门口的椅子。“她”为什么不回来？母亲在咳嗽，她还不睡！她老人家太辛苦了。时候应该不早了罢。

是的，街上二更的梆子响了。“她”快回来了罢。他注意地倾听着门外的声音。有声音了。老鼠在走廊上跑。并且房里也有老鼠了。它似乎跑到他的床脚就停住了。它在做什么？它在咬他的皮鞋吗？他那双穿了五个多月的皮鞋已经遭过两次难，鞋口被咬成象一只破碗的缺口似的。它再来光顾一次，他就无法穿它们上街了。每天晚上他临睡时，总得把皮鞋放到床下一口旧皮箱上面。今天他忘了做这件事，现在他不能静静地躺着不管。他连忙抬起身

子伸手去拿皮鞋。老鼠一溜烟跑掉了。他不知道皮鞋究竟被咬着没有，但是他仍旧小心地把它们放在皮箱上。

他又躺下来。他对自己说：我应该睡了。可是刚闭上眼睛，他就觉得他听见了高跟鞋走上楼梯的声音。他连忙睁开眼倾听。什么也没有。“她”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他终于睡着了，不过并不是熟睡，他迷迷糊糊地过了十几分钟，便醒了。没有女人的脚步声。他又睡了，不久又醒了。他做着不愉快的梦。有一次他低声哭着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那时他母亲的房里已经熄了灯，他也无法知道时候的早迟。街上相当静。一个老年人用凄凉的声音叫卖着“炒米糖开水”。这声音是他听惯了的。那个老人常常叫卖一个整夜，不管天气怎样冷。这一次他却打了一个冷噤，好象那个衰老的声音把冷风带进了被窝里似的。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熟悉的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了。“她”到底回来了。

她轻轻推开门，走进屋子来，口里哼着西洋曲子，打开了电灯。

这时的电灯光非常强。他的眼睛被刺痛了，但是他还微微睁开它们偷看她。她的脸上带着兴奋的微笑。嘴还是那样地红，眉毛还是那样地细，脸还是那样地白嫩。她在屋子中间站了片刻，不知在想什么，忽然掉过眼光来看他。他连忙闭上眼睛装睡了。

她却慢慢地走过来，走到他的床前。他闻到一阵脂粉香。她俯下头看他，她替他盖好被。她发觉他没有脱外面衣服，便轻轻地唤他。他只好睁开眼睛，装着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样子。

“你不脱衣服就睡着了，你是在等我吗？”她亲热地含笑问道。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却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说过叫你不要等，你怎么还等呢？”她说，不过她露了一点感激的表情。

“我也睡过了一觉，”他笨拙地答道。他心里有许多话，却没有勇气说出来。

“你没有把我的信给妈看？”她又问，声音更低。

“没有，”他摇摇头回答。

“她没有说什么？”

“她不知道，”他答道。接着他问了一句：“你今晚上跳得痛快罢？”

“痛快极了，”她得意地说，“我好久不跳了，所以兴趣特别好。我还是在朋友家里换过衣服去的，来不及回家了。”她昂起头，轻快地把身子旋转了一下。

“你跟哪几个人跳？”他问道，勉强装出笑容来。

“我跟几个人跳过，不过还是跟陈主任跳的次数多，”她愉快地说，但是她并不告诉他，陈主任是谁。

“啊，”他答了一声。他想：陈主任大概就是那位同她在国际喝咖啡的年轻人罢，他痛苦地望着她那充满活力的身体。

“你好好脱了衣服睡罢，你对我太好了，”她温柔地对他一笑，安慰他说，便俯下脸去，轻轻地吻了吻他的嘴唇，又把柔嫩的脸颊在他的左边脸上紧紧地靠了一下，然后走到书桌前坐下来，对着镜子弄她的头发。

他轻轻地摸着左边脸颊，用力吸着她留下来的香气，痴痴地望着她的浓黑的头发。过了一会，他想到：“她对我并没有变心。她没有错。她应该有娱乐。这几年她跟着我过得太苦了。”他想到这里，便翻一个身把脸转向

墙壁，落下了几滴惭愧的眼泪。

十一

第二天上午他起身比他妻子早。母亲要他在家多躺一天。他不肯。他说他精神很好，而且今天得去参加替周主任祝寿的公宴，他不去，同事们会以为他穷或者吝啬，会更加看轻他。母亲也放弃了她的主张。他陪着母亲吃了一碗昨夜剩下来的稀饭。母亲上街去买菜，他同她一块儿出去。那时树生还坐在书桌前化妆。

他们走出大门，母亲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他不知道母亲怀着什么心思。两个人走了一段路，快要分手了，母亲忽然声音战抖地唤着他说：“宣，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要为家庭牺牲你自己了。”

他皱了皱眉，过了一两分钟才低声说：“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你不还是一样吃苦？”

“可是她，她过得快活啊，上办公还要打扮得那样摩登，象去吃喜酒一样，”她忍不住爆发地说。

他低下头不出声。

“宣，我给你说，她跟我们母子不是一路人，她迟早会走自己的路，”她又说。

他停了半晌才回答一句：“她跟我结婚也已经十四年了。”

“你们那种结婚算什么结婚呢！”母亲轻蔑地说。

他觉得这句话很刺耳，心里不高兴，就闭紧嘴不再做声了。

母亲也不再说什么，他们分道走了。

他到了公司。还是钟老带着笑脸跟他打招呼。“你怎么不多休息一天？今天又来得这样早！”钟老说，一面用肥大的手摸自己发光的秃头顶。

“我没有什么病，我很好，”他笑答道。他在钟老的眼光和态度中看到了怜悯，那个老人在可怜他，可是他并不觉得受侮辱。他说了两句闲话，便走上楼去。

单调的工作又开始了。永远是那些似通非通的译文，那些用法奇特的字句。他没有权修改它们，他必须逐字校读。他坐下不过一点多钟，就觉得背上发冷，头发烧。他不去管它。“就为了几个钱啊！”他不时痛苦地暗暗念着。他勉强工作到十二点钟。

他并不想吃什么，可是他对自己说：“我至少应该吃一碗饭，我没有生病啊。”他便走下楼去，在饭桌旁坐下，他果然吃完了一碗饭。碾过的平价米在平日吃起来倒并不怎样难吃，今天却有点难下咽了。放下碗，他立在门前看街景，站了一会儿，他觉得毫无趣味，便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去。

他坐在自己位子上随意翻了翻文件，又把看过的校样整理好。工友送了一封信来。他看信封上的字，便知道是小宣从学校里寄来的。他好象得到了一点安慰似的，轻轻吐了一口气。他把信拆开了：

……先生说：物价高涨，我们这期收的图书费、伙食费都不够。每个人还应该补缴三千二百元，说是多了以后还可以退回来。很多同学都缴了。我知道爸爸很苦，没有多的钱，不敢向爸爸要。不过先生又来催了，催得很厉害，说是不缴钱，今年不准参加学期考试。我只好向爸爸、妈妈要求。请爸爸、妈妈三天内把这笔钱寄到学校里来……

仅有一点安慰也消失了。他的眼光停在那几行稚嫩的字迹上。“已经缴过两万多了，还要补缴，哪里来的钱！”他低声抱怨道。没有人注意他。

“学堂又不是商店，只晓得要钱怎么成！中国就靠那班人办教育，所以有这种结果！”他愤怒地小声骂道。信纸冷冷地躺在他的面前，不回答他。

“找树生商量，看她有没有办法，”他想到；“那么现在去。”

“现在不好，还是晚上罢，”他又想到，“她也许不在行里，我也累，不想多动。”

最后他把信纸折好放回在信封内，又郑重地把信封揣在衣袋里面。下半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还是那些疙里疙瘩的译文，他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世界的文字。它们象一堆麻绳在他的脑子里纠缠不清。他疲乏极了。可是他不能丢开它们。他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他很想闭上眼睛，忘掉这一切，或者就伏在桌子上睡一觉。但是吴科长的严厉的眼光老是停留在他的脸上（他这样觉得），使他不敢偷懒片刻。后来他连头也不敢抬起了。

“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消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他心里发出了这个无声的抗议。

然而没有用，这种抗议他已经发过千百回了。但是谁也没有听见，谁也不知道他起过不平的念头。当面也好，背后也好，大家喜欢称他做“老好人”，他自己也以老好人自居。好几年都是这样。

“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和树生，和我母亲，和小宣，我们不是这样地过活的。完了，我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他的眼光不停地在校样上面移动，他的思想却在另一个地方。

“我这是什么思想！我怎么改变到这个地步！贪生怕死，只顾自己！”他又这样地责备自己。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止不住要想：“要是胜利早一点到来，我应该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日本人已经深入广西……他们还说要攻取贵州——”

他不敢再往下想。事实上他也不能往下想了。他头痛得厉害。他拿左手按住他的前额，他还在发烧。发烧，没有关系，近年来他常常在下午发烧，他已经习惯了。反正他不会这么早就死去。况且他也没有考虑死活问题的余裕。那一对严厉的眼睛老是这么凶恶地望着他。“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至多我不吃你们这碗饭就是了，我哪一点不及你们！”他曾经这样想过。但是他离开这个吃饭地方，又到哪里去呢？他在这个山城里没有一个居高位或者有势力的亲戚朋友，这个小小位置还是靠了一位同乡的大力得来的。那是在他失业三个月、靠着妻子的薪金过活的时候。那位对他有好感的同乡已经到别的省分去了。他的唯一的希望也失去了。

“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他常常拿这句话来答复他心里的抗议，现在他又拿这句话来对付他的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好容易熬到了五点钟。他停止办公，倒在靠背椅上养养神，准备到广州大酒家去参加宴会。周主任是广东人，所以同事们今天挑选了一家广东菜馆。他到那里的时候，周主任和别的同事都到了，还没有入座，说是在等候总经理。大家在灯光明亮的厅子里兴高采烈地谈笑。只有两个人不讲话。他自然是其中的一个。他躲在一个角落里，缩在一把椅子上，用茫然的眼光望着众

人，偶尔端起杯子喝一两口茶。

等了半点多钟，总经理坐着汽车来了。他一年中间见不到这位瘦得象猴子一般的大人物几面。大人物点着一根手杖庄严地走进来，众人一窝蜂地拥上去迎接，他多少带点惶恐地跟在大家后面。总经理带笑地道歉说：“对不起，我来迟了。”

“不迟，不迟！我们也是才来！”许多声音一齐说。他没有作声，他不想跟那位大人物讲话，那个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别的同事们好象也忘了他的存在似的，仍旧把他抛在角落里。

摆好了两桌酒席。就座的时候，大家客气地让坐，他默默地远远站着，那几个地位跟他的差不多的同事都有说有笑地坐定了。还是钟老招呼他过去，钟老给他保留了一个座位。

别人喝酒吃菜，兴致非常好。总经理和周主任坐在另外一席。他这一桌的同事们都过去敬了酒，就只有他一个人不曾去。除了钟老，谁都不理他，连小潘今天也不肯跟他讲一句话。他看不惯大家对总经理和周主任巴结的样子，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发呕。这个环境对他太不相宜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多么需要安静。他们并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他们。也没有人强迫他到这里来。可是他却把参加这个宴会看作自己的义务。他自动地来了，而来了以后他却没有一秒钟不后悔。他想走开，但是他连动也不曾动一下。

他一直是埋着头默默地喝酒。钟老偶尔对他讲两三句话，他也只是唯唯地应着。说是因为禁酒的缘故，茶房把黄酒斟在茶杯里冒充茶，免得警察来打麻烦。他现在真的把酒当作茶来喝了。没有人向他劝酒，可是他自己喝了好几杯。他知道自己酒量差，他想喝醉，想使脑筋糊涂，但是一直到席终他还是十分清醒。周主任却醉得只会傻笑，接连讲着一些不合身份的话。他趁着众人吵闹地纠缠在一起似乎在准备游艺节目的时候，一个人偷偷地溜走了。

他走出菜馆，到了冷静的街上，觉得有点冷，但是呼吸舒畅多了。他大步走着。

他急急地走到了家，欣慰地对自己说：“我还以为今天会生病，现在倒没有事了。”他上了楼。他的房门微微开着，母亲坐在方桌前做衣服，只有她一个人在等候他。房里没有树生的影子。

“你回来了？”母亲问道，她抬起头亲切地对他笑了笑。

“是，妈，”他答道。眼光还在找寻另外一个人。

“你今天没有不舒服罢。我倒耽心了一天，我看你早晨出去的时候脸色不大好，”母亲说，就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又把眼镜取下来，揉了揉眼睛。

“我很好。妈，你不休息一下？晚上还要做东西？”他说。

她拿起刚才放在桌上的东西给他看：“我在给你做一件汗衣。今天理箱子，找出一段平价白布来。我看你汗衣短裤破得实在不象话，趁着我还能够动针线的时候给你做两套换一下。”

“妈，你也不能太累啊。这些东西缓点做也没有关系，”他感动地说；“我那两身旧的总还可以穿三五个月，以后我还可以买新的。”

“买新的？可怜你那几个钱的薪水，哪里买得了？这两年你连袜子也没有买过一双。你脾气也太好了。要是没有我累着你，你或许不会苦到这样。你从不想到你自己。这几年来你瘦得多了，看起来你好象过了四十岁的人，

白头发也有了好多根了，”母亲说着，眼圈也红了。

“妈，你不要老想这些事，在这个年头谁不是过一天算一天，能够活下去就算好的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她没有回来过？”他忽然问一句。

“她，你说树生吗？她回来过，又出去了，说是行里有什么事，十点钟一定回来，”母亲答道。但是她马上又改变了语调添上两三句：“你看，就是她一个人舒服。家里事她什么都不管。一天就在外面交际。”她忽然望着他，关心地说：“你今天又吃了酒了，吃得不多罢？你身体差，不宜多吃酒啊。”

“我喝得不多，”他答道，又叹了一口气。他觉得不舒服极了，头晕，心和喉咙都象被什么东西在搔着一般。他打算去倒一杯开水来喝，刚走一步，身子就向右边歪了一下，仿佛要倒下去似的。他连忙站定，但是身子又接连摇晃了两下。

“你怎么啦？”母亲惊问道，便站起来。

“我喝了两杯酒，”他勉强笑了笑。母亲走到他的身边要搀扶他。他摇着头让开身子，接连说：“不要紧，不要紧。我没有醉。”

“那么你早点睡罢，”母亲说。

“不，我不想睡，我要等她回来。”他说着，在书桌前那把藤椅上坐下了。

“你要等她？你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是说她十点钟回来吗？”他反问道。

“她的话相信不得。你还是睡罢。”

“好，我睡，我先躺一会儿也好，”他说着就站起来。

当——当，——当——当，当——当。预行警报的钟声响了。

“警报罗。妈，你躲一下罢，我今天不想走，”他说，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你不走，我也不走。你还是躺一下罢，横顺还没有放‘空袭’，”母亲镇静地说。

整个楼房里本来相当安静，现在突然活动起来了。到处都是人声，脚步声，还有关门的声音。街上有人在跑，还有更多的人在叫唤，在讲话。

“××，你不走啊？”隔壁有人在大声问。

“我不走，敌机拿会来，何必多此一举，”另一个人答道。

“这两天快打到贵州来了，说不定敌人会来一次大轰炸，至少可以扰乱人心。我得到银行界的消息，昨天贵阳炸得厉害，连报上都不敢登。我劝你还是去躲一下罢。”

“那么出去走走也好，我们就一路走。”

接着是关门和走路的声音。虽然中间还隔着一段走廊，但是薄薄的木板壁很容易传声。他们的谈话被这母子两个人听见了。

“妈，你还是走罢，”他恳求道。

“不要紧，现在才是预行，”母亲慢慢地回答。

过了几分钟，空袭警报的汽笛声突然尖锐地响起来。

“妈，走得了，”他催促道。

“我等到放‘紧急’再走，”母亲答道，她仍旧安静地坐着。

“我看还是早点走好，迟了怕来不及进洞了，”他有点着急地说。母亲不曾回答。他忽然站起来，又说：“那么我们一块儿走罢。”

“敌机不见得会来，走一趟太吃力，我看还是等到放‘紧急’再走好，”母亲固执地说。他不作声了。母亲又说：“就是炸死了，也没有关系。我们象这样过日子，还不如炸死好。”

“妈，你不要这样说，我们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呢？”他悲愤地说，他又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门推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你们还没有走！”树生惊喜地说。

“你不去躲警报，怎么还跑回来？”他站起来迎着她问道。

“我回来给你送防空证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的防空证也放到我手提包里面了，刚才发觉了，特地赶回来送给你，”她含笑说道，一面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卡片递到他的手里。

他感激地对她笑了笑，接过防空证揣在衣袋里，又从那里拿出一封信来。他说：“其实我还没有想到防空证上面去。要是不发紧急警报，我们就不躲了。”

“现在走罢，”树生含笑地催他；“早点进防空洞好些，”她又望着母亲说。

“我不走，我不信就会炸死，”母亲板起脸赌气似地说。

树生碰了钉子，怔了一下，但是马上又装出笑脸对他说：“你呢，你也不怕死吗？”

“我很累，我不想走，”他疲倦地答道。

“那么我一个人走了，”她仍然装出笑脸说，便掉转了身子。

“树生，”他想起手里捏的一封信便唤了一声。

她回转头来。他把捏信的手伸向她，一面说：“小宣来的信，他们学堂又要他补缴三千两百块钱。你看罢。”

她走回来，接过信封，取出信笺来看了一遍。她用轻快的声音说：“好的，我明天给他寄三千五百块钱去。”她把信放在手提包里，又往外面走。

“你不为难吗？”他问了一句。

“不要紧，我可以向行里借。我总比你办法，”她不在乎地答道，接着又问他一次：“你不去躲吗？”她看见他在迟疑，就一个人匆匆地走出去了。

“你看，她好神气，也是你才受得了！”母亲气愤地说。这时高跟鞋的声音还在走廊上响。

“不过小宣的学费也亏她。不是靠她，小宣早就停学了。我这个爸爸真不中用，”他叹息地说。

“要是我，我宁肯让小宣停学，”母亲咬着牙说。

他觉得有一口痰贴在他的喉管上，他用力咳嗽，想把痰咳出来。

“我给你倒杯开水，你忍住一下，”母亲说。等到她把开水端来，他已经把痰吐在地上了，不仅地上，他的左手背也溅了些。他看见痰里的血丝，心中一冷，连忙把手背在衣服上擦，又用脚把地板上的痰也擦去了。

“好罗，咳出来就好了，”母亲安慰他说，一面把杯子递给他。

他接过杯子，大口地喝了几口，然后勉强装出笑容，回答道：“是，我现在好多了。”他把杯子放到方桌上，又说：“我累得很，我想睡一会儿。”

“那么你不要脱衣服啊。万一放‘紧急’，跑起来也方便些，”母亲叮嘱道。

他含糊地答应着，已经走到床前和衣倒下来了。就在这一刻，他的精神

和体力似乎完全崩溃了。在昏迷中他觉得母亲来给他盖上了棉被。

十二

他不肯让母亲和妻子知道他吐血的事。第二天他居然支持着到公司去办公。晚上睡得不好，精神相当差。仍旧是那单调的工作和纠缠不清的译文，周主任的厌恶的表情、吴科长的敌视的眼光和同事们的没有表情的面孔。他忍受着。他挨着时刻。他的心并不在纸上。他也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校出了多少错字。听见开饭的铃声，他放下笔，轻轻叹一口气，他仿佛就是一个遇赦的犯人。他的胃口还是不好，他吃得少，也不讲话。他觉得全桌的眼光都带着怜悯在看他，他不安起来。好不容易放下碗，他又象得救似地嘘一口气，离开饭桌。他不敢看旁人，也没有谁理他。

他回到楼上，又在办公桌前坐下。他并不看校样。还没有到办公时间，他用不着多耗费他那有限的精力。他的眼光茫然地朝四处看。除了白茫茫的一片外，他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他疲倦，脑筋也较往日迟钝，眼皮渐渐地往下垂，头越来越重。他睡着了。

同事们的笑声惊醒了他。他连忙坐正。脑子里还装了一些古怪的影子。他从悲欢离合的梦中醒过来了。他还有一种怅惘的感觉。

办公时间近了。周主任和吴科长都不在，同事们高兴地讲着笑话。忽然一个同事提起战局，另一个同事跟着报告昨晚得到的消息。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日本人不停地向这里前进，没有人挡住他们。据说敌人已经到了宜山。

“报上都没有说，你知道！不会有这样快！”汪文宣暗暗地驳斥道，但是他只敢在心里说。“不见得罢。怎么你的消息倒这样灵通？报上还说这两天前方战况很好，”小潘插嘴说。

“你相信报纸？你晓得报上每天有多少检查扣掉的新闻？”那个消息灵通的同事反驳道。

“是啊，这两天情形的确不妙，我有个亲戚在贵阳住家四年了，现在也要把全家搬过来，”另一个同事说。

“这算什么！我有个朋友已经定了飞机票就要搬家到兰州去罗，要逃索性彻底一点，”又一个同事说。

“所以我们公司要搬兰州，这就是彻底啊，”消息灵通的同事说。

“你去吗？”小潘问道。

“我去？恐怕公司不会要我们这班小职员去罢。你还存这个希望吗？”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其实这个同事不能算是小职员，他是出版科的科员，进公司时间久，底薪也比汪文宣的高得多。“不要我们，总得发一笔遣散费。多支三个月薪水也好，”小潘满不在乎地说。

“三个月？我看至多也不过两个月。拿到那一点钱有什么用？逃难不够用；不逃难更不够用。况且这种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机关——”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到这里，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连忙咽下以后的话，同时做出一个可笑的怪相。

周主任来了。整个楼面立刻静下来。小潘也悄悄地回到楼下去。下半天的工作开始了。

汪文宣不出声息地坐在办公桌前。他觉得自己还是在梦中。他的眼睛看不见面前摊开的校样。同事们的谈话占据了整个脑子。逃难，……遣

散，……这不就是他的毁灭吗？还有他的家庭。……湘桂撤退的惨剧，他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一切，……他又是一个这么不中用的人！……要是真的到了那一天……？他一身发冷。他不敢再往下想，却又不能制止自己。他越想，心越乱。他翻过了两张校样，却没有把一个字装进脑子里去。工作，他已经不关心了。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他也不再关心了。他仿佛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毁灭！他被人宣告了死刑。他没有上诉的心思。

他昏昏沉沉地过了半点钟光景。他觉得周身不舒服，头忽然发起烧来。头有点晕。几分钟，十几分钟，半点钟，一点钟以后，热度还没有退。“一定是肺病，我昨晚还吐过血！”他断定道。“没有关系，我反正要死。”他安慰自己。心稍稍安定了。他不再象先前那样地害怕了。他却另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我死，我一个人死，多寂寞啊，”他想着，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家中，抱着母亲，抱着妻，抱着小宣痛哭一场。

到下班的时候，他已经不发烧了。他觉得精神稍微好一点，慢慢地走回家去。

母亲在家里煮好饭等待他。她用慈爱的调子同他谈话，问他这一天的工作情形。吃饭的时候，母亲谈起树生，又发了一通牢骚。他唯唯地应着，他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同时又觉得树生并没有错。

“晚饭她既然不在行里吃，就应该回家来吃。你亲眼看见的，她一个月有几天在家？不是去找情人还有什么事！”母亲收拾饭碗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这样地直说了。

他不作声。他不相信母亲的话。但是母亲的话使他痛苦。永远是这样的控诉，仇视。“为什么不让我安静？既然你爱我，为什么不也爱她呢？你知道我多么离不开她！”他想到。但是他不敢把这答话说出来。“离不开她”四个字伤了他自己，使他感到寂寞。寂寞中又夹杂了一点焦急不安。他默默地站起来，轻轻咬着嘴唇，在屋子里走了几步。

“你没有事，要不要去看电影？我们究竟是读书人，再穷也该有娱乐啊，”母亲做完事情，过来对他说。

“我累得很，不想出去了，”他懒懒地答道。过了半晌，他又带着苦笑加上两句：“现在读书人是下等人了。看电影看戏，只有那班做黑货白货生意的人才花得起钱。”

树生推开门进来。

“你吃过饭吗？”他惊喜地问道。

“吃过了，”她含笑地答道；“我本来想赶回家吃饭的，可是一个女同事一定要请客，不放我回来。今天行里出了一件很有趣的事，等一会儿告诉你。”

“她笑得多么灿烂，声音多清脆！”他想到。可是母亲只含糊地应一声，就走进小屋去了。

她换衣服和鞋子的时候，电灯忽然灭了。他慌忙地找寻火柴点蜡烛。

“这个地方真讨厌，总是停电，”她在黑暗中抱怨道。

蜡烛点燃后只发出摇曳的微光。满屋子都是黑影。他还立在方桌前。她走过来，靠着方桌的一面坐下。她自语般地说：“我就怕黑暗，怕冷静，怕

寂寞。”

他默默地侧过头埋下眼光看她。过了几分钟，她忽然抬起头望着他，说：“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

“我怕你累，你休息一会儿罢，”他勉强做出笑容答道。

她摇摇头：“我不累，行里工作不重，我们又比较自由，主任近来对我很好，同事们都不错。就是——”她停顿一下，忽然改变了语调，皱了一下眉头。“我在外面，常常想到家里。可是回到家里来，我总觉得冷，觉得寂寞，觉得心里空虚。你近来也不肯跟我多讲话。”

“不是我不肯讲话，我怕你精神不好，”他惶恐地分辩道。这不是真话，事实是：他害怕讲多了会使她不高兴，并且每天他和她见面的时候并不多。

“你真是‘老好人’！”她带笑地责备道。“我一天精神好得很，比你好得多，你还耽心我！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常常想到别人却忘了你自己。”

“不，我也想到自己，”他笨拙地辩道。

母亲的房里没有声息，烛光摇晃得厉害，屋角的黑影比先前更浓。从二楼送来一个小孩的咳嗽声和哭声。窗外索索地下起小雨来。

“我们打两盘 bridge 罢，”她忽然站起来，兴奋地提议道。

他很倦，他不想玩“桥牌”。可是他立刻答应了，并且去把纸牌拿来，放到方桌上。他坐下来洗牌发牌。

他看得出来她的兴致愈来愈差。他自己对玩牌更少兴趣。刚玩了两付，她忽然厌倦地站起来说：“不打了，两个人打没有趣味。而且看不清楚。”

他默默地把纸牌放进盒子里，低声叹了一口气。他注意到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流了一大滩在方桌上。他找着剪刀，把烛芯剪短了。

“宣，我真佩服你，”她站在方桌前看他做着这一切，忽然用激动的声音说。他惊讶地抬头望着她，不明白她的意思。“你真能忍耐，什么你都受得了，”她带着抱怨的调子继续说。

“不忍受又有什么办法？”他带着凄凉的微笑答道。

“那么你预备忍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我烦得很。宣，你说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过这种生活？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过得好一点？”

“我想，总有一天，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

她不等他说完，便摆了摆手打断他的话头：“我不要再听抗战胜利的话。要等到抗战胜利恐怕我已经老了，死了。现在我再没有什么理想，我活着的时候我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她激动地甚至带点气愤地说。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过了半晌他才吐出一句话：“这要怪我没有出息。”这句话是用痛苦和抱歉的调子说出来的。

“怪你有什么用？只怪我当初瞎了眼睛，”她烦躁地说。话刚出口，她的心就软了，但是她要咽住话已经来不及了。每个字象一根针似地刺进他的心。他捧着头，默默地用他的十根手指抓他的头发。她连忙走到他的身旁，温柔地说：“原谅我，我的心乱得很。”她把他的右手从头上拿下来，紧紧地捏在自己的两只手里，捏了许久。她忽然觉得一阵心酸，便放开了它，走到窗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十三

他继续过着这样的平凡、单调而痛苦的日子。是什么一种力量支持着他那带病的身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每天下午发着低热，晚上淌着冷汗。汗出得并不太多。他对吐痰的事很留心，痰里带血，还有过两次。他把家里人都瞒过了。母亲只注意他的脸色，她常说：“你今天脸色又不好看了。”他照例回答她：“我觉得倒还好。”母亲痛苦地看他一眼，也不再说什么。她不会知道他的心。有一次妻在旁边听见母亲讲起他脸色怎样的话，妻冷冷地插嘴说：“这两年来他脸色哪一天好看过！”妻说的是真话。但是妻也不知道他的心。关切，怜悯——她们能够给他的就只有这一点点。母亲似乎比妻更关心他，母亲似乎更少想到她自己。但是连母亲也减少不了他内心的痛苦。

“活着好，还是死好？”他常常偷偷地想着，尤其是在办公的时候。他觉得“死”就在前面等他。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似乎在鞭策他走向着“死”。他回到家中，母亲的关心和妻的怜悯并不曾给他多大的安慰。母亲喜欢诉苦，妻老是向他夸耀丰富的生命力，和她的还未失去的青春。他现在开始害怕看母亲的憔悴的愁容，也怕看妻的容光焕发的脸庞。他变得愈不爱讲话了。他跟她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她们关心地望着他或者温和地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总要在心里说：“你们不了解。”她们的确不了解。她们也许觉得他有时会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她们，但是她们并没有特别耽心。母亲或许耽心，可是她的叮嘱和询问（叮嘱他小心身体，问他是不是有病）反而增加他的害怕和痛苦。“她就要看出来来了，”他对自己说，他更加小心起来。有一次母亲谈起他的身体，妻立刻接口说：“让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妻还掉过眼睛来看他，这次是真诚的要求：你走一趟罢。“我很好，我很好，”他慌张地答道。“去检查一次究竟稳当些，”妻说。他不直接回答她，停了片刻，他才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现在看病吃药住医院都要花钱。象我们这种人只要有饭吃，就算是有福气了。他们说湘桂路上不晓得饿死多少人。”

母亲愤愤不平地叹了一口气。妻想了想，才说：“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会象他们那样。不过我们活着的时候，总得想办法。”她皱着眉头，脸上掠过一阴影。但是阴影立刻散去了。她的脸上不留一点忧郁的表情。

“想办法？我看拖到死都不会有办法，前年说到去年就好，去年说到今年就好，今年又怎么说呢？只有一年不如一年！”母亲终于在旁边发起牢骚来了。

“这要怪我们这位先生脾气太好罗，”妻带了点嘲笑的调子说。

母亲变了脸色，接着说：“我宁肯饿死，觉得做人还是不要苟且。宣没有一点错。”

妻冷笑了两声，过了两三分钟又自语似地说：“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认真，何必自讨苦吃！”

“这是我甘心情愿。无论如何，做一个老妈子，总比做一个‘花瓶’好，”母亲气冲冲地说。

“妈，不要说了，树生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并没有不同，”他连忙插进来劝解道，他害怕再听她们的争吵。

“不同，完全不同！”妻挣红脸用劲地说。“现在骂人做‘花瓶’，已经过时了……”

“树生，你不要多说。都是我不好，连累大家受苦，也怪不得妈，”他着急地向妻央求，拉开她。他又低声对她说：“妈上了年纪，想不通，你让她一点罢。”

“哪里是她想不通，明明是你想不通！”妻气恼地骂他，但是声音不大，她坐到床沿上不再作声了。

“当然啊，现在人脸皮厚了，什么都不在乎了，”母亲还在一边嘲骂道。

他正要过去安慰母亲，忽然听见有人在唤“汪先生，汪太太。”他吃惊地向房门那边看去。隔壁的张太太苍白着脸立在门前。

“张太太，请进来坐，”他连忙招呼道，妻和母亲也跟着向那个女人打招呼。

“汪先生，你看这里不要紧罢？我真害怕，要是逃起难来，我们外省人简直没有办法，”张太太刚刚坐定，便惊恐地睁大两只眼睛说。

他没有答话，倒是妻先说了：“我看不要紧。外面谣言很多，我就不去理它。”

“谣言？你听到什么谣言？”他惊问道，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了。

“说是日本人已经到了南丹，逼近贵州了。行里同事都是这么说，”妻相当镇静地回答。

“我听说已经进了贵州啊。我们张先生的机关在准备搬家。不过我们小职员是跟不去的。以后怎么办呢？汪先生，你是本地人，你要照料我们啊！”张太太用了惊恐、焦急的声调央求他。

他心里想：你还找我，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可是他却答道：“好，我一定帮忙。”

“我们想到乡下去躲一下，最好你们去哪里，我们也一起去，”张太太又说。

“现在就去躲？还早罢。张太太，你不要怕。到那个时候总可以想办法，”妻微笑地安慰那个带病容的年轻女人。

“我就是说，将来万一要逃难……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啊。我去告诉我们张先生。他听见也就放心了，”张太太站起来，说着感激的话，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多坐一会儿罢，”妻挽留道。

“不坐啦，不坐啦，”张太太一面说一面往房门外走。

客人走后，房里三个人沉默了两三分钟，母亲忽然发问：“宣，真的要逃难吗？”

他的心跳得厉害，他不敢回答。

“不会的，不会坏到这样，”妻接嘴说，她的脸上现出平静的笑容。

但是第二天妻下班回来，就皱着眉头对他说：“今天消息的确不大好，说是连独山也靠不住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那么我们怎么办？”母亲张皇地插嘴问道。

“除了等着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他断念似地说，又凄凉地笑了笑。他并不害怕，他只有一种疑惑不定的感觉。死，活，灾难对他并没有什么区别。要来的事反正会来，他没有力量挡住它。不来的，更用不着害怕它。

“我们不能等死啊，”母亲焦急地说。

妻怜悯地笑了：“不会到这样地步。该走时大家都会走开。今天还有个

同事约我到乡下去暂避一下，说是怕敌人来个大轰炸。我也没有答应。”

“你自然比我们有办法，”母亲生气地嘲讽道。

“也许罢，我高兴走的时候，我总走得了，”妻故意做出得意的神气答道。

“可是小宣呢？可是小宣呢？我跟宣两个人你可以不管，小宣是你亲生的儿子，你不能丢开他啊！”母亲挣红脸，大声说。

他的眼光轮流地望着这两个女人的脸。他想说：“我都要死了，你们还在吵！”可是他不敢说出来。

“小宣有学校照顾他，用不着你们操心，”妻冷冷地说。

“好的，这样你可以跟着男朋友到处跑了。我从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妈！”母亲咬牙切齿地骂道。

“对不起，我不是你那样的人，我也不想活到你那样的年纪，”妻开始变脸色，大声回答。

“树生，你就让妈多说两句罢，都是一家人，何必这样！说不定过两天大难一来，大家都会——”他忍耐不住，终于痛苦地高声说了。他觉得头痛得厉害，便闭上嘴咬紧了牙齿。

“我并不要吵，是你母亲吵起来的，你倒应该劝劝她，”妻把头偏向一边，昂然说。

“我不要听你那些花言巧语，”母亲指着妻骂道。

“你们吵罢，你们吵罢，”他气恼地在心里说。她们的声音在他的脑子里撞击，他觉得他的头快要炸开了，他再不能忍耐下去。他默默地走向房门。她们不理他。他走出门，一口气跑下楼去。

他走在人行道上，脑子里还是乱烘烘的。夜的寒气开始洗他的脸，他的脑子渐渐地清醒了。

“到哪里去呢？”他问自己，没有回答。他无目的地走着。他又到了那个冷酒馆的门前。

“你应该使自己忘记一切，”好象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朝那个小店里面望。桌子都被客人占据了。只有靠里那张方桌比较空，只坐了一个客人，穿一件旧棉袍，头发长，脸黑瘦。那个人埋着头喝酒，不理睬旁人。

“我去拼个位子，”他低声自语道，就走进去，在那个人的对面拉开板凳坐下来。

“来一杯红糟！”他大声说。堂倌送来一杯酒。他马上端起杯子，大大地喝了一口。酒进到肚里，一股热气冒上来，他受不住，打了一个嗝。

“文宣，”对面那个客人忽然抬起头来看他，唤他的名字。他呆呆地望着那张带病容的黑瘦脸，一时认不出是谁来。

“你认不得我？你吃醉了吗？连老同学——”那个人痛苦地笑了笑。

“柏青！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他睁大眼睛，吃惊地说，打断了那个人的话。相貌全变了，声音也哑了，两颊陷进那么深，眼里布满了血丝。围着嘴生了一大圈短短的黑胡子。“你做了什么事？还不到一个月！”他问着，他有点毛骨悚然了。

“我完了，我已经死了，”那个人嘶声回答，还勉强做出笑容，可是他笑得象在抽筋似的，牙齿黄得可怕。

“不要这样说，柏青，你是不是生过病？”他关心地问，他忘记了自己的苦恼。

“病在这里，在这里！”那个人用手指敲着前额说。

“那么，你不要喝酒了，快回家去休息，”他着急地劝道。

“我要吃，吃了酒才舒服啊，”那个人狞笑地答道，却并不去动面前的酒杯，那里面还有大半杯酒。

“那么你快喝干，好回家去，”他催促道。

“家！我哪里还有家？你要我到哪里去？”那个人冷笑说。

“你住的地方，我陪你回去，”他说。

“我没有住的地方，我没有，我什么也没有，”那个人生气地答道，突然端起杯子，把酒一口喝光了。“痛快！痛快！”他大声说。“我白读了一辈子书，弄成这种样子，真想不到！你知道我住在哪里？有时候我睡小客栈，有时候我就睡马路，我还在你们大门口睡过……”

“你喝醉了，不要多说，我们走罢，”他截断了那个人的话，一面站起来叫堂倌来把两个人的酒钱收了。他拉着那个人的膀子，接连说：“走，走。”

“我没有醉，我没有醉，”那个人不停地摇头说，不肯站起来。

“那么我们找个地方喝茶去，”他说。

“好罢，”那个人站起来，身子摇摆一下，又坐下了。“你先走罢，我多坐一会儿，”那个人痛苦地看了他一眼，有气无力地说。

“那么到我家去坐坐，树生还一直记挂你的太太，”他温和地说，刚说出“太太”两个字，他马上明白自己说错了话，便闭上嘴不作声了。

“你看我这样子怎么能到你家里去！”那个人说，两腮略略动了一下，接着埋头看看自己的胸膛，右手五根手指在旧棉袍的油腻的前胸上敲了两下：“我穿这样的衣服。”摸摸下巴：“我这样的脸貌。”又摇摇头：“不，我不去。我已经死了，你的老同学唐柏青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还要管这些？穿什么衣服，住什么地方，跟朋友有什么关系呢？朋友们都不理我，也好，横竖我已经死了，死了。”最后勉强笑了笑：“你回去罢，不要理我。啊，刚才你还说，你们都记挂我内人。你们都记得她，我怎么能够忘记她！”

汪文宣掉转头看了看四周，几张桌子上客人的眼光全向着他的同学。他脸红了。

“快走罢，那些人都在看你，”他低声催促道。

“看我？让他们看罢，我们都是样，”那个人抬起头望着他，两眼射出一种类似疯狂的眼光，“到冷酒馆来吃酒的就没有一个快活的人。你也一样。”汪文宣听见这句话，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仍旧低声在催促：“不要说了，我们走罢。”

“势利，势利，没有一个人不势利！”那个人只顾自己地说下去。“我把人看透了。我那些老朋友，一年前我结婚，他们还来吃过喜酒的，现在街上碰见，都不理我了。哼，钱，钱！”勉强做出轻蔑的笑容。“没有人不爱钱，不崇拜钱！我这个穷光蛋！你死罢，最好早点死，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好！”忽然站起来：“我跟你去看看大嫂。我内人活着的时候就说过要到府上去拜望大嫂，现在……”说不下去开始抽泣了。

汪文宣拉着那个同学的膀子走出了酒馆。两个人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同学忽然站住，说：“我不去了。”

“那么你到哪里去呢？”他问。

“我也不知道。你不要管我，”那个人坚决地说。

“柏青，这样不行，你到我家里去住一晚罢，”他同情地劝道，又把那

个人的膀子拉住。

“不！不！”那个人摇头说。

“柏青，你不能这样，你该记得你从前的抱负，你振作起来罢，”他痛苦地大声说。他只想哭。

他们又往前走了几步，刚刚要转进他住的那条街，那个人忽然固执地大声说：“不，我要走。”又说：“你放我！”挣脱了他的手，那个人就跑下马路朝对面跑去。

“柏青！柏青！”他失望地唤着。他要跑过去追那个人。他听见一阵隆隆的声音，接着一声可怖的尖叫。他的眼睛模糊了，他仿佛看见一辆大得无比的大卡车在他的身边飞跑过去。

人们疯狂地跑着，全挤在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十字街口马上围了一大群人。他呆呆地走过去，站在人背后，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觉得一个可怖的黑影罩在他的头上。

“好怕人！整个头都成了肉泥，看得我心都紧了，”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

“我说象这样的地方，根本就不应该行驶卡车。这个月辗死好几个人了。前天在小十字辗死一位年轻太太，那才惨！车子也是逃掉了，还跌伤一个警察，”另一个声音说。

他醒了过来。他明白了。他恐怖地、痛苦地叫了一声。但是他的喉咙哑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他一脸。他心里难过得厉害。他浑身发冷。

他悄悄地离开人群走回家去。没有人注意他。只有一个声音伴送他到家。那个熟悉的声音不断地嚷着：“我完了，我完了。”

他推开房门。电灯相当亮。妻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看书。她放下书抬起头看他，脸上现出惊喜的表情，亲热地问了一句：“你又到冷酒馆去了？”

他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才费力地吐出一句：“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可怕的梦。”

母亲从里屋跑出来，大声说：“宣，你回来了！”

“什么梦？你怎么了？休息一会儿罢，”妻温和地说。

他想答话。但是那声可怕的尖叫还在他的脑子里震响。他的精力竭尽了，他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来。他努力支持着。两对急切、关怀、爱怜的眼睛望着他，等待他的答话。他一着急，嘴动了，痰比话先出来，他的心在燃烧。

“血！血！你吐血！”两个女人齐声惊呼。她们把他搀到床前，让他躺下来。

“我完了，我完了，”他迷迷糊糊地念着那句可怕的话，脑子里还响着那声尖叫，眼泪象水似地流下来，他觉得他再没有力气挣扎了。他顺从地闭上了眼睛。

十四

他一晚上不停地做着可怕的梦。早晨醒来他疲倦，发烧，四肢无力，心神不安。

母亲和妻不再争吵了，她们一样亲切地看护着他。下午医生来给他诊病。是一位中医，还是妻去请来的。妻相信西医，主张请大川银行的医药顾问，

可是母亲坚持着请中医。他不愿意得罪母亲，妻也只好让步。她到他服务的图书公司去替他请了病假，又到大川银行去为自己请一天假，然后去请医生。医生张伯情是他母亲的一位远亲，在这城里行医三四年，也还有一点名气，每次到他们家来诊病，除了车费外，并不另收诊费。他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更赞成请中医诊病。“西药多贵！只要少花钱就好！我哪里来那些钱呢？”他这样想道。

医生是一个和善的老人，仔细地把着脉，问着病情，又用温和的调子安慰病人和家属，说这是肝火旺，又加上疲劳，并不是肺病，养息几天就会慢慢地好起来。

妻不大相信医生的话，母亲却很相信。他则是将信将疑。但是无论如何医生使他们三个人都心安了。他渐渐觉得中医也很有道理。“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地看病吃药，怎么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呢？”他安慰自己地想着，他又看见了一线希望，死的黑影也淡了些。

妻出去买了药回来，母亲拿来煮给他吃了。吃过药，他睡了一觉。他睡得不好，老是觉得透不过气来。

傍晚时分，他的热度加高，他又落进了可怖的梦网里。庞大的黑影一直在他的眼前晃动，唐柏青的黑瘦脸和红眼睛，同样的有无数个，它们包围着他，每张嘴都在说：“完了，完了。”他害怕，他逃避。他走，他跑。多么疲倦！但是他不能够停住脚。忽然他走进了荒山。他看不见人影。他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天黑了。他在黑暗中摸索。好累人的旅行啊！忽然他看见了亮光，忽然四周的树木燃烧起来。到处是火。火燃得很旺，火越逼越近。他的衣服烤焦了。他不能忍受，他嘶声大叫：“救命！”

他醒了。他躺在床上，盖着棉被，一身都是汗，口里发出痛苦的呻吟。

“宣，你怎么啦？”妻坐在床沿上，埋下头唤他。“你心里难过吗？”她温柔地问。

他叹了一口气，望着她，并不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低声问她：“你下班多久了？”

“我今天请了一天假，不是跟你说过吗？”妻惊讶地说。

“我忘记了，”他答道。接着他加上一句解释：“梦把我弄昏了。”停了片刻他再说：“我梦见……好象是……我那个老同学给汽车压死了。”

他骗了自己，把真实当作梦境了。

“老同学？你说哪个？”妻惊问道。她慢慢地伸过手去摸他的前额。前额润湿，热已经退了。

“唐柏青，我们在百龄餐厅吃过他喜酒的，他太太生小孩死了，我前不几天才跟你讲过，”他吃力地说。

“是，你跟我讲过，我记得。你不要多讲话，不要想别人的事情，你精神差，先前还在发热。你再睡一会儿罢，”妻温柔地安慰他。

“我怕睡着了，又会做怪梦，”他象小孩似地诉苦道。

“不会的，你什么也不要想，你安心地睡。我在旁边陪着你，你不会做怪梦，”妻含笑地对他说。

“妈呢？”他又问。

“妈在煮饭。你睡罢。等会儿又要吃药了，”她说，把头掉开不再看他。

过了半晌他忽然说：“请你给我倒一点茶。”他并不真想喝茶，不过想跟妻谈话。

妻倒了大半杯热茶来，他抬起头就在她的手里喝了三口，说一句“谢谢你”，又把头放下去。

“你可以再睡一会儿，”妻说着站起来，去把茶杯放在方桌上。

他刚闭上眼睛，又睁开。他偷偷地望着妻，不让她觉察出来。但是过了十多分钟，他忍不住了，又喊着妻的名字，又对她说话。

“树生，我看我的病不会好了，”他说。

“你又在乱想了，”她柔声责备他，脸上露出好意的微笑；“医生不是说吃两付药，静养几天就会好吗？”

他停了片刻才说：“可是你并不相信中医。”

妻一时答不出话，后来便说：“可是妈很相信啊，况且他是你们的亲戚，不会对你说假话。”

“这个年头哪个不说假话啊！”他苦笑道。“我知道我的病，我这个身子拖不到抗战胜利。也好，我活着不但不能给你们帮忙，我只会累你们。”他好象在自言自语，最后声音变了，他突然闭了嘴。妻注意到他在淌眼泪，她心里也不好过。她只说了一句：“你不要这样说，”便用力咬自己的下嘴唇。

“还有妈年纪大了，生活又苦，脾气更不好，有时候多发几句牢骚，希望你能够原谅她，她的心是好的，”他哀求地往下说，他吐字慢，不象刚才那样激动。

“我知道，”她说了三个字，埋着头，伸过右手去捏住他的左手，她也想哭。

“谢谢你。我现在睡了，”他似乎放心地说。

电灯光孤寂地照着这个屋子。光线暗得很，比蜡烛光强不了多少。那种病态的黄色增加了屋子的凄凉。他闭着眼，半张开嘴，一张瘦脸象涂上一层蜡，显得十分可怜。

她仍旧捏住那只手不放松，仍旧坐在床沿上，用寂寞的眼光看各处。同情和爱怜使她苦恼。但是另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在搔她的心。

“为什么我们应该过这种日子？”一个不平的声音在她的心里说。

她觉得右手里捏的那只手非常软弱无力，并且指头发冷。她想抗议：“这就是他忍受的报酬！我不能——”

她吃惊地看他一眼。他轻微地吐着气。现在他似乎舒服多了。似乎并没有噩梦惊扰他的睡眠。她轻轻地放开他那只手。她又伸手去摸他的前额。她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隔壁传来一阵沙沙的语声。从街中又传来几声单调的汽车喇叭声。老鼠一会儿吱吱地叫，一会儿又在啃楼板。它们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停过。这更搅乱了她的心。她觉得夜的寒气透过木板从四面八方袭来，她打了一个冷噤。她无目的地望着电灯泡。灯泡的颜色惨淡的红丝暖不了她的心。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死不下去，就是这样拖。前两三年还有点理想，还有点希望，还可以拖下去，现在……要是她不天天跟我吵，要是他不那么懦弱，我还可以……”她一个人自言自语，这次她皱起了眉头。她心里更烦，她不知道怎样安放她这颗心。她在屋子里踱起来。但是踱了几步，她又停止了，她害怕脚步声会惊醒他。

半掩的房门突然大开了。母亲捧着饭锅子进来。

“她也在吃苦啊，”她看见母亲那种吃力的样子，不禁这样想道。

“他睡了？”母亲的憔悴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脸向着床低声问道。她点点头，小声回答：“这回好象睡得还好。”

“那么让他多睡一会儿，等他醒来再吃药罢，”母亲说；“我们先吃饭。”她和母亲对面坐着吃了一碗饭。母亲的胃口不好。她觉得寂寞，觉得没趣，在饭桌上勉强和母亲讲了几句话。

“她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她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这并没有减轻她的寂寞之感。

“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够牺牲自己？……”她更烦躁，她第二次在心里责备自己。

但是这一晚终于平静地过去了。

第二天起他的病势稍微减轻了。树生仍旧每天到银行去办公，不过上午去得较晚，午后下了班便回到家里来。她暂时断绝了同事间的交际。她帮忙母亲烧饭，有时候还照料他吃药和吃早饭、晚饭。晚饭后他不想睡觉时，她还陪他谈些闲话。她谈着她那个银行里的种种事情，她什么都谈，就只不谈时局。

中药似乎很有功效。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母亲当着妻的面称赞中医高明，妻并没有反驳，只是微微一笑。其实有效的药倒是妻的态度的改变。他需要的正是休息和安慰。

“日本人究竟打到了什么地方了？”他觉得病渐渐好起来、精神可以集中时，就常常想着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敢问她，他害怕听到一个令人心惊的回答。有时候他也注意地看她的脸色，他想从她的表情上猜出战局的好坏，但是这没有用。在这些天里她常常给他看到她的温和而愉快的表情。偶尔他看见她在沉思，但是她马上就用笑容掩饰了一切。她不再跟母亲吵架了。他有时也看见（当他闭着眼或者半闭着眼假寐时）她们两个人坐在一处交谈。“只希望她们从此和好起来，那么我这次吐血也值得，”他也会欣慰地这样想过。

一天妻下班回来，很兴奋地对他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贵阳大轰炸全是谣言，独山失守也是谣言，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进贵州。”

她灿烂地笑了，他喜欢看她这样的笑容。

“真的？”他高兴地吐了一口气，用感谢的眼光望着她。“明天我倒想出去看看，”他慢慢地说。

“你才只睡了五天。至少你要睡上十天半月才好，”妻劝他道。“你只管养病好了，别的事情你一概不用管。”

“钱呢？”他问道。

“我有办法，你不必管它，”妻回答。

“不过多用你的钱也不好。你自己花钱的地方很多，小宣也在花你的钱，”他抱歉地说。

“小宣不是我的儿子吗？我们两个人还要分什么彼此！我的钱跟你的钱不是一样的？”她笑着责备他道。

他不作声，他找不出话来驳她。

“前些天我们行里在闹着调整待遇，后来因为湘桂战事搁下来了。现在又在说，战事好转以后就要实行调整。调整后我的收入可以增加三分之一，所以多花点钱也不要紧，”她看见他闭上嘴在沉思，便又含笑解释道。

“不过这总不大好，我过意不去。想不到我活到这样大，连自己也养不活，”他沉吟地说。

“你怎么这样迂！连这点事也想不通。你病好了，时局好了，日本人退了，你就有办法了。你以为我高兴在银行里做那种事吗？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将来我还是要跟你一块儿做理想的工作，帮忙你办教育，”她温和地安慰他。

“是啊，日本人打退了，我就有办法了，”他喃喃地自语道。

母亲端着饭锅子进来了。

“妈，让我来，”她走去迎母亲，想从母亲手里接过锅子来。

“你快去看看宣的稀饭，不要烧焦了。这个我自己会弄，”母亲摇摇头说。但是她仍然捡了一张旧报纸放在桌上给母亲垫锅子。

他望着妻的背影在门外消失了，他感激地暗暗对自己说：“她仍然对我好。不管我多么不中用，她仍然对我好。这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我不好意思多用她的钱。她会看轻我的，她有一天会看轻我的。我应该振作起来。”他想了会儿，忍不住出声念着她刚才说过的话：“时局好了，日本人打退了，就有办法了。我将来还是回到教育界去。”

“你要什么，宣？”母亲以为他在对她讲话，便过来问道。

“我没有讲话，”他摇头说，他好象刚刚走进一个梦境，就突然被他母亲唤醒了。这个阴暗寒冷的房间能够给他什么希望呢？

母亲还立在床前，她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前额，轻轻地问道：“你现在觉得怎样？”

“很好，”他答道。“我觉得药很有效。”

“明天再请医生来一趟，”她说。

“不必了，我已经好了，”他说。心里却想道：“我哪里有钱看病吃药啊？你真要我靠树生过日子吗？”

妻进屋来照料他吃了稀饭。电灯突然熄了。“怎么今晚上又停电？”他扫兴地说。“他们总不给你看见光明，”他诉苦地又加了一句。

“光明？你现在也要光明了？”妻说。他不知道妻是在赞美他，还是在讽刺他。

母亲点燃了蜡烛，又走出去了。屋子里亮起来。但是摇曳不定的惨黄色的烛光，给每一件东西都抹上一层忧郁的颜色。两只老鼠穿过屋子赛跑。楼下有一个女人用凄凉的声音给小孩叫魂。

“光明，我哪里敢存这个妄想啊？”他叹口气断念地说。

“你不要悲观，你好好养病罢。你还有一道药要吃。我去给你弄来，你吃了药好早点睡觉，”妻柔声安慰道。

“不，你自己先吃了饭再说。其实吃不吃药都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并不相信这种药。你吃过饭再给我吃药也好，也许这种药很有用处，我觉得今晚上人好多了。我有点怕吃这种药，真苦啊。不过也有人说药越苦越灵验。妈相信这种药。她的世界里就只有我同小宣两个人，偏偏我又不中用。”他勉强笑了笑。“你快去吃饭。妈怎么不进来？她还在弄菜吗？她一定是在给我弄药。她真是太好了。你快去看看她。你们快点吃饭罢。我可以闭上眼睛睡一会儿。”他又笑了笑。“你快去！我今天很高兴，战局好转，也免得大家逃难；不然我这个身体会累坏你们。”

妻走出了房门。他的眼光无力地向屋子四周移动。烛光摇晃得厉害。屋里到处都是阴影，他什么也看不透。他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妻回来得很早。她锁住眉头，疲倦地走进屋来，招呼了他和母亲，勉强地一笑，就默默地在书桌前坐下了。

“你怎么今天回来得这样早，还不到下办公时间？”母亲问道。

“行里没有事，坐着心烦得很，所以我早退了，”妻没精打采地答道。

“你今天没有什么应酬罢？”母亲无意地问了一句。

“没有，”妻摇摇头；过了片刻，她又说：“今天消息不大好，大家都没有心肠办公。”

“究竟怎么啦？”母亲变了脸色问道。

“听说独山已经失守了。又说日本人已经过了独山，就要到都匀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宣又在害病！”母亲慌张地说。“你看日本人会不会打到四川来？”

“我想也许不会。不过打来了，我们也只有逃难。我可以跟着银行走，就是宣的问题——”妻皱着眉头沉吟地说，但是母亲打断了她的话。

“你自然有办法。不过我跟宣，还有小宣，我们往哪里去好？我们赤手空拳怎么好逃难？偏偏小宣两个星期都没有进城，说是功课忙。宣又在害病，真急死人！”母亲只顾诉苦地说下去，她带着一种彷徨无依靠的可怜样子。

“妈，我的病差不多全好了，我可以走动，你不要耽心。我们公司一定也有办法安置我们，”他忍不住提高声音插嘴说。关于公司的话，是他说来安慰母亲的，那只是他的妄想，话一说出，他马上看见了周主任的冷冰冰的脸孔和严厉的眼光，他的心就冷了半截。

“你们公司有办法？你太老好了！你对公司还有什么指望？我看那个周主任就不是个好人，他那对贼一样的眼睛真讨厌！”妻带了点气愤地说。“要是我有办法，我一定不让你在他手下做事。”

他知道她说的是真话。但是当着母亲的面说出来，这种真话伤了他的心，引起了他的反感。“为什么我不能在他手下做事？我是靠我的劳力吃饭的！”他分辩道。

“你的话不错。可是他给你吃饱没有？你应该记得你过的是些什么日子！你甘心受他那种人欺负，太不值得！”妻说。

“记住有什么用？过去的横顺已经过去，”他叹口气说。

“可是你还有将来啊，宣，你不应该灰心，”妻又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非常柔和，眼睛里涌现了泪水。

她的声音使他吃惊，他感激地望着她的眼睛。

“汪先生！汪先生！”隔壁张太太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来，把他的眼光唤到房门口去。

“请进来，请进来，”母亲连忙大声招呼。

张太太推开掩着的门进来。“汪太太，你今天下班早！”她没有想到会看见树生在房里。“汪先生今天身体好些了罢？”然后她又向着他的母亲：“老太太，你这两天够辛苦啊！”再后：“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一定要请你们帮忙。要逃难，让我们跟你们一道。我跟我们张先生，带个两岁小孩，又是外省人，无亲无戚，逃难，没有钱，又没有车。他们的机关说不定随时都会撤销，不会带我们走的。万一东洋人打来，你们做做好事救救我们罢！你们本省人，到乡下去也可以，到别的县分去也可以。总之，我们跟着你们走，好不好？”她带着一种孤苦无靠的神情哀求道。

“事情还不会坏到这样罢，”他说，为了表示镇静，他勉强露出笑容。

“听说都匀已经失守，东洋人离贵阳只有几十里了，”张太太好象害怕人听见似地，做出严肃的样子压低声音说。“有人说还有一条路可以不经贵阳就到四川来。汪先生，汪太太，实在要找你们帮忙啊！”

“张太太，你不要怕，都是谣言。事情不会坏到这样，”树生温和地说。

“这两天外面人心惶惶，我们张先生没有办法，就只顾吃酒，你们看怎么不叫人着急！好的，谢谢你们啊。小孩恐怕要醒了，我回去，有事情我再过来。谢谢你们啊。”张太太的苍白脸上现出微笑。但是这微笑并没有使她的双眉开展，也不曾使她额上的皱纹平顺。她轻脚轻手地走出去了。

“树生，那么你的消息证实了，”他小声对妻说，话里不带感情，好象这是一件跟他毫无关系的事一样。

“我也不清楚，不过陈主任劝我走，”妻冷冷地答道，好象这件事情也跟她不相干似的，可是实际上它正搅乱着她的心。

“走，走哪里去呢？”他极力压低声音问道。

“他运动升调兰州，今天发表了，他做经理，要调我去，”妻也极力压低声音说，她故意掉开眼睛不看他。

“那么你去不去？”他又问，声音提高许多，他无法掩饰他的慌张了。

“我不想去，我能够不去就不去，”她沉吟地答道。

“行里调你去，你不去可以吗？”他继续问。

“当然可以，我还有我的自由，至多也不过辞职不干！”她也提高声音回答。

“你一个人走了，那么小宣怎么办？宣又怎么办？”母亲忽然板起脸问道。

“我并没有答应去，我实在不想去，”妻坦然回答，母亲的话并没有激怒她。

“那么你也没有回绝他，”母亲不肯放松地说。

“不过我也说过我家里有人，我不便去。况且会不会调，还不知道。现在只是一句话。”妻的声音里带了一点不愉快，但是她还能够保持安静。

“你想抛下我们，一个人走，你的心我还不知道！”母亲仍然在逼她。

妻不回答，她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略略埋下头看他。她看出了他的眼泪。她默默地抓住他的一只手，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挣出一句话：“我不会走的。”

“我知道，”他点着头感动地说。“谢谢你啊！”过了半晌，他又低声说：“其实你应该走。你跟着我一辈子有什么好处？我这一辈子算是完结了。”

“你不要这样说，这是境遇，不能怪你。这两年你也苦够了。你先养好身体再说，”妻感激地安慰他。

“不怪我，又怪谁呢？为什么别的人又有办法？”他说。听见她这样安慰的话，他更不能压下责备自己的念头。

“这是因为你太老好，”妻微笑说，她的眼光里含着爱和怜悯。

老好！这两个字使他的心隐隐地发痛。又是这个他听厌了的评语！虽然她并没有一点讥讽他的意思。他不再作声了。他想着那个他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不要做老好人！”“可是怎样才能够不做老好人呢？”“没办法。我本性就是这样。”这三句话把他的一切不平和反抗的念头消耗尽了。他这几年的光阴也就浪费在这个问题上。……于是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怎样，你又不快活了？”妻吃惊地问。

“没有，”他摇摇头说，他这时才注意到母亲已经回到小屋去了。

“那么，你再睡一会儿。我就在家里陪你。我不会一个人走的，你不要耽心，”妻温柔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他小声答应着，一面点点头。

她站起来，慢慢地走到一扇窗前，看下面的街景。窗户开在这所楼房的右面砖墙上。下面是一条小小的横街（其实只是小巷）。这所楼房比它四近的房屋都高，并没有墙壁和屋顶遮住窗内的视线。她也可以看见大街。大街是从山坡开辟出来的。迎着她眼光的正是高的一段。因此她能够看见几辆人力车衔接地从坡上跑下来，车夫的几乎不挨地悬空般跑着的双脚使她眼花缭乱。

“他们都忙啊，”她自语道，这是她随口说出来的，声音低，只有她自己听得见。她说这句话好象并没有用意，但是又象有很多意思。她心里仿佛装了不少的东西，但是又好象空无一物。她并不想看什么，却一直站在窗前望着尘土飞扬的马路。她觉得“时间”象溪水一样地在她的身边流过，缓缓地，但是从不停止。她的血似乎也跟着在流。

“难道我就应该这样争吵、痛苦地过完我一辈子？”这是她心里的声音。她不能回答。她吐了一口气。

忽然门上响起了两下叩声。她吃惊地掉转身子。银行里的工友推开掩着的门进来。

“曾小姐，陈主任有封信给你，”工友把信递给她。

她拆开信，看完了信上的寥寥几句话。他约她到胜利大厦吃晚饭。她默默地信笺撕了。

工友站在她面前，等候她的回话。“知道了，你回去罢，”她吩咐道。

“是，”工友唯唯应着，掩上门走出去了。

她把撕碎了的信笺揉成纸团捏在手里，背靠着窗站了一会儿。屋子渐渐地在褪色，但是夜象一管画笔，在屋角胡乱涂抹。病人的脸开始模糊了。他在床上发出急促的呼吸声。不知道他做着怎样的梦。母亲在小屋里没有一点声息。他们把寂寞留给她一个人！她觉得血在流走，不停地流走。她渐渐地感到不安了。“难道我就这样地枯死么？”她忽然起了这个疑问。她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她并不想去赴陈主任的约，她甚至忘记了手里那个撕碎的纸团。

母亲从小屋走出来，扭开了这间屋子的电灯，又是使人心烦的灰黄光。

“啊，你还没有走？”母亲故意对她发出这句问话。

“走？去哪里去？”她惊讶地问道。

“不是有人送信来约你出去吗？”母亲冷笑道。

“还早，”她含糊地回答道。她略略埋下头看了看那只捏着纸团的手，忽然露出了报复的微笑。现在她决定了。

“今天又有人请吃饭？”母亲逼着再问一句。

“行里的同事，”她简单地答道。

“是给你们两个钱行罢？”

母亲的这句话刺伤了她。她脸一红，眉毛一竖。但是她立刻把怒气压住了，她故意露出满不在乎的微笑，点着头说：“是。”

她换了一件衣服，再化妆一下。她想跟他讲几句话。可是他还在睡梦中。她看了他一眼，然后装出得意的神气走出了房门。她还听见母亲在她后面叽

咕，便急急地走下楼去了。

“你越说，我越要做给你看，本来我倒不一定要去，”她噘起嘴气恼地自语道。

十五

她坐人力车到了胜利大厦。陈主任在门口等候她。他陪她上楼。他已经在餐室里定好了座位。他帮忙她脱去大衣，让她坐下来。他坐在她的对面。他含笑地望着她，看得她有点不好意思。她便开口先说：

“飞机票弄好了吗？”

“弄好了，大后天走，”他换了一个比较紧张的表情回答。

“很好，那么再见了。明年还回来罢？”她笑着说。

她这笑容使他不知道她的真意是什么，但是这鼓舞着他。他做出恳切的表情，低声说：“树生。”他唤她的名字，这还是第一次，以前他都称她为“密司曾”。她听见这个称呼，吃了一惊，脸微微红一下。他接下去说：“我刚才得到可靠的消息，敌人已经打进了都匀，看这情形是挡不住的了，还有谣言说贵阳已经靠不住了。”

“不会这样快罢？”她摇摇头说，极力掩饰她心里的恐惧。

“快得很，简直叫你想不到！”他差一点要把舌头伸出来了。这时茶房端上汤来，他连忙把嘴闭上，低下头拿起汤匙喝了两口汤。“你打算怎么办？”

“我吗？我往哪里去呢？我还不是留在这个地方！”她故意笑着回答。

“那么日本人打来怎样办？”他又问。

“等他们打来再说。来得及就逃，来不及就躲到乡下去，”她故意装出不在乎的神情答道。她埋下头喝汤。

“这样不行，日本人来，会到乡下找花姑娘的。你还是早走的好，行里的事没有问题。我有办法给你弄张黑市飞机票，你大后天跟我走，”他做出严肃的表情说。

“大后天太快了，我来不及，”她说，抬起眼睛看他，又埋下头去。

“你还嫌快？日本人来得更快啊！”他着急地说。“这是一个好机会，错过了就不容易找了。我说的全是真话，现在局势的确很严重，请你早点打定主意。”

她并不作声。她开始在思索。丈夫的没有血色的病脸，母亲的憎恨与妒忌的眼光，永远阴暗的房间。……还有湘桂路上逃难的故事，敌人的暴行……这一切全挤到她的脑子里来。她的心乱得很，她无法打定主意。她不能再装假了。她放下汤匙，抬起头叹息地说：“我目前怎么走得了！”

“走不了？你记住这是逃难的时候啊。你家庭不是很简单吗？你还有什么丢不下的！”他说，他知道她有一个丈夫和丈夫的母亲，他也知道她丈夫多病，她又跟那个母亲合不来，他也知道她不大喜欢她这个家。他却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他也不知道她“丢不下的”还是那个多病的丈夫。

“太快了，让我多想想，”她摇头说，她不希望他再拿这样的话逼她。她不愿意马上就决定这个大问题。

“那么我明天早晨听回信，过了明天就难弄到飞机票了，”他说。

“等我想想看，”她沉吟地答道；但是接着她又摇一下头。“我看还是现在回答你罢：我不去了，”她含笑说。

“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你不能放过啊，”他略略变了脸色说。“你不应该为你家里的人牺牲，他们都不关心你，你何必管他们的事。”

汤盆早已收去，现在换上了炸鱼。她低着头，不做声。

“树生，你多想一想。你不能这样白白牺牲你自己啊。你还是跟我一块儿走罢，”他恳求道。

“但是他们怎么办？”她好象在对自己说话似地说。

“他们会照顾自己，你不走对他们也没有好处。你走了，还可以给他们留一笔不小的安家费。”

“可是他——”她原想说“他在生病”，但是刚说出“他”字，她忽然住了口。应该说是那张黄瘦的病脸堵住了她的嘴。她不愿意在这个年纪比她小两岁的男人面前提到她的丈夫。这太寒伧了。

“在这种时候，你还想到别人，你的心肠太好了，”他连忙接下去说。

“可是心肠好，又有什么用？你只有白白牺牲你自己，太不值得！”

他这几句话她听起来不大入耳，她冷冷地说一句：“不走也不见得就会死罢。”

“树生，你不知道，战局多严重。我并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他着急地说。

“我并没有说你在开玩笑，”她说，微微一笑，接着又说：“不过这里有千千万万的人，你为什么就关心我一个？”

“因为我——”他答道，但是她害怕听他说出下面的话，她已经明白他的意思，她脸一红，连忙用别的话打岔了。

到最后喝咖啡的时候，他们忽然听见邻座一个人说：“我决定全家搬回乡下去。你呢？不可不早打主意啊。”

“我才逃到这里来，已经精疲力尽了，还有什么办法呢？”另一个声音回答。“我们这些‘脚底下人’，要逃都没有去处。”

“你听他们的话！”陈主任低声提醒她说。“可见时局的确严重。你非跟我走不可！”

“要走也没有这样容易，我有许多未了的事啊，”她顺口答道，她有点害怕，她的心思更活动了。

“这个时候还管那些事情！你不必多讲了。你准备大后天走罢，”他激动地说。

“听你这口气，好象你要强迫我跟你走，”她微笑说，故意掩饰她的迟疑不决。

“当然，因为我关心你，”他用了战抖的声音说。他伸过手来拿着她的一只手。

她埋下头不作声，慢慢地把手缩回，过了两分钟她忽然站起来，低声说：“我要回去了。”

“等两分钟，我送你回去，”他连忙说。她又默默地坐下来。

陈主任付了帐，陪着她走下楼。他们站在大厦门前。几辆汽车叫吼着一齐开到前面空地上来。人声嘈杂。盛装的淑女、贵妇和魁梧的外国军官从车中走出，鱼贯地往旁边跳舞厅走去。

“不象就要逃难的样子。我看那些话都是谣言，”她疑惑地说。

“脚底下人”：当时重庆人常常称江浙等省的人为“脚底下人”。

“谣言？你还不相信我的话？”他不以为然地说。“我敢说不到一个星期，这班人都会溜光的！”在他的脑中这个城市的前途是一片漆黑，除了毁灭，他再也看不见什么。

“可是走不了的人也很多，能走的究竟是少数，”她感慨地说，她又觉得她的丈夫很可怜。

“不管怎样，有办法走的人总得走啊，”他说。

他们慢步穿过汽车中间的小块空地，慢步走出了巷子。

“现在回家未免太早。我们散散步好不好？”陈主任提议道。

“我想早点回去，”她低声回答。

“迟一点也没有关系，你迟半点钟回家，不会有什么不方便。我想你在家里一定很寂寞，”他说。

她觉得末一句话搔着了她的痒处。她想拒绝他的提议，她想分辩说她在家里并不寂寞，可是她的心反抗。她咬紧嘴唇，什么话也不说。她的脚却顺从地跟着他的脚步走去。

夜并不深，可是显得十分凄凉。街灯昏暗，店铺大半关了门。只有几家小食店还在营业，虽不冷静，却也没有往日那样热闹。寒风暗暗地吹着。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带着怕冷的样子匆匆地逃走了。

“你看，一切都变了，”他带着一点威胁的调子在她的耳边说。“过两天还要更荒凉！”

她不讲话，只顾埋头跟着他的脚步走。她的眼前还浮动着胜利大厦门前淑女贵妇们的面影。“她们都比我幸福，”她不平地想道。

他们走过她住的那条街口，她甚至忘记抬头看一眼她的家所在的那座楼房。他们走向江边。他们顺着那条通到江边去的马路走着。马路蜿蜒地向下弯。他们转下坡去。在中途，在可以望到对岸的地方站住了。他们靠着石栏杆，眺望对岸的星星似的灯火。江面昏黑，灯火高低明灭，象无数只眼睛在闪动，象许多星星在私语。

就在这一段马路上，离他们有二十步光景，有一对恋人似的青年男女，也靠着石栏杆。两个人咕噜地一直讲个不停。

“我在这个鬼地方住够了，也应该走了，”他自语似地说。

“住在这里，觉得这里不好。到了别处去，又不知道怎样，”过了半晌她也自语似地说。

“无论如何总比这个鬼地方好。兰州天气好，是出名的，”他接嘴说。

“我要是去兰州，我的工作不会成问题罢？”她忽然问道。

“不成问题。包在我身上！”他兴奋地说。“那么你决定了！”

“我还是决定不去，”过了一会儿她才回答一句。他不知道她是在说真话，还是开玩笑。

“我们明天再谈去兰州的事，今晚上不要再提这种事情，”他连忙岔开说。“你看夜多么静，我真想写首诗。”

最后一句话差一点惹她笑出声来，但是她竭力忍住了。她含笑问道，“陈主任还写诗吗？”

“我新诗旧诗都爱读，也偷偷写过几首，写得不好，怕你见笑，”他带点慌张、也带点得意地答道。

“没有想到陈主任还是位诗人，我倒想拜读陈主任的诗，”她说。

“你不要再叫陈主任，你就叫我的名字，叫我奉光罢，”他央求道。

“我们叫陈主任叫惯了，改不过口来。还是叫陈主任顺口些，”她带笑回答说。她有点兴奋。她起了一点幻想，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幻想。

“横顺以后要改口的，”他想出这句双关话，他自己也很得意，故意停了一刻，才补上一句：“在兰州我是经理了。”他笑了笑。

“我们将来逃到兰州来，没有办法，向陈经理要碗饭吃，你不要板起面孔拒绝啊，”她也故意笑着说。

“将来？你不是大后天就走吗？”他半开玩笑地说。

她的身子微微战抖了一下。她觉得他的热气喷到她的脸颊上来了。她把身子移开一点。“我还没有决定啊。”接着又加一句：“我不能够丢开他们一个人走。”

“你不能放弃这张飞机票啊。而且你不应该为别人牺牲你自己。而且你先走，他们可以随后跟来，而且……”他着急地说，他把一只手突然伸出去轻轻搂着她的腰。她想避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她觉得自己脸红，心也跳得厉害。她没有功夫分析她这时的心理。她极力约束自己。她打断他的话：“你看对岸，看江面，看我们周围，多宁静，多和平。大家都很安静，我们何必自相惊扰。你有任务当然应该走。可是我赶去做什么呢？”

“因为——因为我爱你啊，”他鼓起勇气激动地在她的耳边说。

这句话对她并不全是意外，但是她仍然吃了一惊。她浑身发热。心跳得更急。她有一种形容不出的异样的感觉。她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才好。她把头埋得更低，眼睛望着黑暗的水面。

“你现在知道我的心了。你还不跟我走么？”他还在她的耳边絮絮地说。

她看见丈夫的带哭的病脸，他母亲的带着憎恶的怒容，还有小宣的带着严肃表情（和他的小孩脸庞不相称）的苍白脸，她摇着头痛苦地说：“不！不！不！”他以为她在表示她不愿意跟他走，可是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三个“不”字里含着什么意思。

“为什么还说‘不’呢？难道你不相信我？”他温柔地问道，一只手还放在她的腰间。他俯下头去，想看出她脸上的表情，可是他的头刚刚挨近她的脸，闻到一股甜甜的粉香，他就大胆地伸过嘴去亲了一下她的左边脸颊，同时放在她腰间的右手也搂得紧些了。

“不！不！”她吃惊地小声说，连忙挣脱他的手，向后退了两步，脸涨得通红。他也跟到她身边，还要对她讲话，刚说出一个“我”字，她忽然摇摇手说：

“我的心乱得很。你送我回去罢。”她又害羞，又兴奋，可是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

“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啊，”他低声催促道。

她不作声。她的脸仍然发热，左边脸颊特别烫，心不但跳得急，好象还在向左右摇来摆去。她没有一点主意，她的脑子也迟钝了。江面上横着一片白蒙蒙的雾，她也没有注意到雾是什么时候加浓的，现在却嗅到雾的气味了，那种窒息人的、烂人肺腑似的气味。夜在发白，雾弥漫到岸上来了。雾包围着她。她除了他外，看不见一个人。那一对青年男女已经被雾吞食了。她有点胆怯。她仿佛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轻轻说着：“我只会累你们。”她打了一个冷噤。她再说一句：“我们还是回去罢。”先前被引起来的那一点浪漫的情感已经消失了。

“时候还早呢！我们再找个地方坐坐好不好？”他说。

“我想早点回去，”她短短地说。“明早晨八点钟我在冠生园等你。”

“那么你明天一定要回答我啊，”他郑重地叮嘱道。他很高兴，他相信她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

“明天，好的，”她点头答道。她把左手插在他的右胳膊底下，挽着他的右膀，走下人行道，向浓雾掩罩的街心走去。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他忽然关心地问她：“你家里有什么事情吗？你今天好象不大高兴。”

“没有，”她摇摇头说，她仍旧挽住他的膀子在雾中走着。她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她有一点怕，又有一点烦，她只想抓住一件东西，所以她更挽紧他的膀子。

“这样离开你，我实在不放心，”他又说；“你在这里不会过得好。”

他的话使她想到别的事情。她觉得心酸，她又起了一种不平的感觉。这是突然袭来的，她无法抵抗。她想哭，却竭力忍住。没有温暖的家，善良而懦弱的患病的丈夫，极端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婆母，争吵和仇视，寂寞和贫穷，在战争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这一切象潮似地涌上她的心头。他说了真话：她怎么能说过得好呢？……她才三十四岁，还有着旺盛的活力，她为什么不应该过得好？她有权利追求幸福。她应该反抗。她终于说出来了：“走了也好，这种局面横顺不能维持长久。”声音很低，她象是在对自己的心说话。

“那么就决定搭这班飞机罢。到了兰州一切问题都容易解决，”他惊喜地大声说。

“不！”她惊醒般地说。但是接着她又添上一句：“我明天回答你。”

“明天？这一晚上的时间多长啊，”他失望地叹息道。

“我得回去好好想一想，这回我要打定主意了，”她说，她并没有感到爱与被爱的幸福。她一直在歧途中彷徨，想决定一条路。可是她一直决定不了。

“那么你明天不会拒绝罢，”他结束地说，希望还不曾完全消失。“明天八点钟在冠生园，我等你答复。”

“明天我也也许会决定走，”她说，“这里的雾我实在受不了，好象我的心都会给它烂掉似的。这两年我也受够了。”她心烦，她想反抗。可是她的眼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雾。她看不见任何的远景。

十六

她又回到了家。进了大门，好象进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可是她不由得皱起眉头来。她似乎被一只手拖着进了自己的房间。

母亲房里有灯光，却没有声息。丈夫静静地躺在床上。他没有睡，看见她进来，他说：“你回来了。”声音是那么亲热，他没有抱怨，这倒使她觉得惭愧。她走到床前，温柔地对他说：“你还不睡？”

“我等你回来，”他答道。

“你自己身体要紧啊，为什么还只想到我？”她感动地说。

“我白天睡得多，所以晚上睡不着，”他亲切地回答。“今晚上张太太又来过，她说我们这里大门口堆了很多行李，说是有一些从贵阳逃来的难民。

张太太听人说连贵阳都保不住了。她劝我们早走。你看怎么样？”

“我好象没有看见什么。大门口冷清清的。情形不会坏到这样罢，”她心不在焉地说。

“我也是这样想，不会这样快。其实我们这种人无钱无势，也用不着逃难。就是遇到不幸，也不过轻如鸿毛。其实活着也不见得比死好。这样一想我的心倒也定了。我一直等着你回来，想跟你谈谈。”他小心地压低声音：“我跟妈常常谈不拢，我也不敢多跟她商量。你比她懂得多，更明白，所以我盼望你回来，我好跟你商量。”

“什么事？你说逃难吗？”她随口问道。

“是，就是逃难的事，”他用恳切的眼光望着她，答道。“我看这回十分之八九有问题。我是逃不动的了。我也不怕什么。不过你应该早作准备。你不必陪我守在这里。你要是能把小宣带走，也给妈找个安身地方，那我就心安了。”他的声音略带战抖，却没有一点感伤的调子。

“我不走，”她简短地说；他这番话是她没有料到的，他在这时候显得十分大量却使她感到良心的责备。她暗想：“他要我走，你居然也让我走！”她反而觉得心里不痛快。

“到那时候你不走是不行的。你不要只顾想着我，我临时可以跟着我们公司走，”他着急地开导她。“我们男人的办法究竟多一点。你不是说行里有意思调你去兰州吗？刚才……”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想了半天，我觉得你还是答应去的好。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不想去，”她仍旧简短地回答他；她坐在床沿上，他的诚恳的关心的表情，使她心里更不舒服，她掉开头去不看她。

“树生，”他颤声唤她，她不得不回过头来。“我这个意思不会错，我是平心静气地想过的——”

“是不是妈跟你讲过什么话？”她打断他的话头，突然问道。

“我没有讲过！我才不在背后讲人坏话！”母亲意外地在小屋里大声分辩道。

树生不做声，却气得用力咬嘴唇。他提高声音回答：“妈，并不是说你讲过树生的坏话，请你不要多心。”

“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母亲继续说。“她横竖是留不住的，让她早点走了也好。”

“我偏不走，看你有什么办法！”树生赌气地说，但是声音低，母亲并没有听清楚。

“妈就是这个脾气，你不要认真，就让她说两句罢。”他小声劝她。

“我这几年也受够了，你亲眼看见的，”她低声答道。

“那么你一个人先走罢。能带小宣就带小宣去；不能带，你自己先走。你不要太委屈了你自己，”他温和地、清清楚楚地说，声音低，故意不让他母亲听见。

“你真的是这样决定吗？”她冷冷地问道，她极力不泄露出自己的感情。

“这是最好的办法，”他恳切地、直率地回答，“对大家都好。”

“你是不是要赶我走？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先去？”她又发问。

“不，不，我没有这个心思，”他着急地分辩。“不过时局坏到这样，你应该先救你自己啊。既然你有机会，为什么要放弃？我也有办法走，我们很快地就可以见面。你听我的话先走一步，我们慢慢会跟上来。”

“跟上来？万一你们走不了呢？”她仍旧不动感情地问。

他停了片刻，才低声回答她：“至少你是救出来了。”他终于吐出了真话。

她突然把脸埋在他的胸膛上，眼里浮出了泪水，心里难过得很。她想大哭一场，然后决定一条路，就不再踌躇。

“宣，你睡罢，为什么你总是不想到你自己啊？”她站起来，揉了揉眼睛，叹息地说。

“我是不要紧的，我是不要紧的，”他接连地说。

“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她自语似地说。她在房里来回走了几转。“我不走。要走大家一齐走！”她说，她决定了，虽然这个决定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

第二天早晨她带给陈主任的答复就是这三个字：我不走。

陈主任立刻变了脸色。过了一会儿他才勉强做出笑容问一句：

“你真的这样决定了？”

“我仔细地想过了，我决定留下来。”

过了几分钟他带着严肃的表情低声对她说：“我不是故意吓你，我告诉你一个消息：行里昨晚得到贵阳分行的电报，说是在办结束了。你得打定主意啊。”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她冷淡地说。

“你多考虑一下。今天情形更不对了。你看在这里吃早点的人比往天少得多，而且都是慌慌张张的。大难近在目前，就是拖也只有几天好拖，”他说。

“你的飞机票拿到了吗？”她打岔地问，她不愿意再听他讲那些话。

“还没有，今天下午再去问，”他无精打采地答道。

“你要早点去啊，你不怕票子会给别人抢去吗？”她假意关心地问道。

“票子给别人抢去也好，我一个人走不走也没有关系，”他自语般地说，他故意用愁苦的眼光看了她一眼。这时茶房送来他要的一碗广东粥，他就埋下头去，用汤匙舀起粥来喝着。

她觉得无话可说，就端起杯子放在嘴边，呷着茶。她看了他两眼。她相信他不是装腔作势，她相信他的痛苦和失望是真的。她开始同情他。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合理。她想：我就答应跟他去，会有怎样的结果？她的决心动摇了。

“你先去罢，说不定我将来会跟着来的，”她并不存心要说这样的话，现在只是为了安慰他、才顺口说了出来。

“将来？我看等不到将来了！”他着急地说。他睁大两眼望着她，好象在责备她：你怎么还不觉悟啊！他的话激起了她的反感。她赌气般地冷冷答道：

“那么你将来回来替我们收尸罢。”

“我给你说，我不去了！”他板起面孔说。

“你不去？这不是你自己想了好久的位置吗？”她惊讶地问道。“你连飞机票也弄好了。”

“我原先准备好你也去的，”他只回答一句。她立刻脸红起来。他的意思她完全了解。她不愿意听他说这样的话，可是她又有意识地逼着他说出这类话来。这时她不敢再答话了。她的决心本来就并不怎样坚定，她害怕他

会来搅乱它。他也不再说话。他默默地望着她。这注视，这沉默使她难堪。她觉得那一对火似的眼光在烧她的脸，她受不住。她低声说：“我们走罢。”她自己却坐着不动。他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过了一会儿，她再说：“要是行里一定要调我去，我也会去的。”她已经让步了，可是他并不曾感觉到，而且连她自己也不觉得。

他们从冠生园出来，他送她到银行门口，就走开了。她以为他去航空公司。他自己却不知道应该去什么地方，最后他决定到国际咖啡店去消磨时间。

她进了银行，看见那些办公桌，那些玻璃板，算盘，帐簿，那些人头（这一切似乎永远不会改变！），她突然感到寂寞。她想跑出去唤他进来，但是她并不曾向大门走一步，她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他来做什么。她默默地走到她自己的座位上去。

新会计主任已经到了，是一个五十光景的老先生，为人似乎古板。他带着奇怪的眼光接连看了她几眼，微微摇了摇头。

她坐在办公桌前，觉得心里很空虚。办公时间早到了，可是往日那种平静、愉快的气氛已经消失。同事们张皇地进进出出，交头接耳地谈话，也不遵守办公时刻。她忽然发觉两张桌子空了，办事人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忽然一个平日跟这个银行有着不小的往来的客人跑来报告：“贵阳已经失守了。”贵阳到此地只有两天的汽车路程。有些同事失声叫起来。“谣言！”她在心里说。

“那我们怎么办？”一个管储蓄户的男同事惶恐地问。

“你是本地人还怕什么？我决定不逃。逃也光，不逃也光，还不如不逃省事，”那个中年客人镇静地说，他似乎一点也不害怕。

“我打算明天就把家眷送走，”另一个管汇兑的同事说。

“要是敌人真的来得这样快，那么逃都来不及罗，”管储蓄户的同事接嘴道。

“谣言！”她在心里驳斥道。

但这这样的谣言被人们反复不停地散布着，银行里整个上午的时间都被它占去了。经理和主任往各处打电话探询消息。他们得到的消息虽然互相冲突，不一定可信，但是其中却没有一件不是叫人耽心的。谁都没有心肠办公。听见什么响声，大家就记起警报来。

她忍受不了这种气氛。她忽然想起家，想起丈夫和儿子。她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小宣，要他请假回家走一趟。她写好信把它交给工友拿去寄发，以后她觉得心里更烦，实在坐不住，就自动地提早下班，也没有人干涉她。

走在街上，她觉得一切都跟往日不同，她好象在梦中，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都很模糊。“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回家去？我的家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这样匆忙地奔走究竟为着什么？”她这样问她自己。“我决定了没有？我为什么不能够决定？我应该怎样办？”

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不到一个答复。她已经到了家。

大门口站着一群人在谈论时局。挑夫们正抬着大皮箱从过道里走出来。有人在搬家，或者离开这个城市。她有点着急，连忙走上楼去。

三楼相当静。自己说没有办法的张太太一家人大清早就搬走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但是房门还锁着。汪家的房门平日总是掩着的，今天却紧紧地关上了，她推不开门，便用手叩了几下。

自然是母亲来开门。她进屋后第一眼便发觉他不在房里，他的床空着。

“妈，他到哪儿去了？”她吃惊地问道。

“他上班去罗，”母亲平平淡淡地回答。

“他的病还没有完全好，怎么今天就去上班？”她不以为然地说。

“他自己要去，我有什么办法！”母亲板起脸答道。

她好象挨了一下闷棍，过了半晌，才自语似地吐出话来：“其实不应该让他去，他的病随时都会加重的。”她怀着满腔的热情回家来，现在心完全冷了。她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声调都会使母亲感到不痛快。

母亲没有能留住儿子，正在为这件事情懊恼，现在听见媳妇的这种类似责备的话，动了气，心想：我就是做错了事，也没有由你来责备的道理！何况你从来就不关心他，只顾自己在外面交男朋友。你这个连家也不要、打算跟男朋友私奔的女人，还有脸对我讲话！

“那么你为什么不早回来拉住他？现在倒要说漂亮话！我问你：今天你走得那样早，究竟为了什么事情？”母亲挣红脸，伸出右手的两根手指头指着媳妇的鼻子说。

“我去会男朋友，我明白地给你说，你管得着吗？”媳妇也挣红脸大声回答。

“我管得着。你是我的媳妇，我管得着！我偏要管！”母亲骂道。

两个女人就这样地吵了起来。

十七

这时候汪文宣在公司里办公。他不会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

这天早晨妻已经出门了，他才起床。他吃过早点后，忽然说要去办公。母亲阻止不了他。

“不要紧，我已经好了。”

“我不能请假太多。再不去办公，连饭碗都会成问题。”

“我们不能把全家人都交给树生一个人养活啊。我这几天吃药治病都是花她的钱。”

他拿这些话来回答母亲。

母亲找不到反驳的话了。其实她自己也想：我宁愿挨饿，宁愿忍受一切痛苦。她不愿意让树生来养活她。

“还是让我出去做事罢，我当个大娘，当个老妈子也可以，”母亲最后吐出了这样的话。她充满爱怜地望着她这个独子，她的眼圈红了。

“妈，你怎么这样说？你是读书人啊，哪里能做这种事！”他痛苦地说，掉开眼光不敢看她。

“我只后悔当初不该读书，更不该让你也读书，我害了你一辈子，也害了我自己。老实说，我连做老妈子的资格也没有！”母亲痛苦地说。

“在这个时代，什么人都有办法，就是我们这种人没用。我连一个银行工友都不如，你也比不上一个老妈子，”他愤慨地说。最后他抬起头叹了一口气，就走出了房门。母亲追出去唤他，要他留下，他却连头也不回地走下楼出去了。

他到了公司。楼下办公室似乎比平日冷静些。签到簿已经收起了。钟老带笑地对他点一个头。他上了楼。二楼办公室里也有几个空位。吴科长刚打完电话，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淡淡地问一句：“你病好了？”

“好了，谢谢你，”他低声答道。

“我看你身体太差，应该长期休养，”吴科长冷冷地说。他不知道吴科长怀着什么心思，却听见周主任在小房间里不高兴地咳了一声嗽。

他含糊地答应了一个“是”，连忙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

他刚坐下，工友就送来一叠初校样到他的面前。“吴科长说，这个校样很要紧，当天就要的，”工友不客气地说。

他心想：时局这样紧张，同事中今天也有几位没有来办公，大家都是忙忙慌慌，为什么单单逼我一个人加倍工作？要是我今天不上班呢？你们就只会欺负我！这太不公道了。可是他哼都不哼一声，只是温和地点点头。

“吴科长说，当天就要的，”工友站在旁边望着他，象在折磨他似地又说了一遍。

他抬起头，但是他连愤怒的表情也没有，他温和地答了一声“好”。工友走开了。

他默默地翻开校样和原稿，他不觉皱起眉头来。这是一本关于党义的书，前面还有好几位党国要人的序言，是用四号字排的。他埋下头低声念这些序文，又念正文。他的心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觉得头昏，四肢无力。但是他还勉强支持着把校样看下去。

在这中间，周主任走了，吴科长又走了。同事们大声交谈起来。他们在交换战事的消息。每个人都带着忧虑的表情讲话，并不热心工作。只有他仍旧把头埋在校样上面。“当天要的，”一个粗鲁的声音不断地在他的耳边说。最后他忍不住在心里答复了：“不要逼我，至多我把命赔给你就是了。”

到了十二点钟，开饭的铃声响了。他好象遇到救星似的，离开了办公室。他的胃口仍然不好。他勉强吃了一碗饭。他觉得同事们都带了轻蔑和怜悯的眼光在看他，并且故意发一些关于战事的“危言”吓他。“老汪，你不久要加薪了。在这种时候你居然还能够埋头工作，年底真该得奖金啊，”一个同事这样讥笑他。他不回答，却又躲到楼上办公桌前面去。他不抽烟，又没有精神看书。他无聊地坐在位子上，对着玻璃窗打起瞌睡来。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叫“汪先生”，他吃惊地睁开眼睛，挺起身子。那个工友又立在他面前，望着他说：“有人给你送来一个字条，请你立刻去。”

字条放在桌上，是树生的笔迹。上面写着：

宣：

有事情同你谈，请即刻到国际一晤。

树生即日

他吃了一惊。“有什么事情呢？”他想到，连忙站起来，匆匆走下楼去。

“汪兄，到哪里去？”钟老问道。

他含糊地答应一声，就走到人行道上去了。

他走进国际咖啡厅。顾客很少，桌子大半空着。树生坐在靠里一张圆桌旁。眼睛正朝着门口，她的擦了粉的脸上带着怒容。看见了他，她忽然站起来，但是马上又坐下了，她望着他，等候他走过去。

“我接到字条马上就来了，”他赔笑地说，在她对面坐下。“什么事？”

“我要跟你离婚！”她睁圆眼睛，噘起嘴，没头没脑地说了一他几乎不

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但是她的表情他却看得十分清楚。他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他不敢再问她。他默默地埋下头去。

“我受不了你母亲的气，我今天下了决心了。有我就没有她，有她就没有我！这一个星期我全忍着，快闷死我了！”

他吐了一口气，抬起头来。他觉得事情并不十分严重，还是那个老问题。他可以向她解释，他甚至可以代母亲向她赔罪。她的怒气会慢慢地平静下来的。

“什么事呀？你得先跟我讲明白，”他鼓起勇气赔笑道。“我妈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脑筋旧，思想不清楚，有点噜嗦，不过人倒是顶好的。”

“什么事？还不是为了你！我提前下了班回家去看你，知道你走了，我觉得她不应该放你走，多说了几句话，她就吵起来了！……”她红着脸激动地说。

“这是我不好，妈本来不放我走，我一定要走，我怕假请多了，公司方面不满意。你也知道我们那里的周主任、吴科长都是刻薄成性的，我吃了他们的饭就没有自由了，”他不等她说完，便插嘴说。

“可是你在吐血生病啊，难道生病也不能请假吗？他又没有买了你的命！”她答道。

“公司不是慈善机关，哪里管得了这些，”他苦笑道。“听吴科长今天的口气，好象他嫌我身体不好，倒希望我辞职。”

“辞职，就辞职！你不做事我也可以养活你！”她赌气地说。

他脸红了一下，他略略埋下头，喃喃说：“不过……”

“是，我知道，又是你母亲，她不愿意，”她气愤地说。“她看不起我！她恨我！”

“不，你误会了，她不恨你，这跟她不相干，”他连忙打岔道。

“她恨我，她看不起我，她刚才还对我讲过，我没有跟你正式结过婚，我不是你的妻子，我不过是你的姘头。她骂我不要脸，她骂我比娼妓还不如。我可怜她没有知识，我不屑于跟她吵。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明白，如果你不另外找个地方安顿她，我就跟你离婚！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一辈子也不会幸福，她根本就不愿意你对妻子好。你有这样的母亲，就不应该结婚！”她愈往下说愈激动，也愈生气，一张脸挣得通红，两只眼睛里燃着怒火。

“树生，你稍微忍耐一下，”他惶恐地说，“等到抗战胜利了，她要到昆明——”

“等到抗战胜利！”她冷笑了一声，“你真是在做梦！日本人已经打到贵阳了，你还在等待胜利！”

“那么大家何苦还要吵呢？彼此忍耐一点不好吗？”他脸上勉强做出笑容，可是他心里很难过。

“忍耐！忍耐！你总是说忍耐的话！我问你，你要我忍耐到几时？”她烦躁地问。

“只要环境好一点，大家就可以相安的，”他带着希望地答道。

“等环境好一点，这样的话我听你说了几年了。环境只有一天天坏下去。跟着你吃苦，我并不怕，是我自己要跟你结婚的。可是要我天天挨你母亲的骂，那不行！”她又生起气来，脸又挣红了。

“那么你看在我的份上，原谅她罢，她这两年也吃够苦了，”他脸色惨

白地央求道。

“那是她活该，生出你这个宝贝儿子来！”她忽然变了脸色说，从手提包里掏出三张百元钞票丢在桌面上，也不再说什么，就站起来，气冲冲地走出去了。

他呆呆地坐在椅子上，过了几分钟才跑出去追她。

他满眼都是人，他应该到哪里去找她呢？他掉头四望，他看不见她的背影。“她一定是去银行，”他想，他便朝那个方向走去。他大步走着，全身发热，淌汗。

他走过大半条街，终于见到她的背影了。他兴奋地唤了一声：“树生！”她似乎没有听见。他鼓起勇气向前跑去。他离她愈来愈近了。他第二次大声唤她的名字。她停下来，回头看他。他连忙跑上去，抓住她的膀子。他睁大两只眼睛瞪着她，半晌才气咻咻地吐出一句话：

“树生，我都是为了你。”他的额上冒着汗。脸病态地发红，嘴无力地张着在喘气，脸上带着一种求宽恕的表情。

“你何苦来！”她怜悯地望着他说，“为什么不回家去躺躺？你病还没有好，怎么能办公啊？”

“我应该向你说明真话，”他仍旧很激动地说，“我去办公，我不过想借支一点钱。”

“我原先就说过，你要用钱，我可以拿给你，用不着你去办公，”她打岔地说。

“我想买点东西……后天是你的生日，……我想送你一点礼物……至少也要买一个蛋糕才……”他断断续续地说，带着羞惭的表情，略略低下头去。

她显然吃了一惊。他的话是她没有料想到的。她脸上的表情渐渐在变化：怜悯被感激和柔爱代替了。“你是这样的打算？”她感动地小声问。

他点点头，又添一句：“可是我还没有拿到钱。”

“你为什么不早说？”她微笑道，带着柔情望他。

“我说了，你一定不让我做，”他答道，他的紧张的心松弛了，他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你还记得我的生日，我自己倒忘记了，我真该谢谢你，”她感激地含笑道。

“那么你不再生我的气了？”他也怀着感激地说。

“我本来就没有跟你生气，”她坦白地回答。

“那么你不离开我们？”他又问，声音还略带战抖。

“我本来就没有离开你的意思，”她答道。她看见他的脸上现出安慰的表情，便柔声劝他：“你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不过你母亲——”她突然住了嘴，改口说：“你还是早点回家去休息罢。不要再去公司了。”

“我去一趟，我把东西收拾一下，就回去，”他说。妻点点头，两个人就在十字路口分别了。

他回到公司，已经是办公时间了。他的精神比较爽快，可是身体还是疲乏。他坐下来，立刻开始工作。他觉得很吃力，有点透不过气来。他打算回家休息，但是他想到“当天要”三个字，他连动也不敢动了。

校样一页一页地翻过了。他弄不清楚自己看的是什么文章。他的心在猛跳，他的脑子似乎变成了一块坚硬的东西。眼前起了一层雾，纸上的黑字模糊起来。他隐隐约约地看见周主任那对凶恶的眼睛（周主任刚刚从外面回

来)。“到这个时候你还不放松我？你不过比我有钱有势！”他愤慨地想道。

也不知道是怎样起来的，他忽然咳一声嗽，接着又咳了两声。他想吐痰，便走到屋角放痰盂的地方去。在十几分钟里面，他去了两次。吴科长不高兴地咳嗽一声，不，吴科长只是哼了一声。他便不敢去第三次。偏偏他又咳出痰来，他只好咽在肚里。他居然忍耐住把剩下的十多页校样看完了。

过了三四分钟，他觉得喉咙又在发痒，他想忍住不咳出声来，可是他心里发慌，最后，一声咳嗽爆发出来了。一口痰不由他管束地吐在校样上。是红色的，是鲜红的血，他仿佛闻到了腥气。他呆呆地望着它。他所有的自持、挣扎、忍耐的力量一下子全失去了。

“那么到了无可挽救的时候了，”他痛苦地想道。忽然听见周主任一声轻咳，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一对眼睛，他吃了一惊，连忙俯下身子在字纸篓里拾起一片废纸把血痰揩去。刚揩好痰，他又发出接连的咳嗽。他走到痰盂前弯下身子吐了几口痰。嘴里干得厉害。他想喝一杯茶，却没有理他。他按着胸膛在喘气。

周主任叫工友来请他到小房间去。

“密斯脱汪，你今天不要办公了，还是早点回家休息罢，我看你身体太差……”周主任靠在活动椅背上，慢吞吞地含笑说。

他竭力装出平静的声音回答一句：“不要紧，我还可以支持。”然而他的身体却不想支持下去。他头昏眼花，四肢无力，身子忽然摇晃起来。

“密斯脱汪，你身体不好，趁早休息罢。不然病倒了，医药费是一笔大数目啊，”周主任又说。

“回去就回去，不吃你这碗饭，难道就会饿死！”他气恼地想道，口里却用温和的调子说：“那么我就请半天假罢。”他连忙用手帕掩住嘴咳起来。

“半天恐怕不行罢……也好，你先回家再说，”周主任带了点嘲笑的表情说，便把头朝面前那张漂亮的写字台埋下去。

他不想再说什么，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可是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向那个人要求：“我想借支一个月薪水，请主任——”

周主任不等他说明理由，立刻截断了他的话，厌烦地挥手说：“支半个月罢，你去会计科拿钱。”

他没有第二句话说，只好忍着到会计科去支了三千五百元。他想：这点钱能够做什么用呢？他带着苦笑把钞票揣在怀里。

他把看完的校样交出去以后，便走下楼。没有人理他，却有些怜悯的眼光跟随他。“何苦啊，”周主任摇摇头低声说了这三个字。

他希望在楼下看见钟老，他盼望着听到一句安慰的话。他的心太冷了，需要一点温暖。但是楼下没有钟老的影子。

天还是灰色，好象随时都会下雨似的。走惯了的回家的路突然变得很长，而且崎岖难走。周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人们全有着那么旺盛的精力。他们跟他中间没有一点关联。他弯着腰，拖着脚步，缓慢地走向死亡。

十八

他到了家。房门半掩着，他推开门进去。母亲立在方桌前洗衣服。他一看便知道旧洋磁脸盆里面泡着的正是他的罩袍。

“宣，你回来了！”母亲惊喜地说。

“我累得很，”他喘息地答道。接着他苦笑地对她说：“妈，你还在给我洗衣服！我不是说过拿给外面洗衣服的大娘去洗吗？”他把书桌前的藤椅掉转方向在它上面坐下来。

“包月洗要八百元一个月，太贵了！横顺我在家里没有事做。我不比树生，她可以到外面去挣钱，”母亲发牢骚地说。

“树生回家来过吗？”他忍不住问了一句。

母亲马上变了脸色，不高兴地回答：“她没头没脑地发了一顿脾气又走了。我看她越来越不象话。你也得管管她。象她这种脾气，我实在伺候不了。我想等你身体好一点，我要回昆明去住一个时候。唉……”（她改换了语调叹了一口气）“我离开云南二十多年了。我二哥他们不晓得老到什么样子……”她的眼睛里开始闪着泪光。

看见母亲的眼泪，他觉得心里一阵难过，他自己也就想哭了。他连忙安慰她说：“妈，你不要伤心。我不会偏袒她，我是你的儿子——”

不等他说完她便插嘴说：“是啊，她不过是你的姘头。她动不动就说走。其实她走了倒好。她走了，我另外给你接一个更好的来。”

母亲的这句话激起了他的反感，他不敢反驳，却用不安的声调说：“我们这样人家，还有什么钱来结婚？连自己都养不活，还会有人嫁给我？”他苦笑了。

“养不活，怕什么！这个年头哪个有良心的人活得好？拖也好、挨也好，我们总要活下去。我们不能因为没有钱，就连妻子、儿女都不要了！”母亲愤慨地说。

“不过我实在离不开树生，结婚十四年了，我们彼此相当了解……”他痛苦地说，话还未说完，他觉得一阵头晕，就把藤椅放还原，将头压在书桌上。他象睡着了一样，半天都不出声息。

母亲走到他的身旁，用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眼光看他。“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她低声说，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接着她又唤道：“宣。”他应了一声，却不抬起头来。

“你到床上去躺躺罢，”她柔声说；“她会回来的，你何苦这样难过。”

“我不是为了她的事情，”他有气无力地摇摇头说；“她会回来，我知道。我先前还看见她。”

“你看见她？她去公司找过你吗？真不要脸！还好意思向你告状！”母亲气红脸，离开他走一步，大声说。她恼怒地想：这个女人究竟在玩什么花样？

他痛苦地看了她一眼，皱着眉头说：“她没有讲什么。她……她不过说时局不……大好。”

“时局好不好，跟她有什么相干！”母亲气愤地说；“她要走，一个人走就是罗。做什么还要来害人！”

“妈！”他不能忍耐地叫起来，这太过份了！为什么她要这样恨树生？为什么女人还不能原谅女人？“她不走，她说过，她不走。她就要回来。”

“她回来？她还有脸见我？”母亲又惊奇又愤恨地说。

“是我要她回来的，”他畏惧地说。

“你还要她回来？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她在房里走了两步，忽然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两手蒙住脸，好象在哭。她又取下手，站起来，自语似地说：“我什么苦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她的气！我宁肯死，宁肯大家

死，我也不要再看见她！”她咬牙切齿他说，仿佛就在咬那个女人的肉似的。她说完并不理他，马上走进她的小屋去了。

他的脑子里杂乱地响着各种声音。他呆呆地望着她，仿佛在做梦。声音渐渐地静下来。他忽然明白了，立刻站起来，走进母亲的屋子里去。

母亲侧着身子躺在床上，脸向着墙壁，低声在哭。

“妈！”他大声唤道。她应着，翻身坐起来，泪珠从她的起皱的眼角落下。

“你还有什么话？”她哑声问道。

“妈，你不要难过，我不让她回来就是罗，”他立在床前，温和地说。她用手帕揩了眼泪，脸上露出了一点喜色。“你这是真话？”她问道。

“妈，是真话，”他不加考虑地回答。

“那么你答应我了？”她不放心地再问一句。

“我答应你。你放心罢，”他望着他母亲的受苦的面颜，他感情冲动地回答。他忘了自己，忘了病，也忘了他的过去和将来。

“只要你肯答应我，只要我不再看见那个女人，我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日子我都过得了！”她带着欣慰的口气说。她站起来。“其实她哪里会回来啊？我看她一定会跟着她的什么主任飞兰州的，”她露出一一点得意的口气说，她觉得自己得到胜利了。她的愤怒消失了。她的痛苦也消失了。她心平气和地走出她的小屋，回到洋磁脸盆前面，把她的一双变得粗糙的手伸进冰冷的水中去。他带着苦笑跟在她的后面，默默地望着她搓洗衣服。他忽然觉得头发晕，眼睛发黑，心里难受得很，他差一点跌倒在地上。他连忙靠着墙壁，闭上眼睛养神。

母亲埋着头，看不见他这情形。她还在对他讲话。她说：“家里少了那个女人，什么事都简单多了……小宣这个星期一定要回来的。这个孩子很可怜，他妈从来不管他……今天外面谣言更多，人心惶惶，好象大祸就要临头。我却不管。这些年头什么日子我没有过过！未必还有更苦的在后头！……你公司里有什么消息吗？”“啊，”他好象从梦中醒过来似地应道；“没有，”他摇摇头。“那么不会搬兰州……”她又说。

“好象要搬，又好象不搬，我不大清楚，”他答道，接连咳了几声嗽。

“怎么你又在咳嗽？你快躺下去歇歇罢，”她关心地说，她抬起头来看他。“你快去睡！你脸色这样难看！你的病刚刚好一点，现在怕又要发作了，”她惊惶地说。

他一直咬紧嘴唇在支持着。但是他听见母亲的这几句话以后，他的精神的力量马上崩溃了。他并不回答她，却摇摇晃晃地走到床前，倒在床上。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她惊问道，连忙走到床前来。“我睡一下，我睡一下，”他喃喃地说。

“宣，你要当心啊。时局这样坏，你又病倒，叫我怎样办？”她有点张皇失措的样子，带着哭声说。

“我不是病，我不是病，”他有气无力地说，接着他又咳了几声嗽，他的咳声空虚无力，很可怕。

“你还要说不是病！还不肯休息！要是真的再倒下来，你怎么受得住？”母亲着急地责备道，她的泪水顺着脸颊直流。“妈，你放心，我不会死。我们这种贱骨头不会死得这么容易，”他吃力地、感伤地说。而其实他所想的

正是这个“死”字。“死”使他悲观，使他难过。

“你不要说话，你先睡一会儿罢，”她忍住悲痛说，她给他盖上了棉被。

“其实死了也好，这个世界没有我们生活的地方，”他自语似地说。

“你不要这样想。我们没有偷人，抢人，杀人，害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母亲愤恨不平地说。

就在这个时候房门突然大开，树生回来了。

“怎么，宣，你又躺下来了？”她顺口问了一句，声音还是那么清脆，脸上带着笑容。

“我走累了，现在躺一会儿，”他连忙撑起半个身子答道。

母亲看见树生进来，大吃一惊。她一张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羞和愤压倒了她。

“你睡你的，不要起来。我给你带来好消息：独山克服了，”树生望着他高兴地大声说。“这是晚报。”她把手里捏的一张晚报递给他。

“我们可以不逃难了，”他读完了那条消息放心地说；他想下床，可是他刚刚移动他的腿，身子就倒了下去。他叹了一口气。

母亲什么话也不说，就板起脸孔躲进小屋去了。“妈，”他在床上唤她，可是她连头也不回过来。

“让她去，让她去，”树生低声对他说，一面做了一个手势。

他摇摇头恳切地说：“这样不好。你看我的面上对妈客气点。你们和解罢。”

“她一直恨我，怎么肯跟我和解？”树生说，她仍然保持着愉快的心情。

“可是你们两个人我都离不开。你跟妈总是这样吵吵闹闹，把我夹在中间，我怎么受得了？”他开始发牢骚。

“那么我们两个中间走开一个就成罗，哪个高兴哪个就走，这不很公平吗？”树生半生气半开玩笑地说。

“对你这自然公平，可是对我你怎么说呢？”他烦躁地说。

“对你也并没有什么不公平。这是真话：你把两个人都拉住，只有苦你自己，”树生坦然答道。

“可是我宁愿自己吃苦啊，”他痛苦地说，终于忍耐不住，爆发了一阵咳嗽，咳声比他们的谈话声高得多。

妻连忙走到床前，母亲立刻从小屋里跑出来。两个女人都站在他的身边，齐声问着：“怎么又咳嗽啦？”

他侧起身子，咳着，喘着气，喉咙痒，心里难过。他眼泪汪汪地望着她们。

“你喝点茶罢？”妻说，他点点头。母亲却抢着去端了一杯茶来。妻看了母亲一眼，也不说什么。

他咳出了两三口痰，缓了一口气，接过了茶杯，喘吁吁地说：“我要死了。”

“哪里的话？你不要怕，过两天就会好的，”妻柔声劝他道。

“我不怕，”他摇摇头说。“不过我知道我不会好了。我满嘴腥气，我又在吐血。”

妻不由自主地朝床前痰盂里看了一眼。她打了一个冷噤，但是她仍然安慰他道：“吐血也没有多大关系。你上次吐血，不是吃几付药就好了吗？”

他感激地看了妻一眼，他说：“你自己就不相信中医，我这个病哪里是

随便几付药就可以医好的？”

母亲不说话，埋着头在揩眼泪。妻似乎还保持着镇静，她继续温和地劝他：“就是肺病罢，也可以养得好。”

他痛苦地笑了笑，眼里还包着泪水。“养？我哪里有钱来养病？偏偏我们穷人生这种富贵病。就说要养罢，一睡就是三五年。哪里来的钱？现在你们大家都在吃苦。我还要乱花钱。”

“我可以设法，只要你肯安心养病，钱总有办法，”妻沉吟地但又是恳切地说，显然她一面说话，一面在思索。她两只大眼睛忽然一亮，她想起了陈主任刚才对她讲的那句话：“我们搭伙做的那批生意已经赚了不少。”她有办法了。她含笑地加一句：“你只管放心养病，钱绝不成问题。”

“我不能再增加你的负担，”他摇头说；“我知道你的收入也不算太多，用处却不少。就说你能找到钱，我将来拿什么来还，我不能给你们留一笔债啊！”

“你的身体比钱要紧。不能为了钱就连病也不医啊！”妻劝道。“只要你能养好病，我可以筹到这笔钱。”

“万一我再花你许多钱，仍旧活不了，这笔钱岂不等于白花！实际上有什么好处？”他固执地说。

“可是生命究竟比钱重要啊！有的人家连狗啊、猫啊生病都要医治，何况你是人啊！”妻痛苦地说。

“你应该看明白了：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我自然是里面最不中用的。有时想想，倒不如死了好，”他说着，又咳起嗽来，咳得不太厉害，但是很痛苦。

“你不要再跟他讲话，你看他咳得这样，心里不难过吗？”母亲忽然抬起头，板着脸责备妻子道。

妻子红了脸，呆了半天才答道：“我这是好意。他只要肯好好养病，一定治得好。”她接着又加一句：“我难过不难过，跟你不相干！”她把身子掉开，走到右面窗前去。

“他咳得这样，还不让他休息。你这是什么居心？”母亲带着憎厌的目光瞪了妻一眼。她的声音不大，可是仍然被妻听见了。

妻从窗前掉转头来，冷笑道：“我好另外嫁人——这样你该高兴了！”

“我早就知道你熬不过的——你这种女人！”母亲高傲地说。她想：你的原形到底露出来了。

“我这种女人也并不比你下贱，”妻仍旧冷笑说。

“哼，你配跟我比！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母亲得意地说，她觉得自己用那两个可怕的字伤了对方的心。

妻变了脸色，她差一点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她在考虑用什么武器来还击。但是他，做着儿子和丈夫的他插嘴讲话了。

她们究竟为着什么老是不停地争吵呢？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这么单纯的关系中间都不能有着和谐的合作呢？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象仇敌似地永远互相攻击呢？……这些老问题又来折磨他。她们的声音吵闹地在他的脑子里响着，不，她们的尖声在敲击他的头。他的头发痛，发胀。他心里更痛。那些关切和爱的话语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现在两对仇恨和轻蔑的眼光对望着，他的存在被忘记了。这争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才能够得到休息？

“妈，树生，你们都不要说了。都是一家人，彼此多少让点步，就没有事了，”他痛苦地哀求道。他心里想说：“你们可怜我，让我休息罢。”

“是你母亲先吵起来的。你亲眼看见，我今天并没有得罪她，她凭什么又骂我是你的姘头？我要她说个明白！”妻把脸挣得通红，她的心确被刺伤了，她需要着补偿。

“你是他的姘头，哪个不晓得！我问你：你哪天跟他结的婚？哪个做的媒人？”

他绝望地用棉被蒙住了头。

“你管不着，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妻昂然回答。

“你是我的媳妇，我就有权管你！我偏要管你！”母亲厉声说。

“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妻冷笑道。“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

“你挖苦我缠过脚？我缠过脚又怎样？无论如何我总是宣的母亲，我总是你的长辈。我看不惯你这种女人，你给我滚！”母亲咬牙切齿地说。

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他觉得头要爆炸，心要碎裂。一个“滚”字象一下结实的拳头重重地打在他的胸上。他痛苦地叫了一声，立刻掀开被头，疯狂地用自己两个拳头打他的前额，口里接连嚷着：“我死了好了！”

“什么事？什么事？”妻惊恐地叫着，就跑到他的床前，俯下头看他。

“宣，你怎样？”母亲惊惶地问道。

“你们不要吵……”他抽泣地说，他只说了这五个字，就蒙着脸低声哭起来。

“你不要难过，……我们以后再也……不吵了，”过了片刻母亲悲声说。

“你们会吵的，你们会吵的……”他病态地哭着说。

妻默默地望了他一会儿，她咬着下嘴唇在想什么。她怜悯地说：“真的，宣，以后不会再吵架了。”

他取下蒙脸的手。一双泪眼看看母亲，又看看妻。他说：“我恐怕活不到多久了。你们让我过点清静日子罢。”

“宣，你不会的，你安心养病罢，”母亲说。

“你只管放心罢，”妻说。

“你们只要不吵架，我的病也好得快些，”他欣慰地说，他差不多破涕为笑了。

可是等他沉沉睡去，母亲出去请医生，妻一个人立在右边窗前看街景的时候，这个三十四岁的女人忽然感觉到象被什么东西搔着她的心似地不舒服。一个疑问在她的脑子里响着：

“这种生活究竟给了我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么？”

她想找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可是她的思想好象被困在一丛荆棘中间，挣扎了许久，才找到一条出路：

“没有！不论是精神上，物质上，我没有得到一点满足。”

“那么我牺牲了我的理想，换到什么代价呢？”

“那么以后呢？以后，还能有什么希望么？”她问自己。

她不由自主地摇摇头。她的脑子里装满了近几年生活中的艰辛与不和谐。她的耳边还隐隐约约地响着他的疲乏的、悲叹的声音和他母亲的仇恨的冷嘲、热骂，这样渐渐地她的思想又走进一条极窄的巷子里去了。在那里她听见一个声音：“滚！”就只有这一个字。

她轻轻地咳了一声嗽。她回头向床上看了一眼。他的脸带一种不干净的淡黄色，两颊陷入很深，呼吸声重而急促。在他的身上她看不到任何力量和生命的痕迹。“一个垂死的人！”她恐怖地想道。她连忙掉回眼睛看窗外。

“为什么还要守着他？为什么还要跟那个女人抢夺他？‘滚！’好！让你拿去！我才不要他！陈主任说得好，我应该早点打定主意。……现在还来得及，不会太迟！”她想道。她的心跳得厉害。她的脸开始发红。

“我怎样办？……‘滚！’你说得好！我走我的路！你管不着！为什么还要迟疑？我不应该太软弱。我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应该硬起心肠，为了自己，为了幸福。”

“我还能有幸福么？为什么不能？而且我需要幸福，我应该得到幸福。……”

她的眼前忽然闪过一张孩子的脸，一张带着成人表情的小孩脸。“小宣！”她快要叫出声来。

“为了小宣——”她想。

“他没有我，也可以活得很好。他对我好象并没有多大的感情，我以后仍旧可以帮助他。他不能够阻止我走我自己的路。连宣也不能够。”

她又掉转头去看床上睡着的人。他仍旧睡得昏昏沉沉。他不会知道她这种种的思想，这个可怜的人！

“我真的必须离开他吗？——那么我应该牺牲自己的幸福来陪伴他吗？——他不肯治病，他完结了。我能够救他，能够使他母亲不恨我，能够跟他母亲和睦地过日子吗？”

她想了一会儿，她低声说出来：“不能。”接着她想：没有用，我必须救出自己。……

飞机声打岔了她，声音相当大，一架中国战斗机低飞过去了。

她得到结论了：找陈主任去。他可以帮忙她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她兴奋地把头一昂，她觉得浑身发热，心也跳得很急。但是她充满勇气，她不再踌躇了。她从抽屉里拿出手提包，走出门去。她已经走到门外廊上了，忽然想起他母亲不在家，他一个人睡在床上，她不放心，便又推开门，回到房里去，看看他是不是睡得很好。

她刚走到他的床前，忽然他在梦中发出了一声哭叫。他唤着她的名字。她吃了一惊，连忙问：“什么事？什么事？”她俯下头去。

他向外一翻身，伸出一只手来抓她的手。她把右手送了过去，他抓到她的手便紧紧捏住。他低声呻吟着。再过三四分钟，他睁开眼来。他的眼光挨到她的脸，就停住不动了。“你在这儿！”他惊喜地说，声音软弱无力。“你没有走？”

“去哪里去？”她问。

“兰州去，我梦见你离开我到兰州去了，”他答道，“把我一个人丢在医院里，多寂寞，多害怕！”

她打了一个冷噤，说不出一句话来。

“幸而这是梦，”他无力地嘘了一口气，“你不会丢了我走开罢？”他的声音颤得厉害。“其实我们相处的日子也不会多了，我看我这个病是不会好的了。”不仅声音，连他的眼睛也在哀求。

“我不会走，你放心罢，”她感动地说，她的心冷了。刚才的那个决定在这一瞬间完全瓦解了。

“我知道你不会走的，”他感激地说；“妈总说你要走。请你原谅她，上了年纪的人总有点怪脾气。”

这个“妈”字象一记耳光打在她的脸上，她惊呆了，她脸上的肌肉微微在抖动，似乎有一个力量逼迫她收回她那句话，她在抗拒。

“谢谢你，谢谢你啊，”他很兴奋地说。“我不会久拖累你的。还有小宣，说起来我实在不好意思，我并没有好好尽过做父亲的责任。”

“你不要再说了，”她抽回她的手，略带粗声地打断了他的话。他那些话似乎是故意说来折磨她的，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她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畅快地哭一场，她仿佛受了多少的委屈。结果她还是坐在床沿上。

他半天不作声，后来忽然叹了一口气，柔声唤道：“树生。”她侧过头看他。“其实你还是走的好。我仔细想想，你在我家里过着怎样的日子啊，我真对不起你。妈的脾气又改不了……她心窄……以后的日子……我不敢想……我何必再耽误你……我是没有办法……我这样的身体……你还能够飞啊……”他的喉咙被堵住了，他的声音哑了。

她站起来，短短地叹了一口气，说：“你还是睡一会儿罢。现在多想这些事情又有什么用？你应该认真治病啊。”

他突然又爆发了一阵咳嗽。他接连咳着，好象有痰粘在他的喉管上，他在用力要咳出它来，可是他把脸都挣红了，却始终咳不出什么。

她轻轻地替他捶背，又给他端来一杯开水。他喝了两口，又咳起来。这一次他咳出痰来了。痰里带了点血丝，不过她没有看见（他也不让她有机会看清楚）。

“医生快来了罢，”她为了想安慰他，顺口说道。

“其实何必再看医生，白淘神，还要花钱，”他叹息说。“我是为了妈的缘故。”

“你到这种时候，还只想到别人，你太老好了，”她关心地说，但是关心中还夹杂了一点点埋怨。“你真不应该为了妈反对，就不进医院，就不用我的钱认真治病。你自己身体要紧啊！”她短短地叹了一口气：“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你这种人造的。你害了你自已，也害了别人……”

一阵脚步声打岔了她。她知道母亲回来了，一定是跟医生一块儿来的。她便走到方桌前在一个凳子上坐下。

于是门被推开，母亲伴着张伯情医生走进来。医生向她和他打招呼。仍旧是那张和善而又通世的脸。仍旧是那样近于敷衍的诊断。

“他不过是在拖着挨日子啊。他哪里能治好他的病？”她想道。她略微皱着眉头。

“不要紧，不要紧。多吃两付药就会好的，”医生很有把握似地说。

“我看这是肺病罢，”他胆怯地说。

“不是，不是，”医生摇头道。“是肺病还了得。肝火旺。吃两付药，少走动，包你好。”这个老人和蔼地笑了笑。

“谢谢你啊，”送走医生时，母亲还接连地感谢道。妻一句话也没有说。

“妈，我看用不着去检药了，”他忽然说。

母亲正拿着药方在看，听见他这句话，便惊问道：“为什么呢？”

“我看吃不吃药都是一样，我这种病不是药医得好的，”他断念似地答道。

“哪有药医不好病的道理？”母亲不以为然地说，她折好了药方。“我

去给你检药。”她拿着手提包，预备走出房门。

“你身边钱不够罢？”他问道。

“我这里还有钱，”妻马上接嘴说。

“我有，”母亲望着他说，并不看妻一眼，好象没有听见她说话似的。妻红了脸，眉毛一竖，但是哼都不哼一声，就走到窗前去了。

“妈，你拿一千元去罢，我今天借支了薪水，”他说，一面伸手在自己的衣袋里掏钱。“你把伙食钱扯了，还是要填补的。刚才请医生已经扯过钱了。”

“你放心，我有钱，我另外找了点钱，”母亲说。

“你在哪里找的钱？……我知道，你一定把你那个金戒指卖掉了！”他说。

“我是老太婆，不必戴戒指，放着它也没有用处，”母亲解释地说。

“那是爹送给你的纪念品，你不能因为我的缘故卖掉啊，”他痛苦地说。

“横竖我跟你爹见面的日子近了，有没有它都是一样，”母亲装出笑容回答道。

“不过你就只有这一件贵重东西，现在连这个也卖了。这是我没有出息。我对不起你，”他带着悔恨地说。

“事情既然做过了，还说它做什么？你好好地养病罢。只要你身体好，我就高兴了，”母亲说罢，不等他讲话就匆匆地走了出去。

妻仍旧立在窗前，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屋子里只有老鼠啃木头的声音。

他翻来复去地想着，他的脑子不肯休息。他睡不着，他感动地说：“妈也很苦啊。她为了我连最后一件宝贝也卖掉了。”他的话是说给妻听的。可是妻静静地立在窗前，连头也不掉过来。

十九

第二天傍晚，陈主任差人送来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

……我的飞机票发生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但下星期三一定可以走。……你的事已讲妥了。

这星期内调职通知书就会下来。……明早八点钟仍在冠生园等候……

树生看完信抬起头，她的眼光无意间同母亲的眼光碰到了。她看出了憎恨和讥笑。“我都知道，你那些鬼把戏！”母亲的眼光似乎在这样说。

“你管不着我！”她心里想，她轻轻地咳了一声。这时她同母亲两个人正在吃晚饭，母亲比她先放下碗。

他在床上继续地干咳。这种咳声在她们的耳里渐渐变成熟悉的了，他时常用手在胸膛上轻轻擦揉，他内部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痛得厉害，而且使他呼吸不畅快。这样的擦揉倒可以给他一点舒适。他时时觉得喉管发痒，他忍不住要咳嗽，却又咳不出痰来。有时他必须用力咳。但是一用力，他又觉得胸部疼痛。这痛苦他一直忍受着，他竭力不发出一声响亮的（甚至别人可以听见的）呻吟。他尽可能不让她们知道他的真实情形。另一方面他却极仔细地注意她们的动作，倾听她们的谈话。

“行里送信来，有要紧事吗？”他停止了咳嗽，关心地问，声音不高。

妻没有听见。母亲掉过脸来看他，显然她也没有听清楚他的话，因为她在问：“宣，你要什么？”

“没有什么，”他摇摇头答道。但是停了两三分钟他又说：“我问树生，信里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情？”这次声音较高，妻也听见了。

“一个同事写来的，没有什么要紧事，”妻淡淡地回答。母亲马上掉过头看她一眼，那神情仿佛在说：“你在骗他，我知道。”

“我听见说是陈主任送来的，”他想了想又说。

“是他，”妻淡淡地回答。

“他不是要飞兰州吗？怎么还没有走？”他又想了一下，再问。

“本来说明天飞的。现在又说飞机票有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妻仍旧用淡漠的调子回答。

过了几分钟，妻站起来，收拾饭桌上的碗碟，母亲到外面去提开水壶。他忽然又问：

“我记得你说过行里要调你到兰州去，怎么这两天又不见提起了？”

妻掉过头，用诧异的眼光看了他一眼，竭力做出平淡的声调回答：

“那不过是一句话，不见得就成事实。”

恰恰在这个时候母亲提了开水壶进来，她听见树生的话，哼了一声，又看了树生一眼，仿佛说：“你撒谎！”

妻脸上微微发红，嘴动了一下，但是她并没有说什么，就把眼睛掉开了。

“万一行里真的调你去，你去不去呢？”他还在追问。妻不知道他存着什么样的心思。

“我不一定去，”她短短地答道，他这种类似审问的问话使她心烦。

“既然调你去，不去恐怕不行罢，”他不知道她的心情，只顾絮絮地讲下去。

“不行，就辞职，”她答得很干脆，而其实她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辞职，怎么行！我病在床上，小宣又要上学。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活下去？”他自语似地说。

“那么卖东西，借债。总不会饿死罢，”妻接嘴说，她故意说给母亲听。她觉得今天受那个女人的气太多了，她总想找个机会刺那个女人一下。

他苦笑了。“你看，我们还有值钱的东西吗？这两年什么都吃光了。借钱向哪个借？只有你还有几个阔朋友……”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她带点厌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你有病不能多讲话，你好好地睡罢。”她掉开脸不看他。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就象在演电影。脑子简直不能够休息，”他诉苦般地说。

“你思虑太多。你不要多想，还是安安静静地睡罢，”妻同情地看他一眼温和地安慰道。

“我怎么能不想呢？才三十四岁就害了这种病，不知道能不能好啊！”他痛苦地说。

“宣，你不要着急，你一定会好的，张伯情说吃几付药，养半个月，一定会好，”母亲插嘴说。

“我主张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最好透视一下，这样靠得住些。我对……”妻沉吟半晌终于正色说道。但是话未说完，就被他打岔了。

“万一检查出来是第三期肺病，又怎么办？”他问。

“那么就照治肺病的办法医治，”妻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是富贵病啊，不说医，就是养，也要一笔大钱，”他苦笑道。

“那么穷人生病就该死吗？”妻愤慨地说。她关心地望着他：“不要紧，我还可以给你设法，医药费不会成问题。”

“不过我不能白白地乱花你的钱啊！”他摇摇头说。其实他的决心已经因她的话开始动摇了。他还要说话，可是他的胸部象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似的，气紧得很，仿佛随时都会闭塞住。他接连沙沙地啾着。呼吸声也很粗重。

“请你让他休息一会儿罢，”母亲瞪了妻一眼，说。她马上又走到他的床前，改用怜惜的眼光望着他，柔声说：“你不要多说话，说话伤神，会加病的。你闭上眼睛睡罢。”

他答了一个“是”字，轻轻地叹一口气，真的把眼睛闭上了。

妻碰了一个钉子，颇不甘心，她脸一红，很想即刻发作。但是她又想：这样单调的争吵有什么好处呢？永远得不到结果，不管怎样把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反复重说，不管怎样用仇恨的眼光互相注视。没有和解，也没有决裂。他没有方法把母亲和妻拉在一起，也没有毅力在两个人中间选取一个。永远是敷衍和拖。除了这个，他似乎再不能做别的事情。现在他病在床上，他还能够给她什么呢？安慰？支持？……他在那边叹气。现在应该她叹气了。她把她的青春牺牲在这间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却换来仇视和敷衍。她觉得自己的忍耐快达到限度了。

“你会讨好他。好罢，我就让你，我并不希罕他，”她在心里骂道。她轻轻地冷笑一声，就慢步走到右侧窗前，隔着玻璃窗看街景。

夜相当冷。寒气凉凉地摸她的脸。下面是一片黑。只有寥寥几盏灯光。原来她这所楼房是一个界线，楼房外算是另一区域，那一区今天停电。她打了一个冷噤，又耸了耸肩。“为什么总是停电？”她烦躁地小声自语。没有人理她。在这个屋子里她是不被人重视的！她的孤独使她自己害怕。她又转过身来迎着电灯光。电灯光就跟病人的眼睛一样，它也不能给她的心添一点温暖。她把眼光移向病床。他闭着眼张着嘴重重地在吐气。他似乎一点钟一点钟地瘦下去。“他也实在可怜，”她想道。母亲已经出去了。她走到病床前把棉被轻轻拉了一下。他忽然睁开眼睛来看她，他定睛望着她，好象不认识她似的。她的心猛然跳了一下，但是她接着温和地解释道：“你的铺盖快掉下地了，我给你拉上来。”

“是吗？”他说，接着又问：“妈睡了？你不休息？”

“还早，”她答道。“你好好睡罢。”

“我正说不睡，怎么又睡着了？”他微笑说。“我有话对你说。明天是你生日……”

“连我自己都忘了，你还提它做什么！”她温柔地插嘴说。

“这是一千六百元，请你替我去定一个四磅蛋糕，明天要的。我不敢麻烦妈，只好请你自己去定，很对不起你……”他战抖地伸出手来，手中有一卷旧钞票。

“我哪里还有心肠过生日？不要买罢，”她感激地说，差一点流下泪来。

“你要去定啊……一定要替我定啊……我自己不敢出去……只好麻烦你……你把钱拿着……”他断断续续地说。

有人在叩门。她想：“难道又是他差人送信来？”这个“他”是指陈主任。她随口说了一句：“请进来。”

出乎她的意外，进来的是一个秃头的老头子，他公司里的同事钟老。“好，我真谢谢你，”她小声说，就把钞票收下了。

“汪兄，怎么啦？睡了吗？”钟老一进门就大声说。又向着她说：“大嫂好。”

“钟先生，请坐，”她连忙招呼道。

“钟老，怎么你跑来了？我的病不要紧，就会好的。对不起，让你跑一趟。我今天早晨刚起来，正要去上班，忽然头晕得很，便又睡下了，一直睡到现在，”他抱歉地说，勉强坐了起来。“你睡，你睡，我坐坐就走的，”钟老走到床前，一面说话，一面做出要他躺下的手势。

“不要紧，我就在床上坐坐，我不想睡。你看我衣服都没有脱，”他坐在床上说。

“看受凉啊，你还是躺下罢。你躺下我们谈，也是一样，”钟老和蔼地说。

“钟先生，请坐罢。请吃茶啊，”她倒了一杯茶放在方桌上，一面对钟老说。

“谢谢，大嫂，”钟老客气地带笑说，就在一个凳子上坐了。“刚才看见晚报，六寨也克服了，这倒是个好消息啊，”钟老端起茶杯呷了一口。

“是，”他说，干咳了四五声。“那么公司不会搬家了，”他感到一点安慰地说。

“当然不会搬了。搬兰州不过是一句话，现在用不着逃难了，”钟老说。

“那么请你明天替我请一天假。我想再休息一天就上班，免得多扣薪水，”他说。

“你用不着后天就去，你可以在家里多休息几天。公司里校对的工作对你身体不相宜。还是身体要紧，”钟老慢吞吞地劝他道。“不过我们周主任和吴科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要吃他们这碗饭，就只好忍点气。”他说着，皱了两次眉头。钟老正要开口，他忽然问道：“昨天我走后你没有听见他们讲起我什么事罢？”“我在楼下办公，怎么听得见呢？”钟老答道。“不过——”钟老从怀里掏出一卷钞票，又站起来，走到床前，把钞票放在病人的枕头旁边。“这里一万另五百块，是你一个半月的薪水，周主任要我给你送来。”

“一个半月的薪水，他要你给我送来？为什么？”他惊问道。停了片刻，他忽然大声说：“是不是他要裁掉我？”

“他说……他说，”钟老结结巴巴地说，红着脸讲不下去了。

“我做了什么错事呢？他不能无缘无故就赶走我，”他愤慨地说。他觉得自己的血往上直冲，整个头都在发烧。左胸一股一股地痛，他开始喘气。

“我在公司里一天规规矩矩地办公，一句话也不敢说。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什么气都忍受下去，我简直——”

“老汪，你不要生气，他不是赶走你……他说……你身体不好……一定有 T.B.。他要我劝你休息半年再说，”钟老鼓起勇气说了起来。“这自然是他的武断，据我看你不见得就有肺病。你不过营养差一点，平日人也太累，休息个把月就会好的。不过周主任，他不这样想，他要你多休息。他说送你两个月薪水，你支了半个月，所以这里只有一个半月的钱。也好，你索性多休息几天，身体养好了，另外找个事，反倒痛快些。”

他埋下头不作声。

“真岂有此理！给他们做了两年牛马，病倒了就一脚踢开，”妻气愤地插嘴说。“宣，钟先生的话不错，等你病好了，另外找个比较痛快的事。”

“现在找事也不容易，”他抬起头说。

“我可以托人设法，我不信连你现在这样的事也找不到，”妻说，他不再说话。

“大嫂的意思不错。其实我们公司，那种官而商商而官的组织是弄不好的，汪兄丢了这里的事并不可惜，”钟老接嘴说。

“他人太老好，在外面做事容易吃亏。这两年要不是靠钟先生关照，恐怕早就站不住了，”妻说。

“大嫂太客气了。我哪里说得上关照，一点忙也没有帮到，实在对不起汪兄，”钟老带笑地说，脸上微微露出了歉意。“不过我跟汪兄平日谈得拢，我很敬佩汪兄的为人。公司里都知道我跟汪兄熟，所以周主任要我来办这个差使，”钟老接着又解释道。

“我知道，我们明白钟先生的意思。既然周主任有这样的表示，文宣就遵命辞职罢，”妻也带笑说（她的笑容看得出是很勉强的）。她马上又向着她的丈夫问道：“是不是这样，宣？”

“是，是，”他含含糊糊地应道。

“大嫂这个意思很不错，”钟老称赞道。“公司既然没有前途，也值得留恋。请汪兄好好保养身体，身体好了，另外找事也不难……”他又谈了几句闲话，忽然立起来客气地说：“我不打扰你们了。我改天再来。汪兄，你好好养病罢。在这个时代还是身体宝贵啊。”

“钟老，再坐一会儿，我们很闲，”他挽留道。妻觉得他替她说了话。来一个客人，至少给这个屋子添一点变化，一点热，一点生气。

“不坐了，改天再来畅谈，”钟老带笑地告辞道。“我还有别的事，”他加上这句解释。

“那么我不送你，走好啊，”他失望地说。

“不要送，我以后会常来的，”钟老客气地回答，一面朝房门走去。

“我送钟先生，”她说。

“大嫂，不敢当，请留步罢，”钟老说，他已经走到房门口了。

“外面黑得很，我送钟先生出去，”她说。她打着手电把客人送到楼梯口，就站在那里用手电光照着钟老走下楼去，她一面叮嘱：“走好啊，走好啊。”

“看得见，大嫂，请回去罢，”钟老在下面客气地说。她懒洋洋地转过身，打算回屋去。忽然听见钟老的声音在跟别人讲话。

“她回来了，”她想到，这个“她”自然是指他的母亲。她马上起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便急急走回房去。

“他走啦？”他问道。这是不必问也不必回答的问话，他显然是为了排遣寂寞才说的。他已经躺下去了。

“走了，”她没精打采地答道。屋子里没有一点热气。永远是那种病态的黄色的电灯光，和那几样破旧的家具。他永远带着不死不活的样子。她受不了！她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活人。她渴望看见一个活人。

“这笔钱你替我收起来，”他苦笑他说。“这是我卖命的钱啊。”

她应了一声。后一句话声音更低，没有被她听见。她似乎要走到床前去。

但是她忽然又退后一步，温和地说：“你交给妈罢，免得她不高兴。”

他轻轻地叹一口气，也不再说什么。在外面廊上已经响着母亲的脚步声，接着那个老妇人走进来了。

“妈，你到哪儿去了？”他亲切地问道。他的声音在这间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寂寞地颤抖着。

“我到张伯情那儿去了一趟。我不放心，我问他究竟你的病怎样。他说不要紧，并不是肺癆，吃几付药，就会好的，”母亲温和地说，但是她的声音里却露出了一点焦虑。

“是，不要紧，我也知道不要紧，”他感激地答道。“你何必还要出去。外面一定很冷。你一天也够累了。你简直是在做我们的老妈子。我真对不起你啊。”他的眼泪流出来了。

“你好好养病罢，不要管这些闲事。我这些年已经做惯老妈子了。我没有她那样的好命，”母亲答道。说了最后一句，她感到一阵痛快，她不自觉地瞥了树生一眼。

树生正立在方桌前听他们母子谈话。她仿佛又挨了一记意外的耳光，她在心里叫了一声：“哎呀！”她回看了他母亲一眼。但是母亲已经走到病人的床前去了，现在还在说：“不过张伯情说，这个地方冬天的雾对你身体实在不相宜，他劝我们搬个地方。”

“搬地方……我们朝哪里搬？我们哪里还有钱搬家？”他叹息道。

永远是这一类刺耳的话。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树生的忍耐力到了最高限度了。她并没有犯罪，为什么应该受罚？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她必须飞，趁她还有着翅膀的时候。为什么她不应该走呢？她和他们中间再没有共同点了，她不能陪着他们牺牲。她要救出她自己。

母亲还在那里讲话，声音象箭似地朝着她的心射过来。“你射来罢，我不怕，我不屑于跟你争……”她自负地想道。她的心突然暖和起来了。

二十

星期六下午树生拿着调职通知书回家，她怀着又兴奋又痛苦的矛盾心情上了楼，推开自己的房门。小宣坐在书桌前藤椅上看书，母亲坐在方桌旁一张凳子上，他仍然躺在病床上。他们正在谈论什么事。小宣看见她进房，便立起来，唤了一声“妈”，脸色苍白地勉强笑了笑。

她应了一声，接着就问：“我的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学堂功课太严，我们好些同学都赶不上，”小宣象板起脸孔似地说，这算是他好些天不曾回家的理由。

她含糊地答应一句。她注意地看了看她这个儿子。贫血，老成，冷静，在他的身上似乎永远不曾有过青春。他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但是他已经衰老了！她皱了一下眉头，逃避似地掉开了眼睛。她走到床前，问病人：“今天好些罢？”

“好些了，”病人点头回答。

这样的问答成了“例行公事”。她每天照样地问，他每天照样地答，虽然他的病一点儿也不见好。

她听见他在咳嗽，看见他拿着枕头旁边的漱口杯（临时作了吐痰杯）吐

痰，又慢慢地把漱口杯放下。他两颊上的肉更少了，两只眼睛带着一种可怕的眼神望着她。

“药吃过了？”她怜悯地再问一句。

他点点头，看他那种神情好象他很痛苦。

“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罢，”她忍不住又说了那句不知说过多少遍的话。

“过几天再说罢，”他力竭似地摇头说。

“为什么不早去？我求求你！不要把病耽误了啊，”她恳切地望着他，央求似地说，眼睛里忽然进出了几滴泪水，她便慢慢地把头掉开了。

“我现在还可以支持，除了咳嗽也没有什么病，”他慢吞吞地答道。

“咳嗽就是病啊，而且你每天发烧，”她又回过脸来说。“我耽心——”她咽下了后面的话。

“你是说我害肺病吗？”他问。

她不敢回答。她现出了一点窘相。她后悔不该对他多讲话。

“其实不用检查，我也知道我这是肺病，”他说。“可是知道了又有什么用？我去检查，等于犯人听死刑宣告。”话说出来，他觉得心里很难过，自己也不想再说下去了。

她默默地望着他，她想：他什么都知道，甚至那个残酷的真实。她的劝告对他有什么用处呢？他躺在床上，不过在挨日子。不论是快，或者慢，他总之是在走向死亡。她还有什么办法拯救他？……没有。他不听她的后，不肯认真治病。她只有等待奇迹。或者……或者她先救出她自己。她的脑子里有着矛盾的思想。所以她一边偷偷流泪，一边又暗暗抱着希望。

“不见得。肺病也养得好。你不要怕花钱。我说过，我愿意给你设法，”她忍住眼泪，最后一次努力地劝他。

“养病就不说要花钱，也应当有好心境，这你是知道的。象我这样生活，哪里会有好心境啊？”他又说。

“宣，你讲话太多了。睡一会儿罢，又快要吃药了。”母亲不耐烦地干涉道。

妻暗暗地瞪了母亲一眼。她走到方桌前坐下来。她坐在那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好。没有人理她，连小宣也不过来跟她讲话。她感到厌倦，现在连眼光也似乎无处可放了。

她觉得无聊地枯坐了一会儿。她想难道必须坐在这里等着母亲煮好饭送上来吗？连吃饭的时候也是冷清清没有生气的。饭后更不会有温暖。永远是灰黄的灯光（不然就是停电时的漆黑，那样的时刻也不少），单调而无生气的闲谈，带病的面容。这样的生活她实在受不了。她不能让她的青春最后的时刻这样白白地耗尽。她不能救别人，至少先得救出她自己。不然她会死在这个地方，死在这间屋子里。

她突然站起来。她又一次下了决心。她用不着再迟疑了。她的手提包里还放着调职通知书。她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呢？

她走到小宣的身旁。“小宣，你跟我出去走走，”她说。

“不等吃饭吗？”小宣抬起头看她，有气无力地问道，这个孩子讲话象大人，尤其是象父亲。

“我们到外面去吃饭，”她短短地答道。

“那么不约婆一道去？”小宣又问，声音提高了些。

“不去也好，”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她觉得心烦。不知道怎样，孩子的话激怒了她。

小宣诧异地看了她一眼，还问一句：“妈，你也不出去？”

“不出去，”她摇摇头说，心想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多嘴！

小宣看了她一眼，也不再说话，又把头埋到书上去了。

“他好象不是我的儿子，”她想道；她还立在小宣的背后，注意地看了他好几次。小宣一点也不觉得。他在读一个剧本。白日的光线渐渐在消失，刚刚亮起来的电灯光又不太亮。所以他把头埋得很深。“他是在弄坏自己的眼睛啊！”她又想。她忍不住怜悯地说：“小宣，你歇一会儿罢，你不要太用功啊。”

小宣又抬起头，惊奇地看她一眼，他回答一声：“是，”他的眼睛不住地闪着，好象它们不大舒服似的。随后他合上书，懒洋洋地站起来。

“怎么，他笑都不笑一声，动作这样慢。他完全不象一个小孩。他就象他父亲，”她又想。

小宣静静地走到床前去看父亲。“他对我一点也不亲热，好象我是他的后母一样，”她痛苦地想。她就在孩子刚才离开的藤椅上坐下。

母亲正坐在床沿上跟宣讲话，小宣立在床前静静地听着。他们似乎谈得很亲密。

“她不要我跟他讲话。怎么她又不让他休息呢？这个自私的老太婆！”她愤慨地想道。她无意间伸手在书桌上拿起小宣刚才看的那本书来。“她就恨我！我是她的仇人！小宣对我冷淡，一定是她教出来的。宣也在敷衍她！不，他其实更爱她，”她继续想道，心更烦起来。她受不住这寂寞，这冷淡。她需要找一件分心的事情。她把眼光放到拿在手里的书上。她首先看到两个红字：《原野》。这是曹禺写的剧本。她看过它的上演。可是又听说后来被禁止了，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戏，多么巧！戏里也有一个母亲憎恨自己的儿媳妇。那个丈夫永远夹在中间，两种爱的中间受苦。结果呢？结果太可怕了！她不会弄出那样的结果，她不是那样的女人！她在这里是多余的。她有机会走开。调职通知书还在她的手提包里。她为什么要放过机会呢？不，那是已经决定的事情了。行里不会改派另一个人，除非她辞职。她当然不会辞职。离开那个银行，她一时也找不到别的职业，而且她还借支了薪金，而且她这两个月还同陈主任搭伙在做囤积的生意。

“飞啊，飞啊！”好象有一个声音反复地在她的耳边轻轻地鼓舞她。调职通知书渐渐地在她的眼前扩大。兰州！这两个大字变成一架飞机在她的脑子里飞动。她渐渐地高兴起来。她觉得自己又有了勇气了。她甚至用轻蔑的眼光看他的母亲。她心想：“你们联在一起对付我，我也不怕，我有我的路！我要飞！”

二十一

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她丢开他跟着另一个男人走了；母亲也好象死在什么地方了。他从梦中哭醒，他的眼睛还是湿的。他的心跳得厉害，他倾听着这敲鼓似的声音。他张开嘴，睁大眼睛，想在黑暗中看出什么来。但是屋子很黑，就好象有一张黑幕盖在他的头上和全身一样。他觉得气紧，呼吸似

乎不十分畅快。胸部还在隐隐地痛，他疲乏地闭上眼睛，但是他立刻又睁开，因为那个可怕的梦境在他的眼前重现了。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他疑惑地想，“是死还是活？”四周没有人声，然而并不是完全静寂的，因为屋子里充满了细小的声音。“我一个人，”他寂寞地说了出来。忽然一阵心酸，他又落下了眼泪。

“真是走的走、死的死了吗？”他痛苦地问自己。没有回答。他翻了一个身，又一个身。“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他想到。“我在做梦吗？”他的手摸着自己颊上的泪痕。他的喉咙发痒，他咳起嗽来。

他突然揭开被，跳下床。他扭开了电灯。屋子亮起来，灯光白得象雪似的，使他的眼睛差一点睁不开。他披着衣服站在方桌前。他第一眼便看他那个睡在床上的妻。谢谢天。妻睡得很好，棉被头盖着她下半个脸，黑黑的长睫毛使她睡着的时候也象睁开眼睛一样。她的额上没有一条皱纹，她还是象十年前那样地年轻。他看看自己，丝棉袍的绸面已经褪了色，蓝布罩衫也在泛白了。他全身骨头一齐发酸、发痛，痰似的东西直往喉管上冒。他同她不象是一个时代的人。他变了！这并不是一个新发现。但是这一次却象有一个拳头在他的胸膛上猛击一下。他的身子晃了晃，他连忙扶着方桌站定了。

他在方桌前立了一会儿。他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不自觉地把头一缩。屋子里依然很亮。老鼠又在啃地板。外面街上有一个人的脚步声，那个人走得慢，而且用一种衰老而凄凉的声音叫着：“炒米糖开水！”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他把眼光掉向母亲的房门。门关着，里面传出来一个人的鼾声，是小宣的，并不太高，不过他听得出。他们睡得很好。他侧耳再听，那还是小宣的鼾声。“这孩子也可怜，偏偏生在我们家里，”他想。“妈也是，老来受苦，”他又叹了一口气。“不过幸好他们都很平安，”这一个念头倒给了他一点安慰。

接着他咳了两声嗽，他觉得痰贴在喉管上，他必须咳出它来。他不敢大声咳，他害怕惊醒妻和母亲。他慢慢地咻着。他的胸部接连地痛。他摸出手帕掩住嘴。他走到书桌前，跌坐在藤椅上。

他咻了好几声，居然把痰咳出来了；他要吐它在地上，可是痰贴在他的舌尖、唇边，不肯下地。“我连这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痛苦地、灰心地想道。

他吐出痰后，觉得喉咙干，想喝两口茶。他便站起来。他无意间把书桌上一件黑黑的东西撞落在地上。他即刻弯下身去拾那件东西。那是树生的手提包。他拾起来，手提包打开了，落下几张纸和一支唇膏。他再俯下身去拾它们。他看见了那张调职通知书。

他把通知书拿在手里，又坐回到藤椅上，他仔细地读着。虽然那上面不过寥寥几行字，他却反复不厌地念了几遍。他好象落在冷窖里一样，他全身都冷了。

“她瞒着我，”他低声自语道。接着他又想：她为什么要瞒我呢？我不会妨碍她的。他感到一种被人出卖了以后的痛苦和愤慨。他想不通，他默默地咬着自己的下嘴唇。胸部还是隐约地在痛。他用左手轻轻擦揉着胸膛。“病菌在吃我的肺，好，就让它们吃个痛快罢，”他想。

“她真的要走吗？”他问自己。他又埋下头看手里那张调职书。他用不着再问了。那张纸明明告诉他，她会走的。

“走了也好，她应该为自己找一个新天地。我让她住在这里只有把她白

白糟蹋，”他安慰自己地想。他又把头掉过去看她。她已经向里翻过了身，他只看见她一头黑发。“她睡得很好，”他低声说。他把头放在靠背上，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会儿。通知书仍然捏在他的手里。

他忽然又惊醒似地睁开眼睛。屋子里多么亮！多么静！多么冷！他又掉过头去看她。她还睡在床上，但是又翻过了身来，面向着他，并且把右膀伸到被外来来了。这是一只白而多肉的膀子。“她会受凉的，”他想着，就站起来，走到床前，把她的膀子放回到被里去。他轻轻地拿着她的手，慢慢地动着，但是仍然把她惊醒了。

她起先哼了一声，慢慢地睁开眼睛。“你还不睡？”她问道。但是接着她又吃惊地说：“怎么，你下床来了！”

“我看见你一只膀子露在外面，怕你着凉，”他低声解释道，通知书还捏在手里。

她感激地对他一笑，然后慢慢地把眼光移到别处去。她忽然看见了那张通知书。

“怎么在你手里？”她惊问道，就坐起来，把睡衣的领口拉紧一点。“你从哪里找到的？”

“我看见了，”他埋下头答道，他的脸立刻发红。他连忙加上一句解释：“你的手提包从桌上掉下来打开了。”

“我今天才拿到它。我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她抱歉似地说，她记起来是自己大意把手提包忘记在书桌上的。她打了一个冷噤，连忙用棉被裹住自己的身子。

“你去罢，我没有问题，”他低声说。

“我知道，”她点点头。她看见他望着自己好象有多少话要说，却又说不出来，她心里也难过。“我本来不想去，不过我不去我们这一家人怎么生活——”

“我知道，”他结结巴巴地说，打断了她的话。

“陈主任帮我订飞机票，说是下星期三走，”她又说。

“是，”他机械地答道。

“横顺我也没有多少行李。西北皮货便宜，我可以在那边做衣服，”她接下去说。

“是，那边皮货便宜，”他没精打采地应道。

“我可以在行里领路费，还可以借支一笔钱，我先留五万在家里。”

“好的，”他短短地回答。他的心象被木棒捣着似地痛得厉害。

“你好好养病。我到那边升了一级，可以多拿薪水，也可以多寄点钱回家。你只管安心养病罢。”她愈说愈有精神，脸上又浮起了微笑。

他实在支持不下去，便说：“我睡罗。”他勉强走到书桌那边，把通知书放回她的手提包里，然后回到床前，他颓然倒下去，用棉被蒙着头，低声哭起来。

她刚刚闭上了眼睛，忽然听见他的哭声。她的兴奋和愉快一下子都飞散了。她觉得不知道从哪里掉下许多根针，全刺在她的心上。她唤一声：“宣！”他不答应。她再唤一声。他仍然不答应，可是哭声却稍微高了些。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她掀开自己的棉被，也拉开他的棉被，把半个身子扑到他的身上，伸出两只膀子搂着他，不管他怎样躲开，她还是把他的脸扳过来。她流着眼泪，呜咽地喃喃说：“我也并不想去。要不是你妈，要不是大家的

生活……我心里也很苦啊！……我一个女人，我……”

二十二

从这一晚起，他又多了做梦的资料。梦折磨着他。每晚他都得不到安宁。一个梦紧接着另一个。在梦中他不断地跟她分别，她去兰州或者去别的地方，有时甚至在跟他母亲吵架以后负气出走。醒来，他常常淌一身冷汗。他无可奈何地叹一口长气，他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很深了。

晚上妻睡在他的旁边。他为了自己的病，常常避免把脸向着她。他们睡在一处，心却隔得很远。妻白天出门，晚上回家也不太早。她有应酬，同事们接连地替她饯行。她每晚回家，总看见母亲在房里陪伴他，但是等她跨进了门，母亲就回到小屋去了。然后她坐在床沿上或者方桌前凳子上絮絮地讲她这一天的见闻。现在她比平日讲话多，他却较从前沉静寡言。他常常呆呆地望着她，心里在想分别以后还能不能有重见的机会。

不做梦时他喜欢数着他们以后相聚的日子和时刻。日子和时刻逐渐减少，而他的挣扎也愈加痛苦。让她去，或者留住她？让她幸福，或者拉住她同下深渊？

“你走后还会想起我么？”他常常想问她这句话，可是他始终不敢说出来。

五万元交来了：两万元现款和一张银行存单。妻告诉他，存“比期”，每半个月，办一次手续，利息有七分光景。到底妻比他知道得多！妻的行装也准备好了。忽然她又带回家一个好消息：飞机票可能要延迟两个星期。她也因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她还对他说，她要陪他好好地过一个新年。对他说来，当然再没有比这个更能够安慰他的了。他无法留住她，却只好希望多和她见面，多看见她的充满生命力的美丽的面颜。

但是这样的见面有时也会给他带来痛苦。连他也看得出来她的心一天一天地移向更远的地方。跟他分离，在她似乎并不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她常常笑着对他说：“过三四个月我就要回来看你。陈主任认识航空公司的人，容易买到飞机票，来往也很方便。”他唯唯应着，心里却想：“等你回来，不晓得我还在不在这儿。”他觉得要哭一场才痛快。可是痰贴在他的喉管里，他用力咳嗽的时候，左胸也痛，他只好轻轻地啾着。这啾声她也听惯了，但是仍然能够得到她的怜惜的注视，或者关心的询问。

他已经坐起来，并且在房里自由地走动了。除了脸色、咳嗽和一些动作外，别人不会知道他在害病。中药还在吃，不过吃得不勤。母亲现在也提起去医院检查、照X光一类的话。然而他总是支吾过去。他愿意吃中药，因为花钱少，而且不管功效如何，继续不断地吃着药，总可以给自己一点安慰和希望。

有时他也看书，因为他寂寞，而且冬天的夜太长，他睡尽了夜，不能再在白天闭眼。他也喜欢看书，走动，说话，这使他觉得自己的病势不重，甚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但是母亲不让他多讲话，多看书，多走动；母亲却时时提醒他：他在生病，他不能象常人那样地生活。

可是他怎么能象常人那样地生活呢？白天躺在床上不做任何事情，这只有使他多思索，多焦虑，这只有使他心烦。他计算着，几乎每天都在计算，他花去若干钱，还剩余若干。钱本来只有那么一点点，物价又在不断地涨，

他的遣散费和他妻子留下的安家费，再加上每月那一点利息，凑在一起又能够用多久呢？他仿佛看着钱一天一天不停地流出去，他束手无法拦住它。他没有丝毫的收入，只有无穷无尽的花费……那太可怕了，他一想起，就发呆。

有一次母亲为他买了一只鸡回来，高兴地煮好鸡汤用菜碗盛着端给他吃。那是午饭后不久的事。这两天他的胃口更不好。“你要是喜欢吃，我可以常常煮给你吃，”母亲带点鼓舞的口气说。

“妈，这太花费了，我们哪里吃得起啊！”他却带着愁容回答，不过他还是把碗接了过来。

“我买得很便宜，不过千多块钱，吃了补补身体也好，”母亲被他浇了凉水，但是她仍旧温和地答道。

“不过我们没有多的钱啊，”他固执般地说；“我身体不好，偏偏又失了业。坐吃山空，怎么得了！”

“不要紧，你不必耽心。横顺目前还有办法，先把你身体弄好再说，”母亲带笑地劝道，她笑得有点勉强。

“东西天天贵，钱天天减少，树生还没有走，我们恐怕就要动用到她那笔钱了，”他皱着眉头说。鸡汤还在他的手里冒热气。

母亲立刻收起了笑容。她掉开头，想找个地方停留她的眼光，但是没有找到。她又回过脸来，痛苦而且烦躁地说了一句：“你快些吃罢。”

他捧着碗喝汤，不用汤匙，不用筷子，还带了一点慌张不安的样子。母亲在旁边低声叹了一口气。她仿佛看见那个女人的得意的笑容。她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她埋下头。但是他的喝汤的响声引起了她的注意。“很好，很好，”他接连称赞道，他的愁容消失了。他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汤碗。他用手拿起一只鸡腿在嘴边啃着。

“妈，你也吃一点罢，”他忽然抬起头看看母亲，带笑地说。

“我不饿，”母亲轻轻地答道。她用爱怜的眼光看他。她心里难受。

“我不是病，我就是营养不良啊，我身体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他解释般地说。

“是啊，你身体会慢慢好起来的，”母亲机械地答道。

他又专心去吃碗里的鸡肉，他仿佛从来没有吃过好饮食似的。他忽然自言自语：“要是平日吃得好一点，我也不会得这种病。”他一面吃，一面说话。母亲仍然站在旁边看他，她一会儿露出笑容，一会儿又伸手去揩眼睛。

“他的身体大概渐渐好起来了。他能吃，这是好现象，”她想道。

“妈，你也吃一点。味道很好，很好。人是需要营养的，”他吃完鸡肉，用油手拿着碗，带着满足的微笑对母亲说。

“好，我会吃，”母亲不愿意他多讲话，就含糊地答应了，其实她心想：“就只有这么一只瘦鸡，给你一个人吃还嫌少啊。”她接过空碗，拿了它到外面去。她回来的时候，他靠在藤椅上睡着了。母亲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想给他盖上点什么东西，可是刚走到他面前，他忽然睁开眼唤道：“树生！”他抓住母亲的手。

“什么事？”母亲惊问道。

他把眼睛掉向四周看了一下。随后他带了点疑惑地问：

“树生还没有回来？”

“没有。连她的影子也看不见，”她带着失望的口气回答。他不应该时

常想着树生。树生对他哪点好？她（树生）简直是在折磨他，欺骗他！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露出了苦笑。“我又在做梦了，”他感到寂寞地说。

“你还是到床上去睡罢，”母亲说。

“我睡得太多了，一身骨头都睡痛了。我不想再睡，”他说，慢慢地站起来。

“树生也真是太忙了。她要走了，也不能回家跟我们团聚两天，”他扶着书桌，自语道。他转过身推开藤椅，慢步走到右面窗前，打开掩着的窗户。

“你当心，不要吹风啊，”母亲关心地说；她起先听见他又提到那个女人的名字，便忍住心里的不痛快，不讲话，但是现在她不能沉默了，她不是在跟他赌气啊。

“太气闷了，我想闻一点新鲜空气，”他说。可是他嗅到的冷气中夹杂了一股一股的煤臭。同时什么东西在刮着他的脸，他感到痛和不舒服。

天永远带着愁容。空气永远是那样地沉闷。马路是一片黯淡的灰色。人们埋着头走过来，缩着颈项走过去。

“你还是睡一会儿罢，我看你闲着也无聊，”母亲又在劝他。

他关上窗门，转过身来，对着母亲点了点头说：“好的。”他望着他的床，他想走过去，又害怕走过去。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日子过得真慢，”他自语道。

后来他终于走到床前，和衣倒在床上，但是他仍旧睁着两只眼睛。

母亲坐在藤椅上闭着眼睛养神。她听见他在床上连连地翻身，她知道是什么思想在搅扰他。她有一种类似悲愤的感觉。后来她实在忍耐不住，便掉过头看他，一面安慰他说：“宣，你不要多想那些事。你安心睡罢。”

“我没有想什么，”他低声回答。

“你瞒不过我，你还是在想树生的事情，”母亲说。

“那是我劝她去的，她本来并不一定要去，”他分辩道。“换个环境对她也许好一点。她在这个地方也住厌了。去兰州待遇高一点，算是升了一级。”

“我知道，我知道，”母亲加重语气地说。“不过你光是替她着想，你为什么不想到你自己？你为什么只管想到别人？”

“我自己？”他惊讶地说，“我自己不是很好吗！”他说了“很好”两个字，连他自己也觉得话太不真实了，他便补上一句：“我的病差不多全好了，她在兰州更可以给我帮忙。”

“她？你相信她！”母亲冷笑一声，接着轻蔑地说，“她是一只野鸟，你放出去休想收她回来。”

“妈，你对什么人都好，就是对树生太苛刻。她并不是那样的女人。而且她还是为了我们一家人的缘故才答应去兰州的，”他兴奋地从床上坐起来说。

母亲呆呆地望着他，忽然改变了脸色，她忍受似地点着头说：“就依你，我相信你的话。……那么，你放心睡觉罢。你话讲多了太伤神，病会加重的。”

他不作声了。他埋着头好象在想什么事情。母亲用怜悯的眼光望着他，心里埋怨道：“你怎么这样执迷不悟啊！可是她仍然用慈爱的声音对他说：“宣，你还是睡下罢，这样坐着看着凉啊。”

他抬起头用类似感激的眼光看了母亲一眼。停了一会儿，他忽然下床来。

“妈，我要出去一趟，”他匆匆地说，一面弯着身子系皮鞋带。

“你出去？你出去做什么？”母亲惊问道。

“我有点事，”他答道。

“你还有什么事？公司已经辞掉你了。外面冷得很，你身体又不好，”母亲着急地说。

他站起来，脸上现出兴奋的红色。“妈，不要紧，让我去一趟，”他固执地说，便走去取下挂在墙上洋钉上面的蓝布罩袍来穿在身上。

“等我来，”母亲不放心地急急说，她过去帮忙他把罩袍穿上了。“你不要走，走不得啊！”她一面说，一面却取下那条黑白条纹的旧围巾，替他缠在颈项上。“你不要走。有事情，你写个字条，我给你送去，”她又说。

“不要紧，我就会回来，地方很近，”他说着，就朝外走。她望着他，突然觉得自己象是在梦中一样。

“他这是做什么？我简直不明白！”她孤寂地自语道。她站在原处思索了片刻，然后走到他的床前，弯下身子去整理床铺。

她铺好床，看看屋子，地板上尘土很多，还有几处半干的痰迹。她皱了皱眉，便到门外廊上去拿了扫帚来把地板打扫干净了。桌上已经垫了一层土。这个房间一面临马路，每逢大卡车经过，就会扬起大股的灰尘送进屋来。这一刻她似乎特别忍受不了肮脏。她又用抹布把方桌和书桌连凳子也都抹干净了。

做完这个，她便坐在藤椅上休息。她觉得腰痛，她用手在腰间擦揉了一会儿。“要是有人来给我捶背多好啊，”她忽然想道。但是她马上就明白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了，她责备自己：“你已经做了老妈子，还敢妄想吗！”她绝望地叹了一口气。她把头放在靠背上。她的眼前现出了一个人影，先是模糊，后来面颜十分清楚了。“我又想起了他，”她哂笑自己。但是接着她低声说了出来：“我是不在乎，我知道我命不好。不过你为什么就不保佑宣？你不能让宣就过这种日子啊！”她一阵伤心，掉下了几滴眼泪。

不久他推开门进来，看见母亲坐在藤椅上揩眼睛。

“妈，你什么事？怎么在哭？”他惊问道。

“我扫地，灰尘进了我的眼睛，刚刚弄出来，”她对他撒了谎。

“妈，你把我的床也理好了，”他感动地说，便走到母亲的身边。

“我没有事，闲着也闷得很，”她答道。接着她又问：“你刚才到哪里去了来？”

他喘了两口气，又咳了两三声嗽，然后掉开脸说：“我去看了钟老来。”

“你找他什么事？你到公司去过吗？”她惊讶地问道，便站了起来。

“我托他给我找事，”他低声说。

“找事？你病还没有全好，何必这样着急！自己的身体比什么都要紧啊，”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我们中国人身体大半是这样，说有病，拖起来拖几十年也没有问题。我觉得我现在好多了，钟老也说我比前些天好多了。他答应替我找事。”他的脸上仍旧带着病容和倦容，说起话来似乎很吃力。他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

“唉，你何必这样急啊！”母亲说。“我们一时还不会饿饭。”

“可是我不能够整天睡着看你一个人做事情。我是个男人，总不能袖手吃闲饭啊，”他痛苦地分辩道。

“你是我的儿子，我就只有你一个，你还不肯保养身体，我将来靠哪个

啊？……”她说不下去，悲痛堵塞了她的咽喉。

他把左手放到嘴边，他的牙齿紧紧咬着大拇指。他不知道痛，因为他的左胸痛得厉害。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手，也不去看指上深的齿印。他看他母亲。她默默地坐在那里。他用怜悯的眼光看她，他想：“你的梦、你的希望都落空了。”他认识“将来”，“将来”象一张凶恶的鬼脸，有着两排可怕的白牙。

两个人不再说话，不再动。这静寂是可怕的，折磨人的。屋子里没有丝毫生命的气象。街中的人声、车声都不能打破这静寂。但是母亲和儿子各人沉在自己的思想中，并没有走着同一条路，却在一个地方碰了头而且互相了解了：那是一个大字：死。

儿子走到母亲的背后。“妈，你不要难过，”他温和地说；“你还可以靠小宣，他将来一定比我有出息。”

母亲知道他的意思，她心里更加难过。“小宣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这孩子太象你了，”她叹息似地说。她不愿意把她的痛苦露给他看，可是这句话使他更深更透地看见了她的寂寞的一生。她说得不错。小宣太象他，也就是说，小宣跟他一样地没有出息。那么她究竟有什么依靠呢？他自己有时也在小宣的身上寄托着希望，现在他明白希望是很渺茫的了。

“他年纪还小，慢慢会好起来。说起来我真对不起他，我始终没有好好地教养过他，”他说，他还想安慰母亲。

“其实也怪不得你，你一辈子就没有休息过，你自己什么苦都吃……”她说到这里，又动了感情，再也说不下去，她忽然站起来，逃避似地走到门外去了。

他默默地走到右面窗前，打开一面窗。天象一张惨白脸对着他。灰黑的云象皱紧的眉。他立刻打了一个冷噤。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冷冷地挨着他的脸颊。“下雨罗，”他没精打采地自语道。

背后起了脚步声，妻走进房来了。不等他掉转身子，她激动地说：“宣，我明天走。”

“明天？怎么这样快？不是说下礼拜吗？”他大吃一惊，问道。

“明天有一架加班机，票子已经送来，我不能陪你过新年了。真糟，晚上还有人请吃饭，”她说到这里不觉皱起了眉尖，声调也改变了。

“那么明天真走了？”他失望地再问。

“明早晨六点钟以前赶到飞机场。天不亮就得起来，”她说。

“那么今晚上先雇好车子，不然怕来不及，”他说。

“不要紧，陈主任会借部汽车来接我。我现在还要整理行李，我箱子也没有理好，”她忙忙慌慌地说。她弯下身去拿放在床底下的箱子。

“我来给你帮忙，”他说着，也走到床前去。

她已经把箱子拖出来了，就蹲着打开盖子，开始清理箱内的衣服。她时而站起，去拿一两件东西来放在箱子里面，她拿来的，有衣服，有化妆品和别的东西。

“这个要带去吗？”“这个要吗？”他时不时拿一两件她的东西来给她，一面问道。

“谢谢你。你不要动，我自己来，”她总是这样回答。

母亲从外面进来，站在门口，冷眼看他们的动作。她不发出丝毫的声息，可是她的心里充满了怨愤。他忽然注意到她，便大声报告：“妈，树生明早

晨要飞了。”

“她飞她的，跟我有什么相干！”母亲冷冷地说。

树生本来已经站直了，要招呼母亲，并且说几句带好意的话。可是听见母亲的冷言冷语，她又默默地蹲下去。她的脸涨得通红，她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

母亲生气地走进自己的小屋去了。树生关上箱盖，立起来，怒气已经消去一半。他望着她，不敢说一句话。但是他的眼光在向她哀求什么。

“你看，都是她在跟我过不去，她实在恨我，”树生轻轻地对他说。

“这都是误会，妈慢慢会明白的。你不要怪她，”他小声回答。

“我不会恨她，我看在你的面上，”她温柔地对他笑了笑，说。

“谢谢你，”他赔笑道；“我明早晨送你上飞机，”他用更低的声音说。

“你不要去！你的身体受不了，”她急急地说。“横顺有陈主任照料我。”

末一句话刺痛了他的心。“那么我们就在这间屋里分别？”他痛苦地说，眼里含着泪光。

“不要难过，我现在还不走。我今晚上早点回来，还可以陪你多谈谈，”她的心肠软了，用同情的声调安慰他说。

他点了点头，想说一句“我等你”，却又说不出来，只是含糊地发出一个声音。

“你睡下罢，站着太累，你的病还没有完全好啊。我可以在床上坐一会儿，”她又说。

他依从了她的劝告躺下了。她给他盖上半幅棉被，然后坐在床沿上。“明天这个时候我不晓得是怎样的情形，”她自语道。“其实我也不一定想走。我心里毫无把握。你们要是把我拉住，我也许就不走了，”这是她对他说说的真心话。

“你放心去好了。你既然决定了，不会错的，”他温和地回答，他忘了自己的痛苦。

“其实我自己也不晓得这次去兰州是祸是福，我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也没有，你又一直在生病，妈却巴不得我早一天离开你，”她望着他，带了点感伤和烦愁地说。

“病”字敲着他的头。她们永远不让他忘记他的病！她们永远把他看作一个病人！他叹了一口气，仿佛从一个跟她同等的高度跌下来，他最后一线游丝似的希望也破灭了。

“是啊，是啊，”他无可奈何地连连说，他带着关切和爱惜的眼光望着她。

“你气色还是不好，你要多休息，”她换了关心的调子说。“经济问题倒容易解决。你只管放心养病。我会按月寄钱给你。”

“我知道，”他把眼光掉开说。

“小宣那里我今天去过信，”她又说。但是没有让她把话说完，汽车的喇叭声突然在楼下正街上响起来了。她略微惊讶地掉过脸来，朝那个方向望了望，又说下去：“我要他礼拜天进城来。”喇叭似乎不耐烦地接连叫着。她站起来，忙忙慌慌地说：“我要走了，他们开车子来接我了。”她整理一下衣服，又拿起手提包，打开它，取出了小镜子和粉盒、唇膏。

他坐起来。“你不要起来，你睡你的，”她一面说，一面专心地对镜扑粉涂口红。但是他仍旧下床来了。

“我走罗，晚上我早一点回来，”她说，掉过脸，含笑地对他点一个头，然后匆匆地走出门去。

屋子里寒冷的空气中还留着她的脂粉香，可是她带走了清脆的笑声和语声。他孤寂地站在方桌前面，出神地望着她的身影消去的地方，那扇白粉脱落了了的房门。“你留下罢，你留下罢！”他仿佛听见了自己的内心的声音。但是橐橐的轻快的脚步声早已消失了。

母亲走出小屋，带着怜悯的眼光看他。“宣，你死了心罢，你们迟早要分开的。你一个穷读书人哪里留得住她！”母亲说，她心里装满了爱和恨，她需要发泄。

他埋下头看看自己的身上，然后把右手放到眼前。多么瘦！多么黄！倒更象鸡爪了！它在发抖，无力地战抖着。他把袖子稍稍往上挽。多枯瘦的手腕！哪里还有一点肉！他觉得全身发冷。他呆呆地望着这只可怕的手，他好象是一个罪人，刚听完了死刑的宣告。母亲的话反复地在他的耳边响着：“死了心罢，死了心罢。”的确他的心被判了死刑了。

他还有什么权利，什么理由要求她留下呢？问题在他，而不是在她。这一次他彻底地明白了。

母亲扭开电灯，屋子里添了一点亮光。

他默默地走到书桌前，用告别一般的眼光看了看桌上的东西，然后崩溃似地坐倒在藤椅上。他用两只手蒙着脸。他并没有眼泪。他只是不愿意再看见他周围的一切。他放弃了一切，连自己也在内。

“宣，你不要难过，女人多得很。等你的病好了，可以另外找一个更好的，”母亲走过去，用慈爱的声音安慰他。

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叫。他取下手来，茫然望着母亲。他想哭。为什么她要把他拉回来？让他这个死刑囚再瞥见繁华世界？他已经安分地准备忍受他的命运，为什么还要拿于他无望的梦来诱惑他？他这时并不是在冷静思索，从容判断，他只是在体验那种绞心的痛苦。树生带走了爱，也带走了他的一切；大学时代的好梦，婚后的甜蜜生活，战前的教育事业的计划，……全光了，全完了！

“你快到床上去躺躺，我看你不大好过罢。要不要我现在就去请个医生来，西医也好，”母亲仍旧不能了解他，但是他的脸色使她惊恐，她着急起来，声音发颤地说。

“不，不要请医生。妈，不会久的，”他绝望地说，声音弱，而且不时喘气。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你说什么？等我来搀你，”母亲吃惊地说，她连忙搀扶着他的右肘。

“妈，你不要怕，没有什么事，我自己可以走，”他说，好象从梦里醒过来一样。他摆脱了母亲的扶持，离开藤椅，走到方桌前，一只手压在桌面上，月茫然的眼光朝四周看。昏黄的灯光，简陋的陈设，每件东西都发出冷气。突然间，不发出任何警告，电灯光灭了。眼前先是一下黑，然后从黑中泛出了捉摸不住的灰色光。

“昨天才停过电，怎么今天又停了？”母亲低声埋怨道。

他叹了一口气。“横竖做不了事，就让它黑着罢，”他说。

“点支蜡烛也好，不然显得更凄凉了，”母亲说。她便去找了昨天用剩的半截蜡烛点起来。烛光摇曳得厉害。屋子里到处都是黑影。不知从哪里进来的风震摇着烛光，烛芯偏向一边，烛油水似地往下流。一个破茶杯倒立着，

做了临时烛台，现在也被大堆烛油焊在桌上了。

“快拿剪刀来！快拿剪刀来！”他并不想说这样的话，话却自然地和他的口中漏出来，而且他现出着急的样子。这样的事情不断地发生，他已经由训练得到了好些习性。他做着自己并不一定想做的事，说着自己并不一定想说的话。

母亲拿了剪刀来，把倒垂的烛芯剪去了。烛光稍稍稳定。“你现在吃饭好吗？我去把鸡汤热来，”她说。

“好嘛，”他勉强地答道。几小时以前的那种兴致和食欲现在完全消失了。他回答“好”，只是为了敷衍母亲。“她为什么还要我吃？我不是已经饱了？”他疑惑地想道。他用茫然的眼光看母亲。母亲正拿了一段还不及大拇指长的蜡烛点燃了预备出去。

“妈，你拿这段长的去，方便点，”他说。“我不要亮，”他又添一句。他想：有亮没有亮对我都是一样。

“不要紧，我够了，”母亲说，仍旧拿了较短的一段蜡烛出了房门。

一段残烛陪伴他留在屋子里。

“又算过了一天，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天好活，”他自语道，不甘心地叹了一口气。

没有人答话。墙壁上颤摇着他自己的影子。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坐下还是站着，应该睡去还是醒着。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动作。他仍旧立在方桌前，寒气渐渐地浸透了他的罩衫和棉袍。他的身子微微战抖。他便离开方桌，走了几步，只为了使身子暖和一点。

“我才三十四岁，还没有做出什么事情，”他不平地、痛苦地想道。“现在全完了，”他惋惜地自叹。大学时代的抱负象电光般地在他的眼前亮了一下。花园般的背景，年轻的面孔，自负的言语……全在他的脑子里重现。“那个时候哪里想得到有今天？”他追悔地说。

“那个时候我多傻，我一直想着自己办一个理想中学，”他又带着苦笑地想。他的眼前仿佛现出一些青年的脸孔，活泼、勇敢、带着希望……。他们对着他感激地笑。他吃惊地睁大眼睛。蜡烛结了烛花，光逐渐暗淡。房里无限凄凉。“我又在做梦了，”他不去剪烛花，却失望地自语道。他忽然听见了廊上母亲的脚步声。

“又是吃！我这样不死不活地挨日子又有什么意思！”他痛苦地想。

母亲捧了一菜碗热气腾腾的鸡汤饭进来，她满意地笑着说：“我给你煮成了鸡汤饭，趁热吃，受用些。”

“好！我就多吃一点，”他顺从地说。母亲把碗放在方桌上。他走到方桌前一个凳子上坐下。一股热气立刻冲到他的脸上来。母亲俯着头在剪烛花。他看她。这些天她更老了。她居然有那么些条皱纹，颧骨显得更高，两颊也更瘦了。

“连母亲也受了我的累，”他不能不这样想。他很想哭。他对着碗出神了。

“快吃罢，看冷了啊，”母亲还在旁边催促他。

二十三

他吃过晚饭后就盼望着妻，可是妻回来得相当迟。

时间过得极慢。他坐在藤椅上或者和衣躺在床上。他那只旧表已经坏了好些天了，他不愿意拿出一笔不小的修理费，就让它静静地躺在他的枕边。他不断地要求母亲给他报告时刻。……七点……八点……九点……时间似乎故意跟他为难。这等待是够折磨人的。但是他有极大的忍耐力。

终于十点钟又到了。母亲放下手里的活计，取下老光眼镜，揉揉眼睛。

“宣，你脱了衣服睡罢，不要等了，”她说。

“我睡不着。妈，你去睡，”他失望地说。

“她这样迟还不回来，哪里还把家里人放在心上？明天一早就要走，也应该早回来跟家里人团聚才是正理，”母亲气恼地说。

“她应酬忙，事情多，这也难怪她，”他还在替他的妻子辩解。

“应酬，你说她还有什么应酬？还不是又跟她那位陈主任跳舞去了，”母亲冷笑地说。

“不会的，不会的，”他摇头说。

“你总是袒护她，纵容她！不是我故意向你泼冷水，我先把话说在这里搁起，她跟那位陈主任有点不明不白——”她突然咽住以后的话，改变了语调叹息道：“你太忠厚了，你到现在还这样相信她，你真是执迷不悟！”

“妈，你还不了解她，她也有她的苦衷。在外面做事情，难免应酬多，她又爱面子，”他接口替妻辩护道；“她不见得就喜欢那个陈主任，我相信得过她。”

“那么我是在造谣中伤她！”母亲勃然变色道。

他吃了一惊，偷偷看母亲一眼，不敢做声。停了一两分钟，母亲的脸色缓和下来，那一阵愤怒过去了，她颇后悔自己说了那句话，她用怜惜的眼光看他。她和蔼地说：“你不要难过，我人老了，脾气更坏了。其实这样吵来吵去有什么好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那样看不起我！不管怎样，我总是你的母亲啊！”

他又得到了鼓舞，他有了勇气。他说：“妈，你不要误会她，她从没有讲过你的坏话。她对你本来是很好的。”他觉得有了消解她们中间误会的机会和希望了。

母亲叹了一口气，她指着他的脸说：“你也太老好了。她哪里肯对你讲真话啊！我看得出来，我比你明白，她觉得她能够挣钱养活自己，我却靠着你们吃饭，所以她看不起我。”

“妈，你的确误会了她，她没有这个意思，”他带着充分自信地说。

“你怎么知道？”母亲不以为然地反问道。就在这时候电灯突然亮了。整个屋子大放光明。倒立的茶杯上那段剩了一寸多长的蜡烛戴上了一大朵黑烛花，现着随时都会熄灭的样子。母亲立刻吹灭了烛，换过话题说：“十点半了，她还没有回来！你说她是不是还把我们放在眼里！”

他不作声，慢慢地叹了一口气。他的左胸又厉害地痛起来。他用乞怜的眼光偷偷地看母亲，他甚至想说：你饶了她罢。可是他并没有这样说。他压下了感情的爆发（他想痛哭一场）。他平平淡淡地对母亲说：“妈，你不必等她了。你去睡罢。”

“那么你呢？”母亲关心地问。

“我也要睡了。我瞌睡得很。”他故意装出睁不开眼睛的样子，并且打了一个呵欠。

“那么你还不脱衣服？”母亲又问。

“我等一会儿脱，让我先睡一觉。妈，你把电灯给我关了罢，”

他故意慢吞吞地说，他又打了一个呵欠。

“好的，你先睡一觉也好，不要忘记脱衣服啊，”母亲叮嘱道。

她真的把电灯扭熄了。她轻手轻脚地拿了一个凳子，放在掩着的门背后。于是她走进她那间小屋去了。她房里的电灯还亮着。

他并无睡意。他的思潮翻腾得厉害。他睁着眼睛望那扇房门，望那张方桌，望那把藤椅，望一切她坐过、动过、用过的东西。他想：到明天早晨什么都会变样了。这间屋子里不会再有她的影子“树生！”他忽然用棉被蒙住头带了哭声暗暗地唤她。他希望能有一只手来揭开他的被，能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轻轻回答：“宣，我在这儿。”

但是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母亲在小屋里咳了两声嗽，随后又寂然了。

“树生，你真的就这样离开我？”他再说。他盼望得到一声回答：“宣，我永远不离开你。”没有声音。不，从街上送进来凄凉的声音：“炒米糖开水。”声音多么衰弱，多么空虚，多么寂寞。这是一个孤零零的老人的叫卖声！他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影子，缩着头，驼着背，两只手插在袖筒里，破旧油腻的棉袍挡不住寒风。一个多么寂寞、病弱的读书人，现在……将来？他想着，他在棉被下面哭出声来了。

幸好母亲不曾听见他的哭声。不会有人来安慰他。他慢慢地止了泪。他听见了廊上的脚步声，是她的脚步声！他兴奋地揭开被露出脸来。他忘了泪痕还没有揩干，等到她在推门了，他才想起，连忙用手揉眼睛，并且着急地翻一个身，使她在扭开电灯以后看不到他的脸。

她走进屋子，扭燃了电灯。她第一眼看床上，还以为他睡熟了。她先拿起拖鞋，轻轻地走到书桌前，在藤椅上坐下，换了鞋，又从抽屉里取出一面镜子，对着镜略略整理头发。然后她站起来，去打开了箱子，又把抽屉里的一些东西放到箱子里去。她做这些事还竭力避免弄出任何响声，她不愿意惊醒他的梦。但是正在整理箱子的中间，她忽然想到什么事，就暂时撇下这个工作，走到床前去。她静静地立在床前看他。

他并没有睡去，从她那些细微的声音里他仿佛目睹了她的一举一动。他知道她到了他的床前。他还以为她就会走开，谁知她竟然在床前立了好一阵。他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他不能再忍耐了。他咳了一声嗽。他听见她小声唤他的名字，便装出睡醒起来的样子翻一个身，伸一个懒腰，一面睁开眼来。

“宣，”她再唤他，一面俯下头看他；“我回来迟了。你睡了多久了？”

“我本来不要睡，不晓得怎样就睡着了，”他说了谎，同时还对她微笑。

“我早就想回来，谁知道饭吃得太迟，他们又拉着去喝咖啡，我说要回家，他们一定不放我走……”她解释道。

“我知道，”他打断了她的话，“你的同事们一定不愿意跟你分别。”这是敷衍的话。可是话一出口，他却觉得自己失言了。他绝没有讥讽她的意思。

“你是不是怪我不早回来？”她低声下气地说；“我不骗你，我虽然在外面吃饭，心里却一直想到你。我们要分别了，我也愿意同你多聚一刻，说真话，我就是怕——”她说到这里便转过脸朝母亲的小屋望了望。——

“我知道。我并没有怪你，”他接嘴说。“你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吗？”他改变了话题问。

“差不多了，”她答道。

“那么你快点收拾罢，”他催她道；“现在大概快十一点了。你要早点睡啊，明天天不亮你就要起来。”

“不要紧，陈主任会开汽车来接我，车子已经借好了，”她顺口说。

“不过你也得早起来，不然会来不及的，”他勉强装出笑容说。

“那么你——”她开始感到留恋，她心里有点难过，说了这三个字，第四个字梗在咽喉，不肯出来。

“我瞌睡，”他故意打了一个假呵欠。

她似乎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她抬起头说：“好的，你好好睡。我走的时候你不要起来啊。太早了，你起来会着凉的。你的病刚刚才好一点，处处得小心，”她叮嘱道。

“是，我知道，你放心罢，”他说，他努力做出满意的微笑来，虽然做得不太象。可是等她转身去整理行李时，他却蒙着头在被里淌眼泪。

她忙了将近一个钟头。她还以为他已经睡熟了。事实上他却一直醒着。他的思想活动得快，它跑了许多地方，甚至许多年月。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它始终绕着一个人的面影。那就是她。她现在还在他的近旁，可是他不敢吐一口气，或者大声咳一下嗽，他害怕惊动了她。幸福的回忆，年轻人的岁月都去远了。……甚至痛苦的争吵和相互的折磨也去远了。现在留给他的只有分离（马上就要来到的）和以后的孤寂。还有他这个病。他的左胸又在隐隐地痛。她会回来吗？或者他能够等到她回来的那一天吗？……他不敢再往下想。他把脸朝着墙壁，默默地流眼泪。他后来也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些时候。然而那是在她上床睡去的若干分钟以后了。

他半夜里惊醒，一身冷汗，汗背心已经湿透了。屋子里漆黑，他翻身朝外看，他觉得有点头晕，他看不清楚一件东西。母亲房里没有声息。他侧耳静听。妻在他旁边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她睡得很安静。“什么时候了？”他问自己。他答不出。“她不会睡过钟点吗？”他想。他自己回答：“还早罢，天这么黑。她不会赶不上，陈主任会来接她。”想到“陈主任”，他仿佛挨了迎头一闷棍，他愣了几分钟。什么东西在他心里燃烧，他觉得脸上、额上烫得厉害。“他什么都比我强，”他妒忌地想道。……

渐渐地、慢慢地他又睡去了。可是她突然醒来了。她跳下床，穿起衣服，扭开电灯，看一下手表。“啊呀！”她低声惊叫，她连忙打扮自己。

突然在窗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他来了，我得快。”她小声催她自己。她匆匆地打扮好了。她朝床上一看。他睡着不动。“我不要惊醒他，让他好好地睡罢，”她想道。她又看母亲的小屋，房门紧闭，她朝着小屋说了一声：“再会。”她试提一下她的两只箱子，刚提起来，又放下。她急急走到床前去看他。他的后脑向着她，他在打鼾。她痴痴地立了半晌。窗下的汽车喇叭声又响了。她用柔和的声音轻轻说：“宣，我们再见了，希望你不要梦着我离开你啊。”她觉得心里不好过，便用力咬着下嘴唇，掉转了身子。她离开了床，马上又回转身去看他。她踌躇片刻，忽然走到书桌前，拿了一张纸，用自来水笔在上面匆匆写下几行字，用墨水瓶压住它，于是提着一只箱子往门外走了。

就在她从走廊转下楼梯的时候，他突然从梦中发出一声叫唤惊醒过来了。他叫着她的名字，声音不大，却相当凄惨。他梦着她抛开他走了。他正在唤她回来。

他立刻用眼光找寻她。门开着。电灯亮得可怕。没有她的影子，一只箱

子立在屋子中央。他很快地就明白了真实情形。他一翻身坐起来，忙忙慌慌地穿起棉袍，连钮子都没有扣好，就提起那只箱子大踏步走出房去。

他还没有走到楼梯口，就觉得膀子发痠，脚沉重，但是他竭力支持着下了楼梯。楼梯口没有电灯，不曾扣好的棉袍的后襟又绊住他的脚，他不能走快。他正走到二楼的转角，两个人急急地从下面上来。他看见射上来的手电光。为了避开亮光，他把眼睛略略埋下。

“宣，你起来了！”上来的人用熟悉的女音惊喜地叫道。手电光照在他的身上。“啊呀，你把我箱子也提下来了！”她连忙走到他的身边，伸手去拿箱子。“给我，”她感激地说。

他不放开手，仍旧要提着走下去，他说：“不要紧，我可以提下去。”

“给我提，”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这是年轻而有力的声音。他吃了一惊。他看了说话的人一眼。恍惚间他觉得那个人身材魁梧，意态轩昂，比起来，自己太猥琐了。他顺从地把箱子交给那只伸过来的手。他还听见她在说：“陈主任，请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

“你快来啊，”那个年轻的声音说，魁梧的身影消失了。“冬冬”的脚步声响了片刻后也寂然了。他默默地站在楼梯上，她也是。她的手电光亮了一阵，也突然灭了。

两个人立在黑暗与寒冷的中间，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声。

汽车喇叭叫起来，叫了两声。她梦醒似地动了一下，她说话了：“宣，你上楼睡罢，你身体真要当心啊……我们就在这里分别罢，你不要送我。我给你留了一封信在屋里，”她柔情地伸过手去，担住他的手。她觉得他的手又瘦又硬（虽然不怎么冷）！她竭力压下了感情，声音发颤地说：“再见。”

他忽然抓住她的膀子，又着急又悲痛地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不定，不过我一定要回来的。我想至迟也不过一年，”她感动地说。“一年？这样久！你能不能提早呢？”他失望地小声叫道。他害怕他等不到那个时候。

“我也说不定，不过我总会想法提早的，”她答道，讨厌的喇叭声又响了。她安慰他：“你不要着急，我到了那边就写信回来。”“是，我等着你的信，”他揩着眼泪说。

“我会——”她刚刚说了两个字，忽然一阵心酸，她轻轻地扑到他的身上去。

他连忙往后退了一步，吃惊地说：“不要挨我，我有肺病，会传染人。”

她并不离开他，反而伸出两只手将他抱住，又把她的红唇紧紧地压在他的干枯的嘴上，热烈地吻了一下。她又听到那讨厌的喇叭声，才离开他的身子，眼泪满脸地说：“我真愿意传染到你那个病，那么我就不会离开你了。”她用手帕揩了揩脸，小声叹了一口气，又说：“妈面前你替我讲一声，我没有敢惊动她。”她终于决然地撇开他，打着手电急急忙忙地跑下了剩余的那几级楼梯。

他痴呆地立了一两分钟，突然沿着楼梯追下去。在黑暗中他并没有被什么东西绊倒。但是他赶到大门口，汽车刚刚开动。他叫一声“树生”，他的声音嘶哑了。她似乎在玻璃窗内露了一下脸，但是汽车仍然在朝前走。他一路叫着追上去。汽车却象箭一般地飞进雾中去了。他赶不上，他站着喘气。他绝望地走回家来。大门口一盏满月似的门灯孤寂地照着门前一段人行道。

门旁边墙脚下有一个人堆。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两个十岁上下的小孩互相抱着缩成了一团。油黑的脸，油黑的破棉袄，满身都是棉花疙瘩，连棉花也变成黑灰色了。他们睡得很熟，灯光温柔地抚着他们的脸。

他看着他们，他浑身战抖起来。周围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寒夜。就只有这两个孩子睡着，他一个人醒着。他很想叫醒他们，让他们到他的屋子里去，他又想脱下自己的棉衣盖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唐柏青也这样睡过的，”他忽然自语道，他想起了那个同学的话，便蒙着脸象逃避瘟疫似地走进了大门。

他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在书桌上见到她留下的字条，他拿起它来，低声念着：

宣：

我走了。我看你睡得很好，不忍叫醒你。你不要难过。我到了那边就给你写信。一切有陈主任照料，你可以放心。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保重自己的身体，认真地治病。

妈面前请你替我讲几句好话罢。

妻

他一边念，一边流泪。特别是最后一个“妻”字引起他的感激。

他拿着字条在书桌前立了几分钟。他觉得浑身发冷，两条腿好象要冻僵的样子。他支持不住，便拿着字条走到床前，把它放在枕边，然后脱去棉袍钻进被窝里去。

他一直没有能睡熟，他不断地翻身，有时他刚合上眼，立刻又惊醒了。可怖的梦魇在等候他。他不敢落进睡梦中去。他发烧，头又晕，两耳响得厉害。天刚大亮，他听见飞机声。他想：她去了，去远了，我永远看不见她了。他把枕畔那张字条捏在手里，低声哭起来。

“你是个忠厚老好人，你只会哭！”他想起了妻骂过他的话，可是他反而哭得更伤心了。

二十四

妻走后第二天他又病倒了。在病中他一共接到妻的三封信。第一封信写着：

宣：

我到了兰州，一切都很陌生，只觉空气好，天虽冷，却也冷得痛快。

行里房屋还在改修中，我们都住在旅馆里。陈经理对我很好，你可不必耽心。初到一个地方，定不下心来，过一两天再给你写长信。

母亲还发脾气吗？我在家她事事看不顺眼，分开了她也许不那么恨我罢。

你的身体应该注意，多吃点营养东西和补品，千万不要省钱，我会按月寄给你。祝福你。

妻×月×日

没有写明回信地址，但是这封短信使他很满意，只除了“陈经理”三个字。他等着第二封信。这并不不要他久等，过了三天第二封信就来了。这封信不但相当长，而且写得很恳切，有不少劝他安心治病的话，还附了一封介绍他到宽仁医院去找内科主任丁医生的信，信末的署名是“陈奉光”。他知道

这是陈经理的名字，他的脸红了一下。他顺口向母亲提了一句：“树生要我到宽仁医院去看病，她还请陈经理写了封介绍信来。”母亲冷冷地说了一句：“哼，哪个希罕他介绍？”他就不敢讲下去了，以后也不敢再提这件事情。他又盼望着第三封信，他相信它一定比第二封信长。过了一个星期，第三封信到了。它却是一封很短的信。在信内她只说她正在为筹备银行开幕的事忙着，一时没有功夫写长信，却盼望他多去信，告诉她他的生活状况。信末写上了她的通信处，署名却改用了“树生”两个字。

他读完信，叹了一口气，不说一句话。母亲伸过手来拿信，他默默地交给她。

“她好神气，才去了十几天就拿出要人的派头来了，”母亲看完信，不满意地说。她不曾看到树生的第一封信。

“她大概真忙，也难怪她，新开行，人手少，陈经理对她好，她也得多出力，”他还在替妻辩护，他竭力掩饰了自己的失望和疑虑（的确他有一点点疑虑）。

“你还要说陈经理对她好！你看着罢，总有一天他们两个会闹出花样来的！”母亲气愤地说。

“妈，我该吃药了罢，”他不愿意母亲再谈这个问题（它使他心里很难过），便打岔道。

“是啊，我去给你煎药，”母亲接着说，想起他的病，她立刻忘记了那个女人。她用慈爱的眼光看他。他还是那么黄瘦，不过眼神好了些，嘴唇也有了点血色。她匆匆忙忙地走出房去了。

他又叹了一口气，把眼睛掉向墙壁。过了两三分钟，他又把眼睛掉向外面，后来又掉向天花板。不管在哪里他都看见那个女人的笑脸，她快乐地笑，脸打扮得象舞台上的美人脸。他整个脸热烘烘的，耳朵边响着单调的铃子声，眼睛干燥得象要发火。他终于昏沉沉地睡着了。

他做着短而奇怪的梦，有时他还发出呻吟，一直到母亲端了药汤进来，他才被唤醒。他大吃一惊，而且出了一身汗。他用了求救的眼光望着她。

“宣，你怎么了？”母亲惊恐地说。她差一点把碗里的药汤泼了出来。

他好象没有听懂她的话。过了半晌，他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他的表情改变了。他吃力地说：“我做了好些怪梦，现在好了。”

母亲不大明白地看了看他。“药好了，不烫，现在正好吃。你要起来吃吗？”她关心地说。

“好。你递给我罢，”他说着就推开棉被坐起来。

“你快披上衣服，看受凉啊，”母亲着急地说。她把药碗递给他以后，便拿起他的棉袍替他披上。“今天很冷，外面在下雪，”她说。

“大不大？”他喝了两大口药，抬起头问道。

“不大，垫不起来的。不过冷倒是冷，所以你起来一定要先穿好衣服，”她说。

他喝光了药汤，把碗递还给母亲。他忽然拉着她的红肿的手惊叫道：“妈，你怎么今年生冻疮了？”

母亲缩回了手，淡淡地说：“我去年也生过的。”

“去年哪有这样厉害！我说冷天你不要自己洗衣服罢，还是包给外面大娘洗好些。”

“外面大娘洗，你知道要多少钱一个月！”她不等他回答，自己又接下

去：“一千四百元，差不多又涨了一倍了。”

“涨一倍就涨一倍，不能为了省一千四，就让你的手吃苦啊，”他痛心地说。“我太对不住你了，”他又添上一句。

“可是钱总是钱啊。我宁肯省下一千四给你医病，也不情愿送给那班洗衣服的大娘，”母亲说。

“树生不是说按月寄钱来吗？目前也不在乎省这几个钱，”他说，伸了个懒腰，拿掉棉袍，又倒下去。

母亲不作声了。她的脸上现出了不愉快的表情。她立刻掉开头，不给他看见她的脸。

“妈，”他温和地唤道。她慢慢地回过头来。“你也得保重身体啊，你何必一定要叫自己多吃苦。”

“我并不苦，”她说，勉强笑了笑。她不自觉地摸着手上发烫的肿痕。

“你不要骗我，我晓得你不愿意用树生的钱，”他说。

“没有这回事，我不是已经在用她的钱吗？”她说，声音尖，又变了脸色，眼眶里装满了泪水。她咬着嘴唇，并且把身子掉开了。

“妈，我真对不起你，你把我养到这么大，到今天我还不能养活你，”他答道。她真想跑进自己的房里去畅快地大哭一场。

“你现在还恨树生吗？”过了半晌他又问。

“我不恨，我从没有恨过她，”她说。她巴不得马上离开这间屋子，她害怕他再谈起树生。

“她说过她对你并没有恶感，”他说。

“谢谢她，”她冷淡地插嘴说。

“那么要是她写信给你，你肯回信吗？”他胆怯地问。

她想了片刻，才答道：“回信。”她仍然不让他看见她的脸色。

“那就好，”他欣慰地说，吐了一口气。

“你以为她会写信给我吗？”她忽然转过身来，问道。

“我想她会有的，”他带了几分确信地答道。

她摇摇头，她想说：“你在做梦！”可是她刚刚说了一个“你”字，立刻闭上了嘴。她不忍打破他的梦。同时她也盼望他的这个梦会实现。

关于树生的事他们就谈到这里为止。晚上等母亲回到小屋睡去以后，他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伏在书桌上给树生写了回信。他报告了他的近况。他也说起他和母亲间的那段谈话，他请她立刻给母亲写一封表示歉意和好感的长信来。封好了信，他疲倦不堪地倒在床上昏沉地睡了。

第二天早晨，不管他发着热，他还亲自把信放到母亲的手里，叮嘱她趁早到邮局作为航空挂号信寄出去。母亲接过信没有说什么，走出房门后却暗暗地摇头。他没有功夫去猜测母亲的心思。他的脸颊发红（因为发热），两眼射出希望的光辉，他好象在盼望着奇迹。

为了写这一封信，他多睡了四天。可是一个星期白白地过去了，邮差就没有叩过他的门。在第二个星期里面她的信来了。是同样的航空挂号信。他拆信时，心战抖得厉害。但是他读完信，脸却沉下来了。一张邮局汇票，一张信笺。信笺上只有寥寥几行字：银行开幕在即，她忙，没有功夫给母亲写长信，请原谅。家用款由邮局飞汇。希望他千万到医院去看病。

“她信里怎样说？”母亲问道，她看见了他的表情。

“她很好，很忙，”他短短地答道。他把汇票和信封递给他母亲：“这

个交给你罢。”

母亲接了过来。她皱了皱眉，一句话也不说。

“妈，以后衣服给洗衣大娘去洗罢。今天说定了啊，”他说。“你也不必太省俭了，横顺树生按月寄钱来。”

“不过这万把块钱也不经用啊，”母亲说。

“妈，你忘了她留下的那笔安家费，”他提醒她道。

“我们不是已经动用了一点吗？剩下的恐怕还不够缴小宣的学食费。上次是两万几。这学期说不定要五万多。”她看见他不答话，停了片刻又接下去说：“其实我倒想让他换个学校。我们穷家子弟何必读贵族学堂？进国立中学可以省许多钱。”

“这是他母亲的意思，我看还是让他读下去罢。他上次考了个备取，他母亲费了大力辗转托人讲情，他才能够进去，”他不以为然地说。他想：我不能违背她的意思。

“那么你写信去提醒她，说学费还不够，要她早点想办法，”她说。

“好，”他应了一声。他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在信里写上那种话。

“我想还是叫小宣回家来住罢，他回来也多一个人跟你作伴，”母亲换了话题说。

他想了想，才说，“他既然来信说，假期内到学堂附近同学家去住，温习功课方便，就让他去罢，何必叫他回来？”

“我看你也实在太寂寞了，他回来，家里也多点热气，”母亲说。

“不过我怕他会染到我的病。他最好跟我隔开，他年纪太轻，容易传染到病，”他用低沉的声音说。

“好罢，就依你，”母亲简短地说；她心里难过，脸上却装出平静的样子。她走开了。刚走到右面窗前，她又转回到他的身边。她慈爱地望着他：“你宽心点，不要太想你的病。你究竟还年轻，不要总苦你自己。”

他略略仰起头看母亲，然后点头说：“我知道，你放心。”

“这种生活，我过得了。我是个不中用的老太婆了。对你，实在太残酷，你不该过这种日子。”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抑制不住感情的奔腾，便说了以上的话。

“妈，不要紧，我想我们总可以拖下去，拖到抗战胜利的一天你就好了，”他反而用话去安慰母亲，他说“你”，不用“我们”，只因为他害怕，不，他相信，自己多半拖不到那一天。

“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看起来也很渺茫，”母亲感慨地说；“我今天碰到二楼一位先生，他说今年就会胜利。固然今年才开头，还有十二个月，不过我们拿什么来胜利，我实在不明白！”

“你老人家也想得太多了，现在横顺日本人打不过来，我们能够拖下去，大家就满意了，”他苦笑说。

“是啊，就是这样。前些时日本人要打到贵阳来了，大家慌张得不得了。现在日本人退了，又没有事了，那班有钱人还是有吃有穿，做官的，做大生意的还是照样神气。不说别人，就说她那位陈主任，陈经理罢……”母亲又说。

“他们也是在拖啊，”他苦笑地说。

“那么拖到胜利一定还是他们享福，”母亲不平地说。

“当然罗，这还用得着说，”他痛苦地答道。

母亲不再说话，她默默地望着他。他也常常掉过眼光看她。两个人都有一种把话说尽了似的感觉。屋子显得特别大（其实这是一个不怎么大的房间），特别冷（虽然有阳光射进来，阳光却是多么地微弱）。时间好象停滞了似的。两个人没精打采地坐着：他坐在藤椅上，背向着书桌，两只手插在袖筒里，头渐渐地变重，身子渐渐地往下沉；母亲一只手支着脸颊，肘拐压在方桌上，她觉得无聊地常常眨眼睛。一只大老鼠悠然自得地在他们的前面跑来跑去，他们也不想把它赶走。

房间里渐渐地阴暗，他们的心境也似乎变得更阴暗了。他们觉得寒气从鞋底沿着腿慢慢地爬了上来。

“我去煮饭，”母亲说，懒洋洋地站起来。

“还早，等一会儿罢，”他哀求般地说。

母亲又默默地坐下，想不出什么话来说。过了一阵，房间快黑尽了。她又站起来：“现在不早了，我去煮饭。”

他也站起来。“我去给你帮忙，”他说。

“你不要动，我一个人做得过来，”她阻止道。

“动一动也好一点，一个人坐着更难过，”他说，便跟着母亲一起出去了。

他们弄好一顿简单的晚饭，单调地吃着。两个人都吃得不多。吃过饭，收拾了碗筷以后，两个人又坐在原处，没有活气地谈几句话，于是又有了说尽了话似的感觉。看看表（母亲的表），七点钟，似乎很早。他们挨着时刻，终于挨到了八点半，母亲回到自己的小屋，他上床睡觉。

这不是他某一天的生活，整个冬天他都是这样地过日子。不同的是有时停电，他们睡得更早；有时母亲在灯下补衣服；有时母亲对他讲一两段已经讲过几十遍的老故事；有时小宣回家住一夜，给屋子添一点热气（那个不爱讲话、不爱笑的“小书呆子”又能够添多少热气呢！）；有时他身体较好；有时他精神很坏。

“我除了吃，睡，病，还能够做什么？”他常常这样地问自己。永远得不到一个回答。他带着绝望的苦笑撇开了这个问题。有一次他似乎得到回答了，那个可怕的字（死）使他的脊梁上起了寒栗，使他浑身发抖，使他仿佛看见自己肉体腐烂，蛆虫爬满全身。这以后，他好些天不敢胡思乱想。

母亲不能够安慰他，这是他的一个秘密。妻更不能给他安慰，虽然她照常写短信来（一个星期至少一封）。她永远是那样地忙，她没有一个时刻不为他的身体耽心，她每封信都问候他的母亲，可是她并不曾照他的要求直接给母亲写一封信。从这一件事，从她的“忙”，从来信的“短”，他感觉到她跟他离得更远了。他从不对母亲说起妻的什么，可是他常常暗暗地计算他跟妻中间相距的路程。

二十五

寒冷的冬天象梦魇似地终于过去了。春天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浓雾被春风吹散了。人们带笑地谈论战争的消息。

但是汪文宣的生活里并没有什么变化。他的身体仍旧是时好时坏。好时偶尔去外面走走，坏时整天躺在床上。母亲照常煮饭，打扫屋子，他生病时还给他煎药。小宣两个星期进城一次，住一个晚上，谈一两段学校的故事，

话不多，这个孩子更难得有笑容。小宣回来时，屋子里听不见笑声，可是这个孩子一走，屋子更显得荒凉了。妻照常来信，寄款，款子一月一汇，信一星期一封，她从没有写过三张信笺，虽然字里行间也有无限深情。她始终很忙。但是他永远有耐心，他每星期寄一封长信去，常常编造一些谎话，他不愿意让她知道他的实际生活情况。写信成了他唯一的消遣，也可以说是他唯一的工作。

春天里日子变得更长，度日更成为一件苦事。他觉得自己快要丧失说话的能力了。他某一次受凉失去嗓音以后，就一直用沙哑的声音讲话。母亲更现老态，她的话也愈来愈少。常常母子两个人在房中对坐，没有一点声音。有时他一天说不上三十句整句的话。

时光象一个带病的老车夫拖着他们慢慢地往前走，是那样地慢，他有时甚至觉得车子已经停住了。

但是他仍然活着，仍然有感情，仍然有思想。他的左胸时常痛。他夜间常常出冷汗，他常常干咳。偶尔他也暗暗地吐一两口血——那只是痰里带血。痛苦继续着，并且不断地增加，欢乐的笑声却已成了远去了的渺茫的梦。

他没有呻吟，也没有抱怨。他默默地送走一天灰色的日子，又默默地迎接一天更灰色的日子。他的话更少，因为他害怕听见自己的沙哑声音。有时气闷得没有办法，他只好长叹，但是他不愿意让母亲听到他的叹声，他总是背着人叹息。

日子愈来愈长，也愈难挨。一个念头折磨着他：他的精神力量快要耗尽，他不能再拖下去了。

但是没有人允许他不拖下去。妻还是叮嘱他安心治病、等待她回来。钟老答应设法替他找适当的工作。母亲不断地买药给他吃，她拿回来的有中国的单方，也有西洋的名药。他不知道那些药对他的身体有无益处，他只是顺从地、断断续续地吃着。他这样做，大半是为了敷衍母亲。有一次母亲还拉他到宽仁医院去看病。他想起了妻寄来的介绍信，可是到处都找不着，原来母亲早已把它撕毁了。他又不愿意多花钱挂特别号，只挂普通号，足足等候了三个钟点。母亲已经让步到拉他去医院了，他也只好忍耐地等待他的轮值，不管候诊室里怎样拥挤，天井内怎样冷（那还是春天到来以前的事）。一个留八字胡的医生对他摆出一张冰冻了的面孔，医生吩咐他解开衣服，用听诊器听了听，又各处敲敲，然后皱着眉，摇摇头，又叫他穿好衣服，开一个方，要他去药剂室购了一瓶药水。医生似乎不愿意多讲话，只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医生说照X光最好，不过“透视”费低。他出来在问询处问明了透视费的价目，他吐了吐舌头，默默地走出了医院。后来他又去过一次医院，那个医生仍旧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他计算一下这一个月已经用去了若干钱，又猜想透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不敢再到医院去了。

“要来的终于要来，让它去罢，”他对自己说。他颇想“听命于天”了。事实上除了这里他的心也没有一个安放处。

有一天午饭后他出街散步。天气很好，不过街上仍然多尘土，车辆拥挤不堪，而且秩序坏，在一个路角堆了大堆的垃圾，从那里发散出来一股一股的霉臭。他掩着鼻走过了一条街。无意间侧头一看，他正立在国际咖啡厅的玻璃橱窗。橱窗里陈列着几个生日大蛋糕和好几种美国糖果。一切都和几个月前一样。不同的是他再听不见那一个人的笑声，再看不见那一个婷婷的身影。

他进去了。厅子里客人相当多，刚巧他从前坐过的那张小圆桌空着，他便挤到里面去坐下来。两个茶房忙碌地端着盘子各处奔走。客人们正在竞赛叫唤茶房的声音的高低。他胆怯地坐在角落里，默默地等待着。

一个穿白制服的茶房终于走过来了。“两杯咖啡，”他低声说。

“嗯？”茶房不客气地问。

“两杯咖啡，”他提高声音再说。

茶房不回答，猝然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茶房端了两个杯子走回来，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另一杯放在他对面。“要牛奶吗？”茶房拿起牛奶罐头问道。他摇摇头说：“我不要。”又指着对面那个杯子说：“这杯要。”茶房把牛奶注入杯中，便拿着罐头走开了。他拿起茶匙舀了糖，先放进对面的杯里，又用茶匙在杯里搅了一下，然后才在自己的杯中放糖。

“你喝罢，”他端起杯子对着空座位低声说。在想象中树生就坐在他的对面，她是喜欢喝牛奶咖啡的。他仿佛看见她对他微笑。他高兴地喝了一大口。他微笑了。他睁大眼睛看对面。位子空着，满满的一杯咖啡不曾有人动过。他又喝了一口。他的嘴上还留着刚才的微笑，但是笑容慢慢地在变化，现在是凄凉的微笑了。“你还会记住我吗？”他小声说，他的心颤得厉害。他觉得鼻酸。他连忙掉开脸去看别人。四座都是烟雾，人们在高谈阔论，大抽香烟。没有人注意到他。

“我敢写保票，不到两个月德国就会投降。日本也熬不过一年。说不定我们会在南京过下一个新年！”旁边一张桌上一个穿中山装的大块头眉飞色舞地大声说。

他吃了一惊。他看看说话的人。这个预言给他带来一种奇特的感觉。他没有快乐，他却感到了羡慕和妒忌。他又望了一下空座位和满杯的咖啡，怅惘地叹了一口气，便站起来付了帐走出去了。

回到家，他正碰见母亲捧着一堆湿衣服从房里出来。

“妈，你怎么又自己洗起衣服来了？”他惊问道。

“不要紧，我可以洗，”母亲笑答道。

“其实你不应该省这点钱，你也该少累点，”他说。

“可是洗衣服大娘又涨价了，树生只寄来那么一点钱，不省怎么够用！”母亲略带烦躁地说。“从过年到现在物价不知涨了多少，收入却不见增加。我有什么办法！”

“她这点钱比我做事拿的薪水还要多些，”他想到，可是他不敢对母亲讲出来。他只好默默地进屋，让母亲到晒台上晾衣服去。

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不想坐，不想躺，也不想看书。他只好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为什么她永远是那样忙？为什么她总是写一些短信？她既然关心我，为什么她不让我知道她的生活情形？”他疑惑地、烦躁地想道。

没有回答。他永远找不到回答。

但是有人来打岔了。他听见粗重的脚步声。于是一个邮差推开门进来，大声叫道：“汪文宣收信！盖图章！”

他接过来，很厚的一封信，邮票在信封上贴满了。他一眼就认出来树生的笔迹。

他在一阵欢喜中盖好图章，把邮件回执交给邮差。“谢谢你，”他感激地对邮差说。

长信终于来了，这正是他需要的回答，他感激地接连吻着信封。他低声笑，他反复念着封面的地址。他忘了自己的烦恼，甚至忘了自己的病。

于是他拆开了信，拿出厚厚的一叠信笺来。

“她给我写长信了！她给我写长信了！”他自己带笑地说了好几遍。他摊开了信笺，可是他只看了称呼的“宣”字以后，马上又把信笺折起，拿着它们，兴奋地在屋子里走了几转。

最后，他在藤椅上坐下来。他从容地打开那一叠信笺，开始读着她的来信。

二十六

那一叠信笺上全是她的笔迹，字写得相当工整，调子却跟往常的不同。她不再说她的“忙”和银行的种种事情。她吐露她的内心，倾诉她的痛苦。他的手跟着那些字战抖起来，他屏住气读下去。那些话象一把铁爪在抓他的心。但是他禁不住要想：“她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他已经有一种预感了。她继续吐露她的胸怀：

.....我知道我这种脾气也许会毁掉我自己，会给对我好的人带来痛苦，我也知道在这两三年中间我给你添了不少的烦恼，我也承认这两三年我在你家里没有做到一个好妻子。是的，我承认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不过我并没有背着你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情），有时我也受到良心的责备。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使你明白我的意思.....特别是近一两年，我总觉得，我们在一起不会幸福，我们中间缺少什么联系的东西，你不了解我。常常我发脾气，你对我让步，不用恶声回答，你只用哀求的眼光看我。我就怕看你这种眼光。我就讨厌你这种眼光。你为什么这样软弱！那些时候我多么希望你跟我吵一架，你打我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可是你只会哀求，只会叹气，只会哭。事后我总是后悔，我常常想向你道歉。我对自己说，以后应当对你好一点。可是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再爱你。你从前并不是这种软弱的人！.....

一下叩门声突然打岔了他。一个人在门外大声叫：“汪兄！”

他大吃一惊，连忙把信笺折好往怀里揣。钟老已经走进来了。

“汪兄，你在家，近来好吗？没有出街？”钟老满面笑容地大声说。

“请坐，请坐，”他客气地说，他勉强地笑了笑，他的心还在信笺上。

“近来很忙罢，”他随口说，他一面倒开水敬客。他的举动迟缓，他的眼前还有一张女人的脸，就是树生的脸，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

“不喝茶，不喝茶，刚才喝了来的，”钟老接连点着头，客气地说。

“我们这里只有开水，随使用一杯罢，”他端了一杯开水放在钟老的面前，略带羞惭地说。

“我喝开水，我喝开水，”钟老赔笑说，“喝开水卫生，”便接过来喝了一口，放下杯子，又说：“伯母不在家，近来好罢？”朝四周看了看。

“还好，谢谢你，”他也笑了笑，但是立刻又收起了笑容，他的心还在咚咚地跳，他的思想始终停在那一叠信笺上面。“家母刚刚出去，”他忽然想起了对方的问话，慌忙地加上一句。他没有说出他母亲在晒台上晾衣服。

“我有个好消息来报告你，”钟老略现得意之色说；“公司里的周主任升了官调走了。新来的方主任，不兼代经理。他对我很客气。昨天我跟他谈

起老兄的事，他很同情你，他想请老兄回去，仍旧担任原来的职务，他要我来先同老兄谈谈。那么老兄的工作没有问题了。”

“是，是，”他答道，他只淡淡地笑了笑，他并没有现出欢喜的表情。他的眼睛望着别处，他好象并不在听对方讲话似的。

“那么老兄什么时候去上班？”钟老问道，他的反应使钟老感到惊讶。钟老原以为他会热烈地欢迎他带来的好消息，却想不到他连一点兴奋表示也没有。

“过两天罢。啊，谢谢你关照，”他惊醒般地说，还提高了声音，他刚要做出笑容，却在途中改变了主意，仍旧板起脸孔来。

“你身体怎样？还有什么不舒服吗？”钟老又问，这次带着关心的样子。

“没有什么，我还好，”他吃惊地看了对方一眼，摇摇头回答。心里在想：树生写这封信来有什么用意？难道她真要——他的脸突然发红，脸上的肌肉搐动起来。

“那么你早点来上班罢。日子久了，恐怕又要发生变化。这个机会也很难得，”钟老停了片刻又叮嘱道。

“是的，我过两天一定来，”他短短地答道，又不作声了。钟老诧异地看了他一眼，知道他一定有什么心事，却又不便问他。多讲话也引不起他的兴趣。这个好心的老人再坐一会儿，又讲了几句闲话，觉得没趣，便告辞走了。

他也不留客，便陪着钟老走出房来。到了楼梯口，钟老客气地要他留步，他却坚持着把客人送到大门。

“汪兄，请早点来上班啊，”钟老在大门口跟他分别的时候又叮嘱了一次。

“一定来，”他恭敬地点头答道。他转过身急急走上楼去，在过道里他撞在一个老妈子的身上，那个女人提着一壶开水，开水溅了好几滴到他的脚背上，烫得他叫出声来。

老妈子还破口大骂，他连忙道了歉，忍住痛逃回楼上去了。他的心仍然被束缚在那一叠信笺上，任何别的事情都不能使他关心。甚至钟老的“喜讯”也没有给他带来快乐。

他回到房里，母亲仍然不在。照理她应该晾好衣服回房来了，她不在，正好给他一个安心读信的机会。他在藤椅上坐下，又把妻的信拿出来读着。他还没有开始，心就咚咚地大跳，两只手象发寒战似地抖起来。

他在信笺上找到先前被打断了的地方，从那里继续读下去：

……我说的全是真话。请你相信我。象我们这样地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以后也不会有幸福。我不能说这全是你的错，也不能说我自己就没有错。我们使彼此痛苦，也使你母亲痛苦，她也使你痛苦。我想不出这是为了什么。并且我们也没有方法免除或减轻痛苦。这不是一个人的错。我们谁也怨不得谁。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命。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我跟你和你母亲都不同。你母亲年纪大了，你又体弱多病。我还年轻，我的生命力还很旺盛。我不能跟着你们过刻板似的单调日子，我不能在那种单调的吵架、寂寞的忍受中消磨我的生命。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我不能在你那古庙似的家中枯死。我不会对你说假话：我的确想过，试过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贤妻良母。我知道你至今仍然很爱我。我对你也毫无恶感，我的确愿意尽力使你快乐。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我做不到。我自己其实也费了不少的心血，我拒绝了种种的诱惑。我曾经发愿终身

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跟你一起度过这些贫苦日子。但是我试一次，失败一次。你也不了解我这番苦心。而且你越是对我好（你并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你母亲越是恨我。她似乎把我恨入骨髓。其实我只有可怜她，人到老年，反而尝到贫苦滋味。她虽然自夸学问如何，德行如何，可是到了五十高龄，却还来做一个二等老妈，做饭、洗衣服、打扫房屋，哪一样她做得出色！她把我看作在奴使她的主人，所以她那样恨我，甚至不惜破坏我们的爱情生活与家庭幸福。我至今还记得她骂我为你的“姘头”时那种得意而残忍的表情。

这些都是空话，请恕我在你面前议论你母亲。我并不恨她，她过的生活比我苦过若干倍，我何必恨她。她说得不错，我们没有正式结婚，我只是你的“姘头”。所以现在我正式对你说明，我以后不再做你的“姘头”了，我要离开你。我也许会跟别人结婚，那时我一定要铺张一番，让你母亲看看。……我也许永远不会结婚。离开你，去跟别人结婚，又有什么意思？总之，我不愿意再回到你的家过“姘头”的生活。你还要我写长信向她道歉。你太伤了我的心。纵然我肯写，肯送一个把柄给她，可是她真的能够不恨我吗？你希望我顶着“姘头”的招牌，当一个任她辱骂的奴隶媳妇，好给你换来甜蜜的家庭生活。你真是在做梦！

他痛苦地叫了一声。仿佛在他的耳边敲着大锣。他整个头都震昏了。过了半天他才吐出一口气来。信笺已经散落在地上了，他连忙拾起来，贪婪地读下去。他的额上冒汗，身上也有点湿。

宣，请你原谅我，我不是在跟你赌气，也不是同你开玩笑。我说真话，而且我是经过长时期的考虑的。我们在一起生活，只是互相折磨，互相损害。而且你母亲在一天，我们中间就没有和平与幸福，我们必须分开。分开后我们或许还可以做知己朋友，在一起我们终有一天会变做路人。我知道在你生病的时候离开你，也许使你难过。不过我今年三十五岁了，我不能再让岁月蹉跎。我们女人的时间短得很。我并非自私，我只是想活，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可怜我一辈子就没有痛快地活过。我为什么不该痛快地好好活一次呢？人一生就只能活一次，一旦错过了机会，什么都完了。所以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我要自由。我知道你会原谅我，同情我。

我不向你提出“离婚”，因为据你母亲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结过婚。所以我们分开也用不着什么手续。我不向你讨赡养费，也不向你索要什么字据。我更不要求把小宣带走。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让我继续帮忙你养病。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你的妻子，我不再是汪太太了。你可以另外找一个能够了解你、而且比我更爱你、而且崇拜你母亲、而且脾气好的女人做你的太太。我对你没有好处，我不是一个贤妻良母。这些年来我的确有对不住你、对不住小宣的地方，我不配做你的妻子同他的母亲。我不是一个好女人，这两年我更变得多了。可是我自己也没有办法。离开我，你也许会难过一些时候，但是至多也不会超过一两年，以后你就会忘记我。比我好的女人多得很，我希望填我这个空位的女人会使你母亲满意。你最好让她替你选择，并且叫新人坐花轿行拜堂的大礼。

……

他发出一声呻吟，一只手疯狂似地抓自己的头发。他的左胸痛得厉害，现在好象不单是左胸，他整个胸部都在痛。她为什么要这样凶狠地伤害他？她应该知道每一个字都是一根锋利的针刺，每根针都在渴望他的心血。他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她？她对他的恨竟然是这么深！单是为了自由，她不会用这些针刺对待一个毫无抵抗的人！想到这里，他抬起头呼冤似地长叹了一口气。他想说：为什么一切的灾祸全落到我的头上？为什么单单要惩罚我一个人？

我究竟做过了什么错事？”

没有回答。他找不到一个公正的裁判官。这时候他甚至找不到一个人来分担他的痛苦。他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他在望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

过了一些时候，他忽然想起了未读完的信，才埋下头把眼光放在信笺上继续读着：

（这里还有两行又四分之一的字被涂掉了，他看不出是些什么字。）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了这许多话。我的本意其实就只是：我不愿意再看见你母亲；而且我要自由。宣，请你原谅我。你看，我的确改变得多了。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生活，我一个女人，我又没有害过人，做过坏事，我有什么办法呢？不要跟我谈过去那些理想，我们已经没有资格谈教育，谈理想了。宣，不要难过，你让我走罢，你好好地放我走罢。忘记我，不要再想我。我配不上你。但我并不是一个坏女人。我的错处只有一个：我追求自由与幸福。

小宣那里我不想去信，请你替我向他解释。我自己说不明白，而且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要失去做他母亲的权利。不过我希望你们不要误会，我并不是为了要同别人结婚才离开你，虽然已经有人向我求婚，我至今还没有答应，而且也不想答应。但是你也了解我的处境，一个女人也不免有软弱的时候。我实在为我自己害怕。我有我的弱点，我又找不到一个知己朋友给我帮忙。宣，亲爱的宣，我知道你很爱我。那么请你放我走，给我自由，不要叫我再担‘妻’的虚名，免得这种矛盾的感情生活，免得你母亲的仇恨把我逼上身败名裂的绝路……

请原谅我，不要把我看作一个坏女人。在你母亲面前也请你替我说几句好话。我现在不是她的“姘头”媳妇了。她用不着再花费精神来恨我。望你千万保重身体，安心养病。行里的安家费仍旧按月寄上。不要使小宣学业中断。并且请你允许我做你的知己朋友，继续同你通信。祝你健康。

倘使可能，盼早日给我回音，就是几个字也好。

树生×月××日

信完了，他也完了。他颓然倒在椅背上。他闭着眼睛，死去似地过了好一会儿。他忽然被母亲唤醒了。他吃惊地把胸部一挺，手一松，那一叠信笺又落在地上。

“妈，你晾衣服，怎么这样久才回来？”他问道。

“我出去了。宣，你怎么不到床上去睡？”母亲说。她看见落在地上的信笺，便问道：“哪个写来的信？”她走去想拾起信笺。

“妈，等我来。”他连忙俯下身子去捡信，一面解释似地加上一句：“树生的信。”

“写得这样长，她说些什么？”母亲再问。

“她没有说什么，”他慌张地回答，立刻把信揣在怀里，他明明是在掩饰。母亲想，一定是媳妇在对丈夫说她的坏话。她忍不住又说：

“她一定在讲我的坏话。我不怕，让她讲好了。”

“妈，她并没有讲你，她在讲别的事，讲——她那边的生活，陈经理对她……”他大声替写信人辩护道，可是他说到一半，他的声音哑了，他只得中途闭了嘴。

母亲注意到这个情形，不再谈论那封信了。她想起另一件事，便换过话题说：

“刚才我碰到钟先生，他说已经跟你讲过，你的事情已经弄好了，你可

以回公司去做事。不过我说，如果新来的主任容易说话，最好让你休息两个月再去上班，只要他肯帮忙先讲好，就不会有问题。”

“我想，明天就去，”他说，脸上没有丝毫欣喜的表情。

“何必这样急，等钟先生来回话以后再去也不迟，”母亲说。

“钟老要我早点去，他说日子久了恐怕会发生变化，”他竭力装出淡漠的声调说。可是他自己觉得有许多小虫在吃他的肺，吃他的心。

“明天就去，未免太急了。或者你后天先去看看情形。明天不要去，明天我做几样好菜请你吃，我想把张伯情也请来。他给你看了好多次病，我们也没有多少钱酬劳他，”母亲装出高兴的样子说。

他想了想，又看了看母亲的脸色。他痛苦地说：“妈，你又当了、卖了什么东西？你为了我把你那一点点值钱的东西全弄光了！”

“不要紧，你不要管，”母亲答道，她的笑更显得不自然了。

“不过你不想一想，万一我死了，你怎么办？你拿什么来过日子？”他争吵似地指着母亲说。

“你不要耽心，我会死在你前头的。而且还有小宣，他一定长大成人了。又还有树生，她究竟是你的妻子，我的媳妇啊，”母亲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微笑道，可是他的心却象被铁爪捏紧了一样。

“妈，你怎么能靠他们！小宣太小，树生——”下面的话已经滑到了他的嘴边，他连忙收住。但是感情的流露却是收不住的。泪水迸出他的眼眶来了。他猝然站起来，什么话也不说，就走出房去。

他听见母亲在房里唤他，他并不答应，却迈着大步急急走下了楼。但是到了大门口，他又迟疑起来。对着这一条街的灰尘，他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他站在门前人行道上，他的脚好象生了根似的，他朝东看看，又朝西看看。他的眼前尽是一些漠不相关的陌生人影。在这茫茫天地间只有他一个渺小病弱的人找不到一个立足安身的地方！他寂寞，他自己也说不出是怎样深的寂寞。脸上的泪痕还不曾干去。心里似乎空无一物。

旁边布店里柜台上堆着各式各样的布，生意似乎还好，三个少妇模样的时髦女子（并不太时髦）有说有笑地在挑选花布。另一边一家新开的小食店门前立着两块花花绿绿的广告牌，牌上有一个年轻女侍对着行人微笑。

“他们都比我快乐，”他想到，但是这所谓“他们”，究竟是谁，连他自己也没有想过。可是他觉得胸部仍旧一阵一阵地在痛。他不知不觉地把手按在胸上。

“宣，宣，”他听见母亲的声音又在后面叫唤。他茫然转过头去。母亲走得气咻咻的，刚走到他的身边，便问：“你到哪里去？”

“我走走，”他做出淡漠的样子回答。

“我看你脸色不好，你还是改天上街罢。横顺你没有什么事，”母亲劝道。

他不作声。母亲又说：“你还是回屋去罢。”

他想了想，其实他并没有用脑筋，他不过愣了一下，接着就说：“不，妈，你让我走走。”他又低声加上一句：“我心里烦。”

母亲叹了一口气，用疑虑的眼光看了看他，她低声嘱咐道：“那么你快点回来，不要走远啊。”

“是，”他答应着就撇下母亲拔步走了。母亲却立在门前，望着他的背影慢慢地消失。

他毫无目的地走着。他不是“疾走”，也不是“散步”。他怀着一个模糊的渴望，想找一个使他忘记一切的地方，或者干脆就毁灭自己。痛苦的担子太重了，他的肩头挑不起。他受不了零碎的宰割和没有终止的煎熬。他宁愿来一个痛痛快快的了结。

人碰到他的头，人力车撞痛他的腿。他的脚在不平的人行道上被石子砖块弄伤了，他几次差一点跌倒在街上。他的眼睛也似乎看不见颜色和亮光，他的眼前只有一片灰暗。他的世界里就只有一片灰暗。

他的脚在一个小店的门前停住。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走了进去，在一根板凳上坐下。这家冷酒馆于他并不陌生，连那张方桌旁边的座位也是他坐过的。

堂倌走过来问一句：“一杯红糟？”

“快！快！”他惊醒似地大声说，其实他也没有想到这是什么意思。

堂倌端上酒来。他糊里糊涂地喝了一大口。一股热气直往喉管冒，他受不住，立刻打了一个嗝。他放下酒杯，又从怀里摸出树生的信来，先放在桌上，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酒。他又打一个嗝。他赌气不喝酒了。他拿起信笺，随意地翻着，低声念了几句。他心里很不好过。眼泪又流出来了。他想不再看信。可是他刚刚把信笺折好，忍不住又打开来，重新翻看，又低声念出几句。他心里更难过，眼泪成股地流下来。他下了决心地端起酒杯大口喝着。他感觉到一股热流灌进肚子里去。他的喉管里，他的胃里都不舒服。他的整个头发烧，思想停滞，记忆也渐渐地模糊。只有信笺上的字句象一根鞭子在他的逐渐麻木的情感上面不停地抽着。

酒馆里白天很清静，除了他，另外还有两个客人对酌谈心。其余的桌子全空着。没有人注意他。堂倌看见他的酒杯空了，便走过来问一句：“再来杯红糟？”

“不！不！”他摇摇头含糊地说；一张脸通红，他才只喝了一两白酒。

堂倌站在旁边用惊奇的眼光看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反复地翻看她的来信。他自己也不知道看了几遍。他不再流泪了。他只是摇头叹息。

“再来杯红糟？”过了一会儿，堂倌看见他不动也不走，又走过来问一句。

“好，好，”他短短地回答。酒送上来，他立刻喝了一大口。他放下杯子，全身发热，头又有点晕。他埋着头，眼光在信笺上，心却不知放在哪里去了。他忽然觉得对面坐了一个人，也低着头在喝酒。他便抬起头睁大眼睛看，什么也没有。“我想到唐柏青了，”他自语道，揉了揉眼睛。他又埋下头去。他恍惚地看到唐柏青在对他苦笑。“怎么我现在也落到他的境地来了？”他痛苦地想。他就象听见警报似地立刻站起来，付了钱便往外面走了。

一路上唐柏青的影子追着他。他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去。

到了家，他才稍稍心安。他一进屋坐下来就给树生写信。母亲同他讲话，他含糊地应着，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他在信上写着：

收到来信，读了好几遍，我除了向你道歉外无话可说。耽误了你的青春，这是我的大不是。现在的补救方法，便是还你自由。你的话无一句不对。一切都照你所说办理。我只求你原谅我。

公司已允许我复职，我明日即去办公，以后请停寄家用款。我们母子二人可以靠我的薪金勉强过活。请你放心。这绝非赌气话，因为我到死还是爱你的。祝幸福！

文宣××日

他一口气写了这些话，并不费力。可是刚刚把信写好，他就觉得所有的力气全用尽了。好象整个楼房全塌了下来，他完了，他的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他绝望地伏在书桌上低声哭起来。

“宣，什么事？什么事？”母亲惊问道。她连忙到他的身边去。

他抬起头来，让她看见他满脸的泪痕，他就象小孩一样哭着说：“你看她的信。”但是他递给她看的却是他写给树生的信，并不是树生寄来的信。

母亲看了那封短信，不用听他解释，便明白了一切。她说：“我原说过，她不会跟你白头偕老的。现在怎样！我早就看透了她的心了。”

她气愤，但是她觉得痛快，得意。她起初还把这看作好消息。她并没有想到她应该同情她的儿子。

二十七

树生的信象投了一个石子在他的生活里，激起一阵水花，搅动了整个水面，然后又平静下去了。但是石子却沉在水底，永远留在那里，无法拿开。她以后还有信来，一个月至少要来三次信。信上话不多，不讲自己的生活情况，只探询他同小宣的健康和近况。她仍旧按月汇款。他母亲要他把款子退回去，他没有照办。他收下款子，不用，也不退回，他把汇款领来全部存入银行，而且依照她的意见，存“比期”。他写回信时也提过请她不要再汇款的话。可是她好象没有见到他的信似的，下次照常汇寄。他要她叙述她的近况，她却一字不提，偶尔提到，也仅有“忙”和“好”两个字。他只有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愿写一个字或者做一件事伤她的心。

他有了工作和收入。他接到她的长信以后隔了一天，便到公司去上班了。新来的方主任是一个不太严厉的中年人，对他相当客气，甚至向他说了一番安慰的话。同事们（除了钟老）虽然没有什么欢迎的表示，不过全对他点头打招呼。他心里高兴，因此对那些古怪的译文或者官场公式文章也就不觉得怎么讨厌了。

家中仍旧少有人声。除了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常常是两个星期一次）小宣回来坐坐，吃一两顿饭或者住一个晚上外，就只有他和母亲两个人，有时甚至只有他们中的一个在家。

日子仍旧单调地一天一天过去，无所谓快，也无所谓慢。他只有一种类似“捱”和“拖”的感觉。他没有娱乐，也没有消遣，他连写信和谈话的快乐也得不到。春天并没有给他带来喜悦。但是春天也终于捱过去了。

夏天里他更憔悴了。他的身体从来不曾好过，他的病一直在加重。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持他使他不倒下去。他每天下午发热，晚上出冷汗，多走路就气喘，又不断地干咳，偶尔吐一口带血痰。左胸有时痛得相当厉害，连右胸也扯起痛了。他起初咬着牙在挣扎，后来也渐渐习惯了。捱日子在他说来并不是一件难事。反正他的生活就只是一片暗灰色。他对一切都断念了。他再不敢有什么妄想。甚至德国投降也不曾带给他快乐和安慰。他听见人说日本在一年内就要崩溃，他也笑不出声来。那些光明、美丽的希望似乎都跟他断绝了关系。他觉得自己就象一个衰老的车夫，吃力地推着一辆载重的车子，一步一步地往前面走，他早已不去想什么时候能达到目的地，卸下这一车重载；他也不再计算已经走了若干路程，他只是一步一步缓慢地

走着，推着，一直到他力竭的时候。

一天晚饭后母亲忽然望着他说：“宣，你这两天没有什么不舒服罢？怎么你脸色这样难看？”

“我还好，没有什么不舒服，”他装出高兴的样子说。可是他的喉咙不肯帮忙他掩饰，他接连干咳几声。他连忙用手掩嘴。他害怕又象白天那样咳出血痰来。白天在办公时间里他咳了一口血痰在校样上面，虽然他已经小心地揩去了血迹，但是纸上的红点还隐约看得见。

“不过你得当心啊，你又在咳嗽。我看你的咳嗽就一直没有好过，”母亲皱着眉说。

“不，也好过一阵子，不过总不能断根。人一累，就要发，”他解释地说。他自己也知道这不是真话，但是他愿意这样说，他不仅想骗过母亲，同时也想骗他自己。

母亲沉默半天，才叹了一口气说：“其实你不应该去做事，不过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他心里很不好过，答不出话来。他越是想不要咳，越是咳得厉害，一咳就不可收拾，脸挣得通红，泪水也咳出来了。急得他的母亲在屋子里乱跑，又拿开水，又替他捶背。他终于缓过气来。他从母亲的手里接过脸帕揩了脸。

“不要紧了，”他吃力地说，用感激的眼光望着母亲。

“你躺躺罢，”母亲怜惜地说。

“不要紧，等我多坐一会儿，”他沙声答道。

“宣，明天我就去公司替你请一两个月的假。你应该休息。你不要愁生活。实在没有办法，我出去当老妈子，”母亲下了决心似地说。

他摇摇头，有气无力地说：“妈，你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怎么吃得消！这种办法有什么用？受苦的并不止我们一两个，我们不拖也只好拖……”

“这样我宁肯不活，”母亲愤愤地说。

“这个年头死也死不下去啊，”他说了一句，又感觉到胸部的隐痛。病菌在吃他的肺。他没有一点抵抗的力量。他会死的，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很快地就会死去。

母亲呆呆地望着他，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他想到这天在公司里听见的同事们关于肺病的闲谈。那是在吃饭的时候，小潘卖弄似地叙述一个亲戚害肺病死去的情形。“只有害肺病的人死的时候最惨，最痛苦。我要是得那种病到了第二期，我一定自杀，”小潘说，眼光射到他的脸上，话一定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听说有一种特效药，是进口货，贵得吓人，”钟老接嘴说。“不过并不灵验，而且这种病单靠吃药也不行啊，”小潘得意地说。

“最惨，最痛苦，”他想着，就再也不能把那个念头驱逐开去。绝望和恐怖从远处逼近。他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噤（虽然已经是夏天，他还感到冷。他真有一种整个身子落进冰窖里去的感觉）。

“为什么就没有一种人人都买得起的、真正灵验的特效药？难道我就应该那样悲惨、痛苦地死去？”

他绝望地暗暗问自己。

“宣，你早点睡罢，不要再想什么事情，请假的话明早晨再说，”母亲看见他精神不好，脸色黄得可怕，眼光停滞而带恐惧，她暗暗地充满了焦虑，不敢再跟他讲话，便温和地劝他道。

他吃了一惊。他好象从一个可怖的梦中醒过来一样。可是他看看四周，屋子里白日光线才开始消去，楼下人声嘈杂，打锣鼓唱戏，骂街吵架，种种奇特的声音打成了一片。他觉得口干，便走去拿茶壶，倒了杯微温的白开水来喝。“好的，我就睡，”他带着苦笑地说；“妈，你也睡罢。我看你也很寂寞。”

“我倒也过惯了。我横顺是个快进坟墓的人，我不怕寂寞，”母亲微微叹息道。

母亲进了小屋，关上门。他上了床，左胸又在痛，不单是左胸，好象全身都痛。他的脑子十分清醒。他睡不着。街中的锣鼓声和唱戏声仍然没有停止。不知是哪一家请端公（巫师）做法事，那个扮旦角的正唱得起劲。他不要听那些戏词，可是它们却不客气地闯进他的耳里来，搅乱了他的思想。他在床上翻来复去，越睡越睡不着，越着急，急出了一身大汗。他又不把那床薄被掀开。他害怕受凉，也不愿意随意损伤自己的健康，虽然他先前还在想他的内部快要被病菌吃光，他已经逼近死亡。

母亲的房里还有灯光，她不曾睡，她偶尔发出一两声咳嗽。她在做什么？她为什么整年不歇地工作？她换到了什么呢？她的生存似乎完全是为着他，为着小宣。但是他拿什么来报答她呢？他想着，他接连抓自己的头发。

然后又是树生，她的美丽的脸在对他微笑。她嘲笑他，还是怜悯他？她前天还来过一封信，以熟朋友关心的口气问起他的健康和一家的生活情况。她又附寄了汇票来。自然他仍旧把款子存入银行。他写了回信，却始终没有告诉她他并未动用她寄来的款子。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她已经跟他脱离了夫妻关系，这还是依照她的意见办的。那么她为什么还不忘记他？为什么还要按月寄款、通信？他越想越不明白。可是一种渴望被这个思想引起来了。

他一个垂死的病人却有着一个健康人的渴望，这个渴望折磨得他很苦，因为连他自己也明白他的渴望是不会得到满足的，一丝一毫的满足也得不到。但是他又不能抑制它，消灭它。他在挣扎，湿透了的汗衣冷冰冰地贴在他的发热的背上。

“我要活，我要活，”他控制不住自己地叫了出来，声音不高，他的嗓子开始哑了。

没有人听见他的叫声，更没有人理睬他。在窗外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那么多人来来去去，巷口新近摆起来的面摊上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么师大声叫唤，顾客们高谈阔论。他也听到“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然而那是一个年轻的声音，而且有几个清脆的女性的尖声在叫“买开水！”或者“炒米糖开水，这儿！”现在连卖“炒米糖开水”的也换了人，而且也正忙着。只有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哪怕他已经接近死亡，也没有人来照顾他。

“我要活，”他还在叫，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他究竟在向谁呼吁呢？他说不出。

二十八

他渐渐地失去了他的声音。他的体力也在逐渐消失。

他每天下班回家，走进门总要喘气，并且要在藤椅上象死人似地坐了好一阵才能够走动、讲话。

“宣，你就请几天假罢，再这样你又要病倒了，”母亲怜惜地劝道。她

也知道他的病逐渐在加重。但是她有什么办法救他呢？张伯情没有用，医院也没有用。而且他们母子两个就只有空空的两双手啊。

“不要紧，我还可以支持下去，”他装出淡漠的声音答道，他的心却好象让一大把针戳了一下似的。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在公司里一面看校样一面咳嗽、看多了就要喘气的情形。他还记得吃饭时同事们厌恶的眼光。他还可以支持多久呢？他不敢想，他又不能叫自己不想。可是他不愿意别人对他提起这件事情。

母亲默默地望着他。她悲痛地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啊？“不过你总该小心保养身体，”她忍不住又说了一句。她看见他微微地摇头，脸上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她忽然想起来：是我害了他，累了他。她想哭，却极力忍住。“不，是那个女人害他的，”她反抗地想，她竖起眉毛来。

窗下马路上传来哭声和鞭炮声。一个女人哭得很伤心。

“哪个在哭？”他忽然用惊惧的声调问道。

“对面裁缝店里死了人，害霍乱，昨天还是好好的，才一天的功夫就死了，”母亲解释道。

“这样倒也痛快，何必哭，”他想了想，自语道。

“你这两天在外面要当心啊，我知道你不会吃生冷，不过你身体差，总以小心为是，”母亲关切地嘱咐。

“我知道，”他顺口答道。可是他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人死了是不是还有灵魂存在，是不是还认识生前的亲人？

对这个疑问谁能够给他一个确定的答复呢？他知道这是一个永远得不到回答的问题。以前有人拿这个问题问过他，他还晒笑过那个人。现在他自己有了同样的疑问了！母亲，树生，还有小宣，是不是他们必须全跟他永别？

他不觉又把眼光射在母亲的脸上。多么慈祥的脸。他柔声唤道：“妈。”

“嗯？”母亲也掉过眼光来看他。她看见他不说话便问道：“什么事？”

“我看看你，”他亲热地说。他勉强笑了笑。接着他又说：“小宣后天要回家了，这两个星期里面不晓得他是不是又瘦了？”

“他的体质跟你差不多。他的脸色也不大好看。补药又太贵，不然买点给他吃也好，”母亲说。她注意地看他。她忽然把脸掉开，立刻有两颗眼泪挂在她的眼角。

小宣的回来给这个寂寞的人家添了些温暖，至少也多了一个人讲话。做祖母的关心地询问孙儿半个月中的生活情况，功课、饮食等等全问到了。小宣答得简单，这是一个不喜欢开口的孩子。不过祖母的问话必须得到回答，连寡言的人也得讲一些话。

“你爹这两天常常挂念你，他很想见你。等一阵他回来看见你一定很高兴，”祖母对孙儿说。

“是，”小宣答得这么短，也没有笑。“这孩子怎么变得更老成了！”祖母奇怪地想。她便关心地问：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小宣仍旧短短地回答，后来皱着眉头添了一句：“功课总是赶不上。”

“赶不上，也不必着急，慢慢来，横顺你年纪轻得很，”她温和地安慰道。

“不过先生逼得很紧，我害怕不及格留级，对不起家里，”小宣诉苦般

地说。

“你这样小，还管什么留级不留级！你身体要紧啊，不要又弄到你父亲那个样子，”祖母痛惜地说。

他，做父亲的他推开门进来了。口里喘着气，脸色灰白，象一张涂满尘垢的糊窗的皮纸。他一直走到书桌前，跌倒似地坐在藤椅上，藤椅摇动几下，它的一只脚已经向外偏斜了。他不说话，紧紧地闭着眼睛，动也不动一下。

祖母向孙儿丢了一个眼色，叫这个孩子不要惊扰刚刚回家来的父亲。她带着恐惧的表情望着他。

过了一会，他忽然睁开眼叫了一声：“妈，”声音差不多全哑了。他转动眼珠去找寻她。

她走过去，温柔地问他：“宣，什么事？”

他伸起一只战抖的手去拉她的手。他的手抓到了她的手便紧紧捏住不放。“小宣呢？”他拖长声音说，又用眼光去找寻他的儿子。小宣本来站在他的右边，不过稍稍向后一点，可是他的眼光一直在他的前面移来移去，没有能把小宣找到。

“你快过来！快来，你爹叫你！”她还以为他已经到了垂危的地步，他在向家人告别，她的声音抖得厉害，她的心抖得更厉害，她用了类似惨叫的声音对小宣说。小宣立刻走到父亲的膝前去。

他用另一只手抓住儿子的手。他注意地看了这个孩子一眼。“你好罢？”他说，他似乎想笑，但是并没有笑，却把眼睛闭上了。两只手仍然紧紧捏住他母亲和他儿子的手。

他母亲流着眼泪，孩子望着他发愣，他们都以为惨痛的事故就要发生了。“完了，”他母亲这样想，眼前开始发黑。唯一的希望是手始终不冷。

“宣，”他的母亲忍不住悲声唤他。他的儿子也跟着悲声叫“爹”。

他睁开眼，勉强笑了笑，他的身子动了。“不要怕，我还不会死，”他说。

他的母亲吐了一口气，紧张的心略微松弛。她忍住泪低声问：“你心里难过？”

他摇摇头，说：“没有什么。”

小宣一直不转睛地望着他。母亲柔声说：“那么你睡下罢。我去给你请医生。”

他松开两只手，摇动一下身子。他用力说：“不要去。妈，我不是病。”

“宣，你不要固执，你怎么能说不是病？”母亲说：“有病不必怕，只要早点医治。”

他又摇头说：“我不害怕。”他伸手在怀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张弄皱了的信笺来，也不说明这是什么，就递到母亲的手里去。

母亲摊开信笺，低声读出下面的话：

文宣先生：

同人皆系靠薪金生活之小职员，平日营养不良，工作过度，身体虚弱，疾病丛生。对先生一类肺病患者，素表同情，未敢歧视。但先生肺病已到第三期，理应告假疗养；纵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按时上班，也当洁身自爱，不与人同桌进食，同杯用茶，以免传布病菌，贻害他人。兹为顾全同人福利起见，请先生退出伙食团，回家用膳。并请即日实行。否则同人当以非常手段对付，勿谓言之不预也。（后面还有六个人的签名和日期）

“他们当面交给你的？”母亲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叫工友送来的。小潘起的稿，同桌七个人就只钟老没有签名，”他答道。停了一下他又说：“话自然也有道理，不过措辞不应该这样，有话可以好说，我也是一个人啊……”他吐不出声音来了，就索性闭了口。

“真岂有此理！连信也写不通的人，居然这样神气！大家同事一两年，难道连一点感情也没有！”母亲气得脸通红，过了半天才颤巍巍地讲出这几句话来，她几下就把信撕得粉碎。

“我说爹不必理他们，看他们怎样对付你！”小宣也居然变了脸色，气愤地说。

“大家都是同事，为什么你不能在公司吃饭？要说害肺病就那么容易传染，怎么这里的人又未见死绝？哪个心虚，才害怕！”母亲的怒气不能平下去，她继续骂着。

他摇摇头，很吃力地吐出一句哑声的话：“其实这还是怪我生了不治的病。”他母亲和他儿子都带着惊疑的表情望着他。过了片刻，他又说：“不能怪他们。他们也怕生这种病。真的，他们染到了这种病又怎么办？……”

母亲气得朝地上吐痰。她打断了他的话：“你这个人真没有办法。自己到了这个地步，还去管他们做什么？要是我，我就叫他们都染到这个病。要苦，大家一齐苦。不让有一个人幸灾乐祸。”

“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他苦笑地说。他的沙哑声使人想到他的喉咙开始在溃烂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自语道：“我吃杯茶。”

母亲连忙扶着他，一面吩咐小宣：“你去给你爹倒杯茶来。”

小宣答应着，很快地就把杯子端了来，里面还在冒热气。他接过杯子看了一眼，愁苦地说了两个字：“开水”，然后拿起来咕嘟咕嘟地喝光了。他把杯子交还给小宣，一面小心嘱咐：“小宣，你记住好好用开水把这个杯子洗干净。”他费了大力才把这句话对小宣讲清楚。

“用不着那样洗。我不怕传染。难道我们自己家里人还要写信逼你吗？”母亲痛苦地悲声说。

他看看母亲，又看看小宣，然后说：“不过小宣究竟很年轻啊。”接着他又加一句：“我们汪家就只有他一个男丁……”他慢慢地朝着床走去。“我躺一会儿，”他到了床前，低声自语道；于是他跌下似地倒在床上了。

第二天他照常上班。他那件平价布的长衫前后有几块灰白色印迹。他又流汗、又喘气地上了楼，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来，打开抽屉，拿出了昨天未看完的校样。

他还不曾开始工作，就觉得精神支持不住。汗不停地出。脑子空空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只得咬紧牙关，定下心来，强迫着自己开始办公。

面前摊开的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大著的校样。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着。作者大言不惭地说中国近年来怎样在进步，在改革，怎样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进到成为四强之一的现代国家；人民的生活又怎样在改善，人民的权利又怎样在提高；国民政府又如何顾念到民间的疾苦，人民又如何感激而踊跃地服役，纳税，完粮……“谎话！谎话！”他不断地在心里说，但是他不得不小心地看下去，改正错植的字，拔去一些“钉子”。

这个工作已经是他的体力所不能负担的了。但是他必须咬紧牙关支持着，慢慢地做下去。他随时都有倒在地上的可能。可是他始终用左手托着腮在工作。他常常咳嗽。不过他已经用不着耽心他的咳嗽会惊扰同事们了。他

已经咳不出声音来了。自然他会咳出痰来，痰里也带点血。他把痰吐在废纸上，揉成一团，全丢在字纸篓中去。有一次他不小心溅了一点血在校样上，他用一片废纸拭去血迹，他轻轻地揩了一下，不敢用力，害怕弄破纸质不好的校样。他拿开废纸，在那段歌颂人民生活如何改善的字句中间还留着他的血的颜色。“为了你这些谎话，我的血快要流尽了！”他愤怒地想，他几乎要撕碎那张校样，但是他不敢。他凝视着淡淡的血迹，叹了一口气。他终于把这张校样看完翻过去了。

忽然楼下人声嘈杂，好象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有人跑下楼去。接着楼上起了小小的骚动，人们大声在谈论一件事。他却退缩在自己的座位上，眼光定在校样上，整个脑子里响着蟋蟀的叫声。他连动也没有动一下。忽然他听见“钟老”两个字，人们不止一次地讲着“钟老”。他吃惊地抬头看。主任带着严肃的表情在同科长讲话。

“钟老什么事？”他想到，他要站起来，但是他鼓不起勇气。他仍旧坐着不动，象生根在椅子上一样。

接着主任和科长也下楼去了。他用探询的眼光送他们下楼。不久科长一个人走上楼来。楼下的闹声早已消失了。

“走了。一定是霍乱。幸好借到汽车送去，有二三十里路啊，”他听见科长对人说。

“有人陪去罢？”

“小潘去，他原车回来。等会儿再派个工友去看看他，”科长说。

“小潘！”他惊奇地想到。“他现在怎么又不怕传染呢？他单单欺负我。”他觉得胸部一阵剧痛。

开午饭的时候，他没有下去。主任最后下楼，看见他端坐不动，便问道：“你不下去吃饭？”

“我不想吃，”他带窘相地答道。

“你不舒服吗？”

“不，”他连忙站起来摇头说。“他不知道，”他感激地想。

“你打过预防针没有？”

“没有，”他摇头答道。

“你要打才成。钟老已经送进医院去了，一定是霍乱症，”主任关心地嘱咐道。

“是，谢谢你，”他答道。

“你嗓子哑了好几天了，还没有看医生吗？”

“看过，一直在吃药，不过始终不见好，”他低着头回答。

“你要当心啊，”主任皱皱眉头说。“你身体不好，告一两天假也不要紧。”

“是，”他应道。他抬不起头来。

主任下楼去了。他一个人留在楼上。他忽然想：“主任是不是在暗示要我辞职？”他心里很不好过。本来已经病弱的身体似乎又遭受到一个意外的打击，他快要倒下去爬不起来了。他两手托腮，一个人对着校样纳闷。

“不会的，他对我好象还客气，”他忽然自语道。这个念头减少了他的痛苦和疑虑，他的心稍微舒畅一点。

小潘一直没有消息。下班前一个钟点的光景那个年轻人突然回来了。他先在楼下讲话，后来又上楼来，到主任的房里去了。

“去的时候汽车在路上抛锚，差不多耽搁了两个多钟头，”小潘先说。

“钟老的病怎样？不要紧罢？”主任关心地问。

“那个医院是临时改设的。糟透了。一共只有两个医生，四个护士，二十张病床。现在收了三十几个病人。有的就摆在过道上，地板上，连打盐水针也来不及，大小便满地都是，奇臭不堪。病人还是陆续在送来。全城就只有这么一个时疫医院，而且汽车开不到门口，还要用滑竿抬上去。钟老送到医院，医生来看了病，的确是霍乱。又等了一点多钟，才有人来给他打盐水针。医生护士们实在忙不过来，他们也累得很。看情形非派个工友去照料不可……”小潘兴奋地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话。

“医生怎么说？既然是霍乱，打了盐水针，总不会有生命危险了，”主任说。

“医生没有说什么，他只是摇头叹气。他好象在说，他不过是个寻常的医生，现在把全城人的性命交给他们两个人照料，他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小潘说。

“好，这样罢，这里明天放一天假，好好打扫一番，也消消毒，免得再传染人，”主任想了想又说。

同事们继续谈论着钟老的事。只有汪文宣一个人把头埋在校样上，不敢插一句嘴。但是钟老的和善而略带滑稽的面颜一直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有一种如在梦中的感觉。他这一天没有看见钟老，他签到时钟老还不曾来。大概钟老是带病上班的，所以这一天会迟到，而且突然发了病。钟老的病会不会有危险呢？不会的罢，钟老昨天还是那么健康，那么结实，跟他一天天在瘦下去的情形完全不同。那么为什么小潘又说得这样可怕呢？他想着。钟老是在公司里的唯一的友人，钟老又没有在那封信上签名，他不能不想念钟老。

下了班回到家里，他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只叹了两口气，说了两三句同情的话，以后就不再提起钟老的名字了。可是他一晚上都没有睡好。有几只蚊子和苍蝇来搅扰他。老鼠们把他的屋子当作竞走场。窗下街中，人们吵嘴、哭诉、讲笑话、骂街一直闹到夜半。他不断地看见钟老的笑脸、发光的秃顶和发红的鼻子。他一直想着钟老的事。钟老会死？不会死？科学能不能救活那个老人？霍乱对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他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见到“麻脚瘟”的“威力”了。

这个夜晚他时睡时醒，老是觉得有一个可怕的重量压在他的胸膛上。他不断地小声呻吟。他梦到钟老死去，甚至全公司的人都死去。他小声哭叫。他的声音只有他自己听得见，所以没有惊醒母亲。

第二天早晨他起身后只觉得头晕，四肢无力。他母亲关心地问他：“宣，你眼睛怎么这样红？昨晚睡得怎样？”

“不好，不晓得醒过多少回，”他答道。

“那么你今天不要出街罢，既然放一天假，你也落得休息一天，”她说。

“你想去看看钟老是不是好了一点，”他沉吟地说。

“你去医院？”母亲惊问道。

“我到公司去，公司里会有消息的，”他解释道。

“今天放假，怎么还会有消息？”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他看了母亲一眼，也不再说话了。这一天他一直在家里睡觉，他完全照母亲的意思办。可是他心里老是在想钟老的事情。凶呢？吉呢？他几乎要祷告了。留下“他”罢。用科学的力量救活“他”罢！他整天呼吁着。整夜希

望着。

他的心一上一下，始终没有安宁。好不容易挨到另一天天明，捱到上班时。他到了公司，一切如旧，只有钟老的座位空着。上楼就坐后，他摊开前天未看完的校样继续校对下去。不久工友送来一张吴科长的字条，要他为这本他正在校对的“名著”写一篇广告辞。

这张字条等于命令，他不能不服从。他想了想，抽出一张信纸，拿起笔，打算试写一两百字。可是写了一句，他就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字句混杂在一起成了一个整块搁在他的脑子里，他不能够把它们一一分开。他的思路停滞了。他拿着笔，不住地在砚台上蘸墨汁，许久写不出一个字。他的额上满是汗珠，整个脸象火烧似的发烫。没有办法，他拿开信笺，又继续看校样。

忽然他听到一声吴科长的咳嗽。他吃了一惊。吴科长是随意咳出来的，他却以为是对他不满意的表示。他连忙振作精神，又把那张信纸拿过来，放在面前。“没有关系，随便敷衍几句罢，”他想到，就糊里糊涂地写了一百五六十个字。他自己念一遍。“谎话，完全说谎！”他骂自己。可是他却拿起广告辞，走到吴科长的办公桌前，恭敬地把它递到科长的手里。

“不大妥当，恭维的话太少，”吴科长皱皱眉摇摇头说，“象这样的名著非郑重介绍不可。不然某先生看见会不高兴。”

某先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候补中委和政界的忙人，难道连书店的广告辞也会注意吗？他不大相信吴科长的话，就顺口说了一句：

“某先生不见得会注意罢。”

“你哪里知道？他们做大官的对什么事情都注意。某先生是文化界出身的，他非常关心文化，著作的兴趣也不亚于从政，他又是我们公司的常务董事，”吴科老板起脸说。

“是，是，”他埋下头答道。

“你拿回去重写过罢，”吴科长说，把广告辞交还给他。

他唯唯地应着，正要转身走开，又听见吴科长吩咐道：

“还有你校对那本书，要特别小心，不能有一个错字，某先生对于书上的错字平日也很注意。”

他厌恶地应了一声，连头也不抬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他怨愤地对自己说：“好罢，我来大捧一场。”他又拿起笔，费力地在脑子里找寻了些最高的赞颂词句，胡乱地写到纸上去。“你看，我也会撒谎的，”他痛苦地自语道。好在这些无声的语言不怕被别人听见。

他忽然听见小潘的脚步声。小潘气急色败地跑上楼来，进了主任的小房间，喘息地大声说：“方主任，张海云刚刚打电话来说，钟老一早就死了。他连打几个电话，都打不通。”

他眼前一阵黑，耳朵里全是铃子声。他连忙用双手捧住了头。

二十九

他在公司里就只有钟老这么一个朋友。钟老死去以后，他失去了自己跟公司中间的联系。现在可以说公司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了。下班时他仔细地把他的办公桌收拾清楚。下楼出门时，他还在钟老的座位前站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后来走出大门，他又用古怪的眼光看了看门口，他觉得自己快要跟这个地方永别了。

事实上他第二天还来，第三天还来，第四天还来，一直到第六天他还来。

那天下午有几个同事约好到钟老的墓地去。他也参加。他们搭长途汽车去，也搭长途汽车回来。他们被人象装沙丁鱼似的塞在车子里面。他几乎连一个站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不得不把左脚悬在空中。一路上车子颠簸得厉害，车里闷热，空气坏，他心里很不好过，差一点要在车上呕吐了。

钟老就葬在时疫医院附近斜坡上的一块小地方，坟上土已经干了，还没有长草，只放了一个纸花圈，是用红、白、绿三色土花纸扎成的。上款写“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写“一中书局挽”。另外还有一个花圈绑在一个木架子上，高高地立在墓前，上款仍是“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却是“弟方永成敬挽”，这是主任送的，也是纸扎的花圈。来不及立碑，就让这两个没有香味的花圈一立一躺地陪伴着和善的老人。

“公司就这样办丧事，也太简陋了，一共花不了几个钱，”一个同事说。

“这已经不容易了。要是周主任在这儿，恐怕连这样也办不到，”另一个同事说。

“其实想得开一点，人死了，再怎样，也没有意思。还不如生前待得好一点，”第三个同事插嘴说。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公司对我们活着的人也不过如是，何况死人！”第二个说话的人接口说。

没有人跟汪文宣讲话。他们好象都在避开他。他一个人站在一个角里，胆怯地望着他那个朋友的坟头，好象他真害怕他们随时都会把他赶走似的。

泪水使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肺痛，喉痛，现在眼睛又痛。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怎么花圈上写着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他看错了，那里明明是“又安”两个字。不，不是他看错。他想到了另一个同样的纸花圈，白纸条的上款的确写着他的名字。他也会躺在这同样的土堆下面。陪伴他的也只有这同样的荒凉的环境。

同事们都走了，他们回到城里去了。他们临走时并不唤他一声。他一个人立在墓前不时左右观望，他好象不是在拜望一位朋友，他现在来看他的简陋的新居。

天空里黑云愈积愈厚，四周的景色逐渐阴暗，后来连他也觉察出来了。他不能再留下，便匆匆地赶到长途汽车站去。他并没有跑，但是到了车站，他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得没有办法。他只等了半点多钟就被人挤上了车子。在车上站了一点又二三十分钟，才到了他住处的附近。本来汽车只走四十多分钟，这次因为半途遇雨，雨太大，车子在中途停了若干时候。

他回到家就力竭地睡倒下来。从这时起他便没有再去公司了。

他整天躺在床上，发着低热，淌着汗，不停地哮喘。他讲话的时候喉咙呼噜呼噜地响。他的胸部、喉咙都痛得厉害。但是他并不常常发出呻吟。他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让小宣回家。在母亲面前他的话更少了，看见母亲对他流泪时，他常常苦笑。

他完全断了念。可是母亲却不肯放弃这个绝望的战斗。母亲请了西医来给他诊病，西医摇摇头，表示他的病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她只得又向张伯情求助，张伯情曾经带给她一线希望，可是现在连张伯情也觉得没有治愈的把握了。

他的嗓音终于完全失去，现在他说话连自己也听不见了。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形时，他伤心地哭了一场。这所谓哭也不过是眼泪畅流，哭出来他倒

觉得心里较为畅快。母亲看见他在哭，过来问他为了什么。他答不出声，只有张开嘴用手指指着喉咙。她明白了他的痛苦。她沉默半天，才怜爱地说：

“宣，你不要难过。……你是个好人……天应该有眼睛……”她的喉咙暂时也哑了。

“妈，我不难过。你怎么相信起天来了！”他想说却说不出，他只有竭力止了悲，摇摇头，装出了笑容。

“你不要怕，你不会死的，”她说。

“我并不怕，人人都要死；不过留下你一个人受苦，我心里很难过。小宣年纪又太小，……”他用力说，但是母亲只听见一点咻声，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那种挣扎的情形使她又害怕又痛苦。她望着他，一面打断了他的话：

“你不要讲话了，你好好休息罢。”她脸上的肌肉在搐动，眼里装满了泪水。

他长长地叹一声，睁大泪眼，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母亲。

屋子里异常闷热，板壁好象随时会燃烧起来似的。他把盖在身上的一幅平价布床单也揭开了，从破旧汗衣的洞孔中他看见了自己那个只有皮和骨头的黄色胸膛。

这以后母亲为他买了一个铃子。唤人时他用铃子代替他说话；请人做事时他求助于纸笔。这里所谓人，其实就是母亲一个，此外就难得有人到他的屋子里来，除了医生和邮差。但是邮差也不常来，因为小宣难得写信，树生的信也来得少了。树生仍旧按月寄款来。款子已经动用了。过去一直在银行里存“比期”的款子也由母亲陆续取了出来。还是母亲开口向他要了存单以后去取的。现在为了儿子的生命，她什么事都肯做了，只除了先给树生去信。给树生的信都是他自己写的，他不要母亲代笔。他在每封信上都写着：“我还好，我的健康逐渐在恢复，你不要为我耽心，”一类的话。给小宣的信，有时他写，有时母亲写，他只叫孩子不要回家（暑假中那个孩子住在同学的家里），好好念书，温习功课。母亲的信里话多一些，但是她也不忍讲出真实的情形，并且她还暗暗地抱着一线希望。

然而跟她的希望相反，真实的情形却逐渐坏下去。他自己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的内部一天一天地在腐烂，他的肺和他的咽喉的痛苦一天一天地增加。母亲也看得出他在用缓慢的脚步走向死亡。

但是母亲的心还是不能轻易放弃。她继续给他吃药，给他喝鲜牛奶和鸡汁，她帮他穿衣，伺候他大小便，她为他做着一切连老妈子也不愿意做的事。可是有一天他终于吃力地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妈，你给我吃点毒药，让我快死。我不能看见你这样受苦。我太痛苦。”

母亲读这张字条的时候，他眼泪汪汪地望着她。

“我不能，我就只有你一个儿子，”她哭着说。

他又写：“我迟早还是要死。”

“你死，我跟你一齐死，我也不要活了！”母亲大声哭着说，她制止不了自己的悲痛。

他放下笔，头疲倦地倒在枕上。

炎热增加他的痛苦。喧哗更象在火上添油。霍乱为这个城市带走了不少的人，这条街上常常有凄惨的哭声。他躺着，成天地躺在床上，仰着，侧着，伏着。他的心静不下来，他从没有能够痛快地睡一刻钟。

他不能够自己穿衣服，也不能够自由地坐起来。每次他给树生写信，总是怀着拼死的决心，忍受极大的痛苦，才能够写下四五行字。“我还好，我的身体可以支持下去，”他永远这样说。

“你何苦啊，我替你写罢，”母亲用了类似哀告的声音说，也没有用，在这件事上他不肯听从母亲的话。要是他不能亲笔写信，那么她知道他一定是病重了。

“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呢？”

有一天母亲忍不住吐出了这句话。

他迟疑了半天才写出五个字的答复来：

“我愿她幸福。”

母亲想：“她已经是别人的人了，为什么不让她难过一下，让她受点良心的责备呢？”“你这傻子，”她温和地责备他。可是她再看一眼纸上歪歪斜斜的字迹，她的心软下来了。她又想，他活在世界上究竟有过什么幸福？他苦了一生，为什么连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她也不肯帮忙实现？他到底是她的亲骨肉啊。她默默地望着他那张没有光泽的瘦脸，她的心好象被什么东西绞着似地发痛。她想哭，她想叫。她愿意地板上开一个洞让她跌进地狱里去；她愿意天上丢下一颗炸弹把她这个小小的世界整个毁灭。

这天下午隔壁人家的一个年轻人害霍乱死了。两个女人哭得很伤心。哭声进了他的房间。他倾听了一阵，忽然写给他母亲：

“妈，我死了，你不要哭啊。”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母亲痛苦地问。

“想到你哭，我就死不下去，我心里更苦，”他回答。

“你不会死！你不会死！”母亲流着泪大声说。

最热的气候过去了。屋子里的空气比较好受一点。可是他的病还是照常进行，痛苦也不断地增加。他用了更大的忍耐来对付这个病。有时候忍不住了，他也呻吟，可是连他的痛苦的呻吟也是无声的。

一个晚上母亲拿鸡汤给他喝。她用汤匙喂他。他吞了两口，忽然推开她的手，又微微地摇着头。

“你再吃几口罢，你一天只吃那么少的东西不行啊，”母亲劝道。

他用战抖的手拿起笔，费力地写了两个字：“喉痛”。

母亲打了一个冷噤。她那只拿着汤匙的手也在打战。她忍着心痛再劝道：“你忍住痛再吃两口罢，不吃东西怎么行！”她又把汤匙送到他的嘴边。他颤动地张开了口，努力吞下鸡汤，一次两次他的眼珠往上翻，手抓紧了薄被。

“宣，”母亲低声呼唤；他含泪地看她，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母亲咬紧牙关，再把汤匙放进他的嘴里去。他照样痛苦地把汤吞下去了，以后又吞了两次。再一次他就把一汤匙的鸡汤全喷了出来。他无声地呛咳了一阵。母亲连忙放下碗擦揉他的胸膛。

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想睡。可是痛苦使他清醒。他不能呻吟，不能叫唤。他默默地跟痛苦战斗。母亲的手使他感到安慰，他努力把思想集中在母亲的身上，他希望暂时忘记他那个痛苦。

忽然街上响起了鞭炮声。虽然在这个山城里几年来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他们并没有心肠注意它。出乎他们的意外，鞭炮声接连地响着，远远近近都在放鞭炮，好象发生了什么的喜庆事，人声嘈杂，许多人在跑，有人大声唱歌，有人笑着讲话。

“什么事？”他想到，母亲却说了出来。

“日本投降罗！日本投降罗！”孩子的声音在街上叫着，年轻人的声音响应着。

他吃了一惊。母亲忘了一切地大声问他：“宣，你听见没有？说是日本投降罗！”

他摇摇头，他还不相信。可是外面鞭炮声响得更密了。

人们象潮涌似地走过窗下的街心。

“大概是真的，不然不会这样！”母亲兴奋地说。

他还是在摇头。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合众社电报：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无条件投降！”有人在街上大声报告。

“你听，这还不是真的吗？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我们不再吃苦了！”她歇斯底里地高声叫道。她一边笑，一边流眼泪，她好象忘记自己是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床前一根板凳上放着一支蜡烛，烛光抖得厉害，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从一个小缺口流下来。

他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母亲，仿佛不懂母亲的意思。突然他迸出了眼泪。他想笑，又想哭。但是很快地他又冷静下来。他吐了一口长气。他想：你完了，我也完了。

“号外！号外！日本人投降！”报贩大声叫着跑过窗下。

母亲拉着他的手，温和地带笑问他：“宣，你高兴吗？胜利罗！胜利罗！”

他用战抖的手捏着笔，吃力地在纸上写着：

“我可以瞑目死去。”

母亲看见这些歪斜的字，她忘记了一切，又哭又笑地叫起来：“宣，你不会死！你不会死！胜利了，就不应该再有人死了！”

她的泪水畅快地流下来，她紧紧捏住儿子的手，不知道心里是喜是悲。

三十

母亲的那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在她说了那些话以后，某一天的夜晚，她坐在床沿上，守着她的儿子。电灯光还是半明半暗的，旁边一根板凳上放着满满一小饭碗的鸡汤，碗里有一根汤匙。

“宣，你吃两口罢，”她说。

他翻了翻白眼，微微动一动身子，手挥舞一下，也不去拿笔。他不回答。

“宣，你两天不吃东西了，忍着痛吃一点罢，”她哀求地大声说。

他慢慢地动一下头。他张开嘴，又伸出手，很费力地放到嘴边，抓住下嘴唇。然后他又松开手，把手指伸进口里去，象是要抓舌头。

“宣，你难过吗？你忍耐点罢，”她捏紧他的另一只手悲痛地说。

他点点头，把手从嘴里拿出来，就放在喉咙上。他眼里含着泪，望着他母亲。

“你不要难过，你不会死的，”她安慰道。

他那五根手指不停地在喉咙上擦揉，动作仍然迟缓而且手指僵硬。他忽然把胸膛向上挺了一下。

“宣，你要什么？”母亲问。

他不回答。过了半天，他那五根好象僵硬了的手指忽然狂乱地抓他的喉

咙。身子战抖着，床板发出了响声。

“宣，你忍耐点，”母亲说。她放开了他的左手，站起来，又把他的右手从他的喉咙上拉开。但是过了两三分钟他的右手又放到那个地方去了。他大大地张开嘴，用力咻着。他的眼睛翻白。他的手指在喉咙上乱抓。五根手指都长着长指甲，它们在他的喉咙上划了几条血痕。

“宣，你忍耐点，这样是不行的，你不能这样啊！”母亲悲痛地求他。他的眼光慢慢地移到她的脸上。他的眼光说着话：我痛得厉害。他的身子在床上摇摆，战抖。

“宣，你痛得厉害吗？”她又问。

他点点头。他把右手从喉咙上取了下来。手指头在空中乱抓，她不知道他要什么。

“宣，你要什么？”她问。

他的眼光慢慢地移到枕旁那支铅笔上。

“你有话要说，要笔吗？”她一面问，一面把铅笔拿起来递到他的手里。他似乎要抢过笔来，可是他的手指颤得厉害，他接过笔时，差一点把它落在被上。

母亲递了一本书给他。“你就写在书后面罢，”她说。

他一只手拿笔，一只手拿书，很费力地在书的封底上写了一个“痛”字。其实只有七分象字，笔划写够了，却安排得不匀整。

母亲看到这个字，眼泪又迸出来了。“宣，你忍耐点罢。等到小宣把张伯情请来就好了。”她虽然在安慰他，可是说完话就背过脸低声哭起来。

他的神志清醒。他锐敏地感到痛，感到自己的衰弱。他知道他的身体组织的各部分逐渐在死亡，而且就要到了最后的关头。他这时候强烈地感觉到对于生命的依恋，对于死亡的恐惧。他也看见自己所带给母亲的痛苦。他看见母亲哭着走到窗前去。他能够做什么呢？哪怕就说一句话，留下几句遗言也好。“我做过了什么错事呢？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受这惩罚？还有她，我母亲，我死了，她一个人怎样生活？拿什么生活？小宣又怎样活下去？他们又做过什么坏事呢？”他装满了一肚皮的怨气，他想叫，想号。但是他没有声音。没有人听得见他的话。他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够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地死去。

街上有一对夫妇在吵架，女的在哭在叫，男的在打在骂，还有第三个人在劝解。另外有一个人唱着川戏从窗下走过。

“为什么他们都应该活，而我必须死去，并且这么痛苦地死去？”他又想。“我要活！”他无声地叫道。

母亲掉回脸来看他。她的眼睛红肿，脸色惨白，她好象随时都会病倒似的。

“她也太辛苦了，”他痛苦地想。他把头一动。忽然一阵剧痛袭来，喉咙和肺一齐痛，痛得他忍耐不住。他两只手乱抓。他张开嘴叫，没有声音。他拼命把嘴张大，还是叫不出声音来。他满头是汗，他觉得两只手被人捏住，母亲的声音在说着什么。……但是他痛得晕过去了。

他又被母亲的哭唤声惊醒。他躺在床上，满身冷汗，裤子给小便打湿了。他抓紧母亲的手，呆呆地望着那张亲爱的脸。痛苦稍微减轻了一些。他想对母亲笑，但是眼泪不由他控制地流出来。

“你醒过来了，以后不要紧了，”母亲嘘了一口气，亲热地说，她的眼

角和两颊都还有泪痕。

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小宣从外面走进屋子。他一进门就说：“婆，张伯情在打摆子，不能来。”

母亲愣了一下。完了！她的心上挨了一下石子。她问道：“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大街上人多得很，明天庆祝胜利，到处都在准备，我走错路，到张家又耽搁了好一阵，”小宣答道。他又加一句解释：“今晚上很热闹，到处扎好了灯彩。”

“你肚子饿不饿？你身上还剩得有钱，你出去吃两碗面罢。我今天下午没有煮饭，上午有点剩饭我炒来吃了。你快去吃罢，”她又说。

“好，”小宣应道。

这一番对话他全听进去了。“他们在庆祝，”他想到；他愿意为他们笑一笑，可是痛苦阻止了他。“胜利会不会给他们带来解救呢？”他又想，第二个“他们”指的是母亲和小宣。可是痛苦又来阻止了他。他被痛苦占有了。痛苦第一。痛苦逐渐增加，不停地增加，痛苦赶走了别的思想。痛苦使他忘记了一切。他只记得忍受痛，或者逃避痛。一场绝望的战斗又在进行。他失败了。但是他不得不继续作战。他无声地哀叫着：“让我死罢，我受不了这种痛苦。”

然而他的亲爱的人，他母亲和他儿子不能了解这种无声的语言。他们不会帮忙他解除这种痛苦。

痛苦继续着，而且不停地增加。

九月三日，胜利日，欢笑日，也没有给这个房间带来什么变化。在大街上人们带着笑脸欢迎胜利游行的行列。飞机在空中表演，并且散布庆祝的传单。然而在汪文宣的屋子里却只有痛苦和哭泣。

他这一天晕过去三次，而又醒了转来。他觉得已经到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的顶点了，他愿意“死”马上来带走他。可是他仍旧活着。母亲和小宣一直守在床前。他眼泪汪汪地望着他们。他只求他们帮助他早一刻死亡。

他的生命一分钟一分钟地慢慢死去。他的脑子一直是清醒的，虽然不能多用思想。在这些最后的时刻里，他始终不肯把眼光从母亲和小宣的脸上掉开。后来他们的面影渐渐地模糊起来，他仿佛又看见了第三个人的脸，那自然是树生的，他并没有忘记她。但是甚至这三个人的面颜也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他一直痛到最后一刻。一口气吊着，他许久死不下去。母亲和小宣每人捏紧他的一只手，望着他咽气。

最后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象还在向谁要求“公平”。这是在夜晚八点钟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

尾 声

将近两个月以后的一个夜晚，在山城里说是因为修理锅炉全市停电。早晨下过一阵雨，下半天气候骤然转寒，冷风一阵一阵地吹过市空，赶走了摊头的顾客。电石灯的臭味随着风四处飘送，火花孤寂地打着寒颤。

一辆人力车经过阴暗、寒冷、荒凉的市街，到了一所大楼的门前。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装束入时的女人。她夹着手提包走进弹簧门去。她用手电光照路，走过了黑洞似的过道，上了二楼，又走上三楼。

在一间屋子的门前她站住了。她兴奋地敲着房门。

没有应声。她看见房内有亮，门上没有锁，心里想屋子里不会没有人，也许他们睡着了，她便用力再敲两下。

“哪个？”屋子里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这个声音似乎是她熟悉的，但是她又说不出是谁的声音。

“我，”她顺口答应了一个字。

门开了，射出一道微光。她瞥见方桌上燃着一支蜡烛。开门的也是一个女人，脸背着光，她认不清楚是谁的脸孔。

“找哪个？”开门人惊讶地问。

“请问汪家是不是住在这儿？”叩门人更惊讶地问。

“这儿没有姓汪的，”开门人回答。

“以前不是汪家住在这儿吗？明明是这一间屋，家具也是，”叩门人说，她的惊奇更大了。

“啊，你是汪太太！请进来坐！今天停电，我没有看清楚，”开门人笑着说，她闪开身子，把叩门人让了进去。

“方太太，你们不是在二楼住吗？几时搬上来的？”叩门人想起开门人原来是住在二楼的方太太，毕竟遇到了一个熟人，她稍微心安一点。房间里的陈设没有多大的改变，就是四壁白了许多，看起来顺眼些。

“就是这个月月半，”方太太回答。“汪太太，啊，我不晓得现在要怎样叫你才好，你不是在兰州吗？几时回来的？”

“今天刚到的，方太太，我还是从前那样，”树生红了脸说。接着她声音发颤地问：“方太太，他们搬到哪儿去了？我说文宣他们。”

“你说汪先生吗？你还不晓得？”方太太惊问道。

“我的确不晓得。我两个月没有接到他们的信了，”树生不安地说。

“汪先生不在了，”方太太低声说。

“他不在了？什么时候？”树生身子一动，变了脸色，惊叫道。

“就在上个月庆祝胜利那一天，”方太太说。树生的身子猛然抖了一下。“老太太带小少爷走了。我们这间房子就是老太太让给我们的，家具也是她让的，我们出了一点钱。”

树生好象让人迎头浇了一桶冷水似的，她全身发冷，脸色惨白。她呆了半天才吐出一句问话：“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她连忙伸手擦揉眼睛，一面把脸掉开。

“我也不晓得。我问过老太太，她说是先搬到一个亲戚家去住几天，又说要去昆明，又好象听她说在托什么人买船票，”方太太一边想，一边答道，她的声音平淡，好象她对自己的话并没有把握似的。

“去昆明也用不着买船票，他们在这个地方并没有亲戚，”树生怀疑地

说，“不晓得他们到哪儿去了？”

“老太太是这样说的，”方太太说；“不过我想他们到昆明去的成份居多。他们搬走以前，差不多把东西都卖光了，就在这个门口摆地摊卖的。啊，汪太太，你坐了半天，我还没有倒茶，”她抱歉似地说，就站起来，走向一个茶几，那里放着热水瓶、茶壶和茶杯。

“方太太，你不要客气，我不渴，”树生连忙欠身阻止道。“我请问你，你知道我们文宣临死的情形吗？他现在葬在哪里？”

“汪太太，你不要难过，你歇歇，先吃杯茶罢，”方太太温和地说，端了一杯茶放在树生的面前。

“谢谢你，请你告诉我他临死的情形。我在兰州还以为他的病渐渐好起来了。他每封信都说他身体不坏。请你告诉我，我不怕，你说真话罢。”

“其实我不晓得。我实在不晓得。汪先生生病的时候我只去看过老太太一次。我只晓得他声音哑了，睡了不到两个多月就死了。我那次看见他睡在床上，说不出话，瘦得可怜——”方太太用了一种类似悒郁的声调说。

“他葬在哪儿？我要去看他！”树生忘了一切地打岔道。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心痛，她后悔，她真想立刻就到他的墓地去。

“我不晓得。我听说汪先生临死时身边没有什么钱，尸首搁在房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预备。也亏得老太太，她跑了两个整天，才弄到一点钱，买了棺材装好抬出去葬了。我不晓得汪先生葬在哪儿。我问过老太太，她也不说。老太太也真苦，这两个多月她瘦得多，头发全白了，”方太太一面说，一面用同情的眼光看她。

树生一边听，一边咬嘴唇。她的鼻头酸痛，悔恨的情感扭绞着她的心。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她还竭力控制自己。“那么隔壁邻舍总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罢？他不能够就这样失踪的。公司里一定有人知道，至少钟先生总晓得，”她象同谁争论般地说。她不知道钟老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这儿的人都不晓得。棺材是大清早抬出去的。没有人跟去送葬。老太太也没有通知我们。不过汪先生公司里总有人晓得，”方太太好心地说，她很愿意给这位客人帮忙，可是自己也知道没有办法。

“我明天到公司去打听明白，”树生失望地说。她埋下头用手帕揩泪痕。她又问：“老太太他们哪天搬出去的？”

“我记得是十二。她头天搬走，我们第二天粉刷墙壁，第四天就搬进来。楼下那一间，我们先生拿来会客、办公、讲生意用。啊，汪太太，还没有问你住在哪儿？”方太太关心地问。

“我暂时住在……朋友家里……我过几天就要回去，”树生迟疑地说。

“那么你还去不去找老太太他们？”方太太继续问道。

婴儿的哭声突然从小屋里传来。方太太不等客人回答马上站起来，着急地说：“我女儿醒了，你请坐一下罢。”她忙忙慌慌地走进小屋里面去了。

树生免去了回答一个难题的痛苦。她仍旧坐着，一个人伴着一支蜡烛。她忽然起了一种似在梦中的感觉。这是她自己住过的屋子，自己用过的家具：方桌，书桌，小书架，碗橱，床……一切都是她熟悉的，虽然破的修理好了，旧的弄干净了，墙壁刷得白白的。可是她坐在她坐了几年的凳子上，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生客。甚至在那一切熟悉的东西上面她也找不到过去的痕迹了。同样燃着一支蜡烛，可是现在却比从前亮了许多。不到一年的功夫，一切都改变了。他死了，母亲和孩子走了。他葬在哪里？他们去到哪

里？她不知道。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她还有什么办法知道？别人的孩子在她的屋子里哭。多么新奇的声音！现在那个年轻的母亲在小屋里抱着小孩走来走去，唱催眠曲。她从前也这样做过的。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为了小宣。可是现在她的小宣又在哪儿呢？那个孩子，他并不依恋她，她也没有对他充分地表示过母爱。她忽略了他。现在她要永远失掉他了。她就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啊！方太太还不出来，婴孩仍旧不时地哭叫，方太太有耐心地继续唱催眠曲，一面走一面拍拍孩子。那个女人似乎忘了她的存在，只顾着孩子，就忘记了客人，让她冷清清地坐在外屋里，被回忆包围、折磨。她忽然想起了楼梯口的一幕。他们在黑暗中握手。她含着眼泪扑到他的身上去吻他。“我要你保重！为什么病到那样还不让我知道呢？”她痛苦地想道。“只要对你有好处，我可以回来，我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她今天下飞机的时候，还这样想过。她可以坦白地对他说这种话。然而现在太迟了。她不敢想象他临死的情形。太迟了，太迟了。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她想着，想着，她突然站起来，她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她再受不了这个房间和这些家具，每件东西都在叙说他和她们的故事，每件东西都在刺痛她。她甚至受不了那个年轻母亲的催眠曲。歌声使她想起她自己曾经做过母亲，给她唤起她久已埋葬了的回忆。她应该走了。

“方太太，我走了，你不要出来，”她大声说，便拿起手提包朝房门外走。

方太太抱着婴孩赶出来，诚恳地叫道：

“汪太太，你再坐一会儿。还早嘛！”树生停了脚步回过头来。

“我走了，谢谢你，”树生说。

“慢走啊，”方太太柔声说，接着又加一句：“你还再来耍罢。”

“谢谢你，我不来了，”树生摇摇头说。这次她不曾流泪，可是她觉得比流了泪还更痛苦。

“那么你等等，我拿蜡烛来送你，外面很黑，”方太太殷勤地说，她一只手抱婴孩，一只手拿起了烛台。

“方太太，你请留步。我有电筒，看得见，这个地方我住惯了的，”树生客气地说，就急急往门外廊上走去。

“汪太太！等等，等等啊！我送你到楼梯口，”方太太大声唤道。接着她又在抱怨：“真讨厌，现在还停电。胜利了两个多月，什么事都没有变好，有的反而更坏。”

树生已经走到了楼梯口。她回过头，朝着方太太打了一下手电，大声说：“方太太，请回去，我走罗！”她也不等回答，就急急走下楼去了。的确这是她走惯了的地方，走起来并不费力。

她刚走出大门，迎面一股寒风使她打了一个冷噤。“怎么才阳历十月底，夜里就这样冷！”她想道，她觉得身上那件秋大衣不够暖了。门前连一辆车子也看不见。她回头看了看大门和那盏闭着眼睛似的门灯，她轻轻叹了一口气。她不知道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好。她心里空虚得很。她只想找个地方关上门大哭一场，但是没有办法。她只好慢慢地走在人行道上走着。

“小姐，我们是从桂林逃难来的，东西都丢光了……”突然从黑暗里闪出一个黑影，一下子就跑到她的身边，一只枯瘦的手伸到她的面前，使她大吃一惊。她仔细一看，说话的是一个老太婆。

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钞票递到那只黑手上。

“小姐，谢谢啊，”老太婆说，又把身子缩进黑暗里去了。

她摇了摇头，又继续往前面走。于是她看见了亮光。

“相因卖，相因卖，五百块钱……三百块钱……两百块钱……”

电石灯的臭味随着寒风扑上她的鼻端。从那些带笑的嘴唇里发出哀叫似的声音。一个年轻女人坐在矮凳上，怀里抱一个睡着的婴孩，正在用沉滞的目光望着面前一堆卖不出去的东西。

她又打一个冷噤。“夜真冷啊！”她想道；“人家也是母亲啊，”她又想。她在那个地摊前站了片刻，她用同情的眼光看那个女人和怀里的孩子。

“我总要找到小宣，”她在心里说。她又看看眼前的母亲和孩子，“他们也摆过这样的地摊，”她再想道，这个“他们”不用说是指老太太和小宣，她心里更加难受了。

“你哪天走？”旁边有人在讲话。

“走不了。船票哪有我们老百姓的份！”另一个人说。

“想办法罢，当黄鱼总行！”

“现在是官复员，不是老百姓复员。我有个亲戚买不到票当黄鱼，上了船给人抓下来了。白出了船钱。”

“你还好，走不了，在四川多住几个月也不愁没饭吃。我下个月再走不了，就要饿饭了。东西快卖尽吃光了。原先以为一胜利就可以回家。”

“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楣。早知道，那天真不该参加胜利游行。……”

她又打了一个冷噤。她好象突然落进了冰窖里似的，浑身发冷。她茫然四顾，她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她好象在做梦。昨天这个时候她还在另一个城市的热闹酒楼上吃饭，听一个男人的奉承话。今天她却立在寒夜的地摊前，听这些陌生人的诉苦。她为着什么回来？现在又怀着怎样的心情走出那间屋子？……以后又该怎样？……她等待着明天。

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就是到了明天，她至多也不过找到一个人的坟墓。可是她能够找回她的小宣吗？她能够改变眼前的一切吗？她应该怎样办呢？走遍天涯地角去作那明知无益的找寻吗？还是回到兰州去答应另一个男人的要求呢？

她只有两个星期的假期。她应该在这两个星期内决定自己的事情。……至少她还有十二三天的功夫，而且事情又是不难决定的。为什么她必须站在地摊前忍受寒风的吹打呢？

“我会有时间来决定的，”她终于这样对自己说。她走开了。她走得慢，然而脚步相当稳。只是走在这条阴暗的街上，她忽然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时掉头朝街的两旁看，她耽心那些摇颤的电石灯光会被寒风吹灭。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

1946年12月31日写完

散 文

一个车夫

这些时候我住在朋友方的家里。

有一天我们吃过晚饭，雨已经住了，天空渐渐地开朗起来。傍晚的空气很凉爽。方提议到公园去。

“洋车！洋车！公园后门！”我们站在街口高声叫道。

一群车夫拖着车子跑过来，把我们包围着。

我们匆匆跑上两部洋车，让车夫拉起走了。

我在车上坐定了，用安闲的眼光看车夫。我不觉吃了一惊。在我的眼前晃动着一个瘦小的背影。我的眼睛没有错。拉车的是一个小孩，我估计他的年纪还不到十四。

“小孩儿，你今年多少岁？”我问道。

“十五岁！”他很勇敢、很骄傲地回答，仿佛十五岁就达到成人的年龄了。他拉起车子向前飞跑。他全身都是劲。

“你拉车多久了？”我继续问他。

“半年多了，”小孩依旧骄傲地回答。

“你一天拉得到多少钱？”

“还了车租剩得下二十吊钱！”

我知道二十吊钱就是四角钱。

“二十吊钱，一个小孩儿，真不易！”拉着方的车子的中年车夫在旁边发出赞叹了。

“二十吊钱，你一家人够用？你家里有些什么人？”方听见小孩的答话，也感到兴趣了，便这样地问了一句。

这一次小孩却不作声了，仿佛没有听见方的话似的。他为什么不回答呢？我想大概有别的缘故，也许他不愿意别人提这些事情，也许他没有父亲，也许连母亲也没有。

“你父亲有吗？”方并不介意，继续发问道。

“没有！”他很快地答道。

“母亲呢？”

“没有！”他短短地回答，声音似乎很坚决，然而跟先前的显然不同了。声音里漏出了一点痛苦来。我想他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我有个妹子，”他好像实在忍不住了，不等我们问他，就自己说出来；“他把我妹子卖掉了。”

我一听这话马上就明白这个“他”字指的是什么人。我知道这个小孩的身世一定很悲惨。我说：

“那么你父亲还在——”

小孩不管我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他抽白面，把我娘赶走了，妹子卖掉了，他一个人跑了。”

这四句短短的话说出了一个家庭的惨剧。在一个人幼年所能碰到的不幸的遭遇中，这也是够厉害的了。

“有这么狠的父亲！”中年车夫慨叹地说了。“你现在住在哪儿？”他一面拉车，一面和小孩谈起话来。他时时安慰小孩说：

“你慢慢儿拉，省点儿力气，先生们不怪你。”

“我就住在车厂里面。一天花个一百子儿。剩下的存起来……做衣服。”

“一百子儿”是两角钱，他每天还可以存两角。

“这小孩儿真不易，还知道存钱做衣服。”中年车夫带着赞叹的调子对我们说。以后他又问小孩：“你父亲来看过你吗？”

“没有，他不敢来！”小孩坚决地回答。虽是短短的几个字，里面含的怨气却很重。

我们找不出话来了。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还没有仔细思索过。在我知道了他的惨痛的遭遇以后，我究竟应该拿什么话劝他呢？

中年车夫却跟我们不同。他不加思索，就对小孩发表他的道德的见解：

“小孩儿，听我说。你现在很好了。他究竟是你的天伦。他来看你，你也该拿点钱给他用。”

“我不给！我碰着他就要揍死他！”小孩毫不迟疑地答道，语气非常强硬。我想不到一个小孩的仇恨会是这样地深！他那声音，他那态度……他的愤怒仿佛传染到我的心上来了。我开始恨起他的父亲来。

中年车夫碰了一个钉子，也就不再开口了。两部车子在北长街的马路上滚着。

我看不见那个小孩的脸，不知道他脸上的表情，但是从他刚才的话里，我知道对于他另外有一个世界存在。没有家，没有爱，没有温暖，只有一根生活的鞭子在赶他。然而他能够倔强！他能够恨！他能够用自己的两只手举起生活的担子，不害怕，不悲哀。他能够做别的生在富裕的环境里的小孩所不能够做的事情，而且有着他们所不敢有的思想。

生活毕竟是一个洪炉。它能够锻炼出这样倔强的孩子来。甚至人世间最惨痛的遭遇也打不倒他。

就在这个时候，车子到了公园的后门。我们下了车，付了车钱。我借着灯光看小孩的脸。出乎我意料之外，它完全是一张平凡的脸，圆圆的，没有一点特征。但是当我的眼光无意地触到他的眼光时，我就大大地吃惊了。这个世界里存在着的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不存在的。在那一对眼睛里，我找不到承认任何权威的表示。我从没有见过这么骄傲、这么倔强、这么坚定的眼光。

我们买了票走进公园，我还回过头去看小孩，他正拉着一个新的乘客昂起头跑开了。

1934年6月在北平

木匠老陈

生活的经验固然会叫人忘记许多事情。但是有些记忆经过了多少时间的磨洗也不会消失。

故乡的那些房屋，那些街道至今还印在我的脑子里。我还记得我每天到学堂去总要走过的木匠老陈的铺子。

木匠老陈那时不过四十岁光景，脸长得像驴子脸，左眼下面有块伤疤，嘴唇上略有几根胡须。大家都说他的相貌丑，但是同时人人称赞他的脾气好。

他平日在店里。但是他也常常到相熟的公馆里去做活，或者做包工，或者做零工。我们家里需要木匠的时候，总是去找他。我就在这时候认识他。他在我们家里做活，我只要有空，就跑去看他工作。

我那时注意的，并不是他本人，倒是他的那些工具：什么有轮齿的锯子啦，有两个耳朵的刨子啦，会旋转的钻子啦，像图画里板斧一般的斧子啦。这些奇怪的东西我以前全没有看见过。一块粗糙的木头经过了斧子劈，锯子锯，刨子刨，就变成了一方或者一条光滑整齐的木板，再经过钻子、凿子等等工具以后，又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像美丽的窗格，镂花的壁板等等细致的物件，都是这样制成的。

老陈和他的徒弟的工作使我的眼界宽了不少。那时我还在家里读书，祖父聘请了一位前清的老秀才来管教我们。老秀才不知道教授的方法，他只教我们认一些字，呆板地读一些书。此外他就把我们关在书房里，端端正正地坐在凳子上，让时间白白地过去。过惯了这种单调的生活以后，无怪乎我特别喜欢老陈了。

老陈常常弯着腰，拿了尺子和墨线盒在木板上面画什么东西。我便安静地站在旁边专心地望着，连眼珠也不转一下。他画好了墨线，便拿起锯子或者凿子来。我有时候觉得有些地方很奇怪，不明白，就问他，他很和气地对我一一说明。他的态度比那个老秀才的好得多。

家里的人看见我对老陈的工作感到这么大的兴趣，并不来干涉我，却嘲笑地唤我做老陈的徒弟，父亲甚至开玩笑地说要把我送到老陈那里学做木匠。但这些嘲笑都是好意的，父亲的确喜欢我。因此有一个时候我居然相信父亲真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对老陈说过要跟他学做木匠的话。

“你要学做木匠？真笑话！有钱的少爷应该读书，将来好做官！穷人的小孩才学做木匠，”老陈听见我的话，马上就笑起来。

“为什么不该学做木匠？做官有什么好？修房子，做家具，才有趣啊！我做木匠，我要给自己修房子，爬到上面去，爬得高高的，”我看见他不相信我的话，把它只当做小孩子的胡说，我有些生气，就起劲地争论道。

“爬得高，会跌下来，”老陈随口说了这一句，他的笑容渐渐地收起来了。

“跌下来，你骗我！我就没有见过木匠跌下来！”

老陈看我一眼，依旧温和地说：“做木匠修房子，常常拿自己性命来拼。一个不当心在上面滑了脚，跌下来，不跌成肉酱，也会得一辈子的残疾。”他说到这里就埋下头，用力在木板上推他的刨子，木板查查地响着，一卷一卷的刨花接连落在地上。他过了半晌又加了一句：“我爹就是这样子跌死的。”

我不相信他的话。一个人会活活地跌死！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见人说过。既然他父亲做木匠跌死了，为什么他现在还做木匠呢？我简直想不通。

“你骗我，我不信！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做木匠？难道你就不怕死！”

“做木匠的人这样多，不见得个个都遭横死。我学的是这行手艺，不靠它吃饭又靠什么？”他苦恼地说。然后他抬起头来看我，他的眼角上嵌得有泪珠。他哭了！

我看见他流眼泪，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就跑开了。

不久祖父生病死了，我也进了学堂，不再受那个老秀才的管束了。祖父死后木匠老陈不曾到我们家里来过。但是我每天到学堂去都要经过他那个小小的铺子。

有时候他在店里招呼我；有时候他不在，只有一两个徒弟在那里钉凳子或者制造别的物件。他的店起初还能够维持下去，但是不久省城里发生了巷战，一连打了三天，然后那两位军阀因为别人的调解又握手言欢了。老陈的店在这个时期遭到“丘八”的光顾，他的一点点积蓄都给抢光了，只剩下一个空铺子。这以后他虽然勉强开店，生意却很萧条。我常常看见他哭丧着脸在店里做工。他的精神颓丧，但是他仍然不停手地做活。我听说他晚上时常到小酒馆里喝酒。

又过了几个月他的店终于关了门。我也就看不见他的踪迹了。有人说他去吃粮当了兵，有人说他到外县谋生去了。然而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了。他手里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了几件木匠用的工具。

“老陈，你还在省城！人家说你吃粮去了！”我快活地大声叫起来。

“我只会做木匠，我就只会做木匠！一个人应该安份守己，”他摇摇头微笑道，他的笑容里带了一点悲哀。他没有什么大改变，只是人瘦了些，脸黑了些，衣服脏了些。

“少爷，你好好读书。你将来做了官，我来给你修房子，”他继续含笑说。

我抓住他的袖子，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告辞走了。他还告诉我他在他从前一个徒弟的店里帮忙。这个徒弟如今发达了，他却在那里做一个匠人。

以后我就没有再看见老陈。我虽然喜欢他，但是过了不几天我又把他忘记了。等到公馆里的轿夫告诉我一个消息的时候，我才记起他来。

那个轿夫报告的是个什么消息呢？

他告诉我：老陈同别的木匠一起在南门一家大公馆里修楼房，工程快要完了，但是不晓得怎样，老陈竟然从楼上跌下来，跌死了。

在那么多的木匠里面，偏偏是他跟着他父亲落进了横死的命运圈里。这似乎是偶然，似乎又不是偶然，总之，一个安份守己的人就这样地消失了。

1934年秋在上海

最初的回忆

“这个娃娃本来是给你的弟媳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送给你。”

这是母亲在她的梦里听见的“送子娘娘”说的话。每当晴明的午后，母亲在她那间朝南的屋子里做针线的时候，她常常对我们弟兄姊妹（或者还有老妈子在场）叙述她这个奇怪的梦。

“第二天就把你生下来了。”

母亲抬起她的圆圆脸，用爱怜横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时站在她的身边。

“想不到却是一个这样淘气娃娃！”

母亲微微一笑，我们也都笑了。

母亲很爱我。虽然她有时候笑着说我是淘气的孩子，可是她从来没有骂过我。她让我在温柔、和平的气氛中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

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光的头发，常常带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子。

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脑子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

我的最初的回忆是跟母亲分不开的。我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母亲的温柔的声音。

我四五岁的光景，跟着母亲从成都到了川北的广元县，父亲在那里做县官。

衙门，很大一个地方，进去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大堂，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还有稀疏的桑林，算起来大概有六七进。

我们住在三堂里。

最初我同母亲睡，睡在母亲那张架子床上。热天床架上挂着罗纹帐子或者麻布帐子，冷天挂着白布帐子。帐子外面有微光，这是从方桌上那盏清油灯的灯草上发出来的。

清油灯，长的颈项，圆的灯盘，黯淡的灯光，有时候灯草上结了黑的灯花，必剥必剥地燃着。

我睡在被窝里，常常想着“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

白天，我们在书房里读书，地点是在二堂旁边。窗外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先生是一个温和的中年人，面貌非常和善。他有时绘地图。他还会画铅笔画。他有彩色铅笔，这是我们最羡慕的。

学生是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我。

一个老书童服侍我们。这个人名叫贾福，六十岁的年纪，头发已经白了。

在书房里我早晨认几十个字，下午读几页书，每天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的功课比我的稍微多一点，他比我只大一岁多。贾福把我们送到母亲的房里。母亲给我们吃一点糖果。我们在母亲的房里玩了一会儿。

“香儿，”三哥开始叫起来。

我也叫着这个丫头的名字。

一个十二三岁的瓜子脸的少女跑了进来，露着一脸的笑容。“陪我们到四堂后面去耍！”

她高兴地微笑了。

“香儿，你小心照应他们！”母亲这样吩咐。

“是。”她应了一声，就带着我们出去了。

我们穿过后房门出去。

我们走下石阶，就往草地上跑。

草地的两边种了几排桑树，中间露出一条宽的过道。桑叶肥大，绿荫荫的一大片。

两三只花鸡在过道中间跑。

“我们快来拾桑果！”

香儿带笑地牵着我的手往桑树下面跑。

桑葚的甜香马上扑进了我的鼻子。

“好香呀！”

满地都是桑葚，深紫色的果子，有许多碎了，是跌碎了的，是被鸡的脚爪踏坏了的，是被鸡的嘴壳啄破了的。

到处是鲜艳的深紫色的汁水。

我们兜起衣襟，躬着腰去拾桑葚。

“真可惜！”香儿一面说，就拣了几颗完好的桑葚往口里送。我们也吃了几颗。

我看见香儿的嘴唇染得红红的，她还在吃。三哥的嘴唇也是红红的，我的两手也是。

“看你们的嘴！”

香儿扑嗤笑起来。她摸出手帕给我们揩了嘴。

“手也是。”

她又给我们揩了手。

“你自己看不见你的嘴？”三哥望着她的嘴笑。

在后面四堂里鸡叫了。

“我们快去找鸡蛋！”

香儿连忙揩了她的嘴，就牵起我的手往里面跑。

我们把满兜的桑葚都倒在地上了。

我们跑过一个大的干草堆。

草地上一只麻花鸡伸长了颈项得意地在那里一面走，一面叫。我们追过去。

这只鸡惊叫地扑着翅膀跳开了。别的鸡也往四面跑。“我们看哪一个先找到鸡蛋？”

香儿这样提议。结果总是她找到了那个鸡蛋。

有时候我也找到的，因为我知道平时鸡爱在什么地方下蛋。香儿虽然比我聪明，可是对于鸡的事情我知道的就不比她少。鸡是我的伴侣。不，它们是我的军队。

鸡的兵营就在三堂后面。

草地上两边都有石阶，阶上有房屋，阶下就种桑树。左边的一排平房，大半是平日放旧家具等等的地方。最末的一个空敞房间就做了鸡房，里面放了好几只鸡笼。鸡的数目是二十几只，我给它们都起了名字。

大花鸡，这是最肥的一只，松绿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点。凤头鸡，这只鸡有着灰色的羽毛，黑的斑点，头上多一撮毛。

麻花鸡，是一只有黑黄色小斑点的鸡。

小凤头鸡比凤头鸡身子要小一点。除了头上多一撮毛外，它跟普通的母鸡就没有分别。

乌骨鸡，它连脚、连嘴壳，都是乌黑的。

还有黑鸡、白鸡、小花鸡，……各种各类的名称。

每天早晨起床以后，洗了脸，我就叫香儿陪我到三堂后面去。

香儿把鸡房的门打开了。

我们揭起了每一只鸡笼。我把一只一只的鸡依着次序点了名。

“去罢，好好地去耍！”

我们撒了几把米在地上，让它们围着啄吃。

我便走了，进书房去了。

下午我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有时候比较迟一点放学。

我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四堂后面去。

我睡在高高的干草堆上。干草是温暖的，我觉得自己好像睡在床上。

温和的阳光爱抚着我的脸，就像母亲的手在抚摩。

我半睁开眼睛，望着鸡群在下面草地上嬉戏。

“大花鸡，不要叫！再叫给别人听见了，会把鸡蛋给你拿走的。”

那只大花鸡得意地在草地上踱着，高声叫起来。我叫它不要嚷，没有用。

我只得从草堆上爬下来，去拾了鸡蛋揣在怀里。大花鸡爱在草堆里生蛋，所以我很容易地就找着了。

鸡蛋还是热烘烘的，上面粘了一点鸡毛，是一个很可爱的大的鸡蛋。

或者小凤头鸡被麻花鸡在翅膀上啄了一下就跑开了。我便吩咐它：

“不要跑呀！喂，小凤头鸡，你怕麻花鸡做什么？”有时候我同三哥在一起，我们就想出种种方法来指挥鸡群游戏。

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寂寞。

傍晚吃过午饭后（我们就叫这做午饭），我等到天快要黑了就同三哥一起，叫香儿陪着，去把鸡一一地赶进了鸡房，把它们全照应进了鸡笼。

我又点一次名，看见不曾少掉一只鸡，这才放了心。有一天傍晚点名的时候，我忽然发觉少了一只鸡。我着急起来，要往四堂后面去找。

“太太今天吩咐何师傅捉去杀了。”香儿望着我笑。

“杀了？”

“你今天下午没有吃过鸡肉吗？”

不错，我吃过！那碗红烧鸡，味道很不错。

我没有话说了。心里却有些不舒服。

过了三四天，那只黑鸡又不见了。

点名的时候，我望着香儿的笑脸，气得流出眼泪来。“都是你的错！你坏得很！他们捉鸡去杀，你晓得，你做什么不跟我说？”

我捏起小拳头要打香儿。

“你不要打我，我下次跟你说就是了。”香儿笑着向我告饶。然而那只可爱的黑鸡的影子我再也看不见了。

又过了好几天，我已经忘掉了黑鸡的事情。

一个早上，我从书房里放学出来。

我走过石栏杆围着的长廊，在拐门里遇见了香儿。“四少爷，我正在等你！”

“什么事情？”

我看见她着急的神气，知道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了。“太太又喊何师傅杀鸡了。”

她拉着我的手往里面走。

“哪一只鸡？快说。”我睁着一对小眼睛看她。

“就是那只大花鸡。”

大花鸡，那只最肥的，松绿色的羽毛上长着不少白色斑点。我最爱它！我马上挣脱香儿的手，拼命往里面跑。

我一口气跑进了母亲的房里。

我满头是汗，我还在喘气。

母亲坐在床头椅子上。我把上半身压着她的膝头。

“妈妈，不要杀我的鸡！那只大花鸡是我的！我不准人家杀它！”

我拉着母亲的手哀求。

“我说是什么大事情！你这样着急地跑进来，原来是为着一只鸡。”

母亲温和地笑起来，摸出手帕给我揩了额上的汗。

“杀一只鸡，值得这样着急吗？今天下午做了菜，大家都有吃的。”

“我不吃，妈，我要那只大花鸡，我不准人杀它。那只大花鸡，我最爱的……”

我急得哭了出来。

母亲笑了。她用温和的眼光看我。

“痴儿，这也值得你哭？好，你喊香儿陪你到厨房里去，喊何厨子把鸡放了，由你另外拣一只鸡给他。”

“那些鸡我都喜欢。随便哪只鸡，我都不准人家杀！”我依旧拉着母亲的手说。

“那不行，你爹吩咐杀的。你快去，晚了，恐怕那只鸡已经给何厨子杀了。”提起那只大花鸡，我忘掉了一切。我马上拉起香儿的手跑出了母亲的房间。

我们气咻咻地跑进了厨房。

何厨子正把手里拿着的大花鸡往地上一掷。

“完了，杀死了。”香儿叹口气，就呆呆地站住了。大花鸡在地上扑翅膀，松绿色的羽毛上染了几团血。我跑到它的面前，叫了一声“大花鸡”！

它闭着眼睛，垂着头，在那里乱扑。身子在肮脏的土地上擦来擦去。颈项上现出一个大的伤口，那里面还滴出血来。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死的挣扎！

我不敢伸手去挨它。

“四少爷，你哭你的大花鸡呀！”这是何厨子的带笑的声音。他这个凶手！他亲手杀死了我的大花鸡。

我气得全身发抖。我的眼睛也模糊了。

我回头拔步就跑，我不顾香儿在后面唤我。

我跑进母亲的房里，就把头放在她的怀中放声大哭：“妈妈，把我的大花鸡还给我！……”

母亲温柔地安慰我，她称我做痴儿。

为了这件事，我被人嘲笑了好些时候。

这天午饭的时候，桌子上果然添了两样鸡肉做的菜。我望着那两个菜碗，就想起了大花鸡平日得意地叫着的姿态。我始终不曾在菜碗里下过一次筷子。

晚上杨嫂安慰我说，鸡被杀了，就可以投生去做人。她又告诉我，那只鸡一定可以投生去做人，因为杀鸡的时候，袁嫂在厨房里念过了“往生咒”。

我并不相信这个老妈子的话，因为离现实太远了，我看不见。“为什么做了鸡，就该被人杀死做菜吃？”我这样问母亲，得不着回答。

我这样问先生，也得不着回答。

问别的人，也得不着回答。

别人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却始终不懂。

对于别人，鸡不过是一只家禽。对于我，它却是我的伴侣，我的军队。

我的一个最好的兵就这样地消失了。

从此我对于鸡的事情，对于这种为了给人类做食物而活着的鸡的事情，就失掉了兴趣。

不过我还在照料那些剩余的鸡，让它们先后做了菜碗里的牺牲品，连凤头鸡也在内。

老妈子里面，有一个杨嫂负责照应我和三哥。

高身材，长脸，大眼睛，小脚。三十岁光景。

我们很喜欢她。

她记得许多神仙和妖精的故事。晚上我和三哥常常找机会躲在她的房里，逼着她给我们讲故事。

香儿也在场，她也喜欢听故事。

杨嫂很有口才。她的故事比什么都好听。

我们听完了故事，就由她把我们送回到母亲房里去。坝子里一片黑暗。草地上常常有声音。

我们几个人的脚步声在石阶上很响。

杨嫂手里捏着油纸捻子，火光在晃动。

我们回到母亲房里，玩一会儿，杨嫂就服侍我在母亲的床上睡了。

三哥跟着大哥去睡。

杨嫂喜欢喝酒，她年年都要泡桑葚酒。

桑葚熟透了的时候，草地上布满了紫色的果实。我和三哥，还有香儿，我们常常去拾桑葚。

熟透了的桑葚，那甜香真正叫人的喉咙痒。

我们一面拾，一面吃，每次拾了满衣兜的桑葚。“这样多，这样好！”

我们每次把一堆一堆的深紫色的桑葚指给她看，她总要做出惊喜的样子说。

她拣几颗放在鼻子上闻，然后就放进了嘴里。

我们四个人围着桌子吃桑葚。

我们的手上都染了桑葚汁，染得红红的，嘴也是。“够了，不准再吃了。”

她撩起衣襟揩了嘴唇，便打开立柜门，拿出一个酒瓶来。她把桑葚塞进一个瓶里，一个瓶子容不下，她又去取了第二个，第三个。

每个瓶里盛着大半瓶白色的酒。

多少恨

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

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

——南唐李后主：《忆江南·怀旧》从母亲那里我学着读那叫做“词”的东西。

母亲剪了些白纸订成好几本小册子。

我的两个姐姐各有一本。后来我和三哥每个人也有了这样的一本小册子。

母亲差不多每天要在小册子上面写下一首词，是依着顺序从《白香词谱》里抄来的。

是母亲亲手写的娟秀的小字。

晚上，在方桌前面，清油灯的灯光下，我和三哥靠了母亲站着。

母亲用温柔的声音给我们读着小册子上面写的字。

这是我们幼年时代的唯一的音乐。

我们跟着母亲读出每一个字，直到我们可以把一些字连接起来读成一句为止。

于是母亲给我们拿出来那根牛骨做的印圈点的东西和一盒印泥。

我们弟兄两个就跪在方凳子上面，专心地给读过的那首词加上了圈点。

第二个晚上我们又在母亲的面前温习那首词，一直到我们能够把它背诵出来。

但是不到几个月母亲就生了一个妹妹。

我们的小册子里有两个多月不曾添上新的词。

而且从那时候起我就和三哥同睡在一张床上，在另一个房间里。

杨嫂把她的床铺搬到我们的房里来。她陪伴我们，照料我们。

这个妹妹大排行第九，我们叫她做九妹。她出世的时候，我在梦里，完全不知道。

早晨我睁开眼睛，阳光已经照在床上了。

母亲头上束了一根帕子，她望着我笑。

旁边突然响起了婴儿的啼声。

杨嫂也望着我笑。

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这是我睡在母亲床上的最后一天了。秋天，天气渐渐地凉起来。

我们恢复了读词的事情。

每天晚上，二更锣一响，我们就阖上那本小册子。“喊杨嫂领你们去睡罢，”母亲温和地说。

我们向母亲道了晚安，带着疲倦的眼睛，走出去。“杨嫂，我们要睡了。”

“来了！来了！”杨嫂的高身材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她常常牵着我走。她的手比母亲的粗得多。

我们走过了堂屋，穿过大哥的房间。

有时候我们也从母亲的后房后面走。

我们进了房间。房里有两张床：一张是我同三哥睡的，另一张是杨嫂一个人睡的。

杨嫂爱清洁。所以她把房间和床铺都收拾得很干净。她不许我们在地板上吐痰，也不许我们在床上翻斤斗。她还不许我们做别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并不恨她，我们喜欢她。临睡时，她叫我们站在旁边，等她把被褥铺好。她给我们脱了衣服，把我们送进了被窝。

“你不要就走开！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她正要放下帐子，我们就齐声叫起来。

她果然就在床沿上坐下来，开始给我们讲故事。有时候我们要听完了一

个满意的故事才肯睡觉。有时候我们就在她叙述的中间闭上了眼睛，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什么神仙、剑侠、妖精、公子、小姐……我们都不去管了。生活就是这样和平的。

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愤怒。只有平静的喜悦。然而刚刚翻过了冬天，情形又改变了。

晚上我们照例把那本小册子阖起来交给母亲。

外面响着二更的锣。

“喊你们二姐领你们去睡罢。杨嫂病了。”

母亲亲自把我们送到房间里。二姐牵着三哥的手，我的手是母亲牵着的。母亲照料着二姐把我们安置在被窝里，又嘱咐我们好好地睡觉。

母亲走了以后，我们两个睁开眼睛望着帐顶，然后又掉过脸对望着。

二姐在另一张床上咳了几声嗽。

她代替杨嫂来陪伴我们。她就睡在杨嫂的床上，不过被褥帐子完全换过了。

我们不能够闭眼睛，因为我们想起了杨嫂。

三堂后边，右边石阶上的一排平房里面，第四个房间，没有地板，一盏瓦油灯放在破方桌上面……

那是杨嫂从前住过的房间。

她现在生病，又回到那里去了，就躺在她那张床上。

外面石阶下是光秃的桑树。

在我们的房里推开靠里一扇窗望出去，看得见杨嫂的房间。

那里很冷静，很寂寞。

除了她这个病人外，就只有袁嫂睡在那里。可是袁嫂事情多，睡得迟。

我们以后就没有再看见杨嫂，只知道她在生病，虽然常常有医生来给她看脉，她的病还是没有起色。

二姐把我们照料得很好。还有香儿给她帮忙。她晚上也会给我们讲故事。

我渐渐地把杨嫂忘记了。

“我们去看杨嫂去！”

一天下午我们刚刚从书房里出来，三哥忽然把我的衣襟拉一下，低声对我说。

“好！”我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

我们跑到三堂后面，很快地就到了右边石阶上的第四个房间。

没有别人看见我们。

我们推开掩着的房门，进去了。

阴暗的房里没有声音，只有触鼻的臭气。在那张矮矮的床上，蓝布帐子放下了半幅。一幅旧棉被盖着杨嫂的下半身。她睡着了。

床面前一个竹凳上放着一碗黑黑的药汤，已经没有热气了。

我们胆怯地走到了床前。

纸一样白的脸。一头飘蓬的乱发。眼睛闭着。嘴微微张开在出气。一只手从被里垂下来，一只又黄又瘦的手。

我有点不相信这个女人就是杨嫂。

我想起那张笑脸，我想起那张讲故事的嘴，我想起大堆的桑葚和一瓶一瓶的桑葚酒。

我仿佛在做梦。

“杨嫂，杨嫂。”我们兄弟两个齐声喊起来。

她的鼻子里发出一个细微的声音。她那只垂下来的手慢慢地动了。

身子也微微动着。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

眼睛睁开了，闭了，又睁开得更大一点。她的眼光落在我们两个的脸上。

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好像要笑。

“杨嫂，我们来看你！”三哥先说，我也跟着说。

她勉强笑了，慢慢地举起手抚摩三哥的头。

“你们来了。你们还记得我。……你们好罢？……现在哪个在照应你们？……”

声音是多么微弱。

“二姐在照应我们。妈妈也来照应我们。”

三哥的声音里似乎淌出了眼泪。

“好。我放心了。……我多么记挂你们啊！……我天天都在想你们。……我害怕你们离了我觉得不方便……”

她说话有些吃力，那两颗失神的眼珠一直在我们弟兄的脸上转，眼光还是像从前那样地和善。

她这样看人，把我的眼泪也引出来了。

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这只手是冷冰冰的。

她的眼光停留在我的脸上。

“四少爷，你近来淘不淘气？……多谢你还记得我。我的病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的。”

我的眼泪滴到她的手上。

“你哭了！你的心肠真好。不要哭，我的病就会好的。”她抚着我的头。

“你不要哭，我又不是大花鸡啊！”

她还记得大花鸡的事情，跟我开起玩笑来。

我并不想笑，心里只想哭。

“你们看，我的记性真坏！这碗药又冷了。”

她把眼光向外面一转，瞥见了竹凳上的药碗，便把眉头一皱，说着话就要撑起身子来拿药碗。

“你不要起来，我来端给你。”

三哥抢着先把药碗捧在手里。

“冷了吃不得。我去喊人给你煨热！”三哥说着就往外走。“三少爷，你快端回来！冷了不要紧，吃下去一样。你快不要惊动别人，人家会怪我花样多。”她费力撑起身子，挣红了脸，着急地阻止三哥道。

三哥把药碗捧了回来，泼了一些药汤在地上。

她一把夺过了药碗，把脸俯在药碗上，大口地喝着。她抬起头来，把空碗递给三哥。

她的脸上还带青红色。

她用手在嘴上一抹，抹去了嘴边的药渣，颓然地倒下去，长叹一声，好像已经用尽了力气。

她闭上眼睛，不再睁开看我们一眼。鼻子里发出了轻微的响声。

她的脸渐渐地在褪色。

我们默默地站了半晌。

房间里一秒钟一秒钟地变得阴暗起来。

“三少爷，四少爷，四少爷，三少爷！”

在外面远远地香儿用她那带调皮的声音叫起来。

“走罢。”

我连忙拉三哥的衣襟。

我们走到石阶上，就被香儿看见了。

“你们偷偷跑到杨大娘房里去过了。我要去告诉太太。”香儿走过来，见面就说出这种话。她得意地笑了笑。“太太吩咐过我不要带你们去看杨大娘，”她又说。“你真坏！不准你向太太多嘴！我们不怕！”

香儿果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

母亲并没有责骂我们。她只说我们以后不可以再到杨嫂的房间里去。不过她并没有说出理由来。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像水流一般地快。

然而杨嫂的病不但不曾好，反而一天天地加重了。我们经过三堂后面那条宽的过道，往四堂里去的时候，常常听见杨嫂的奇怪的呻吟声。

听说她不肯吃药。听说她有时候还会发出怪叫。

人一提起杨嫂，马上做出恐怖的、严肃的表情。

“天真没有眼睛：像杨嫂这样的好人怎么生这样的病！”母亲好几次一面叹气，一面说。

但是我不知道杨嫂究竟生的是什么病。

我只知道广元县没有一个好医生，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说。

又过了好几天。

“四少爷，你快去看，杨大嫂在吃虱子！”

一个下午，我比三哥先放学出来，在拐门里遇到香儿，她拉着我的膀子，对我做了一个怪脸。

“我躲在门外头看。她解开衣服捉虱子，捉到一个就丢进嘴里，咬一口。她接连丢了好几个进去。她一面吃，一面笑，一面骂。她后来又脱了裹脚布放在嘴里嚼。真脏！”

香儿极力在摹仿杨嫂的那些动作。

“我不要看！”

我生气地挣脱了香儿的手，就往母亲的房里跑。

虱子、裹脚布，在我的脑子里无论如何跟杨嫂连不起来。杨嫂平日很爱干净。

我不说一句话，就把头放在母亲的怀里哭了。

母亲费了好些功夫来安慰我。她含着眼泪对父亲说：

“杨嫂的病不会好了。我们给她买一副好点的棺材罢。她服侍我们这几年，很忠心。待三儿、四儿又是那样好，就跟自己亲生的差不多！”

母亲的话又把我的眼泪引出来了。

我第一次懂得死字的意义了。

可是杨嫂并不死，虽然医生已经说病是无法医治的了。她依旧活着，吃虱子，嚼裹脚布，说胡话，怪叫。每个人对这件事情都失掉了兴趣，谁也不再到她的房门外去偷看、偷听了。

一提起杨嫂吃虱子……，大家都不高兴地皱着眉头。“天呀！有什么法子使她早死，免得受这种活罪。”大家都希望她马上死，却找不到使她早死

的办法。一个堂勇提议拿毒药给她吃，母亲第一个反对。

但是杨嫂的存在却使得整个衙门笼罩了一种忧郁的气氛。无论谁听说杨嫂还没有死，马上就把脸沉下来，好像听见了一个不祥的消息。

许多人的好心都希望一个人死，这个人却是他们所爱的人。然而他们的希望终于实现了。

一个傍晚，我们一家人在吃午饭。

“杨大娘死了！”

香儿气咻咻地跑进房来，开口就报告这一个好消息。袁嫂跟着走进来证实了香儿的话。

杨嫂的死是毫无疑问的了。

“谢天谢地！”

母亲马上把筷子放下。

全桌子的人都嘘了一口长气，好像长时期的忧虑被一阵风吹散了。

仿佛没有一个人觉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然而谁也无心吃饭了。

我最先注意到母亲眼里的泪珠。

健康的杨嫂的面影在我的眼前活泼地出现了。

我终于把饭碗推开，俯在桌子上哭了。

我哭得很伤心，就像前次哭大花鸡那样。同时我想起了杨嫂的最后的话。

一个多月以后母亲对我们谈起了杨嫂的事情：

她是一个寡妇。她在我们家里做了四年的老妈子。

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就只有这一点点。

她跟着我们从成都来，却不能够跟着我们回成都去。

她没有家，也没有亲人。

所以我们就把她葬在广元县。她的坟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坟前有没有石碑，或者碑上刻着什么字。

“在阴间(鬼的世界)大概无所谓家乡罢，不然杨嫂倒做了异乡的鬼了，”母亲偶尔感叹地对人说。

在清明节和中元节，母亲叫人带了些纸钱到杨嫂的坟前去烧。

就这样地，“死”在我的眼前第一次走过了。

我也喜欢读书，因为我喜欢我们的教读先生。

这个矮矮身材白面孔的中年人有种种办法取得我们的敬爱。

“刘先生。”

早晨一走进书房，我们就给他行礼。

他带笑地点点头。

我和三哥坐在同一张条桌前，一个人一个方凳子，我们觉得坐着不方便，就跪在凳子上面。

认方块字，或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刘先生待我们是再好没有的了。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一句，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微笑。

母亲曾经叫贾福传过话，请刘先生不客气地严厉管教我们。

但是我从不知道严厉是怎么一回事。我背书背不出，刘先生就叫我慢慢地重读。我愿意什么时候放学，我就在什么时候出去，三哥也是。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更喜欢书房。

而且在充满阳光的书房里看大哥和两个姐姐用功读书的样子，看先生的温和的笑脸，看贾福的和气的笑脸，我觉得很高兴。

先生常常在给父亲绘地图。

我不知道地图是什么东西，拿来做什么用。

可是在一张厚厚的白纸上绘出许多条纤细的黑线，又填上各种的颜色，究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还有许多奇怪的东西，例如现今人们所称为圆规之类的仪器。

绘了又擦掉，擦了又再绘，刘先生那种俯着头专心用功的样子，仿佛还在我的眼前。

“刘先生也很辛苦啊！”我时时偷偷地望先生，这样地想起来。

有时候我和三哥放了学，还回到书房去看先生绘地图。

刘先生忽然把地图以及别的新奇的东西收起来，笑嘻嘻地对我们说：

“我今晚上给你们画一个娃娃。”

这里说的娃娃就是人物图的意思。

不用说，我们的心不能够等到晚上，我们就逼着他马上绘给我们看。

如果这一天大哥和二姐、三姐的功课很好，先生有较多的空时间，那么用不着我们多次请求，他便答应了。

他拿过那本大本的线装书，大概是《字课图说》罢，随便翻开一页，就把一方裁小了的白纸蒙在上面，用铅笔绘出了一个人，或者还有一两间房屋，或是还有别的东西。然后他拿彩色铅笔涂上了颜色。

“这张给你！”

或者我，或者三哥，接到了这张图画：脸上总要露出十分满意的笑容。

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图画。因为这些图画我们更喜欢刘先生。

图画一张一张地增加，我的一个小木匣子里面已经积了几十张图画了。

我一直缺少玩具，所以把这些图画当作珍宝。

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要把这些图画翻看好一会儿。

红的、绿的颜色，人和狗和房屋……它们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

然而这些画还不能够使我满足。我梦想着那张更大的图画：有狮子、有老虎、有豹子、有豺狼、有山、有洞……

这张画我似乎在《字课图说》，或者别的书上见过。先生不肯绘出来给我们。

有几个晚上我们也跑到书房里去问先生讨图画。

大哥一个人在书房里读夜书，他大概觉得寂寞罢。

我们站在旁边看先生绘画，或者填颜色。

忽然墙外面响起了长长的吹哨声。

先生停了笔倾听。

“在夜里还要跑多远的路啊！”

先生似乎也怜悯那个送鸡毛文书的人。

“他现在又要换马了！”

于是轻微的马蹄声去远了。

那个时候紧要的信函公文都是用专差送达的。送信的专差到一个驿站就要换一次马，所以老远就吹起哨子来。

先生花了两三天的功夫，终于在一个下午把我渴望了许久的有山、有洞、有狮子、有老虎、有豹、有狼的图画绘成功了。

我进书房的时候，正看见三哥捧着那张画快活地微笑。

“你看，先生给我的。”这是一张多么可爱的画，而且我早就梦见先生绘出来给我了。但是我来迟了一步，它已经在三哥的手里了。

“先生，我要！”我红着脸，跑到刘先生的面前。“过几天我再画一张给你。”

“不行，我就要！我非要不可！”

我马上就哭出来，不管先生怎样劝，怎样安慰，都没有用。同时我的哭也没有用。先生不能够马上就绘出同样的一张画。于是我恨起先生来了。我说他是坏人。

先生没有生气，他依旧笑嘻嘻地向我解释。

然而三哥进去告诉了母亲。大哥和二姐把我半拖半抱地弄进了母亲的房里。

母亲带着严肃的表情说了几句责备的话。

我止了泪，倾听着。我从来就听从母亲的吩咐。

最后母亲叫我跟着贾福到书房里去，向先生赔礼；她还要贾福去传话请先生打我。

我低着头让贾福牵着我的手再到书房里去。

但是我并没有向先生赔礼，先生也不曾打我一下。反而先生让我坐在方凳上，他俯着身子给我系好散开了的鞋带。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枕头边拿出那个木匣子，把里面所有的图画翻看了一遍，就慷慨地全送给了三哥。

“真的？你自己一张也不要？”

三哥惊喜地望着我，有点莫名其妙。

“我都不要！”我毫无留恋地回答他。

在那个时候我有一种近乎“不完全，则宁无”的思想。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再也没有向先生要过图画了。

春天。萌芽的春天。嫩绿的春天。到处散布生命的春天。

一天一天地我看见桑树上发了新芽，生了绿叶。

母亲在本地蚕桑局里选了六张好种子。

每一张皮纸上面布满了芝麻大小的淡黄色的蚕卵。

蚕卵陆续变成了极小的蚕儿。

蚕儿一天一天地大起来。

家里的人为了养蚕的事情忙着。

大的簸箕里面摆满了桑叶，许多根两寸长的蚕子在上面爬着。

大家又忙着摘桑叶。

这样的簸箕一个一个地增加。它们占据了三堂后面左边的两间平房。这两间平房离我们的房间最近。

每天晚上半夜里，或是母亲或是二姐，三姐，或是袁嫂，总有一次要经过我们房间的后门到蚕房去加桑叶。常常是香儿拿着煤油灯或者洋烛。

有时候我没有睡着，就在床上看见煤油灯光，或者洋烛光。可是她们却以为我已经睡熟了，轻脚轻手地在走路。

有时候二更锣没有响过，她们就去加桑叶，我也跟着到蚕房去看。

浅绿色的蚕在桑叶上面蠕动，一口一口地接连吃着桑叶。簸箕里一片沙沙的声音。

我看见她们用手去抓蚕，就觉得心里像被人搔着似地发痒。

那一条一条的软软的东西。

她们一捧一捧地把蚕沙收集拢来。

对于母亲，这蚕沙比将来的蚕丝还更有用。她养蚕大半是为了要得蚕沙的缘故。

大哥很早就有冷骨风的毛病，受了寒气便要发出来。一发病就要痛三四天。

“不晓得什么缘故，果儿会得到这种病，时常使他受苦。”

母亲常常为大哥的病担心，看见人就问有什么医治这个病的药方，那时候在广元似乎没有好医生。但是老妈子的肚皮里有种种古怪的药方。

母亲也相信她们，已经试过了不少的药方，都没有用。

后来她从一个姓薛的乡绅太太那里得到了一个药方，就是：把新鲜的蚕沙和着黄酒红糖炒热，包在发痛的地方，包几次就可以把病治好。

在这个大部分居民拿玉蜀黍粉当饭吃的广元县里，黄酒是买不到的。母亲便请父亲托人在合州带了一坛来预备着。

接着她就开始养蚕。

父亲对母亲养蚕的事并不赞成。母亲曾经养过一次蚕。有一回她忘记加桑叶，蚕因此饿死了许多。后来她稍微疏忽一点，又让老鼠偷吃了许多蚕去。她心里非常难过，便发誓以后不再养蚕了。父亲害怕她又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不管父亲怎样劝阻她，不管背誓的恐惧时时折磨她，她终于下了养蚕的决心。

这一年大哥的病果然好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薛太太的药方生了效。不过后来母亲就同薛太太结拜了姊妹。

以后我看见蚕在像山那样堆起来的一束一束的稻草茎上结了不少白的、黄的茧子，我有时也摘下了几个茧子来玩。

以后我看见人搬了丝车来，把茧子一捧一捧地放在锅里煮，一面就摇着丝车。

以后我又看见堂勇们把蚕蛹用油煎炒了，拌着盐和辣椒吃，他们不绝口地称赞味道的鲜美。

“做条蚕命运也很悲惨啊！”我有时候会这样地想起来。

父亲在这里被人称做“青天大老爷”。他常常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上的公案前面审案。下面两旁站了几个差人（公差），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板子：有宽的，那是大板子；有窄的，那是小板子。

“大老爷坐堂！……”

下午，我听见这一类的喊声，知道父亲要审案了，就找个机会跑到二堂上去，在公案旁边站着看。

父亲在上面问了许多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些。被问的人跪在下面，一句一句地回答，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好几个人。

父亲的脸色渐渐地变了，声音也变了。

“你胡说！给我打！”父亲猛然把桌子一拍。

两三个差人就把犯人按倒在地上，给他褪下裤子，露出屁股。一个人按住他，别的人在旁边等待着。

“给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说！他这个混帐东西不肯说实话！”“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啊！”

那个人趴在地上杀猪也似地叫起来。

于是两个差役拿了小板子左右两边打起来。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真是冤枉啊！”

“胡说！你招不招？”

那个犯人依旧哭着喊冤枉。

屁股由白而红，又变成了紫色。

数到了一百，差人就停住了板子。

“禀大老爷，已经打到一百了。”

屁股上出了血，肉开始在烂了。

“你招不招？”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无话可招啊！”

“你这个东西真狡猾！不招，再打！”

于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打着板子，一直打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被打的人就由差役牵了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说：

“给大老爷谢恩。”

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个道理我许久都想不出来。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

打屁股差不多是坐堂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父亲坐在公案前面几乎每次都要说：“给我拉下去打！”

有时候父亲还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罚：叫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两三次差人们还放了一盘铁链在犯人的两腿下面。

由黄变红、由红变青的犯人的脸色，从盘着辫子的头发上滴下来的汗珠，杀猪般的痛苦的叫喊……

犯人口里依旧喊着：“冤枉！”

父亲的脸阴沉着，好像有许多黑云堆在他的脸上。

“放了他罢！”

我在心里要求着，却不敢说出口。这时候我只好跑开了。

我把这件事对母亲讲了。

“妈，为什么爹在坐堂的时候跟在家里的时候完全不同？好像不是一个人！”

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见他骂过人。

母亲温和地笑了。

“你是小孩子，不要多管闲事。你以后不要再去爹坐堂。”

我并不听母亲的话，因为我的确爱管闲事。而且母亲也不曾回答我的问题。

“你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人家究竟也是父母养的。我昨晚看见‘跪抬盒’，听到犯人的叫声心都紧了，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觉得心里难过吗？”

一个上午，房里没有别人的时候，我听见母亲温和地对父亲这样说。

父亲微微一笑。

“我何尝愿意多用刑？不过那些犯人实在狡猾，你不用刑，他们就不肯招。况且刑罚又不是我想出来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没有县官的样子！”

“恐怕也会有屈打成招的事情。”

父亲沉吟了半晌。

“大概不会有的，我定罪时也很仔细。”

接着父亲又坚决地说了一句：

“总之我决不杀一个人。”

父亲的确没有判过一个人的死罪。在他做县官的两年中间只发生了一件命案。这是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犯人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他亲手把一个同伴砍成了几块。

父亲把案子悬着，不到多久我们就回成都了。所以那个青年的结局我也不知道了。

母亲的话在父亲的心上产生了影响。以后我就不曾看见父亲再用“跪抬盒”的刑罚了。

而且大堂外面两边的站笼里也总是空的，虽然常常有几个戴枷的犯人蹲在那里。

打小板子的事情却还是常有的。

有一次，离新年还远，仆人们在门房里推牌九，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后来父亲知道了，就去捉了赌，把骨牌拿来叫人抛在厕所里。

父亲马上坐了堂，把几个仆人抓来，连那个管监的刘升和何厨子都在内，他们平时对我非常好。

他们都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认错，求饶。

“给我打，每个人打五十再说！”

父亲生气地拍着桌子骂。

差人们都不肯动手，默默地望着彼此的脸。

“喊你们给我打！”父亲更生气了。

差人大声应着。但是没有人动手。

刘升他们在下面继续叩头求饶。

父亲又怒吼了一声，就从签筒里抓了几根签掷下来。这时候差人只得动手了。

结果每个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叩了头谢恩走了。我心里很难过，马上跑到门房里去。许多人围着那几个挨了打的人，在用烧酒给他们揉伤处。

我听见他们的呻吟声，不由得淌出眼泪来。我说了些讨好他们的话。

他们对我仍旧很亲切，没有露出一丝不满意的樣子。又有一次，我看见领九妹的奶妈挨了打。

那时九妹在出痘子，依照中医的习惯连奶妈也不许吃那些叫做“发物”的食物。

不知道怎样，奶妈竟然看见新鲜的黄瓜而垂涎了。做母亲的女人的感觉特别锐敏。她会在奶妈的嘴上嗅出了黄瓜的气味。

一个晚上奶妈在自己的房里吃饭，看见母亲进来就露出了慌张的样子，把什么东西往枕头下面一塞。

母亲很快地就走到床前把枕头掀开。

一个大碗里面盛着半碗凉拌黄瓜。

母亲的脸色马上变了，就叫人去请了父亲来。

于是父亲叫人点了明角灯，在夜里坐了堂。

奶妈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里让两个差人拉着她的两只手，另一个差人

隔着她的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打她的背。

一，二，三，四，五……

足足打了二十下。

她哭着谢了恩，还接连分辩说她初次做奶妈，不知道轻重，下次再不敢这样做了。

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晨母亲就叫了她的丈夫来领她去了。

这个年轻的奶妈临走的时候脸色凄惨，眼角上还滴下泪珠。

我为这个情景所感动而下泪了。

我后来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待她。

母亲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她不说别的话。

以后也没有人提起这个奶妈的下落。

母亲常常为这件事情感到后悔。她说那个晚上她忘记了自己，做了一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

我只看见母亲发过这一次脾气。

记得一天下午三哥为了一件小事情，摆起主人的架子把香儿痛骂了一顿，还打了她几下。

香儿向母亲哭诉了。

母亲把三哥叫到她面前去，温和地向他解释：

“丫头同老妈子都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的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骂人打人。我不愿意让你以后再这样做。你要好好地记住。”

三哥埋下头，不敢说话。香儿高兴地在旁边暗笑。

三哥垂着头慢慢地往外面走。

“三儿，你不忙走！”

三哥又走到母亲的面前。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要听我的话。你懂得吗？你记得吗？”

三哥迟疑了半晌才回答说：

“我懂……我记得。”

“好，拿云片糕去。喊香儿陪你们去耍。”

母亲站起来，在连二柜上放着的磁缸里取了两叠云片糕递给我们。

我也懂母亲的话，我也记得母亲的话。

但是现在母亲也做了一件残酷的事情。

我为这件事情有好几天不快活。

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

在宣统做皇帝的最后一年，父亲就辞了官回成都去了，虽然那个地方有许多人挽留他。

在广元的两年的生活我的确过得很愉快，因为在这里人人都对我好。我们家添了两个妹妹：九妹和十妹。

这两年中间我只挨过一次打，因为祖父在成都做生日，这里敬神，我不肯磕头。

母亲用鞭子在旁边威胁我，也没有用。

结果我挨了一顿打，哭了一场，但是我始终没有磕一个头。这是我第一次挨母亲的鞭子。

从小时候起我就讨厌礼节。而且这种厌恶还继续发展下去。父亲在广元做了两年的县官，回到成都以后买了四十亩田。别人还说他是一个“清官”。

家庭的环境

我们回到成都，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而且不久革命就爆发了。

我当时一点也不懂什么叫做革命，更谈不到拥护或者害怕，只有十月十八日的兵变给我留下了一个恐怖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仍旧在书房里读书。一天一天听见教书先生（他姓龙）用激动的声音讲起当时川汉铁路的风潮。

龙先生是个新党，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开说出反对清朝政府的话。不过对于被捕的七个请愿代表他却表示大的尊敬，而且他不喜欢当时的总督赵尔丰。

二叔和三叔从日本留学回来不过一两年。他们的辫子是在日本剪掉了的（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两个人的辫子都剪掉了，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剪掉了辫子），现在他们戴上了假的辫子。有些人在背后挖苦他们，骂他们是革命党。

我的脑后垂着一根小小的、用红头绳缠的硬辫子；我每天早晨都要母亲或者老妈子给我梳头，我觉得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因此我倒喜欢那些主张剪掉辫子的革命党。

旧历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冥寿），家里的人忙着摆供。

下午就听说外面风声不大好。

五点钟光景，父亲他们正在堂屋里磕头。忽然一个仆人进来报告：外面发生了兵变，好几家银行和当铺都被抢了。我们二伯父的公馆也遭到变兵的光顾。

其实后一个消息是不确实的。二伯父的公馆虽然离我们这里很近，但是在当时谁也失掉了判断力，况且二伯父一家又是北门一带的首富，很有遭抢劫的可能。

于是堂屋里起了一个小小的骚动，众人马上四散了。各人回到房里去想“逃难”的办法。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片刻，大家就忙乱起来。

一个仆人帮忙父亲把地板撬开一块，从立柜里取出十几封银圆放在地板下面。后来他们又放了好几封银圆在后花园的井里。又有人忙着搬梯子来，把几口红皮箱放到顶楼板上上面去，那里是藏东西的地方。

同时母亲叫人雇了几乘轿子来，把我们弟兄姊妹带到外祖母家里去。大哥陪着父亲留在家里。

我和母亲坐在一乘轿子里面。母亲抱着我。我不时偷偷地拉起轿帘看外面的街景。

街上有些人在跑。好几乘轿子迎面撞过来。没有看见一个变兵。

晚上我们都挤在外祖母房里，大家都不说话。

外面起了枪声，半个天空都染红了。一个年轻的舅父在窗下对我们说话。这些话都是很可怕的。

外祖母闭着眼睛念佛。

后来附近一带突然起了嘈杂的人声。好像离这里只有十几步路的赵公馆给变兵打进去了。

闹声、哭声、枪声、物件撞击声……响成了一片。

外祖母逼着母亲逃走，母亲不肯。大家争论了片刻，母亲就带着我们到了后面天井里。外祖母一定不肯走，她说她念佛吃素多年了，菩萨会保佑她。

天是红的。几株树上有乌鸦在叫。枪声，我们也听得很清楚。

母亲发出了几声绝望的叹息。她还关心到外祖母，关心到父亲。

舅父给我们搬了梯子来。墙并不高。一个老妈子先爬到墙外去。然后母亲、三哥、我都爬过去了。接着我的两个姐姐也爬了过去。

墙外是一个菜园。我们在菜畦里躲了好些时候，简直顾不到寒冷了。

后来我们看见没有什么动静，才到那个管菜园的老太婆的茅棚里坐了一夜。

那个老太婆亲切地招待我们，还给我们弄热茶来喝。

母亲一晚上都在担心家里的事情。第二天十九日的上午外面平静了，她就带着我一个人先回家。父亲和大哥惊喜地迎接我们。

父亲告诉我们：昨晚半夜里果然有十几个变兵撬了大门进来。家里已经有了准备。十几个堂勇端起火药枪在二门外的天井里排成了两排，再加上三叔的两个镖客（三叔在南充做知县，刚刚从那里回来）。变兵看见这里人多，不敢动手，只说来借点路费。父亲叫人拿了一封银元出来送给他们，他们就走了。只损失了这一百圆。以后再也没有变兵进来过。

这一晚上在家里就只有父亲和大哥照料着。叔父和婶娘们都避开了，祖父也到别处去了。这一天是母亲和我的生日，但是家里已经忘了这件事情。从此我们就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地板下面的银元自然取了出来。井里的却不知道给谁拿去了，父亲叫人来淘了两次井，都没有找到。

赵尔丰被革命党捉住杀头的消息使龙先生非常高兴，同时在我们的家里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印象。在以后许多天里，我们都听见人们在谈论赵尔丰被杀头的事情。

共和革命算是成功了。

二叔和三叔头上的假辫子也取了下來。再没有人嘲笑他们的“秃头”了。

在一个晴明的下午，仆人姜福（他不知道从哪里刚学会了剪发的手艺）找了一把剪发的洋剪刀，把我和三哥的小辫子剪掉了。

接着我们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仆人中有一两个不肯剪的，却不留心在街上给警察强迫剪去了。

我们家里开始做新的国旗。照例由父亲管这些事情。他拿一大块白洋布摊在方桌上，先用一个极大的碗，把墨汁涂了碗口，印了一个大圆形在布上，然后用一个小杯子在大圆形的周围印了十八个小圈。在大圆形里面写了一个“汉”字，十八个小圈代表当时的十八省。

我对于做国旗的事情感到兴趣。但是不久中华民国成立，我们家里又把大汉旗收起，另外做了五色旗。

祖父因为革命而感到悲哀。父亲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二叔断送了他的四品的官。三叔却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三叔还是一个诗人，写过不少诗词。祖父也是诗人，还印过一册诗集《秋棠山馆诗钞》送人。父亲和二叔却不常做诗。

至于我们这一辈，虽然大都是小孩子，但是对于清朝政府的灭亡，都觉得高兴。

清朝倒了。我们依旧在龙先生的教导下面读书。但是大哥不久就进了中学。

两年半以后，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死在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旧历七月的一个夜里。

母亲病了二十多天。她在病中是十分痛苦的。一直到最后一天，她还很清醒，但是人已经不能够动了。

我和三哥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每次我们到病床前看她，她总要流眼泪。

在我们兄弟姊妹中间，母亲最爱我，然而我也不能够安慰她，减轻她的痛苦。

母亲十分关心她的儿女。她临死前五天还叫大哥到一位姨母处去借了一对金手镯来。她嫌样子不好看，过了两天她又叫大哥拿去还了，另外在二伯母那里去借了一对来。这是为大哥将来订婚用的。她在那样痛苦的病中还想到这些事情。

我和三哥都没有看见母亲死。那个晚上因为母亲的病加重，父亲很早就叫老妈子照料我们睡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棺材已经进门了。

我含着眼泪，心里想着我是母亲最爱的孩子。

棺材放在签押房里。闭殓的时候，两个人手里拿着红绫的两头预备放下去。许多人围着棺材哭喊。我呆呆地望着母亲的没有血色的脸。我恨不能把以后几十年的眼光都用来在这个时候饱看她。

红绫终于放下去了。它掩盖了母亲的遗体。漆匠再用木钉把它钉牢。几个人就抬着棺盖压上去。

二姐和三姐不肯走开，她们伤心地哭着，把头在棺材上面撞。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听见签押房里两个姐姐的哀哀的哭声。我不能够闭上眼睛。我的眼泪也淌了出来。我怜悯我的两个姐姐。我也怜悯我自己。

早晨我也会被她们的哭声惊醒。我就躺在床上，含着眼泪祷告母亲保佑我的两个姐姐。

白天我常常望着签押房里灵帷前母亲的放大照像。我心里想着这时候母亲在什么地方。

家祭的一夜，我们三弟兄匍匐地跪在灵前蒲团上，听着张二表哥诵读父亲替我们做好的一篇祭文。

……吾母竟弃不孝等而长逝矣……不孝等今竟为无母之人矣……

诵读的声音很可笑。我不过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我细嚼着这两句话的滋味，我的眼泪滴在蒲团上了。

第二天灵柩就抬了出去，先寄殡在城外一座古庙里，后来安葬在磨盘山。父亲在一个坟墓里做好了两个穴。左边的一个是留给他自己用的。三年后他果然睡在那个穴里面了。

灵柩抬出去以后，家里的一切恢复了原状。母亲房里的陈设跟母亲在时并没有两样，只多了一张母亲的放大半身照像。

常常我走进父亲的房间，看不见母亲，还以为她在后房里，便温和地叫了一声“妈”。但是我马上就想起母亲已经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了。

我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跟有母亲的堂兄弟们比起来，我深深地感到了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

也许是为了填补这个缺陷罢，父亲后来就为我们接了一个更年轻的母亲来。

这位新母亲待我们也很好。但是她并不能够医好我心上的那个伤痕。她不能够像死去的母亲那样地爱我，我也不能够像爱亡母那样地爱她。

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原是两个彼此不了解的陌生的人。

母亲死后四个多月的光景二姐也死了。

二姐患的是所谓“女儿痲”的病。我们回到成都不久她就病了。有一次她几乎死掉，后来有人介绍四圣祠医院的一个英国女医生来治好了她。

因此母亲叫人买了刀叉做了西餐，请了四圣祠医院的几个“洋太太”到我们家里来吃饭。这是我们第一次跟西洋人接触。她们都会说中国话。我觉得她们也很和气。

母亲同那几个英国女医生做了朋友。她带着我到她们的医院里去玩过几次，也去看过病。她们送了我们一些西洋点心和好几本书。我很喜欢那本皮面精装的《新旧约全书》官话译本。不过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去读它。母亲死后，我们就没有跟那几个英国女医生来往了。

母亲一死，二姐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大概是过分的悲痛毁坏了她的身体。

她一天天地瘦弱起来，脸上没有一点血色，面孔也是一天比一天地憔悴。她常常提起母亲就哭，我很少看见她笑过。

“妈，你看二姐多可怜，你要好好地保佑二姐啊！”我常常在暗中祷告。

但是二姐的病依旧没有起色。父亲请了许多名医来给她诊断，都没有用。

冬天一到，二姐便睡倒了。谁看见她，都会叹息地说：她瘦得真可怜。

旧历十一月二十八日是祖父的生日，从那一天起，我们家里接连唱了三天戏。戏台在大厅上，天井里坐了十几桌客。全家的人带着笑容跑来跑去。

二姐一个人病在房里，听见这些闹声，她一定很难受。晚上客人散去了大半，父亲便叫人把二姐扶了出来，远远地坐在阶上看戏。

二姐坐在一把藤椅上，不能动，用失神的眼光茫然地望着戏台。我不知道她眼里看见的是什么景象。

脸瘦成了一张尖脸，嘴唇也枯了。我的心为爱、为怜悯而痛苦了。

“我要进去，”二姐把头略略一偏，做出不能忍耐的样子低声说。老妈子便把她扶了进去。

三天以后二姐就永远闭了她的眼睛。她也死在天明以前。那时候我在梦里，不能够看见她的最后一刻是怎样过去的。

我那天早晨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到了一个坟场。地方很宽，长满了草。中间有一座陌生人的坟。坟后长了几株参天的柏树。仿佛是在春天的早晨。阳光在树梢闪耀，坟前不少的野花正开出红的、黄的、蓝的、白的花朵。两三只蝴蝶在花间飞舞。树枝上还有些山鸟在唱歌。

我站在坟前看墓碑上刻的字，一阵微风把花香送进我的鼻子里。忽然坟后面响起了哭声。

我惊醒了。心跳得很厉害。我在床上躺了片刻。哭声依旧在我的耳边荡漾。我分辨出来这是三姐的哭声。

我感到了恐怖。我没有疑惑：二姐死了。

父亲忙着料理二姐的后事。过了一会儿，姨外婆坐了轿子来数数落落地哭了一场。

回到成都以后我还是一个小孩。能够同我在一块儿玩的，就只有三哥和几个年纪差不多的堂、表弟兄，此外还有几个仆人。在广元陪我们玩的香儿已经死了。

大哥已经成人。他喜欢和姐姐、堂姐、表姐们一块儿玩。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我们这一辈的男男女女很多。我除了两个胞姐和三个堂姐外还有好几个表姐。她们和大哥的感情都很好。她们常常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时候大哥就忙起来。姐姐、堂姐、表姐聚在一块儿，她们给大哥起了一个“无事忙”的绰号。

游戏的种类是很多的。大哥自然是中心人物。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行酒令。酒令有好几种，大哥房里就藏得有几副酒筹。

常常在傍晚，大哥和她们凑了一点钱，买了几样下酒的冷菜，还叫厨子做几样热菜。于是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来，一面行令，一面喝酒，或者谈一些有趣味的事情，或者评论《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外，没有一个人不曾读过《红楼梦》。父亲在广元买了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石印小本。大哥后来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我常常听见人谈论《红楼梦》，当时虽然不曾读它，就已经熟悉了书中的人物和事情。

后来有两个表姐离开了成都，二姐又跟着母亲死了。大哥和姐姐们的聚会当然没有以前那样地热闹，但是也还有新的参加者，譬如两个表哥和一个年轻的叔父（六叔）便是。我和三哥也参加过两三次。

不过我的趣味是多方面的。我跟着三哥他们组织了新剧团，又跟着六叔他们组织了侦探队。我还常常躲在马房里躺在轿夫的破床上烟灯旁边听他们讲青年时代的故事。

有一个时期我和三哥每晚上都要叫姜福陪着到可园去看戏。可园演的有川戏，也有京戏。我们一连看了两三个月。父亲是那个戏园的股东，有一厚本免费的戏票。而且座位是在固定的包厢里面，用不着临时去换票。我们爱看武戏，回来在家里也学着翻斤斗，翻杠杆。

父亲喜欢京戏。当时成都戏园加演京戏聘请京班名角，这种事情大半由他主持。由上海到成都来的京班角色，在登台之前常常先到我们家来吃饭。自然是父亲请客。他们有时也在我们的客厅里清唱。

有一次父亲请新到的八九个京班名角在客厅里吃饭。饭后大家正在花园里玩，那个唱老旦的宝幼亭（我们先听过了他的唱片）忽然神经错乱，跪在地上赌咒般地说了好些话。众人拉他，他不肯走，把父亲急得没有办法。我们在旁边觉得好笑。我和这些戏子都很熟，有时我还跟着父亲到后台去看他们化妆。

一个唱青衣的小孩名叫张文芳，年纪不过十四五岁，当时在成都也受人欢迎。他的哥哥本来也唱青衣，如今嗓子坏了不再登台了，就管教弟弟，靠着弟弟过活。他也到我们家里来过一次。他完全是个小孩，并没有一点女人气。然而在戏里他却改换面目做了种种的薄命的女人。我看惯了他演的那些悲剧，一点也不喜欢。但是有一次离新年不远，我跟着父亲到了他们住的地方（大概就是在戏园里面），看见他穿一身短打，手里拿了一把木头的关刀寂寞地舞着，我不觉望着他笑了。我和他玩了好一会儿，问答了一些事情，直到父亲来带我回家的时候。我想，他的生活一定是很寂寞的罢。

然而说句公平的话，父亲对待戏子的态度很客气，他把他们当作朋友，所以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他并没有玩过小旦。

三叔却不同，他喜欢一个川班的小旦李凤卿。祖父也喜欢李凤卿。有一次祖父带我去看戏。李凤卿包了头穿着粉红衫子在台上出现以后，祖父带笑

地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人。

李凤卿时常来找三叔。他也常常同我们谈话。他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会写一手娟秀的字。他虽然穿着男人的衣服，但是举动和说话都像女人，有时候手上、脸上还留着脂粉。

有一次三叔把李凤卿带到我们客厅里来化装照相。我看见他在那里包头，擦粉，踩骄。他先装扮成一个执长矛的古代的女将，后来就改扮做一个旗装贵妇。这两张照片后来都挂在三叔的房里，三叔还亲笔题了诗在上面。

李凤卿的境遇很悲惨。后来在祖父死后不多久他也病死了，剩下一个妻子，连埋葬费也没有。还是三叔出钱把他安葬了的。

三叔做了一副挽联吊他，里面有“……也当忍死须臾，待侬一诀”的话。

二叔也做过一副挽联，我还记得上下联的后半句是：“……哪堪一曲广陵，竟成绝响。……惆怅落花时节，何处重逢。”

后来二叔偶尔和教书先生谈起这件事情，那个六十岁的曹先生不觉惊讶地问道：

“××先生竟然也好此道？他不愧是一位风雅士！”

这“××先生”是指三叔。三叔在南充做知县的时候，曹先生是那个县的教官。曹先生到我们家来教书还是三叔介绍的。李凤卿当时在南充唱戏，三叔在那里认识了他。

听见“风雅士”三个字，就跟平日听见曹先生说的“大清三百年来深仁厚泽沦肌髓”的话一样，我觉得非常肉麻。

二叔对曹先生谈起李凤卿的生平。他本是一个小康人家的子弟。十三四岁时给仇人抢了去，因为他家里不肯出钱赎取，他就被人坏了身子卖到戏班里去，做了旦角。

五叔后来也玩过川班的旦角。他还替他们编过剧本。

我们组织过一个新剧团，在桂堂后面竹林里演新剧。竹林前面有一块空地，就做了我们的舞台。我们用复写纸印了许多张戏票送人，拉别人来看我们的表演。

我们的剧本是自己胡乱编的，里面没有一个女角。主要演员是六叔、二哥（二叔的儿子）、三哥和香表哥；我和五弟（也是二叔的儿子）两个只做配角，或者在戏演完以后做点翻杠杆的表演。看客多半是女的，就是姐姐、堂姐、表姐们。我们用种种方法强迫她们来看，而且一定要戏演完才许她们走。

父亲也被我们拉来了。他居然坐在那里看完我们演的戏。他又给我们编了一个叫做《知事现形记》的剧本。二哥和三哥扮着戏里面两个主角表演得有声有色的时候，父亲也哈哈地笑起来。

在公馆里我有两个环境，我一部分时间跟所谓“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时间又跟所谓“下人”在一起生活。

我常常爱管闲事，我常常在门房、马房、厨房里面和仆人、马夫们一起玩，常常向他们问这问那，因此他们都叫我做“稽查”。

有时候轿夫们在马房里煮饭，我就替他们烧火，把一些柴和枯叶送进那个柴灶里去。他们打纸牌时，我也在旁边看，常常给那个每赌必输的老唐帮忙。有时候他们也诚恳地对我倾吐他们的痛苦，或者坦白地批评主人人们的好坏。他们对我什么事都不隐瞒。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同情他们的小朋友。我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们也毫不吝惜。

我生活在仆人、轿夫的中间。我看见他们怎样怀着原始的正义的信仰过那种受苦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看见他们怎样跟贫苦挣扎而屈服、而死亡。六十岁的老书童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后来做了乞丐，死在街头。一个老轿夫离开我们家，到斜对面一个亲戚的公馆里当看门人，不知道怎样竟然用一根裤带吊死在大门里面。这一类的悲剧以及那些活着的“下人”的沉重的生活负担，如果我一一叙述出来，一定会使最温和的人也无法制止他的愤怒。

我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听那些老轿夫在烟灯旁叙述他们痛苦的经历，或者在门房里黯淡的灯光下听到仆人发出绝望的叹息的时候，我眼里含着泪珠，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这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我同他们的友谊一直继续到我离开成都的时候。不过我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以后，就很少有时间在门房和马房里面玩了。接着我又参加了社会运动。

我早就不到厨房里去了，因为我不高兴看谢厨子和老妈子调情（他后来就同祖父的一个老妈子结了婚，那个女人原是一个寡妇），而且谢厨子仗着祖父喜欢他，常常欺凌别人，也使我不同意他，虽然我从前常常到厨房去看他烧菜做点心。

我愈是多和“下人”在一起，愈是讨厌“上人”中间那些虚伪的礼节和应酬。有两次在除夕全家的人在堂屋里敬神，我却躲在马房里轿夫的破床上。那里没有人，没有灯，外面有许多人叫我，我也不应。我默默地听着爆竹声响了又止了，再过一会儿我才跑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家里平日敬神的时候，我也会设法躲开。我为了这些事情常常被人嘲笑，但是我始终照自己的意思做。

六叔、二哥、香表哥三个人合作办了一种小说杂志，名称就叫《十日》，一个月出三本，每本用复写纸抄了五六份。

我是杂志的第一个订户。大哥把他那篇最得意的哀情小说在《十日》杂志第一期上面发表了，所以他们也送他一份。还有一个奉表哥也投了一篇得意的稿子。

在我们家里大哥是第一个写小说的人。他的小说是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旧句开始的。奉表哥的小说是以“杏花深处，一角红楼，”的句子开始的。接着就是“斗室中有一女郎在焉。女郎者何，×其姓，××其名，”诸如此类的公式文章。把“女郎”两个字改作“少年”就成了另一篇小说。小说的结局离不掉情死，后面还有一封情人的绝命书。

我对于《十日》杂志上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感不到兴趣。而且我亲眼看见他们写小说时分明摊开了好几本书在抄袭。这些书有尺牋，有文选，有笔记，有上海新出的流行小说和杂志。小说里每段描写景物的四六句子，照例是从尺牋或者文选上面抄来的。他们写小说并不费力。不过对于那三个创办杂志的人的抄录、装订、绘图的种种苦心我却非常佩服。

《十日》杂志出版了三个月，我只花了九个铜元的订费，就得到厚厚的九本书。

民国六年春天成都发生了第一次巷战。在这七天川军同滇军的巷战中，我看见了不止一个可怕的流血景象。

在这时候二叔的两个儿子，二哥和五弟突然患白喉症死了。我在几天的

功夫就失掉了两个同伴。

他们本来可以不死，但是因为街上断绝了行人，请不到医生来治病，只得让他们躺在家里，看着病一天天地加重。等到后来两个轿夫背着他们跨过战壕，冒着枪林弹雨赶到医院时，他们已是奄奄一息了。

战事刚刚停止，我和三哥也患了喉症。我们的病还没有好，父亲就病死了。

父亲很喜欢我。他平时常常带着我一个人到外面去玩。在他的病中他听说我的病好多了，想看我，便叫人来陪我到他的房里去。

我走到床前，跪在踏脚凳上，望着他的憔悴的脸，叫了一声“爹”。

“你好了？”他伸出手抚摩我的头。“你要乖乖的。不要老是拼命叫‘罗嫂！罗嫂！’你要常常来看我啊！”罗嫂是在我们病中照料我们的那个老妈子。

父亲微微笑了。

“好，你回去休息罢。”过了半晌父亲这样吩咐了一句。

第三天父亲就去世了。他第一次昏过去的时候，我们围在床前哭唤他。他居然醒了转来。我们以为他不会死了。

但是不到一刻钟光景，他又开始在床上抽气了。我们看着他一秒钟一秒钟地死下去。

于是我的环境马上改变了。好像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剧变。

满屋子都是哭声。

晚上我和三哥坐在房间里，望着黯淡的清油灯光落泪。大哥忽然走进来，在床沿上坐下去，哭着说：“三弟，四弟，我们……如今……没有……父亲……了……”

我们弟兄三个痛哭起来。

自从父亲接了继母进来以后，我们就搬到左边厢房里住。后来祖父吩咐把我们紧隔壁的那间停过母亲灵柩的签押房装修好，做了大哥结婚时的新房。大哥和嫂嫂就住在我们的隔壁。

这时候嫂嫂在隔壁听见了我们的哭声，便走过来劝慰大哥。他们夫妇埋着头慢慢地出去了。

父亲埋葬了以后，我心里更空虚了。我常常踟躅在街头，我总觉得父亲在我的前面，仿佛我还是依依地跟着父亲走路，因为父亲平时不大喜欢坐轿，常常带了我在街上慢步闲走。

但是一走到行人拥挤的街心，跟来往的人争路时，我才明白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从此我就失掉了人一生只能够有一个的父亲了。

父亲死后不久，成都又发生了更激烈的巷战。结果黔军被川军赶走了，全城的房屋烧毁了很多。不用说我们受了惊，可是并没有大的损失。

我们自然有饭吃，只是缺少蔬菜和油荤。

在马房里轿夫们喝着烧酒嚼着干锅魁（大饼）来充塞肚里的饥饿，他们买不到米做饭。

枪炮声，火光，流血，杀人，以及种种残酷的景象。而且我们偶尔也挨近了死的边缘。……

巷战不久就停止了。然而军阀割据的局面却一直继续下去，到现在还没有打破。

三哥已经进了中学，但是父亲一死，我进中学的希望便断绝了，祖父从来不成送子弟进学校读书，现在又没有人出来替我讲话。

我便开始跟着香表哥念英文。每天晚上他到我们家里来教我，并不要报酬。这样继续了三年。他还帮助我学到一点其它的知识。祖父死后我和三哥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我就没有时间跟着香表哥念书。他后来结了婚，离开了成都，到乐山教书去了。

香表哥（他的本名是濮季云）是一个真挚而又聪明的青年。当时像他那样有学识的年轻人，在我们亲戚中间已经是很难得的了。然而家庭束缚了他，使他至今还在生活的负担下面不断地发出绝望的呻吟，白白地浪费了他的有为的青春。

但是提起他，我却不能不充满了感激。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是得到两个人的帮助的，其中的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是大哥，大哥买了不少的新书报，使我能够贪婪地读完了它们。而且我和三哥一块儿离开成都到上海，以及后来我一个人到法国去念书，都少不了他的帮助。虽然为着去法国的事情我跟他起过争执，但是他终于顺从了我的意思。

在我的心里永远藏着对于这两个人的感激。我本来是一个愚蠢的、孤僻的孩子。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也许我至今还是一个愚蠢的、孤僻的人罢。

父亲的死使我懂得了更多的事情。我的眼睛好像突然睁开了，我更看清了我们这个富裕大家庭的面目。

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友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像沉重的石块重重地压着。

我的身子给绑得太紧了，不能够动弹。我也不能够甩掉肩上的重压。我把全部的时间用来读书。书本却蚕食了我的健康。

我一天一天地瘦下去。父亲死后的一年中间我每隔十几天就要病倒一次，而且整个冬天一直在吞丸药。

第二年秋天我进了青年会的英文补习学校。祖父知道了这件事情，也不干涉，因为他听说学会英文可以考进邮局工作，他又知道邮局的薪水相当高，薪水是现金，而且逐年增加，位置又稳固，不会因政变或其它的人事变动而失业。我的一位舅父当时是邮局的一个高级职员，亲友们都羡慕他的这个“好位置”。

我在青年会上了一个月的课就生了三次病。祖父知道了便要我在家里静养。不过他同意请香表哥到我们家里来正式教我念英文，还吩咐按月送束脩给香表哥。其实所谓束脩的数目也很小，不是一元，便是两元。

自从父亲死后，祖父对我的态度也渐渐地改变。他开始关心我、而且很爱我。后来他听见人说牛奶很“养人”，便出钱给我订了一份牛奶。他还时常把我叫到他的房里去，对我亲切地谈一些做人处世的话。甚至在他临死前发狂的一个月中间他也常常叫人把我找去。我站在他的床前，望着他。他的又黑又瘦的老脸上露出微笑，眼里却淌了泪水。

以前在我们祖孙两个中间并没有感情。我不曾爱过祖父，我只是害怕他；而且有时候我还把他当作专制、压迫的代表，我的确憎恨过他。

但是在他最后的半年里不知道怎样，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对他也开始发生了感情。

然而时间是这么短！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旧历），我就失掉了他。

新年中别的家庭里充满了喜悦，爆竹声挨门挨户地响起来。然而在众人的欢乐中，我们一家人却匍匐在灵前哀哀地哭着死去的祖父。

这悲哀一半是虚假的，因为在祖父死后一个多星期的光景，叔父们就在他的房间里开会处分了他的东西，而且后来他们还在他的灵前发生过争吵。

可惜祖父没有知觉了，不然他对于所谓“五世同堂”的好梦也会感到幻灭罢。我想他的病中的发狂决不是没有原因的。

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曾祖死后，做了多年的官，后来“告归林下”。他买了不少的田产，修了漂亮的公馆，收藏了好些古玩字画。他结过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五儿一女，还见到了重孙（大哥的儿子）。结果他把儿子们造成了彼此不相容的仇敌，在家庭里种下了长期争斗的根源，他自己依旧免不掉发狂地死在孤独里。并没有人真正爱他，也没有人真正了解他。

祖父一死，家庭就变得更黑暗了。新的专制压迫的代表起来代替了祖父，继续拿旧礼教把“表面是弟兄，暗中是仇敌”的几房人团结在一起，企图在二十世纪中维持封建时代的生活方式。结果产生了更多的争斗和倾轧，造成了更多的悲剧，而裂痕依旧是一天一天地增加，一直到最后完全崩溃的一天。

祖父像一个旧家庭制度的最后的卫道者那样地消失了。对于他的死我并没有遗憾。虽然我在哀悼失掉了一个爱我的人，但是同时我也庆幸我获得了自由。从这天起在我们家里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支配我的行动了。

祖父死后不到半年，在一九二二年暑假我和三哥就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从补习班读到预科、本科，在那里接连念了两年半的书。在学校里因为我没法交出中学毕业文凭，后来改成了旁听生，被剥夺了获得毕业文凭的权利。这件事情竟然帮助我打动了继母和大哥的心，使他们同意我抛弃了学业同三哥一路到上海去。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春天在枪林弹雨中保全了性命以后，我和三哥两个就离开了成都的家。大哥把我们送到木船上，他流着眼泪离开了我们。那时候我的悲哀是很大的。但是一想到近几年来我的家庭生活，我对于旧家庭并没有留恋。我离开旧家庭不过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但是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在那里呻吟憔悴地等待宰割，我因此不能不感到痛苦。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间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的尸体，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陈旧的礼教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

一个理想在前面向我招手，我的眼前是一片光明。我怀着大的勇气离开了我住过十七年的成都。

那时候我已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且参加了社会运动，创办了新的刊物，并且在刊物上写了下面的两个短句作为我的生活的目标了：

奋斗就是生活，
人生只有前进。

做大哥的人

我的大哥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到父母的宠爱，在书房里又得到教书先生的称赞。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母亲也很满意这样一个“宁馨儿”。

他在爱的环境里逐渐长成。我们回到成都以后，他过着一位被宠爱的少爷的生活。辛亥革命的前夕，三叔带着两个镖客回到成都。大哥便跟镖客学习武艺。父亲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想使他做一个“文武全才”的人。

每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大哥便起来，穿一身短打，在大厅上或者天井里练习打拳使刀。他从两个镖客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全套本领。我常常看见他在春天的黄昏舞动两把短刀。两道白光连接成了一根柔软的丝带，蛛网一般地掩盖住他的身子，像一颗大的白珠子在地上滚动。他那灵活的舞刀的姿态甚至博得了严厉的祖父的赞美，还不说那些胞姐、堂姐和表姐们。

他后来进了中学。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他又名列第一。他得到毕业文凭归来的那一天，姐姐们聚在他的房里，为他的光辉的前程庆祝。他们有一个欢乐的聚会。大哥当时对化学很感兴趣，希望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念书，将来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美丽的幻想。

然而不到几天，他的幻想就被父亲打破了，非常残酷地打破了。因为父亲给他订了婚，叫他娶妻了。

这件事情他也许早猜到一点点，但是他料不到父亲就这么快地给他安排好了一切。在婚姻问题上父亲并不体贴他，新来的继母更不会知道他的心事。

他本来有一个中意的姑娘，他和她中间似乎发生了一种旧式的若有若无的爱情。那个姑娘是我的一个表姐，我们都喜欢她，都希望他能够同她结婚。然而父亲却给他另外选了一个张家姑娘。

父亲选择的方法也很奇怪。当时给大哥做媒的人有好几个，父亲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父亲不能够决定这两个姑娘中间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的媳妇，因为两家的门第相等，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地大。后来父亲就把两家的姓写在两方小红纸块上面，揉成了两个纸团，捏在手里，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了一个纸团。父亲拈了一个“张”字，而另外一个毛家的姑娘就这样地被淘汰了。（据说母亲在时曾经向表姐的母亲提过亲事，而姑母却以“自己已经受够了亲上加亲的苦，不愿意让女儿再来受一次”这理由拒绝了，这是三哥后来告诉我的。拈阄的结果我却亲眼看见。）

大哥对这门亲事并没有反抗，其实他也不懂得反抗。我不知道他向父亲提过他的升学的志愿没有，但是我可以断定他不会向父亲说起他那若有若无的爱情。

于是嫂嫂进门来了。祖父和父亲因为大哥的结婚在家里演戏庆祝。结婚的仪式自然不简单。大哥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了三天的戏。在这些日子里他被人宝爱着像一个宝贝；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他似乎有一点点快乐，又有一点点兴奋。

他结了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媳妇，我们有了嫂嫂，别的许多人也有了短时间的笑乐。但是他自己也并非一无所得。他得到了一个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她年轻，她读过书，她会做诗，她会画画。他满意了，在短时

期中他享受了以前所不曾梦想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中他忘记了他的前程，忘记了升学的志愿。他陶醉在这个少女的温柔的抚爱里。他的脸上常带笑容，他整天躲在房里陪伴他的新娘。

他这样幸福地过了两三个月。一个晚上父亲把他唤到面前吩咐道：“你现在接了亲，房里添出许多用钱的地方；可是我这两年来入不敷出，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用，我只好替你找个事情混混时间，你们的零用钱也可以多一点。”

父亲含着眼泪温和地说下去。他唯唯地应着，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可是回到房里他却倒在床上伤心地哭了一场。他知道一切都完结了！

一个还没有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地走进了社会。他没有一点处世的经验，好像划了一只独木舟驶进了大海，不用说狂风大浪在等着他。

在这些时候他忍受着一切，他没有反抗，他也不知道反抗。

月薪是二十四元。为了这二十四元月薪他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然而灾祸还不曾到止境。一年以后父亲突然死去，把我们这一房的生活的担子放到他的肩上。他上面有一位继母，下面有几个弟弟妹妹。

他埋葬了父亲以后就平静地挑起这个担子来。他勉强学着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来处理一切。我们一房人的生活费用自然是由祖父供给的。（父亲的死引起了我们大家庭第一次的分家，我们这一房除了父亲自己购置的四十亩田外，还从祖父那里分到了两百亩田。）他用不着在这方面操心。然而其它各房的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却使他难于应付。他永远平静地忍受了一切，不管这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愈来愈厉害。他只有一个办法：处处让步来换取暂时的平静生活。

后来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祖父第一次看见了重孙，自然非常高兴。大哥也感到了莫大的快乐。儿子是他的亲骨肉，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实现他那被断送了的前程。

他的儿子一天一天长大起来，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得到了我们大家的喜爱。

接着五四运动发生了。我们都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他买了好些新书报回家。我们（我们三弟兄和三房的六姐，再加上一个香表哥）都贪婪地读着一切新的书报，接受新的思想。然而他的见解却比较温和。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把这种理论跟我们大家庭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

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旧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气十足的少爷；在他同我们一块儿谈话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了。这种生活方式是我和三哥所不能够了解的，我们因此常常责备他。我们不但责备他，而且时常在家里做一些带反抗性的举动，给他招来祖父的更多的责备和各房的更多的攻击与陷害。

祖父死后，大哥因为做了承重孙（听说他曾经被一个婢娘暗地里唤做“承重老爷”），便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到处磕头作揖想讨好别人，也没有用处；同时我和三哥的带反抗性的言行又给他招来更多的麻烦。

我和三哥不肯屈服。我们不愿意敷衍别人，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主张，我们对家里一切不义的事情都要批评，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和婢娘。他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威权。他们只好在大哥的身上出气，

对他加压力，希望通过他使我们低头。不用说这也没有用。可是大哥的处境就更困难了。他不能够袒护我们，而我们又不能够谅解他。

有一次我得罪了一个婊娘，她诬我打肿了她的独子的脸颊。我亲眼看见她自己在盛怒中把我那个堂弟的脸颊打肿了，她却牵着堂弟去找我的继母讲理。大哥要我向她赔礼认错，我不肯。他又要我到二叔那里去求二叔断公道。但是我并不相信二叔会主张公道。结果他自己代我赔了礼认错，还受到了二叔的申斥。他后来到我的房里，含着眼泪讲了一两个钟头，惹得我也淌了泪。但是我并没有答应以后改变态度。

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他一个人平静地代我们受了好些过，我们却不能够谅解他的苦心。我们说他的牺牲是不必要的。我们的话也并不错，因为即使没有他代我们受过承担了一切，叔父和婊娘也无法加害到我们的身上来。不过麻烦总是免不了的。

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来了。他那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还不到四岁，就害脑膜炎死掉了。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的悲哀是很大的。

他的内心的痛苦已经深到使他不能够再过平静的生活了。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现象。他称这种现象做“痰病”。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

后来他居然帮助我和三哥（二叔也帮了一点忙，说句公平的话，二叔后来对待大哥和我们相当亲切）同路离开成都，以后又让我单独离开中国。他盼望我们几年以后学到一种专长就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但是我和三哥两个都违背了他的期望。我们一出川就没有回去过。尤其是我，不但不进工科大学，反而因为到法国的事情写过两三封信去同他争论，以后更走了与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不仅他对我绝了望，而且成都的亲戚们还常常拿我来做坏子弟的榜样，叫年轻人不要学我。

我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那时三哥在北平，没有能够来上海看他。我们分别了六年如今又有机会在一起谈笑了，两个人都很高兴。我们谈了别后的许多事情，谈到三姐的惨死，谈到二叔的死，谈到家庭间的种种怪现象。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但是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

他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月。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我把他送到了船上。他已经是泪痕满面了。我和他握了手说一句：“一路上好好保重。”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了我。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拿出一张唱片给我，一面抽咽地说：“你拿去唱。”我接到手一看，是 G.F. 女士唱的“Sonny Boy”，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谋得利洋行买的。他知道我喜欢听这首歌，所以想起了把唱片拿出来送给我。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样地爱听它。这时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欢的东西从他的手里夺去。但是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抗过他的劝告了，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使他难过。表弟们在下面催促我。我默默地接过了唱片。我那时的心情是不能够用文字表达的。

我和表弟们坐上了划子，让黄浦江的风浪颠簸着我们。我望着外滩一带的灯光，我记起我是怎样地送别了一个我所爱的人，我的心开始痛起来，我的不常哭泣的眼睛里竟然淌下了泪水。

他回到成都写了几封信给我。后来他还写过一封诉苦的信。他说他会自

“SonnyBoy”：格蕾西·菲尔兹唱的《宝贝儿子》。

杀，倘使我不相信，到了那一天我就会明白一切。但是他始终未说出原因来，所以我并不曾重视他的话。

然而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果然就用毒药断送了他的年轻的生命。两个月以后我才接到了他的二十几页的遗书。在那上面我读着这样的话：

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我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是借贷来的，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些，二则不受时间影响。用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作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顺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罢。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

这就是大哥自杀的动机了。他究竟是为了顾全绅士的面子而死，还是因为不能够忍受未来的更痛苦的生活，我虽然熟读了他的遗书，被里面一些极凄惨的话刺痛了心，但是我依旧不能够了解。我只知道他不愿意死，而且他也没有死的必要。我知道他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了，甚至在第四次的遗书里他还不自觉地喊着：“我不愿意死。”然而他终于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吞食了自己摘下的苦果而死去了。结果他在那般虚伪的绅士眼前失掉了面子，并且把更痛苦的生活留给他的妻子和一儿四女（其中有四个我并未见过）。我们的叔父婶娘们在他死后还到他的家里逼着讨他生前欠的债；至于别人借他的钱，那就等于“付之东流”了。

大哥终于做了一个不必要的牺牲者而死去了。他这一生完全是在敷衍别人，任人播弄。他知道自己已经逼近了深渊，却依旧跟着垂死的旧家庭一天一天地陷落下去，终于到了完全灭顶的一天。他便不得不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拿毒药做他唯一的拯救了。

他被旧礼教、旧思想害了一生，始终不能够自拔出来。其实他是被旧制度杀死的。然而这也是咎由自取。在整个旧制度大崩溃的前夕，对于他的死我不能有什么遗憾。然而一想到他的悲惨的一生，一想到他对我所做过的一切，一想到我所带给他的种种痛苦，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觉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

忆

啊，为什么我的眼前又是一片漆黑？我好像落进了陷阱里面似的。我摸不到一样实在的东西，我看不见一个具体的景象。一切都是模糊，虚幻。……我知道我又在做梦了。

我每夜都做梦。我的脑筋就没有一刻休息过。对于某一些人梦是甜蜜的。但是我不曾从梦里得到过安慰。梦是一种苦刑，它不断地拷问我。我知道是我的心不许我宁静，它时时都要解剖我自己，折磨我自己。我的心是我的严厉的裁判官。它比 Torquema-da 更残酷。

“梦，这真的是梦么？”我有时候在梦里这样地问过自己。同样，“这不就是梦么？”在醒着的时候，我又有过这样的疑问。梦境和真实渐渐地融合成了一片。我不再能分辨什么是梦和什么是真了。

薇娜·妃格念尔 关在席吕谢尔堡中的时候，她说过：“那冗长的、灰色的、单调的日子就像是无梦的睡眠。”我的身体可以说是自由的，但我不是也常常过着冗长的、灰色的、单调的日子么？

诚然我的生活里也有变化，有时我还过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然而这变化有的像电光一闪，光耀夺目，以后就归于消灭；有的甚至也是单调的。一个窒闷的暗夜压在我的头上，一只铁手扼住我的咽喉。所以便是这些灰色的日子也不像无梦的睡眠。我眼前尽是幻影，这些日子全是梦，比真实更压迫人的梦，在梦里我被残酷地拷问着。我常常在梦中发出叫声，因为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曾停止过挣扎。

这挣扎使我太疲劳了。有一个极短的时间我也想过无梦的睡眠。这跟妃格念尔所说的却又不同。这是永久的休息。没有梦，也没有真；没有人，也没有自己。这是和平。这是安静。我得承认，我的确愿望过这样的东西。但那只是一时的愿望，那只是在我的精神衰弱的时候。常常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时期，我的精神上又起了一种变化，我为这种愿望而感到羞惭和愤怒了。我甚至责备我自己的懦弱。于是我便以痛悔的心情和新的勇气开始了新的挣扎。

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过的是两重的生活。一种是为他人的外表生活，一种是为自己的内心生活，”我的灵魂里充满了黑暗。然而我不愿意拿这黑暗去伤害别人的心。我更不敢拿这黑暗去玷污将来的希望。而且当一个青年怀着了一颗受伤的心求助于我的时候，我纵不是医生，我也得给他一点安慰和希望，或者伴他去找一位名医。为了这个缘故，我才让我的心，我的灵魂扩大起来。我把一切个人的遭遇、创伤等等都装在那里，像一只独木小舟沉入大海，使人看不见一点影响。我说过我生来就带有忧郁性，但是那位作为“忧郁者”写了自白的朋友，却因为看见我终日的笑容而诧异了，虽然他的脸上也常常带着孩子的傻笑。其实我自己的话也不正确。我的父母都

Torquemada：十五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

薇娜·妃格念尔（V.Figner，1852—1942）：旧俄民粹派女革命家，在席吕谢尔堡监狱里给关了二十年。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五年侨居国外，后回国。她写了许多回忆录（《难忘的劳动》，1921—22年版）。

在这里我借用了妃格念尔的话。她还说：“——在外表上我不得不保持安静勇敢的面目，这个我做到了；然而在黑夜的静寂里我会带着痛苦的焦虑来想：末日会到来吗？——到了早晨我就戴上我的面具开始我的工作。”她用这些话来说明她被捕以前的心境。——作者注

不是性情偏执的人，他们是同样地温和、宽厚、安份守己，那么应该是配合得很完满的一对。他们的灵魂里不能够贮藏任何忧郁的影子。我的忧郁性不能够是从他们那里得来的。那应该是在我的生活环境里一天一天地磨出来的。给了那第一下打击的，就是母亲的死，接着又是父亲的逝世。那个时候我太年轻了，还只是一个应该躲在父母的庇护下生活的孩子。创伤之上又加创伤，仿佛一来就不可收拾。我在七年前给我大哥的信里曾写道：“所足以维系我心的就只有工作。终日工作，终年工作。我在工作里寻得痛苦，由痛苦而得满足。……我固然有一理想。这个理想也就是我的生命，但是我恐怕我不能够活到那个理想实现的时候。……几年来我追求光明，追求人间的爱，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结果我依旧得到痛苦。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还要以更大的勇气走我的路。”但是在这之前不久的另一封信里我却说过：“我在心里筑了一堵墙，把自己囚在忧郁的思想里。一壶茶，一瓶墨水，一管钢笔，一卷稿纸，几本书……我常常写了几页，无端的忧愁便来侵袭。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胸膛里激荡，我再也忍不下去，就掷了笔披起秋大衣往外面街上走了。”

在这两封信里不是有着明显的矛盾么？我的生活，我的心情都是如此的。这个恐怕不会被人了解罢。但是原因我自己却明白。造成那些矛盾的就是我过去的生活。这个我不能抹煞，我却愿意忘掉。所以在给大哥的另一封信里我又说：“我怕记忆。我恨记忆。它把我所愿意忘掉的事，都给我唤醒来了。”

的确我的过去像一个可怖的阴影压在我的灵魂上，我的记忆像一根铁链绊住我的脚。我屡次鼓起勇气迈着大步往前面跑时，它总抓住我，使我退后，使我迟疑，使我留恋，使我忧郁。我有一颗飞向广阔的天空去的雄心，我有一个引我走向光明的信仰。然而我的力气拖不动记忆的铁链。我不能忍受这迟钝的步履，我好几次求助于感情，但是我的感情自身被夹在记忆的钳子里也失掉了它的平衡而有所偏倚了。它变成了不健康而易脆弱。倘使我完全信赖它，它会使我在彩虹一现中随即完全隐去。我就会为过去所毁灭了。为我的前途计，我似乎应该撇弃为记忆所毒害了的感情。但是在我这又是势所不能。所以我这样永久地颠簸于理智与感情之间，找不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我的一切矛盾都是从这里来的。

我已经几次说过了和这类似的话。现在又来反复解说，这似乎不应该。而且在这时候整个民族的命运都陷在泥淖里，我似乎没有权利来絮絮地向人诉说个人的一切。但是我终于又说了。因为我想，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我在许多人的身上都看见和这类似的情形。使我们的青年不能够奋勇前进的，也正是那过去的阴影。我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倘使我们是失去过去生活的原始人，我们也许能够做出更多的事情来。

但是回忆抓住了我，压住了我，把我的心拿来肢解，把我的感情拿来拷打。它时而织成一个柔软的网，把我的身体包在里面；它时而燃起猛烈的火焰，来烧我的骨髓。有时候我会紧闭眼目，弃绝理智，让感情支配我，听凭它把我引到偏执的路上，带到悬崖的边沿，使得一个朋友竟然惊讶地嚷了出来：“这样下去除了使你成为疯子以外，还有什么？”其实这个朋友却忘了他自己也有不小的矛盾，他和我一样也是为回忆所折磨的人。他以为看人很清楚，却不知看自己倒糊涂了。他把自己看作人类灵魂的医生，他给我开了个药方：妥协，调和；他的确是一个好医生，他把为病人开的药方拿来让自

已先服了。然而结果药方完全不灵。这样的药医不了病。他也许还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我却知道唯一的灵药应该是一个“偏”字：不是跟过去调和，而是把它完全撇弃。不过我的病太深了，一剂灵药也不会立刻治好多年的沉痾。……

我又在做梦了。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不，我的眼前尽是些幻影。我的眼睛渐渐地亮了，那些人，那些事情。……难道我睡得这么深沉么？为什么他们能够越过这许多年代而达到我这里呢？

我全然在做梦了。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忘记了我自己。好像被一种力量拉着，我沉下去，我沉下去，于是我到了一个地方。难道我是走进了坟墓，或者另一个庞贝城被我发掘了出来？我看见了那许多人，那些都是被我埋葬了的，那些都是我永久失掉了的。

我完全沉在梦境里面了，我自己变成了梦中的人。一种奇怪的感情抓住了我。我由一个小孩慢慢地长大起来。我生活在许多我的同代人中间，分享他们的悲欢。我们的世界是狭小的。但是我们却把它看作宇宙般地广大。我们以一颗真挚的心和一个不健全的人生观来度我们的日子。我们有更多的爱和更多的同情。我们爱一切可爱的事物：我们爱夜晚在花园上面天空中照耀的星群，我们爱春天在桃柳枝上鸣叫的小鸟，我们爱那从树梢洒到草地上的月光，我们爱那使水面现出明亮珠子的太阳。我们爱一只猫，一只小鸟。我们爱一切的人。我们像一群不自私的孩子去领取生活的赐与。我们整天尽兴地笑乐，我们也希望别人能够笑乐。我们从不曾伤害过别的人。然而一个黑影来掩盖了我们的灵魂。于是忧郁在我们的心上产生了。这个黑影渐渐地扩大起来，跟着它就来了种种的事情。一个打击上又加第二个。眼泪、呻吟、叫号、挣扎，最后是悲剧的结局。一个一个年轻的生命横遭摧残。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悲痛的回亿给别人；有的就被打落在泥坑里面不能自拔……

啊，我怎么做了一个这么长久的梦！我应该醒了。我果然能够摆脱那一切而醒起来么？那许多生命，那许多被我爱过的生命在我的心上刻划了那么深的迹印，我能够把他们完全忘掉么？

我把这一切已经埋葬了这么多的年代，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有这样长的梦？这样痛苦的梦？甚至使我到今天还提笔来写《春》？

过去，回忆，这一切把我缚得太紧了，把我压得太苦了。难道我就永远不能够摆脱它而昂然地、无牵挂地去走我自己的路么？

我的梦醒了。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次了。我要摆脱那一切绊住我的脚的东西。我要摆脱一切的回亿。我要把它们全埋葬在一个更深的坟墓里，我要忘掉那过去的一切。

不管这是不是可能，我既然开始了我的路程，我既然跟那一切挣扎了这许多年代，那么，我还要继续挣扎下去。在永久的挣扎中活下去，这究竟是我度过生活的美丽的方法。

1936年5月

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

朋友，你要我告诉你关于那个老人的最后的事情。我现在不想说什么话，实在我也不能够说什么。我只给你写下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

在万国殡仪馆里面，我和一些年纪差不多的朋友，过了四天严肃而悲痛的日子。灵堂中静静地躺着那个老人，每天从早到晚，许许多多的人到这里来，一个一个地或者五六个人站成一排地向他致最深的敬礼。我立在旁边，我的眼睛把这一切全看进去了。

一个秃顶的老人刚走进来站了一下，忽然埋下头低声哭了。另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已经走出了灵堂，却还把头伸进帷幔里面来，红着眼圈哀求道：“让我再看一下罢，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灵堂里灯光不够亮。一群小学生恭敬地排成前后两列，一齐抬起头，痴痴地望着那张放大的照片。忽然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埋下头鞠躬了。其余的人马上低下头来。有的在第三次鞠躬以后，还留恋地把他们的头频频点着。孩子们的心是最真挚的。他们知道如今失掉一个爱护他们的友人了。“救救孩子”，我的耳边还仿佛响着那个老人的声音。

我所认识的一个杂志社的工友意外地来了。他红着脸在灵堂的一角站了片刻，孩子似地恭恭敬敬行了三个礼，然后悄悄地走开了。

我还看见一个盲人，他穿着一身整齐的西装，把一只手扶在另一个穿长衫的人的肩头，慢慢地从外面走进来。到了灵前那个引路人站住了。盲人从引路人的肩上缩回了手，向前移动一步，端端正正地立着，抬起他那看不见的眼睛茫然望了望前面，于是低下头，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他又伸出手，扶在引路人的肩上默默地退去了。

两个穿和服的太太埋着头，闭着眼睛，默默地合掌祷告了一会儿。我给她们拉帷幔的时候，我看见了她们脸上的泪痕，然后在帷幔外面响起了悲痛的哭声。

我的耳朵是不会误听的，像这样的哭声我每天至少要听到几次。我的眼泪也常常被它引了出来。

我的眼睛也是不会受骗的。我看见了穿粗布短衫的劳动者，我看见了抱着课本的男女学生，我也看见了绿衣的邮差、黄衣的童子军，还有小商人、小店员，以及国籍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的各种各类的人。在这无数不同的人的脸上，我看见了一种相同的悲戚的表情。这一切的人都是被这一颗心从远近的地方牵引到这里来的。

在这些时候我常常想：这个被我们大家敬爱着的老人，他真的就死去了？我不能相信。但是这些悲戚的面容，这些悲痛的哭泣却明白地告诉我，这个老人绝不会再坐起来，带着温和的笑容和我们交谈了。

二十一日夜里，已经过了十一点钟，我和几个朋友准备动身回家。灵堂里很静。我一个人走到灵柩前面，静静地站了四五分钟的光景。我借着黯淡的灯光，透过那玻璃棺盖，痴痴地望着我们所熟习的那张脸：眼睛紧紧地闭着，嘴也紧紧地闭着。一种温和的表情笼罩在这张脸上。没有死的恐怖。仿佛这个老人就落在深沉的睡眠里。这四周都是鲜花扎成的花圈和花篮，晚香玉的馥郁的香气一眼一股地沁入我的心肺。我不禁想着：这难道不是梦？我又想：倘使这个老人一翻身坐起来呢？

但是一个沉重的声音在我的心上叫起来：死了的不能够复活了。

死者的遗体是在这天下午入殓的。我跟着许多朋友行了礼以后，站在人丛中，等着遗体入殓。前面一片哭声刺痛我的心。我忍不下去了，含着眼泪回过头来，无意地看见那个高身材的朋友红着眼睛，伸出手拼命在另一个朋友的肩头上抓。我看见他心里难过，自己心里也更难受了。在这一刻满屋子人的心都是相同的，都有一样东西，这就是——死者的纪念。

出殡的日子我和一个朋友早晨七点半钟到了殡仪馆。别的朋友忙着在外面做事情。我一个人绕着灵柩走了一周，以后又站了片刻。我的眼前仍旧是那酣睡中的慈和的面颜，空气里依旧弥漫着浓郁的晚香玉的芬芳。我又一次想起来：这也许是梦罢，倘使他真的坐起来呢？

朋友，这不是梦。我们大家所敬爱的导师，这十年来我一直崇拜着的那位老人永远离开我们而去了。旁边花圈上一条白绸带写着“先生精神不死”。然而我心上的缺口却是永远不能填补的了。

我不能够这样地久站下去。瞻仰遗容的人开始接连地来。有的甚至是从远方赶来看他们所敬爱的老人最初的也就是最后的一面。“让我们多看几眼罢，”我伸手拉帷幔的时候，常常有人用眼睛这样地恳求。但地方是这样狭小，后面等着的人又有那么一长列，别的朋友也在催促。我怎么能够使每个人都多看他几眼呢？

下午两点钟，灵柩离开了殡仪馆，送葬的行列是很有秩序的。许多人悲痛地唱着挽歌。此外便是严肃的沉默。

到了墓地，举行了仪式以后，十三四个人抬起了灵柩。那个刚刚在纪念堂上读了哀词的朋友，突然从人丛中跑出来，把他的手掌也放在灵柩下面。我感动地想：在这一刻所有的心都被躺在灵柩中的老人连接在一起了。

在往墓穴去的途中，灵柩愈来愈重了。那个押柩车来的西洋人跑来感动地用英语问道：“我可以帮忙吗？”我点了点头。他默默地把手伸到灵柩下面去。

到了墓穴已经是傍晚了，大家把灵柩放下。一个架子上绑着两根带子，灵柩就放在带子上面。带子往下坠，灵柩也跟着缓缓地落下去。人们悲声低唱安息歌。在暮色苍茫中，我只看见白底黑字的旗子“民族魂”渐渐地往下沉，等它完全停住不动时，人们就把水门汀的墓盖抬了来。一下子我们就失去了一切。

“安息罢，安息罢……”这简直是一片哭声。

仪式完毕了，上弦月在天的一角露出来。没有灯光。在阴暗中群众像退潮似地开始散去。……

夜晚十点钟我疲倦地回到家里，收到了一个朋友的来信，他说：

……我如果不是让功课绊住，很想到殡仪馆去吊周先生。人死了，一切都成为神圣的了。他的人格实在伟大。他的文章实在深刻……

高身材的朋友：指郑振铎（1898—1958）。

朋友：指靳以。

读哀词的朋友：指胡愈之（1896—1986）。

写信的朋友：指李健吾（1906—1982）。

事实上，写信的人今天正午还到殡仪馆来过。我那时看见他，却不知道他已经寄发了这样的信。

我的书桌上摆了一本《中流》。我读了信，随手把刊物翻开，我见到这样的一句话，便大声念了出来：

他的垂老不变的青年的热情，到死不屈的战士的精神，将和他的深湛的著作永留人间。

朋友，我请你也记住这一句话。这是十分真实的。

1936年10月22日

死

像斯芬克司的谜那样，永远摆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字——死。

想了解这个字的意义，感觉到这个字的重量，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我如果从忙碌的生活中逃出来，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静静地思索片刻，像一个旁观者似地回溯我的过去，便发见在一九二八年我的日记的断片中，有两段关于死的话。一段的大意是：忽然想到死，觉得死逼近了，但自己却不甘心这样年轻就死去。自己用了最大的努力跟死挣扎，后来终于把死战胜了。另一段的大意是：今天一个人在树林中散步，忽然瞥见了死，心中非常安静，觉得死也不过如此。……我那时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话？当时的心情经过八九年岁月的磨洗，已经成了模糊的一片。我记得的是那时过着秋水似的平静的生活，地方是法国玛伦河畔的一个小城镇。在那里我不会看见惊心动魄的惨剧。我所指的“死”多半是幻象。

幻象有时也许比我所看见的情景更真切。我自小就见过一些人死。有的是慢慢地死去，有的死得快。但给我留下的却是同样的不曾被人回答的疑问：死究竟是什么？我常常好奇地想着我要来探求这个秘密。然而结果我仍是一无所获。没有一个死去的人能够回来告诉我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有时我一个人关在房里，夜晚不点灯，我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两只眼睛注意地望着黑暗。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依旧注意地望着。我也不用思想。这时死自然地来了，但也只是一刹那间的事，于是它又飘飘然走了。死并不可怕。自然死也不能诱人。死是有点寂寞的。岂止有点寂寞，简直是十分寂寞。

我那时的确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孩子（以后自然也是）。我把死看作一个奇异的所在。我一两次大胆地伸了头在那半掩着的门前一望。门里是一片漆黑。我什么东西都看不见。这探求似乎是徒然的。

有一次我和死似乎隔得很近。那是在成都发生巷战的时候。其实说巷战，还不恰当，因为另一方面的军队是在城外。城外军队用大炮攻城，炮弹大半落在我们家里，好几间房屋毁坏了，到处都是尘土，我们时时听见大炮声、屋瓦震落声与家人惊叫声。一家人散在四处，无法聚在一起，也不知道彼此的生死。我记得清楚，那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阴历），也就是所谓“花朝”（百花生日），午前十一点钟的光景。我起初还在大厅上踱着，后来听说家里的人大半都躲到后面新花园里去了，我便跑到书房里去。教书先生在那里，不过没有学生读书。不久三哥也来了。我们都不说话，静静地听着炮声。窗外是花园，从玻璃窗望出去，玉兰花刚开放，满树满枝的白玉花朵已经引不起我们的注意。他们垂着头坐在书桌前面。我躺在床上，头靠着床背后的板壁。炮弹带着春雷似的巨响从屋顶上飞过。我想，这一次它会落到我的头上来罢。只要一瞬的功夫，我便会落在黑暗里，从此人和我隔了一个世界，留给我的将是无穷的寂寞。……这时我的确感到很大的痛苦。死并不使我害怕。可怕的是徘徊在生死之间的那种不定的情形。我后来想，倘使那时真有一个炮弹打穿屋顶，向着我的头落下来，我会叫一声“完了”，就放心地闭上了眼睛，不会有别的念头。我用了“放心地”三个字，别人也许

希腊神话：斯芬克司是狮身女面、有双翼的怪物，常常坐在路旁岩石上，拦住行人，要他们猜一个难解的谜，猜不中的人便会给她弄死。

觉得奇怪。但实际上紧张的心情突然松弛了，什么留恋、耽心、恐怖、悔恨、希望，一刹那间全都消失得干干净净，那时心中确实是空无一物。爱德华·加本特在他的一本研究爱与死的书里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中，它（指死）是和平的，安静的，还带着一种深的放心的感觉，”这是很有理由的。

我还见过一次简单的死。川、黔军在成都城内巷战的时候，对门公馆里的一个轿夫（或者是马弁，因为那家的主人是什么参议、顾问之类）站在我家门前的太平缸旁边，跟人谈闲话。一颗子弹落在街心，再飞起来，打进了那个人的胸膛。他轻轻叫了一声，把手抚着胸倒在地上。什么惊人的动作也没有。他完结了，这么快，这么容易。这一点也不可怕，我又想起加本特的话来了。他说死人的脸上有时还会闪着一种忘我的光辉，好像新的生命已经预先投下它的光辉来了。他甚至在战地遗尸的脸上见过这样的表情。他以为死是生命的变形内的生命的解脱。

据说加本特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但是“死”这个谜到现在为止似乎还不曾得到一个确定的解答。我更爱下面的一种说法：死是“我”的扩大。死去同时也就是新生，那时这个“我”渗透了全宇宙和其它的一切东西。山、海、星、树都成了这个人的身体的一部分，这一个人的心灵和所有的生物的心灵接触了。这种经验是多么伟大，多么光辉，在它的面前一切小的问题和疑惑都消失了。这才是真正的和平，真正的休息。

这自然是可能的。我有时也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毕竟太美丽了。而且我不曾体验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我想到“死”的时候，从没有联想到这一个死法。我看见的是黑的门、黑的影子。倒是有一两次任何事情都不去想的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傍晚的天空和模糊的山影、树影，我觉得自己并不存在了，我与周围的一切合在一起变成了一样东西。然而这感觉很快地就消失了。要把它捉回来，简直不可能。但这和死完全没有关系，并不能证实前面的那种说法。

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我在前面说过没有一个死了的人能够回来告诉我关于死的事情。对于这句话我应该加以更正。我有一个朋友患伤寒症曾经死过几小时，后来被一位名医救活了。在国外的几个友人还为他开过一个追悼会。他后来对我谈起他的死，他说他那时没有一点知觉，死就等于无梦的睡眠。加本特认识一位太太，她患重病死了两三个钟头，家人正要给她举办丧事，她忽然活转来了。此后她又活了三四年。据说她对于死也没有什么清晰的感觉。但有一点她和我那位朋友不同。她是一个意志力极坚强的女人，她十分爱她的儿女，她不能舍弃他们，所以甚至在这无梦的睡眠中她还保持着她的“求生的意志”。这意志居然战胜了死，使她多活了几年。诗人常说“爱征服死”。爱的确可以征服死，这里便是一个证据。若就我那位朋友的情形来说，那却是“科学把死征服”了。

像这样的事情倒是我们常常会遇见的。然而从死过的人的口里我们却不曾听过一句关于死的恐怖的话。许多人在垂危的病中挣扎地叫着“我不要死”，可是等到死真的来了时，他（或她）又顺服地闭了眼睛。的确这无梦的睡眠，永久的安息，是一点也不可怕的。可怕的倒是等死。而且还是周围那些活着的人使“死”成为可怕的东西。那些眼泪，那些哭声，那些悲戚的面容……使人觉得死是一个极大的灾祸。而天堂地狱等等的传说更在“死”

见英国作家爱·加本特（1844—1929）的《爱与死的戏剧》。

上面罩了一个可怕的阴影。我在小孩时代就学会了怕死。别的许多人的遭遇和我的不会相差多远。

世间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怕死甘愿低头去做种种违背良心的事情。真正视死如归的勇士是不多见的。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布鲁诺上火柱……像这样毫不踌躇地为信仰牺牲生命的，古今来能有几人！

人怕死，就因为他不知道死，同时也因为不知道他自己。其实他所害怕的并不是死，我读过一部通俗小说，写一个被百口称作懦夫的人怎样变成勇敢的壮士。这是一个临阵脱逃的军官。别人说他怕死，他自己也以为他怕死。后来为环境所迫，他才发现了自己的真面目。他并不是一个怕死的人。他怕的却是“怕死”的“怕”字。他害怕自己到了死的时候会现出怯懦的样子，所以他逃避了。后来他真正和死对面时却没有丝毫的畏惧。许多人的情形大概都和这个军官的类似。真正怕死的人恐怕也是很少很少的罢。倘使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个，那么遍天下皆是勇士了。

“死”不仅是不可怕，它有时倒是值得愿望的，因为那才是真正的休息，那才是永久的和平。正如俄国政治家拉吉穴夫所说：“不能忍受的生活应该用暴力来毁掉，”一些人从“死”那里得到了拯救。拉吉穴夫自己就是服毒而死的（在一八二二年）。还有俄罗斯的女革命家，“五十人案”中的女英雄苏菲·包婷娜后来得了不治之病，知道没有恢复健康的希望了，她不愿意做一个靠朋友生活的废人，便用手枪自杀。那是一八八三年的事情。去年夏天《狱中记》的作者柏克曼在法国尼斯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患着重病，又为医生所误，两次的手术都没有用。他的目力也坏了。他不能够像残废者那样地过着日子。所以有一次在他发病的时候，他的女友出去为他请医生，躺在病床上的他却趁这个机会拿手枪打了自己。四十四年前他的枪弹不曾打死美国资本家亨利·福利克，这一次却很容易地杀死了他自己。在他留下的短短的遗书里依旧充满着爱和信仰。他这个人虽然只活了六十几岁，但他确实是知道怎样生，知道怎样死的。

在这样的行为里面，我们看不见一点可怕或者可悲的地方。死好像只是一件极平常、极容易、极自然的事情。甚至在所谓“卡拉监狱的悲剧”里，也没有令人恐怖的场面。我们且看下面的记载：

……波波何夫与加留席利二人都吞了三倍多的吗啡，很快地就失了知觉。夜里波波何夫还醒过一次。他听见加留席利喉鸣，他想把加留席利唤醒。他抱着他的朋友，在这个朋友的脸上狂吻了许久。后来他看见这个朋友不会再醒了，他又抓了一把鸦片烟吞下去，睡倒在加留席利的身边，永闭了眼睛。

谁会以为这是一个令人伤心断肠的悲剧呢？多么容易，多么平常（不过对于生者当然是很难堪的）。美国诗人惠特曼在美国内战的时期，曾在战地医院里服务，他一定见过许多人死，据他说在许多场合中“死”的到来是十分简单的，好像是日常生活里一件极普通的事情，“就像用你的早餐一样。”

通俗小说：指《四羽毛》，这是一本宣扬英帝国主义“功绩”的坏书。

《狱中记》：这是一个年轻人在美国监狱中十四年生活的记录。

“卡拉监狱的悲剧”：这是为了给一个女囚人雪耻的同盟自杀，参加者女囚人三个（先死），男囚人十四个。事情发生于一八八九年。雷翁·独意奇的《西伯利亚的十六年》中有详细的记载。

关于“死”的事情我写了八张原稿纸，我把问题整个地想了一下，我觉得我多少懂得了一点“死”。其实我真懂得“死”吗？

我自己也没有胆量来下一个断语。我的眼光正在书堆中旅行，它忽然落到了一本日文书上面停住了。我看书脊上的字：

死之忏悔 古田大次郎

我不觉吃了一惊，贯串着这一本将近五百页的巨著的，不就是同样的一个“死”字么？

“死究竟是什么呢？”

那个年轻的作者反复地问道。他的态度和我的的是不相同的。他不是作家，此外也不曾写过什么东西。其实他也不能够再写什么东西，这部书是他在死囚牢中写的日记，等原稿送到外面印成书时，作者已经死在绞刑台上了。我见过一张作者的照片，是死后照的。是安静的面貌，一点恐怖的表情也没有。不像是死，好像是无梦的睡眠。看见这照像就想到作者的话：“一切都完了。然而我心里并没有受到什么打击，很平静的。像江口君的话，既然到了那个地步，不管是苦，不管是烦闷，我只有安然等候那死的到临。”这个副词“安然”用得没有一点夸张。他的确是安然死去的。他上绞刑台的时候，怀里揣着他妹妹寄给他的一片树叶，和他生前所喜欢的一只狗和一只猫的照片。这样地怀着爱之心而死，就像一个人带着宽慰的心情静静地睡去似的。这安然的死应该说是作者的最后胜利。

然而我读了这两百多天的日记，我想到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在狱中等死的情形，我在字句间看出了一个人的内心的激斗，看出了血和泪的交流。差不多每一页，每一段上都留着挣扎的痕迹。作者能够达到那最后的胜利，的确不是容易的事。

我感着生的倦怠么？不！

《死之忏悔》：日本东京春秋社出版（一九二六年）。

《死之忏悔》中的日记到九月十七日为止，作者于十月十五日受绞刑。日记原稿共三十三册。作者自己说只有第三十三册才是“真正的死刑囚的狱中记”，那是判决死刑以后的日记。据古田生前的辩护律师布施辰治在序文中说，这一册日记当局不许拿出来发表。然而后来它终于被领出来而且秘密出版了。我得到一册，曾读过一遍。书名是《死刑囚的回忆》，但在二·二八的沪战中，被炮弹打毁了。这一册的内容和以前的三十二册差不多，不过调子有点不同。写以前的三十二册时作者已经知道死刑是无可避免的了。然而判决究竟不曾确定。死虽然就在他的眼前，希望纵然极其微弱，却也不曾完全消失。所以那时有疑惑，有挣扎，有呻吟，有眼泪。作者当时还不大认识死的面目。最后临到了写第三十三册，一切都决定了，从此再没有从前那种不安定，从前那种苦苦的挣扎。的确如布施辰治所说，确定了舍弃生命以后，心境和态度都是更为沉静，真有超越生死之概。因此无怪乎有人会以为这一册“真正的死刑囚的狱中记”反不及以前的三十二册中文笔之清丽和表现之沉痛了。古田大次郎自称为一个恐怖主义者。倘使把他的日记当作一个恐怖主义者的心理分析的记录看倒很适当。或者把它看作一个人的最真挚的自白看也无可。所以加藤一夫读了它，就“觉得我的灵魂被净化了。我真的由于他的这记录而加深了我对于生活的态度”。加藤一夫称古田为一个“真诚的，真实的而又充满温情的纯真的灵魂”。他说《死之忏悔》是一本“非宗教的宗教书”。……我读完这本书，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但是我不能不有一种惋惜的感觉。像古田那样的人不把他的希望寄托在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上面，却选取了恐怖主义的路，在恐怖主义的境地中去探求真理，终于身死在绞刑台上。这的确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作者注

对于死的恐怖呢？曾经很厉害地感着。现在有时感到，有时感不到。把死忘记了的时候居多。只是死的瞬间的痛苦还是有点可怕。

作者这样坦白地承认着。他常常在写下了对于死的畏惧以后，又因为发觉自己的懦弱而说些责备自己的话。然而在另一处他却欣喜地发见：

死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也是伟大的。……

后来作者又疑惑地问道：

死果然是一切的终结吗？死果然会赔偿一切吗？我为什么要怕死呢？

“死并不可怕，只是非常寂寞。我为什么憎厌临死的痛苦呢？我想那样的痛苦是不会有的罢。”作者又这样地想道。

“我想保持着年轻的身体而死去，”这是作者的希望。

我不想再引下去了。作者是那样的一个厚于人情的青年，他有慈祥的父亲，又有可爱的妹妹，还有许多忠诚的友人。要他把这一切决然抛弃，安然攀登绞刑台，走入那寂寞的永恒里，这的确不是片刻的功夫所能做到的。这两百多天的日记里充满着情感的波动。我们只看见那一起一伏，一潮一汐。倘使我们不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追随作者的笔，我们就不能了解作者的心情。

只有二十六岁的年纪。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而又不得不离开。不想死，而被判决了死刑。一天天在铁窗里面计算日子，等着死的到来。在等死的期间想象着那个未知的东西的面目，想象着它会把他带到什么样的境界去。在这种情形下写成的《死之忏悔》，我们可以用一个“死”字来包括。他谈死，他了解死，他感觉到死的重量。他的文字是充满着血和泪的。在那本五百页的大书里作者古田提出许多疑问，写出许多揣想，作者无一处不论到死，或者暗示到死。然而我却找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一个结论。

其实这个答案，这个结论是有的，却不在这本书里面，这就是作者的死。这个死给他解答了一切的问题，也给我解答了一切的问题。

古田大次郎为爱而杀人，而被杀，以自己的血偿还别人的血，以自己的痛苦报偿别人的痛苦。他以一颗清纯的心毫不犹豫地攀登了绞刑台。死赔偿了一切。死拯救了一切。

我想：“他的永眠一定是安适而美满的罢。”我突然想起五十年前芝加哥劳工领袖阿·帕尔森司上绞刑台前作的诗了：

到我的墓前不要带来你们的悲伤，
也不要带来眼泪和凄惶，
更不要带来惊惧和恐慌；
我的嘴唇已经闭了时，
我不愿你们这样来到我的坟场。
我不要送葬的马车排列成行，

帕尔森司（1848—1887）：美国芝加哥劳工运动的一个领导人。一八八六年五月四日芝加哥干草市场发生炸弹事件。帕尔森司是当日群众大会的一个演说者，因此被法庭悬赏五千元通缉。六月二十一日他到法庭自首。第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与同志司皮司、斐失儿、恩格尔同受绞刑。一八九三年伊利诺斯省新省长就职，重查此案，发见真相，遂发出理由书，宣告法官枉法，并替帕尔森司等洗去罪名。这是帕尔森司上绞刑台前数小时内写成的诗。

我不要送丧的马队，
头上羽毛飘动荡漾；
我静静地放我的手在胸上，
且让我和平地安息在墓场。
不要用你们的怜悯来侮辱我的死灰，
要知道你们还留在荒凉的彼岸，
你们还要活着忍受灾祸与苦辛。
我静静地安息在坟墓里面，
只有我才应该来怜悯你们。
人世的烦愁再不能萦绕我的心，
我也不会再有困苦和悲痛的感情，
一切苦难都已消去无影。
我静静地安息在坟墓内，
我如今只有神的光荣。
可怜的东西，这样惧怕黑暗，
对于将临的惨祸又十分胆寒。
看我是何等从容地回到家园！
不要再敲你们的丧钟，
我现在已意足心满。

这篇短文并不是“死之礼赞”。我虽然写了种种关于“死”的话，但是我愿意在这里坦白地承认：

“我还想活！”因为我正如小说《朝影》中的青年奈司拉莫夫所说：“我爱阳光、天空，和春光、秋景；我爱青春，以及自然母亲所给与我们的和平与欢乐。……”

1937年3月在上海

生

死是谜。有人把生也看作一个谜。

许多人希望知道生，更甚于愿意知道死。而我则不然。我常常想了解死，却没有一次对于生起过疑惑。

世间有不少人喜欢拿“生是什么”、“为什么生”的问题折磨自己，结果总是得不到解答而悒郁地死去。

真正知道生的人大概是有的；虽然有，也不会多。人不了解生，但是人依旧活着。而且有不少的人贪恋生，甚至做着永生的大梦：有的乞灵于仙药与术士，有的求助于宗教与迷信；或则希望白日羽化，或则祷祝上登天堂。在活着的时候为非作歹，或者茹苦含辛以积来世之福——这样的人也是常有的。

每个人都努力在建造“长生塔”，塔的样式自然不同，有大有小，有的有形，有的无形。有人想为子孙树立万世不灭的基业；有人愿去理想的天堂中做一位自由的神仙。然而不到多久这一切都变成过去的陈迹而做了后人凭吊唏嘘的资料了。没有一座沙上建筑的楼阁能够稳立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一百四十七年前法国大革命中的启蒙学者让·龚多塞不顾死刑的威胁，躲在巴黎卢森堡附近的一间顶楼上忙碌地写他的最后的著作，这是历史和科学的著作。据他说历史和科学就是反对死的斗争。他的书也是为征服死而著述的。所以在写下最后两句话以后，他便离开了隐匿的地方。他那两句遗言是：“科学要征服死，那么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死了。”

他不梦想天堂，也不寻求个人的永生。他要用科学征服死，为人类带来长生的幸福。这样，他虽然吞下毒药，永离此世，他却比谁都更了解生。

科学会征服死。这并不是梦想。龚多塞企图建造一座为大众享用的长生塔，他用的并不是平民的血肉，像我的童话里所描写的那样。他却用了科学。他没有成功。可是他给那座塔奠了基石。

这座塔到现在还只有那么几块零落的基石，不要想看见它的轮廓！没有人能够有把握地说定在什么时候会看见它的完成。但有一事实则是十分确定的：有人在孜孜不倦地努力于这座高塔的建造。这些人是科学家。

生物是必死的。从没有人怀疑过这天经地义般的话。但是如今却有少数生物学者出来企图证明单细胞动物可以长生不死了。德国的怀司曼甚至宣言：“死亡并不是永远和生物相关联的。”因为单细胞动物在养料充足的适宜的环境里便能够继续营养和生存。它的身体长大到某一定限度无可再长的时候，便分裂为二，成了两个子体。它们又自己营养、生长，后来又自己能自己分裂以繁殖其族系，只要不受空间和营养的限制，它们可以永远继续繁殖、长生不死。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当然没有死亡。

拿草履虫为例，两个生物学者美国的吴特拉夫和俄国的梅塔尼科夫对于草履虫的精密的研究给我们证明：从前人以为分裂二百次、便现出衰老状态而逼近死亡的草履虫，如今却可以分裂到一万三千次以上，就是说它能够活到二十几年。这已经比它的平常的寿命多过七十倍了。有些人因此断定说这些草履虫经过这么多代不死，便不会死了。但这也只是一个假定。不过生命的延长却是无可否认的。

关于高等动物，也有学者作了研究。现在鸡的、别的一些动物的、甚至

人的组织 (tissue) 已经可以用人工培养了。这证明：多细胞动物体的细胞可以离开个体，而在适当的环境里生活下去，也许可以做到长生不死的地步。这研究的结果离真正的长生术还远得很，但是可以说朝这个方向前进了一步。在最近的将来，延长寿命这一层，大概是可以办到的。科学家居然在显微镜下的小小天地中看出了解决人间大问题——生之谜的一把钥匙。过去无数的人在冥想里把光阴白白地浪费了。

我并不是生物学者，不过偶尔从一位研究生物学的的朋友那里学得一点点那方面的常识。但这只是零碎地学来的，而且我时学时忘。所以我不能详征博引。然而单是这一点点零碎的知识已经使我相信龚多塞的遗言不是一句空话了。他的企图并不是梦想。将来有一天科学真正会把死征服。那时对于我们，生就不再是谜了。

然而我们这一代（恐怕还有以后的几代）和我们的祖先一样，是没有这种幸运的。我们带着新的力量来到世间，我们又会发挥尽力量而归于尘土。这个世界映在一个婴孩的眼里是五光十色；一切全是陌生。我们慢慢地活下去。我们举起一杯一杯的生之酒尽情地饮下。酸的、甜的、苦的、辣的我们全尝到了。新奇的变为平常，陌生的成为熟习。但宇宙是这么广大，世界是这么复杂，一个人看不见、享不到的是太多了。我们仿佛走一条无尽长的路程，游一所无穷大的园林，对于我们就永无止境。“死”只是一个障碍，或者是疲乏时的休息。有勇气、有精力的人是不需要休息的，尤其在胜景当前的时候。所以人应该憎恨“死”，不愿意跟“死”接近。贪恋“生”并不是一个罪过。每个生物都有生的欲望。蚱蜢饥饿时甚至吃掉自己的腿以维持生存。这种愚蠢的举动是无可非笑的，因为这里有的是严肃。

俄罗斯民粹派革命家妃格念尔“感激以金色光芒洗浴田野的太阳，感激夜间照耀在花园天空的明星”，但是她终于让沙皇专制政府将她在席吕谢尔堡中活埋了二十年。为了革命思想而被烧死在美国电椅上的鞋匠沙珂还告诉他的六岁女儿：“夏天我们都在家里，我坐在橡树的浓荫下，你坐在我的膝上；我教你读书写字，或者看你在绿的田野上跳荡、欢笑、唱歌，摘取树上的花朵，从这一株树跑到那一株，从清朗、活泼的溪流跑到你母亲的怀里。我梦想我们一家人能够过这样的幸福生活，我也希望一切贫苦人家的小孩能够快乐地同他们的父母过这种生活。”

“生”的确是美丽的，乐“生”是人的本分。前面那些杀身成仁的志士勇敢地戴上荆棘的王冠，将生命视作敝屣，他们并非对于生已感到厌倦，相反的，他们倒是乐生的人。所以奈司拉莫夫坦白地说：“我不愿意死。”但是当他被问到为什么去舍身就义时，他却昂然回答：“多半是因为我爱‘生’过于热烈，所以我不忍让别人将它摧残。”他们是为了保持“生”的美丽，维持多数人的生存，而毅然献出自己的生命的。这样深的爱！甚至那躯壳化为泥土，这爱也还笼罩世间，跟着太阳和明星永久闪耀。这是“生”的美丽之最高的体现。

“长生塔”虽未建成，长生术虽未发现，但这些视死如归但求速朽的人却也能长存在后代子孙的心里。这就是不朽。这就是永生。而那般含垢忍辱积来世福或者梦想死后天堂的“芸芸众生”却早已被人忘记，连埋骨之所也无人知道了。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的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里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会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方向。

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满溢的生命。正如青年早逝的法国哲家居友所说：“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个人的生命应该为他人放散，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为他人牺牲。……这牺牲就是真实生命的第一个条件。”我相信居友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慕，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给别人，否则我们就会感到内部的干枯。居友接着说：“我们的天性要我们这样做，就像植物不得不开花似的，纵然开花以后便会继之以死亡，它仍旧不得不开花。”

从在一滴水的小世界中怡然自得的草履虫到在地球上飞腾活跃的“芸芸众生”，没有一个生物是不乐生的，而且这中间有一个法则支配着，这就是生的法则。社会的进化、民族的盛衰、人类的繁荣都是依据这个法则而行的。这个法则是“互助”，是“团结”。人类靠了这个才能够不为大自然的力量所摧毁，反而把它征服，才建立了今日的文明；一个民族靠了这个才能够抵抗他民族的侵略而维持自己的生存。

维持生存的权利是每个生物、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的。这正是顺着生之法则。侵略则是违反了生的法则的。所以我们说抗战是今日的中华民族的神圣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可以否认。

这次的战争乃是一个民族维持生存战争。民族的生存里包含着个人的生存，犹如人类的生存里包含着民族的生存一样。人类不会灭亡，民族也可以活得很久，个人的生命则是十分短促。所以每个人应该遵守生的法则，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将个人的生存放在群体的生存里。群体绵延不绝，能够继续到永久，则个人亦何尝不可以说是永生。

在科学还未能把“死”完全征服、真正的长生塔还未建立起来以前，这倒是唯一可靠的长生术了。

我觉得生并不是一个谜，至少不是一个难解的谜。

我爱生，所以我愿像一个狂信者那样投身到生命的海里去。

1937年8月在上海

悼鲁迅先生

十月十九日上午，一个不幸的消息从上海的一角传出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鲁迅先生逝世了！

花圈、唁电、挽辞、眼泪、哀哭从中国各个地方像洪流一样地汇集到上海来。任何一个小城市的报纸上也发表了哀悼的文章，连最僻远的村镇里也响起了悲痛的哭声。全中国的良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悲痛的。这一个老人，他的一支笔、一颗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业。甚至在他安静地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还把成千上万的人牵引到他的身边。不论是亲密的朋友或者恨深的仇敌，都怀着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遗体前哀痛地埋下了头。至少在这一刻全中国的良心是团结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多的言辞来哀悼这么一位伟大的人，因为一切的语言在这个老人的面前都变成了十分渺小；我们不能单单用眼泪来埋葬死者，因为死者是一个至死不屈的英勇战士。但是我们也无法制止悲痛来否认我们的巨大损失；这个老人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的一句话。然而我们并不想称他做巨星，比他作太阳，因为这样的比喻太抽象了。他并不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然界的壮观。他从不曾高高地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一个不识者的简单的信函就可以引起他胸怀的吐露；一个在困苦中的青年的呼吁也会得到他同情的帮忙。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爱护青年的。

然而把这样的一个人单单看作中国文艺界的珍宝是不够的。我们固然珍惜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也和别的许多人一样以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是我们更重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

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近二三十年来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高举着思想的火炬，领导无数的青年向着远远的一线亮光前进。

现在，这样的一个人从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他的死是全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尤其是在国难加深、民族解放运动炽烈的时候，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导师，我们的哀痛不是没有原因的。

别了，鲁迅先生！你说：“忘记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你的。我们不会让你静静地死去。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你活着来看大家怎样继承你的遗志向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迈进！

1936年10月在上海

爱尔克的灯光

傍晚，我靠着逐渐黯淡的最后的阳光的指引，走过十八年前的故居。这条街、这个建筑物开始在我的眼前隐藏起来，像在躲避一个久别的旧友。但是它们的改变了的面貌于我还是十分亲切。我认识它们，就像认识我自己。还是那样宽的街，宽的房屋。巍峨的门墙代替了太平缸和石狮子，那一对常常做我们坐骑的背脊光滑的雄狮也不知逃进了哪座荒山。然而大门开着，照壁上“长宜子孙”四个字却是原样地嵌在那里，似乎连颜色也不曾被风雨剥蚀。我望着那同样的照壁，我被一种奇异的感情抓住了，我仿佛要在这里看出过去的十八个年头，不，我仿佛要在这里寻找十八年以前的遥远的旧梦。

守门的卫兵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他不了解我的心情。他不会认识十八年前的年轻人。他却用眼光驱逐一个人的许多亲密的回忆。

黑暗来了。我的眼睛失掉了一切。于是大门内亮起了灯光。灯光并不曾照亮什么，反而增加了我心上的黑暗。我只得失望地走了。我向着来时的路回去。已经走了四五步，我忽然掉转头，再看那个建筑物。依旧是阴暗中一线微光。我好像看见一个盛满希望的水碗一下子就落在地上打碎了一般，我痛苦地在心里叫起来。在这条被夜幕覆盖着的近代城市的静寂的街中，我仿佛看见了哈利希岛上的灯光。那应该是姐姐爱尔克点的灯罢。她用这灯光来给她的航海的兄弟照路，每夜每夜灯光亮在她的窗前，她一直到死都在等待那个出远门的兄弟回来。最后她带着失望进入坟墓。

街道仍然是清静的。忽然一个熟习的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地唱起了这个欧洲的古传说。在这里不会有人歌咏这样的故事。应该是书本在我心上留下的影响。但是这个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事情。

十八年前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我离开这个城市、这条街的时候，我也曾有一个姐姐，也曾答应过有一天回来看她，跟她谈一些外面的事情。我相信自己的诺言。那时我的姐姐还是一个出阁才只一个多月的新娘，都说她有一个性情温良的丈夫，因此也会有长久的幸福的岁月。

然而人的安排终于被“偶然”毁坏了。这应该是一个“意外”。但是这“意外”却毫无怜悯地打击了年轻的心。我离家不过一年半光景，就接到了姐姐的死讯。我的哥哥用了颤抖的哭诉的笔叙说一个善良女性的悲惨的结局，还说起她死后受到的冷落的待遇。从此那个作过她丈夫的所谓温良的人改变了，他往一条丧失人性的路走去。他想往上爬，结果却不停地向下面落，终于到了用鸦片烟延续生命的地步。对于姐姐，她生前我没有好好地爱过她，死后也不曾做过一样纪念她的事。她寂寞地活着，寂寞地死去。死带走了她的一切，这就是在我们那个地方的旧式女子的命运。

我在外面一直跑了十八年。我从没有向人谈过我的姐姐。只有偶尔在梦里我看见了爱尔克的灯光。一年前在上海我常常睁起眼睛做梦。我望着远远的在窗前发亮的灯，我面前横着一片大海，灯光在呼唤我，我恨不得腋下生出翅膀，即刻飞到那边去。沉重的梦压住我的心灵，我好像在跟许多无形的魔手挣扎。我望着那灯光，路是那么远，我又没有翅膀。我只有一个渴望：飞！飞！那些熬煎着心的日子！那些可怕的梦魇！

但是我终于出来了。我越过那堆积着像山一样的十八年的长岁月，回到了生我养我而且让我刻印了无数儿时回忆的地方。我走了很多的路。

十八年，似乎一切全变了，又似乎都没有改变。死了许多人，毁了许多

家。许多可爱的生命葬入黄土。接着又有许多新的人继续扮演不必要的悲剧。浪费，浪费，还是那许多不必要的浪费——生命，精力，感情，财富，甚至欢笑和眼泪。我去的时候是这样，回来时看见的还是一样的情形。关在这个小圈子里，我禁不住几次问我自己：难道这十八年全是白费？难道在这许多年中间所改变的就只是装束和名词？我痛苦地搓自己的手，不敢给一个回答。

在这个我永不能忘记的城市里，我度过了五十个傍晚。我花费了自己不少的眼泪和欢笑，也消耗了别人不少的眼泪和欢笑。我匆匆地来，也将匆匆地去。用留恋的眼光看我出生的房屋，这应该最后的一次了。我的心似乎想在那里寻觅什么。但是我所要的东西绝不会在那里找到。我不会像我的一个姑母或者嫂嫂，设法进到那所已经易了几个主人的公馆，对着园中的花树垂泪，慨叹着一个家族的盛衰。摘吃自己栽种的树上的苦果，这是一个人的本分。我没有跟着那些人走一条路，我当然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足迹。几次走过这个地方，我所看见的还只是那四个字：“长宜子孙”。

“长宜子孙”这四个字的年龄比我的不知大了多少。这也该是我祖父留下的东西罢。最近在家里我还读到他的遗嘱。他用空空两手造就了一份家业。到临死还周到地为儿孙安排了舒适的生活。他叮嘱后人保留着他修建的房屋和他辛苦地搜集起来的书画。但是儿孙们回答他的还是同样的字：分和卖。我很奇怪，为什么这样聪明的老人还不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样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轻心灵的发育成长，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起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

“长宜子孙”，我恨不能削去这四个字！许多可爱的年轻生命被摧残了，许多有为的年轻心灵被囚禁了。许多人在这个小圈子里面憔悴地挨着日子。这就是“家”！“甜蜜的家”！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爱尔克的灯光不会把我引到这里来的。

于是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依旧是十八年前的那些人把我送到门口，这里面少了几个，也多了几个。还是和那次一样，看不见我姐姐的影子，那次是我没有等待她，这次是我找不到她的坟墓。一个叔父和一个堂兄弟到车站送我，十八年前他们也送过我一段路程。

我高兴地来，痛苦地去。汽车离站时我心理的确充满了留恋。但是清晨的微风，路上的尘土，马达的叫吼，车轮的滚动，和广大田野里一片盛开的菜子花，这一切驱散了我的离愁。我不顾同行者的劝告，把头伸到车窗外面，去呼吸广大天幕下的新鲜空气。我很高兴，自己又一次离开了狭小的家，走向广大的世界中去！

忽然在前面田野里一片绿的蚕豆和黄的菜花中间，我仿佛又看见了一线光，一个亮，这还是我常常看见的灯光。这不会是爱尔克的灯里照出来的，我那个可怜的姐姐已经死去了。这一定是我的心灵的灯，它永远给我指示我应该走的路。

1941年3月在重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终于走进了这个“公馆”。“长宜子孙”四个字果然跟着“照壁”一起消失了——作者注。

虎

我不曾走入深山，见到活泼跳跃的猛虎。但是我听说过不少关于虎的故事。

在兽类中我最爱虎；在虎的故事中我最爱下面的一个：

深山中有一所古庙，几个和尚在那里过着单调的修行生活。同他们做朋友的，除了有时上山来的少数乡下人外，就是几只猛虎。虎不惊扰僧人，却替他们守护庙宇。作为报酬，和尚把一些可吃的东西放在庙门前。每天傍晚，夕阳染红小半个天空，虎们成群地走到庙门口，吃了东西，跳跃而去。庙门大开，僧人安然在庙内做他们的日课，也没有谁出去看虎怎样吃东西，即使偶尔有一二和尚立在门前，虎们也视为平常的事情，把他们看作熟人，不去惊动，却斯斯文文地吃完走开。如果看不见僧人，虎们就发出几声长啸，随着几阵风飞腾而去。

可惜我不能走到这座深山，去和猛虎为友。只有偶尔在梦里，我才见到这样可爱的动物。在动物园里看见的则是被囚在“狭的笼”中摇尾乞怜的驯兽了。

其实说“驯兽”，也不恰当。甚至在虎圈中，午睡醒来，昂首一呼，还能使猿猴颤栗，万兽之王的这种余威，我们也还可以在作了槛内囚徒的虎身上看出来。倘使放它出柙，它仍会奔回深山，重做山林的霸主。

我记起一件事情，三十一年前，父亲在广元做县官。有天晚上，一个本地猎户忽然送来一只死虎，他带着一脸惶恐的表情对我父亲说，他入山打猎，只想猎到狼、狐、豺、狗，却不想误杀了万兽之王。他绝不是存心打虎的。他不敢冒犯虎威，怕虎对他报仇，但是他又不能使枉死的虎复活，因此才把死虎带来献给“父母官”，以为可以减轻他的罪过。父亲给了猎人若干钱，便接受了这个礼物。死虎在衙门里躺了一天，才被剥了皮肤解了。后来父亲房内多了一张虎皮椅垫，而且常常有人到我们家里要虎骨粉去泡酒当药吃。

我们一家人带着虎的头骨回到成都。头骨放在桌上，有时我眼睛看花了，会看出一个活的虎头来。不过虎骨总是锁在柜子里，等着有人来要药时，父亲才叫人拿出它来磨粉。最后整个头都变成粉末四处散开了。

经过三十年的长岁月，人应该忘记了许多事情。但是到今天我还记得虎头骨的形状，和猎人说话时的惶恐表情。如果叫我把那个猎人的面容描写一下，我想用一句话：他好像做过了什么亵渎神明的事情似的。我还要补充说：他说话时不大敢看死虎，他的眼光偶尔挨到它，他就要变脸色。

死了以后，还能够使人害怕，使人尊敬，像虎这样的猛兽，的确是值得我们热爱的。

7月28日

“狭的笼”：指虎圈，见爱罗先珂（1889—1952）的童话《狭的笼》（鲁迅译）。

龙

我常常做梦。无月无星的黑夜里我的梦最多。有一次我梦见了龙。

我走入深山大泽，仅有一根手杖做我的护身武器，我用它披荆棘，打豺狼，它还帮助我登高山，踏泥沼。我脚穿草鞋，可以走过水面而不沉溺。

在一片大的泥沼中我看见一个怪物，头上有角，唇上有髭，两眼圆睁，红亮亮像两个灯笼。身子完全陷在泥中，只有这个比人头大过两三倍的头颅浮出污泥之上。

我走近泥沼，用惊奇的眼光看这个怪物。它忽然口吐人言，阻止我前进：

“你是什么？要去什么地方？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是一个无名者。我寻求一样东西。我只知道披开荆棘，找寻我的道路，”我昂然回答，对着怪物我不需要礼貌。

“你不能前进，前面有火焰山，喷火数十里，伤人无算。”

“我不怕火。为了得到我所追求的东西，我甘愿在火中走过。”

“你仍不能前进，前面有大海，没有船只载你渡过白茫茫一片海水。”

“我不怕水，我有草鞋可以走过水面。为了得到我所追求的东西，甚至溺死，我也毫无怨言。”

“你仍不能前进，前面有猛兽食人。”

“我有手杖可以打击猛兽。为了得到我所追求的东西，我愿与猛兽搏斗。”

怪物的两只灯笼眼射出火光，从鼻孔中突然伸出两根长的触须，口大张开，露出一嘴钢似的亮牙。它大叫一声，使得附近的树木马上落下大堆绿叶，泥水也立刻沸腾起泡。

“你这顽固的人，你究竟追求什么东西？”它厉声问道。

“我追求生命。”

“生命？你不是已经有了生命？”

“我要的是丰富的、充实的生命。”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它摇摇头。

“我活着不能够做一件有益的事情。我成天空谈理想，却束手看着别人受苦。我不能给饥饿的人一点饮食，给受冻的人一件衣服；我不能揩干哭泣的人脸上的眼泪。我吃着，谈着，睡着，在无聊的空闲中浪费我的光阴——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说是有生命？在我，若得不到丰富的、充实的生命，那么活着与死亡又有什么区别？”

怪物想了想，仍然摇头说：“我怕你会永远得不到你所追求的东西。或许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在它那张难看的脸上见到一丝同情了。我说：

“不会没有，我在书上见过。”

“你这傻子，你居然相信书？”

“我相信，因为书上写得明白，讲得有道理。”

怪物叹息地摇摆着头：“你这顽强的人，我劝你立刻回头走。你不知道前面路上还做些什么东西等着你。”

“我知道，但是我还要往前走。”

“你应该仔细想一下。”

“你为什么这样不惮烦地阻止我？我同你并不相识，我甚至不知道你的

名字。告诉我，你究竟叫什么名字！”

“已经很久没有人提起我的名字了，我自己也差不多忘记了它。现在我告诉你：我是龙，我就是龙。”

我吃了一惊。我望着那张古怪的脸。

“你是龙，怎么会躺在泥沼中？据我所知，龙是水中之王，应该住在大海里。你为什么而且不能乘雷上天？”我疑惑地问道。这时天空响起一声巨响，因此我才有后一句话。我看看它的身子，黄黑色的污泥盖住了它的胸腹和尾巴。泥水沸腾似地在发泡，从水面不断地冒起来难闻的臭气。

龙沉默着，它似乎努力在移动身子。但是身子被污泥粘着，盖着，压着，不能够动弹。它张开嘴哀叫一声，两颗大的泪珠从眼里掉下来。

它哭了！我惶恐地望着它的头，我想，这和我在图画上看见的龙头完全不像，它一定对我说了假话。它不是龙。

“我也是为了追求丰富的生命才到这里来的，”它止了泪开始叙述它的故事。它的话是我完全料不到的。这对我是多大的惊奇！

“我和你一样，也不愿意在无聊的空闲中浪费我的光阴。我不愿意在别的水族的痛苦上面安放我的幸福宝座，我才抛弃龙宫，离开大海，去追求你所说的那个丰富的、充实的生命。我不愿意活着只为自己，我立志要做一些帮助同类的事情。我飞上天空，我又不愿终日与那些飘浮变化的云彩为伍，也不愿高居在别的水族之上。我便落下地来。我要访遍深山大泽，去追寻我在梦里见到的东西。在梦中我的确见过充实的、有光彩的生命。结果我却落在污泥里，不能自拔。”它闭了嘴，从灯笼眼里流出几滴泪珠，颜色鲜红，跟血一样。

“你看，现在污泥粘住了我的身子，我要动一下也不能够。我过不了这种日子，我宁愿死！”它回过头去看它的身子，但是眼前仍然只是那一片污泥。它痛苦地哀叫一声，血一样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它说：“可是我不能死，而且我也不应该死。我躺在这里已经过了多少万年了。”

我的心因同情而痛苦，因恐惧而猛跳。多少万年！这样长的岁月！它怎么能够熬过这么些日子？我打了一个冷噤。但是我还能够勉强地再问它一句：“你是怎样陷到污泥里来的？”

“你不用问我这个。你自己不久就会知道，你这顽固的年轻人。”它忽然用怜悯的眼光望我，好像它已经预料着，不幸的遭遇就会降临到我身上来似的。

我没有回答。它又说：“我想打破上帝定下的秩序，我想改变上帝的安排，我去追求上帝不给我们的东西，我要创造一个新的条件。所以我受到上帝的惩罚。为了追求充实的生命，我飞过火焰山，我斗过猛兽，我抛弃了水中之王的尊荣，历尽了千辛万难。但是我终于逃不掉上帝的掌握，被打落在污泥里，受着日晒、雨淋、风吹、雷打。我的头、我的脸都变了模样，我成了一个怪物。只是我的心还是从前的那一颗，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那么，你为什么阻止我前进，不让我去追寻生命？”

“顽固的人，我不愿意你也得着恶运。你是人，你不能活到万年。你会死，你会很快地死去，你甚至会毫无所获而失掉你现在有的一切。”

“我不怕死。得不到丰富的生命我宁愿死去。我不能够像你这样，居然在污泥中熬了多少万年。我奇怪像你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值得留恋？”

“年轻人，你不明白。我要活，我要长久活下去。我还盼望着总有那么

一天，我可以从污泥中拔出我的身子，我要乘雷飞上天空。然后我要继续追寻丰富的、充实的生命。我的心在跳动，我的意志就不会消灭。我的追求也将继续下去，直到我的志愿完成。”

它说着，泪水早已干了，脸上也没有了痛苦的表情，如今有的却是勇敢和兴奋。它还带着信心似地问我一句：“你现在还要往前面走？”

“我要走，就是火山、大海、猛兽在前面等我，我也要去！”我坚决地甚至热情地回答。

龙忽然哈哈地笑起来。它的笑声还未停止，一个晴空霹雳突然降下，把四周变成漆黑。我伸出手也看不见五根指头。就在这样的黑暗中，我听见一声巨响自下冲上天空。泥水跟着响声四溅。我觉得我站的土地在摇动了。我的头发昏。

天渐渐地亮开来。我的眼前异常明亮。泥沼没有了。我前面横着一片草原，新绿中点缀了红白色的花朵。我仰头望天，蔚蓝色的天幕上隐约地现出淡墨色的龙影，一身鳞甲还是乌亮乌亮的。

7月28日

伤 害

一个初冬的午后，在沪县城里，一条被燃烧弹毁了的街旁，我看见一个黑脸小乞丐寂寞地立在面食担子前，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两个肥胖孩子正在得意地把可口的食物往嘴里送。

我穿着秋大衣，刚在船上吃饱饭，闲适地散步到街上来。

但是他，这个六七岁的孩子，赤着脚，露着腿，身上只披一块破布，紧紧包住他那瘦骨的一身黑皮在破布的洞孔下发亮。他的眼睛无光，两颊深陷，嘴唇干瘪得可怕，两只干瘦得像鸡爪的手无力地捧着一个破碗，压在胸前。

他没有温暖，没有饱足。他不讲话，也不笑。黑瘦的脸上涂着寂寞的颜色。

我不愿多看他，便匆匆走过他的身旁。但是我又回转来，因为我也不愿意就这样地离开他。

这样地一来一往，我在他的身边走过四五次。他不抬头看我一眼，好像他对这类事情并不感到惊奇。我注意地看他，才知道他的眼光始终停留在面食担子上。但甚至这眼光也还是无力的。

我站在他面前，不说什么，递了一张角票给他。

他默默地接过角票，把眼光从担子上掉开。他茫然地看看我，没有一点表情，仍然不开口。于是他埋下眼睛，移动一下身子，又把脸掉向面担。两个胖小孩还在那里吃“连肝肉”、“心肺”一类的东西，嘴里“噓噓”作声。

我想揩去他脸上的寂寞的颜色，便向他问两句话。他没有理我。他甚至不掉过头来看我。

我想，也许他没有听见我的话，也许我的话使他不高兴。我问的是：你有没有家？有没有亲人？

我不再对他说话，我默默地离开了他。我转弯时还回头去看那个面担，黑脸小乞丐立在担子前，畏怯地望着卖面人，右手伸到嘴边，一根手指头衔在嘴里。两个肥胖小孩却站到旁边一个卖糖食的摊子前面去了。

七天后我再到沪县城里，又经过那条街。仍然是前次看见的那样的街景。面食担子仍然放在原处。两个肥小孩还是同样得意地在吃东西。黑脸小乞丐仿佛也就站在一星期前立过的那个地方，用了同样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似乎并没有在别处耽搁了一个星期。

我走到黑脸小孩面前，又默默地递了一张角票到他的手里。他也默默地接着，而且也茫然地看我一眼，没有表情，也没有动作。以后他仍旧把脸掉向面担。

我们两个都重复地做着前次的动作。我甚至没有忘记问他：你有没有一个家？有没有一个亲人？

这次他仍旧不回答我，不过他却仰起头看了我一两分钟。我也埋下眼睛去看他的黑脸。茫然的表情消失了。他圆圆地睁着那对血红的眼睛，泪水像线一样地从两只眼角流下来。他把嘴一动，没有发出声音，就掉转身子，用力地一跑。

我在后面唤他，要他站在。他不听我的话。我应该叫他的名字，可是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姓名。我站在面担前，希望能够看见他回来。然而他的瘦小身子像一股风似地飘走了，并没有一点踪迹。

我等了一会儿，又走到旁边那个在废墟上建造起来的临时广场上，跟着

一些本地人听一个老烟客讲明太祖创业的故事。那个老烟客指手划脚地讲得津津有味。众人都笑，我却不作声，我的心并不在这里。

过了半点多钟，这附近还不见那个黑脸小孩的影子。我便到城里各处走了一转，后来再经过这个地方，我想，他应该回来了，但是我仍旧看不到他。那两个肥胖小孩还在面担前吃东西。

我感到疲倦了。我不知道黑脸小孩住在什么地方，或者他是否就有住处。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再到这里来。看见阳光离开了街市，我觉得疲倦增加了，我想回到船上去休息。

最后我终于拖着疲倦的身子离开了泸县。那一段路是不容易走的，我的心很沉重。我想到那个黑脸小孩和他的突然跑开，我知道自己犯了过失了。

我为什么两次拿那问话去折磨他呢？这原是明显的事实：要是他有家，有亲人，他还会带着冻和饿寂寞地立在街旁么？他还会像一棵枯草、一只病犬那样，木然地、无力地捱着日子么？

他也许不知道家和亲人的意义。但是他自己和那两个胖小孩间的差别，他应该了解罢。从这差别上他也许可以明白家和亲人的意义。那么，我大大地伤害了他，这也是很明显的事实了。

今天，八个月以后的今天，我还记得那个黑脸小孩的面貌和他两只眼角的泪水。他一定早忘记了我。但是我始终忘不掉他。我想请求他那小小的心灵宽恕我。然而我这些话能够达到他的耳边么？他会有机会看到我的文章么？

我不知不觉间在那个时候犯了不可补偿的过失了。

8月1日

撒 弃

凉夜，我一个人走在雨湿的街心，街灯的微光使我眼前现出一片昏黄。两个老妇的脚步跟着背影远远地消失了。我的前面是阴暗，又似乎是空虚。

我在找寻炫目的光辉。但是四周只有几点垂死的灯光。

我的脚不感到疲倦。我不记得我已经走了若干时候，也不知道还要走若干路程。

一个影子在后面紧紧跟着我。他走路没有声音。我好像听见他在我的耳边低声讲话。

我回过头，看不见一个人，等我再往前走，我又听见有人在我后面说话。

“谁？”我问道。

“我，”这是一个熟习的声音。

“你是谁，为什么紧紧跟着我？”

“我是你的影子。我从来就跟在你后面。”

“那么请你出来，让我见你一面。我不要听你那些叽哩咕嚕。”

他不作声，却仍然跟着我走。

“我说，请你出来，让我见见你。你为什么老躲在黑暗里面？”我不能忍耐地再说一次。

“我不能出来，”他嗫嚅地说；“我不能离开黑暗。黑暗可以作我的掩护。”

“那么你可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我突然问道。

“我不知道，不过我要跟着你。”

“我告诉你，我要去寻找光明。”

我似乎听见一声“啊哟”，过了半晌，耳语又响起来：

“你不会找到光明。你还不如回头走别的路。”

“我一定要往前走。见不到光明，我就不停脚步。”

“但是你知道这地方离光明还有若干路程？你这一生又还可以走若干时候？”

“我不管这些事。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到那个地方去找光明。”

“你会什么也看不见，就疲倦地死在中途。没有人埋葬你，却让你暴尸荒野，给兀鹰做食料。”

“我宁愿让兀鹰啄我的肉，却不想拿它们去喂狗。我宁愿疲劳地死在荒野，却不想安乐地躺在温暖的家中。”

“所有的人都会嘲笑你；谁都会忘记你。你口渴，没有人递给你一杯水。你倒下去，没有人搀扶你一把，你呻吟，便有人向你投掷石子。一直到死，你得不到一点点同情。”

“我为什么要别人的同情？难道我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的路？”

“那么你不怕寂寞？你不知道前面的路便是用寂寞铺砌的？”

“我知道。我的脚踏在寂寞上面，我的步子就显得更有力。寂寞会成为我的忠实伴侣。”

“你这个傻子，即使你得到光明，你拿它来做什么用？你能将它当饭吃，当衣穿？”影子居然晒笑起来。

我昂然回答：“我若得到光明，就把它分给众人，让光辉普照世界。若得不到光明，我愿意一个人寂寞地死在中途。”

“但是为你自己，你留什么给你自己？”

“如果光明普照世界，我也可以分到一线光——”

“然而要是黑暗统治一切呢？”它打岔地问我。

“那么我就努力跟黑暗斗争，我要打破黑暗。”

“打破黑暗？你有多大的力量？”它哈哈大笑起来。“我劝你不要过分看重自己。”

“不管我有没有力量，但是我有志愿，我有决心。我做不到，不要紧。别的人可以做到。”

“你这个疯子，你这个空想家。你不要安乐，你不要荣誉。你把寂寞当作宝贝，还要它做你的永久伴侣。你还要追求光明，打破黑暗，却不想，没有黑暗，我怎么能够生存？”它冷笑，它哂笑，它大笑。“算了罢，我也该死心了。老是跟着你，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不甘心做一个傻瓜，白白毁掉我自己。从这时候起，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让你去拥抱寂寞，任你去爱抚死亡。我会看到兀鹰啄尽你的肉，马蹄踏碎你的骨。”

带着几声轻蔑的大笑，我的影子离开了我。它走路没有声音，我不知它去向何处。我只看见一个黑影在我的眼角一晃。

于是我的耳边寂然了。

在我的眼前，那昏黄淡到成为一片灰黑。前面展开一条长的路。路是阴暗的，我抬起头用力向前望去，我要看透那阴暗。好像有一线光在远处摇晃，但亮光离这里一定很远。

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我慢慢地寂静中移动脚步。我不记得我已经走了若干路程，也不知道还要走若干时候。

8月4日

死

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样的一句话：

死是永生的门。

为着了解它的意义，我思索了许久。

有一天我们在成都一个友人家中谈到你，你的死讯突然来了。这消息是无可疑惑的。半个多月前还有朋友来信报告医生们对你的病下的诊断。那位朋友说，这个冬天便是你跟肺病挣扎的最后关头，结果不是你永闭眼睛，就是病永久消灭。我们希望你战胜病，但是死捉住了你。

信静静地躺在桌上。我们痛苦地埋下头，怕看彼此脸上的痉挛。

死在我们的眼前慢慢地走过去。

“一个懂得生活的人死了，”友人叹息地说了一句。“他不愿意死，他不应该死，然而偏偏是他先死去，”我制止不了我的悲痛的声音。

在成都，在重庆，在昆明，在任何地方，我都看到你的文章，你的充满活力、散布生命的文章，你鼓舞人勇敢地去体验生活，坚决地去征服生命。你赞美“生之欢乐”，你歌颂斗争的美丽。

一直到最后的日子，你没有停止过你那管撒播生命种子的笔，你蘸着生命的露水写字，你蘸着自己的赤热的血写字。有人说你是“生命的象征”。

“生命的象征”会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么？

我不相信你会死。便是在今天我们还想，你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你不过在远地方活着，你在做什么事情，或者你在埋头写什么东西。

今天离你去世的日子将近半年了。在这半年中我们一直在谈论你，我和许多朋友都在谈论你，像一个大家敬爱的活人，不像一个死去的影子。你始终活在我们中间，而且你将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我们读着你写的文章，我们谈论你做过的事情，我们重复着你说过的话，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又有一代的人来读你的文章，谈论你的为人，遵行你的教训。

的确你始终活在我们中间，而且永远活在我们中间。这“我们”的意义一天比一天地在扩大。

你何曾死去？这不就是永生的开端么？

“死是永生的门。”我现在明白这句话的意义了。

8月4日

废园外

晚饭后出去散步，走着走着我又到了这里来了。

从墙的缺口望见园内的景物，还是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在一个角落里，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旁边是一座毁了的楼房的空架子。屋瓦全震落了，但是楼前一排绿栏杆还摇摇晃晃地悬在架子上。

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屋子里推开小窗眺望园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

但是现在窗没有了，楼房快要倾塌了。只有园子里还盖满绿色。花还在盛开。倘使花能够讲话，它们会告诉我，它们所看见的窗内的面颜，年轻的，中年的。是的，年轻的面颜，可是，如今永远消失了。花要告诉我的还不止这个，它们一定要说出八月十四日的惨剧。精致的楼房就是在那天毁了的。不到一刻钟的功夫，一座花园便成了废墟了。

我望着园子，绿色使我的眼睛舒畅。废墟么？不，园子已经从敌人的炸弹下复活了。在那些带着旺盛生命的绿叶红花上，我看不出一点被人践踏的痕迹。但是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我回头看，没有人。这句话还是几天前，就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二天听到的。

那天中午我也走过这个园子，不过不是在这里，是在另一面，就是在楼房的后边。在那个中了弹的防空洞旁边，在地上或者在土坡上，我记不起了，躺着三具尸首，是用草席盖着的。中间一张草席下面露出一只瘦小的腿，腿上全是泥土，随便一看，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人腿。人们还在那里挖掘。远远地在一个新堆成的土坡上，也是从炸塌了的围墙缺口看进去，七八个人带着悲戚的面容，对着那具尸体发愣。这些人一定是和死者相识的罢。那个中年妇人指着露腿的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以后从另一个人的口里我知道了这个防空洞的悲惨故事。

一只带泥的腿，一个少女的生命。我不认识这位小姐，我甚至没有见过她的面颜。但是望着一园花树，想到关闭在这个园子里的寂寞的青春，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搔着似地痛起来。连这个安静的地方，连这个渺小的生命，也不为那些太阳旗的空中武士所宽容。两三颗炸弹带走了年轻人的渴望。炸弹毁坏了一切，甚至这个寂寞的生存中的微弱的希望。这样地逃出囚笼，这个少女是永远见不到园外的广大世界了。

花随着风摇头，好像在叹息。它们看不见那个熟习的窗前的面庞，一定感到寂寞而悲戚罢。

但是一座楼隔在它们和防空洞的中间，使它们看不见一个少女被窒息的惨剧，使它们看不见带泥的腿。这我却是看见了的。关于这我将怎样向人们诉说呢？

夜色降下来，园子渐渐地隐没在黑暗里。我的眼前只有一片黑暗。但是花摇头的姿态还是看得见的。周围没有别的人，寂寞的感觉突然侵袭到我的身上来。为什么这样静？为什么不出现一个人来听我愤慨地讲述那个少女的故事？难道我是在梦里？

脸颊上一点冷，一滴湿。我仰头看，落雨了。这不是梦。我不能长久立在大雨中。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漏雨。

1941年8月16日在昆明

灯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窒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

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地像浪花似地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

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射出来几点灯光，它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

我望着这些灯，灯光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光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一个黑影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罢。

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

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过好些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么？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楼房前面的廊上么？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

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

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

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希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它的帮助。

再回溯到远古的年代去。古希腊女教士希洛点燃的火炬照亮了每夜泅过海峡来的利安得尔的眼睛。有一个夜晚暴风雨把火炬弄灭了，让那个勇敢的情人溺死在海里。但是熊熊的火光至今还隐约地亮在我们的眼前，似乎那火炬并没有跟着殉情的古美人永沉海底。

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它们的一点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灵里的黑暗，热促成我心灵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飘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

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投到

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救人啊！”），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觉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许多年，而且使他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跟他重谈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

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了。

1942年2月在桂林

纪念友人世弥

我想不到我会来写这样的文章，记忆逼着我写。记忆使我痛苦。甚至在这样一个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代中，我还受着个人情感的熬煎。我不说我们民族的损失，固然世弥（即罗淑）是中国的一个优秀的女儿；我不说我们文坛的损失，固然世弥的作品显示了她未来的光辉的成就；因为在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下，许多青年有为的生命，许多优秀卓绝的文学才能已经变成了白骨黑灰。为了一个民族的独立和生存，这样的牺牲并不算是昂贵的代价。许多人默默地死去，许多人默默地哀悼他们的死者，没有谁出来发一声不平的怨言。我也没有权利把我个人的悲痛提出来加在这许多人的悲痛上面，促他们多回顾“过去”，给他们多添一分苦恼。他们需要的是“遗忘”，要忘记过去的一切，要忘记灾祸与悲痛，像堂·吉诃德那样地投身到神圣的抗战中去。

然而我不能够制止个人的悲痛，我无法补偿个人的损失。这一个友人的死给我留下的空虚，到现在还不曾得到填补。记忆逼着我写，悲痛逼着我写，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一些朋友，我要写下这篇关于世弥的文章。

世弥是一个平凡的人，甚至在她的外貌上，人也看不出锋芒。她写过文章，但她的文笔并不华丽，那里面有的是一种真实、朴素的美。她不喜欢表显自己，她写文章也不愿意让朋友们知道。她把她的热情隐藏在温厚的外表下。许多人说她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却少有人知道她是社会革命的斗士。在我们这些友人中间，有时因为意见的分歧会损害友情，个人的成见妨害到事业的发展，然而她把我们（至少是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团结在一起。她的客厅仿佛成了我们的会所。但我们并不同时去找她，我们个别地去，常常怀着疑难和苦恼去求助于她。她像长姊似地给我们解决问题，使我们得到安慰和鼓舞。她的考虑十分周到，她的话语简单而有力量，我们都相信她，敬爱她。

她有一种吸引力把许多朋友拉到她的身边，而且使他们互相接近、了解。一个朝鲜朋友被日本人追缉得厉害的时候，他到上海来总是由她和她的丈夫款待，他就住在他们家里，或者她替他转信。那个朋友也是我的友人。艰苦的环境使他的头发在几个月内完全变成了白色，但是他的精神并没有衰老。有一次我受了一个朋友的嘱托从日本海军陆战队布岗警戒下的虹口带了一支手枪、一百颗子弹和一包抗日文件到她的家里寄存。她毫不迟疑地收下了我提去的那口箱子，让那些东西在她的家里放了一年，到她离开上海时才让另一个朋友拿去。这些事倘使她活着，她一定不让我说出来，而我也不能写。但是如今她和我已经成了两个世界的人。我不曾当着她的面说一句感激的话，我知道这会使她不高兴。然而这时候思念刺痛我的心，我愿意让人知道我们从她那里得过的恩惠。要是这触犯了她的朋友，她也会原谅她的朋友，因为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我不敢想，有时候我甚至不能相信世弥的死讯是真实的。去年九月八日上海西车站的分别仿佛还是昨天的事。上海沦陷后她和宗融打过急电来探问我的安全，又屡次写信劝我离开“孤岛”。我答应今年到他们那里去。如今我失了约，而她也不能活着来责备我了。

这三四年来，我在生活里、事业上遇到各种麻烦，我缺乏忍耐，不能从容地应付一切，常常让自己沉溺在苦恼中间。朋友不宽恕我，敌人不放松我。

我不能严格地改正错误，我反而让自己陷在绝望的心境中。好几次我带着气愤到她那里倾诉，她仔细地开导我，安慰我，甚至指责我的缺点。她知道我的弱点、我的苦恼和我的渴望。但是她绝不姑息她的友人。我是在朋友们的督责下成长起来的。她便是那许多朋友中间给了我帮助最大的一位。但是如今我不知不觉间失掉了这样一位友人，我的悲痛太大了。

我唠唠叨叨地叙说我个人的损失，我太自私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失去这一个连锁，那损失比我个人的更大。而且就个人的悲痛来说，我们大家热爱的马大哥，我认识他在他和世弥结婚以前，我知道世弥在他的生活里、情感上占着什么样的位置，我知道世弥是他的一个怎样的不可分离的生活与工作的伴侣。他们九年来始终没有分离过。如今一只残酷的魔手把她抓了去，永远不放回来。留下他一个人带着那个聪明可爱的小弥和一个新生的孩子（那个男孩是她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在那间空阔的屋子里，八岁的小弥天天嚷着要“妈妈”，新生的孩子又无知地啼哭等着人喂奶。做一个这样的父亲，不知道要花费多少的心血。对于在书堆里过惯生活的马大哥，我简直不敢想象他的悲痛。我不能够安慰他，因为他的灾祸太大了。但是我想借用意大利爱国者马志尼劝赫尔岑的话来劝他：

勇敢些，你要抑制悲痛，不要叫你的精神破碎。我常常以为我们亲爱的人的死会使我们变成更好的人，你的义务是去做一切她所喜欢的事而不去做任何她所反对的事。……

现在正是这个时候了。

别了，我永不能忘记的友人，我不再用言词哀悼你。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这样做。你不愿意在这样的年纪早早地死去，你更不会愿意在你渴望了几年的抗战的烽火燃烧的时候寂寞地闭上眼睛。但是你已经尽了你的职责了。你留下了这么深的敬爱在我们中间。我们失去了你这样一个连锁，可是我们已经坚实地团结起来。你的手所放下的火炬，也将由我们接过来高高地举起。我们会把它举得更高，使你的和我们的理想早日实现，我知道那会是你最快活的时候。到了那一天，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的理想里。

1938年4月在广州

悼 范 兄

昨夜窗外落着大雨，刚刚修补好的屋顶，阻止不了雨水的浸泻，我用一个面盆做武器，跟那接连不断的雨滴战斗。我躺在床上，整夜发着高热，不能闭上眼睛，那些时候我都想起你，我善良仁厚的亡友。我的心燃烧着，我的身体燃烧着，但我的头脑却是清醒的。在这凌乱地堆满家具和书报的宽大楼房的黑暗中展开了十二年的友情。你的和蔼的清瘦的面颜，通过了十二年的长岁月，在这雨夜里发亮。在闽南一个古城的武庙中，我们第一次握手，这是我最初从你的亲切的话里得到温暖和鼓舞。没有经过第三个人的介绍，我们竟然彼此深切地了解了。是社会改革的伟大理想把我们拉拢的。你为着自己的理想劳苦了二十年，你把你的心血、精力、肌肉都献了给它，人们看见你一天天地瘦下去，弱下去。一直到死，你没有停止过你的笔和唇舌。

我没有忘记，就是在十二年前那个南国的秋天里，我们在武庙的一个凉台上喝着绿豆粥，过了二三十个黄昏，我们望着夜渐渐地从庭前两棵大榕树繁茂的枝叶间落到地上，畅快地谈论着当前的社会问题和美丽的未来的梦景。让我们热情的声音，在晚风中追逐。参加谈话的人，我记得有时是五个，有时是六个。他们如今散处在四方，都还活得相当结实，却料不到偏偏少了一个你。

在朋友中你是一个切实的人。即使在侈谈梦景的时候，你也不曾让热情把你引到幻想的境域里去。在第一次的闲谈中我就看出来，甚至当崇高的理想在你脸上发光的时候，你也仍旧保持着科学的头脑。靠着你，我多知道一些事情，我知道怎样节制我的幻想，不让夸张的梦景迷住了我的眼睛。凉台上的夜谈并不是白费的。至少对我已经发生影响了。

在那个古城里，我们常常同看秋夜的星空。在那些夜里我也曾发着高热，喝着大碗神曲汁，但是亿万的发光的生命，使我忘记了身体的燃烧。从星球的生命中，我更了解了“存在界”的意义。你告诉我许多关于星球的事，让我知道你怎样由宇宙问题的探讨，而构成了你的生活哲学。

白天你又从外面那些浮着绿萍的水沼、水潭里带回来一杯、一瓶的污水，于是在你的书桌上，显微镜下面展开了一滴水中的世界，使我看见无数的原生动物的活动与死亡。

在你这里我看见了那无穷大的世界，在你这里我也看见了那无穷小的世界。我知道人并不是宇宙的骄子，我知道生命无处不在，我知道生命绵延不绝。你的生活哲学影响了我的。你的待人的态度也改变了我的。倘使我今天从我的生活中完全抽去了你的影响，则我将成为一个忘恩的人而辜负了亡友的期望了。

你不是一个空谈家，也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英雄。在武庙凉台上的夜谈中你就显露了你的真实面目。谦逊、大量、勤勉、刻苦，这都是你的特点。你不是一个充满夺目光彩的豪士，也不是一个口如悬河的辩才。你是用诚挚，用理智，用坚信，用恒心来感动人的。别人把崇高的理想用来做成自己头顶上的圆光的时候，你却默默地在打算怎样为它工作，为它牺牲。所以你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家庭幸福，将自己的心血作为燃料，供给那理想多放一点光辉，却少有人知道你的名字，或者还有些不做一事的人随意用轻蔑的态度抹煞了你的工作。

的确在生前你是常常被人误解的。有人把你看作一个神经质的肺病患

者，有人把你视为一个虚伪的道学家，还有人以为你只是一个被生活担子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读书人。有好多次那些狂妄的、或者还带有中伤意味的话点燃了我的怒火，我愤慨地、热烈地争辩，我甚至愿意挖出我的心，只为了使友人能够更明白地了解你。我这争辩自然是没有用处的，我的话并不曾给你的面影增加光彩。后来还是你自己用你的笔、你的唇舌、你的工作精神、你的生活态度把许多颗年轻的心拉到你的身边，还是你自己用这些把别人投掷在你的面影上的污泥洗去，是你自己拨开了那些空谈家的烟雾，直立在人们的面前，不像一个病人，却像一个战士，一个被称为“生命的象征”的战士（一个朋友称你做“生命的象征”，她这话的确不错）。

诚然十二年前我就知道你是一个肺病患者，而且我们也想得到有一天你终于会死在这个不治之症上。但是和你在一起时我却始终忘记你是一个病人。你的思想、你的言语和你的行为都不带丝毫的病态。人从你的身上看不到一点犹疑，一丝悲观，一毫畏怯。你不寻求休息，却渴望工作。你在各处散布生命，你应该是一个散播生命种子的人。十几年前你写过歌颂战士的文章，到临死你还写出了《生之欢乐》。你最后留下遗言，望年轻人爱真理向前努力。

在《战士颂》中你坦白地说过：“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而且追过它，自己去制造更广、更深的洪流。我如果是一盏灯，这灯的用处便是照彻那多量的黑暗。我如果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涛去洗涤海边一切陈腐的积物。”

在《生之欢乐》的开端，你更显明地承认：“有人把人生当作秕糠，我却以为它是谷粒。有人把人生视同幻梦，我却以为它是实在。有人把人生作为苦乐，我却以为它是欢乐。有许多人以人生为苦恼、黑暗、艰难、乏味、滞钝、不自由、憎恨、丑恶、柔弱的象征，我却认为人生是爱、美、光明、自由、活泼、有为、创造、进步的本身。”

你还勇敢地叫喊：“人生的美、爱、力量，都是从奋斗中创造出来的。所以人不是环境的奴隶，而是环境的主人……从奋斗的人格中，我们窥见生之光明，生之进步，生之有为，生之自由。……人生的解释受了积极思想的指导，人将为自由，为光明，为爱，为美，为创造，为进步而生，因此人将与压迫、黑暗、暴行、丑恶搏斗。燧石因相击而生火，人则由奋斗而尝到生之欢乐。”

我从未听说过像这么美丽的洋溢着生命的战歌！在朋友中就只有你一个人是这么热情地在各处散布生命，鼓舞希望！在一个孩子的纪念册上你写着：“希望是人生所需要的，人如没有希望，何异江河涸了流水。”你这条江一生就没有涸过流水。不但这样，而且你这条江更投入在“那个人类生活的大海里”，用你自己的话，“在大海里你得到了伟大的生命力，发见了不灭的希望”，的确一直到死，你没有失掉希望。

你和我都曾歌颂过战士，我们的战士所用的武器，不是枪和刀，却是知识、信仰，和自己的意志。他把自己的意志锻炼成比枪刀更锋利、更坚实、更耐久的东西。他永远追求光明。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他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对于他，生活便是不停的战斗。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带着满身伤痕而死去。你正是这类战士的一个典型，你从不知道灰心与绝望，你永没有失去青春的活力。

“除非他死，人不能使他放弃工作，”这是我称誉战士的话。你确实做

到了这个地步。甚至在你的最后两年间，你的肺病已经进入第三期，你受着那么大的肉体痛苦的折磨，在死的黑影的威胁下，你还实践了你那“以有限的余生，为社会文化、思想运动作最后努力”的约言，完成了《科学与人生》、《达尔文》、《科学方法精华》三部译著。这许多万字，都应该是在“胸部剧痛”和“咳嗽厉害”中写成的。最后躺在死床上，你还努力写着你那篇题作《理想社会》的文章。可见一直到死都是些什么事情牵系住你的心。

十几年来你努力跟死挣扎，你几次征服了死，最后终于给死捉了去。这应该是一个悲剧。但是想到你怎样在死的威胁下努力工作，又以怎样的心情去接受死，我觉得这是一个壮观。一个朋友说，临死的你比任何强健的友人“都更富于生命力”！另一个青年友人却因为你以濒死之躯竟能够如此平静地保持着“坚决的信心和旷达的态度”而感到惭愧。一个温柔的女性的的心灵曾经感动地为你写下这样的赞辞：“透过那为病菌磨枯了的身体，我望见了一个比谁都富于生命的欣欣向荣的灵魂！永远不绝望，永远在求生，——为工作而生。”我应该给她添上几句：而且像一个播种的农夫，永远在散播生命的种子。你以一种超人的力量平静地吞食了那一切难忍的病痛，将它们化作生命的甘泉而吐出来。难道世间还有比这更强健的人？还有比这更美丽的生命的表现？

自然在你一生中，经济的压迫与生活的负担很少放松过你。要是换上一个环境，你也许至今还在美国的实验室里度着岁月。你也并不是没有“向上爬”的机会。对你的生活有决定影响的更不是经济的压迫。你为了理想才选取现在走的这条路，而且也是为了理想才选取了过去所走过的路。甘愿过着贫苦生活，默默地埋头工作，在绝望的情形下苦苦地支持着你的教育事业，把忌恨和责难全引到自己的身上，一直到用尽了自己的力量，使事情告一个段落，才又默默地卸下两肩的责任，去到另一个地方开始接受新的工作。倘若单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你不会让工作把你的身体磨到这样；倘若单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你又不会有那么坚强、充实的精力，在患病垂危的最后二年间还做出那样多的事情。

通过了你的一生，你始终把握着战士的武器。你的一生就是意志征服环境的一个最有力的表现，你做了许多在你的处境里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创造自己，只为了来完成更大的工作。你终于留下不少的成绩和不小的影响而去了。你的死使我想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学者龚多塞，他在服毒以前安静地写下了遗言：“科学要征服死。”我又想起一个躺在战场上的兵，他看见自己的战胜的旗帜在敌人的阵地上飘扬，才安然闭上燃烧的眼睛。

有了这样辉煌的战绩以后，你对自己的死应该没有遗憾了。你是完成了你的任务以后才倒下的。而我们呢？作为你的朋友的朋友，至少我是没有理由来哀悼你的。失去了这个散布生命的人，失去这个“生命的象征”，像这样一个生命的壮观如今竟然在我们的面前永久消去，我们应该感到何等的寂寞。我们应该为这个巨大的损失悲痛。

在这里我不敢提说到个人的私谊，这几年来我已经失掉不少能够了解我、鼓舞我、督责我、安慰我、帮助我的友人，如今又失去这个不可少的你！十二年来的关切、鼓励、期望、扶助（我永不能忘记“八·一三”以后两个月你汇款给我的事，那时你自己也是相当困苦的），现在都成了一阵烟，一阵雾。我在成都得到你的死讯回来，读到你生前寄出的告别信。我读了开头

的几句：“无论属于公的或属于私的，我有千言万语需要对你说，但我无从说起，”我只有伏在书桌上淌泪，范兄，我不是在为你流泪，我是在哭我自己。

在你的告别信里还有两段我不能卒读的话，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把它们写下来的，你甚至带点残酷地说：

自去年冬至节以后，忽然变成终日喘哮不绝，且痰塞喉间，平卢平卢作响，咽喉剧痛，声音全部哑失。现由中西医诊断，谓阴历十二月一个月为生死关键。

最近几个月来我已受够了病的痛苦，因为喉痛，连鲜牛乳、鸡汁都不能自由的吃。四肢和身躯已成枯柴，仅剩了骨和不光泽的皮。我已不能自己穿衣，不能自己研墨执笔，我的身体可说完全失了自由。

在我们这些活着的友人中间有谁受过这样痛苦的病的折磨？又有谁能够忍受这一切而勇敢地一直工作到死？更有谁在自己就要失去生命的时候还能够那么热情地到处散布生命，写出洋溢着生命的歌颂生之欢乐的文章？倘若有一天我也到了你这样的境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保持着你的十分之一的勇敢和热情，像一个战士那样屹立在人世的波涛中间？我更担心自己是否还可以像你那么宁静，那么英勇地去迎接死？

今天仍旧在这间堆满家具和书报的宽大楼房里，窗外街中响着喧嚣的汽车声，尘土和炎热不断地落到我的头上，身上，手上和纸上。时间已是开篇所谓“昨夜”后的第四天了，我的高热刚刚退尽。这几天里我不能做别的事情，我就只想到你，我善良仁厚的亡友。你现在永远地离开我们了。一直到最后你还给我们留下一个战士的榜样，你还指示我们一个充实的生命的例子，你對自己，对朋友都可以说是毫无遗憾的。正如我在前面说的那样，你是尽了你的战士的任务躺下了，你把这广大的世界和这么多待做的工作留给我们。继续你的遗志前进，这正是作为你的友人的我们的责任。范兄！你静静地安息罢，我不能再辜负你的殷切的期望了。

从炎热的下午到了阴雨的深夜，雨洗去了闷热，但也给我带来寂寞。而且这是带点悲凉味的寂寞。一切都睡去了，除了狗吠和蛙鸣。十二年的友情又来折磨我的心。我从凌乱的书桌上，拿起你的信函，你那垂死的手写出来的有力的字迹，正在诉说十二年中间两个友人的故事。武庙中第一次的握手，也就是同样的写这信的手和拿这信的手罢，那么这应该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的握手了。这样的告别，这是多么可悲痛的告别啊！

但是望着眼前你的活跃的字迹，我能够相信你已经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么？

凉风从窗外吹入，我伸出头去望天空，雨天自然没有星光，但是我的眼前并不是一片黑暗。我想起了一颗死去的星。星早已不存在于宇宙间了，但是它的光芒在若干年后才达到地球，而且照耀在地球上。范兄，你就是这样的一颗星，你的光现在还亮在我的眼前，它在给我照路！

1941年6月17日夜在重庆沙坪坝

纪念憾翁

工人堆上了最后的一撮土，细雨便跟着夜色来了。我又一次揭下帽子，晚风冰冷地敲着我的头，好像要给我唤起那些记忆似的。我转头望望四周，一片黄沙，一堆山影，几棵枯树，除了我们这一群十多个，再不见一个人影，工人们收拾了器具走了。我最后一次望了一下眼前的新家，然后戴上帽子。我也动身回家了。我的眼睛是干的，那里面没有眼泪，有的只是一个人的影子。我敬爱的亡友，你的影子送我走过那些泥泞的道路，一直把我送到篱笆门前。我到了家，看见那亲切地招呼着我的灯光。两所房屋紧紧地靠在一起，可是我回到了家，你的影子却永远地消失了。

厅堂里那张竹沙发上坐着另一位朋友。那里原是你从前常常坐的地方，那饭桌是你靠过的，那板凳也不知被你坐过多少次，那窗板也曾好几回由你亲手装上，那茶杯和茶壶上面应当还留着你的指痕。板壁和土地也曾听见你的爽朗的笑声，整个厅子似乎都在呼唤你回来。但是一屋子阴沉的脸色给了我一个多么绝望的回答：你永远不会回来了。

在外面爆竹声万马奔腾似地响着，空气里仿佛隐约地飘荡着一阵一阵的欢笑声。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一个欢乐的日子。我们也想跟着这个城市发笑，我们也想说些吉庆的话，可是我们的笑容是忧郁的，我们的笑声是空虚的。便是最会讲话的嘴现在也显得笨拙了。朋友们用痛苦的眼光对望着，然后露出无可如何的微笑。大家都明白任何努力也不能够立刻除去各人心上的重压。我们开始觉得这种团聚是难堪的了，城里的朋友便借了种种的口实一个一个地走开了。剩下住在这里的几个人默默地对着一盆火坐了许久。

夜在接连不断的爆竹声中慢慢地走了过去，它并没有惊动我们。在隔壁你的房间里静静的没有声息，黑黑的没有灯光。我的眼皮渐渐地垂下来，朋友们也都埋下了头。方桌上的一盏植物油灯也渐渐地暗淡了。我是在做梦吗？在这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吗？什么都还是同以前一样的吗？

我突然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这不是梦。什么都没有改变。就只是你不会回来了，永远不回来了。

我敬爱的亡友，十三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曾想到十三年后今天的这情形么？

十三年，那些数不清的长日子，我应当忘记了许多事情，可是你那时的面容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子里。我们没有机会讲许多话，我只默默地注视你那温和的微笑。这微笑经历了长久的艰苦的岁月都没有消去。它慢慢地把我拉向你的身边。在七年的沉默之后，我们偶然遇在一起，我又在你的脸上见到那同样的笑容。迟疑和拘束在一瞬眼的功夫完全消失了，我兴奋地握着你伸过来的手。友情从这里开始，苦难巩固它，欢乐装饰它。在寒冷中我感到它的温暖，在暗夜里我见到它的光辉。我开始为了七年的沉默责备自己。现在在一个平凡的面貌下面，我听到一颗善良的心的跳动了，我又开始为自己庆幸。

从那时到今天整整六个年头过去了。我不能计算这七十二个月中我从你那里得到多少东西。你太慷慨了，你为我打开了你那海似的心，让我的心灵在你的鼓舞、安慰、帮助下成长起来。有一个时期在上海租界里敌伪的魔爪向四处伸展，死亡在我们的周围窥伺，外面散布着种种的流言，人对自己常

见的朋友都不能够相信了。一天晚上我接到几次朋友们警告的电话，我也把这似可信似不可信的消息用电话转告你。在电话中我听见了你那爽朗的笑声，我的心安了。这些日子里都是你的笑声引起我的笑声，你的镇定和乐观增加了我的勇气，你的豪侠的精神净化了我的心灵。正如在广州大轰炸中和从广州脱险出来的日子里，我因了你的友情的鼓舞而更勇敢地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一样。在任何时候我都觉得我不是孤独的，甚至在危险当前、黑云蔽天、最绝望的时候。我原是一个渺小的人，但我现在也知道为大义献身；我原是一个心贫的人，但我如今也愿意做一块木柴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我始终是在朋友的庇护下面生活的。你正是那些能够了解我、鼓舞我、安慰我、督责我、帮助我的友人中间的一个。现在我又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更多的这样的友人呢？

我不应当在这里唠唠叨叨地诉说个人的私谊。其实受到损失的不止我一个，还有更多的人在悲痛中过日子，她们失去了丈夫，失去了父亲，这损失更是不能补偿的了。在他们的旁边我没有权利悲叹哭泣。我更没有权利利用过去的回忆折磨他们。你原是一个口如悬河的辩才，却默默地跟他们诀别。一瞥最后的注视，一滴最后的泪，你放心地闭了眼睛。你自己安息了，你也把安静留给了他们。一直到死，你都是一个谦和的人；一直到死，你都是在替别人着想。你永远想到别人，忘了自己。

我没有看到你跟死挣扎，我没有看到你在死面前显出胆怯的样子，你死去如同酣睡。“我没有病，我没有病，”你不知说了多少遍。我们不相信你的话。其实也许你比我们更清楚。你是有道理的，因为一直到最后还没有一个医生看出你致死的病源，而那个一口断定一个星期包好的“名医”，几次挺起肚子坐在车上经过你的门前，也忘记下车来问一句他卖出的几十颗高价的“特效药”是否灵验。要是你现在还有知觉，我想你一定会望着他发出你那爽朗的笑声。

然而我们却不能够笑了。我们不是大量的人，不能够宽恕那疏忽和愚蠢。他的轻率的诊断在许多人的心里挖了一条沟，那是无法填满的了，纵使 we 活到百年的高龄。

我敬爱的亡友，原谅我又在这里诉说个人的损失。不过你不会误解我的意思，我并非说你只是在几个人中间发光的人。你的死使神圣的抗战失掉了一个热烈的拥护者，使为正义奋斗的人失去了一个忠实的朋友。你是一个理想家，但你又是实际的人；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你又和非宗教者做了好友。你在朋友中间发射着光彩，但是你单单为了一件小小的工作就牺牲了生命。的确，你是为了你那个“该死的刊物”（你骂它该死，更可见你是如何爱它！）死的。你为它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安乐，牺牲了家庭幸福，甚至冒着种种危险；你将自己的心血和精力熬成墨水，给理想多涂一点光彩，为抗战多尽一分力量。这些年来我就没有看见你闲过一天。最后躺在病床上，你还带着焦虑地筹划刊物的维持与发展。就在去世的前两天，你还关心地问起刊物的事情。你不会想到就在这么短短的时间以后，在你自己的刊物上会印出哀悼你的文章。

六年来我的眼睛牢牢地注视着你的生活。我看见你怎样挣扎，怎样跌倒，又怎样爬起来继续前进。没有人在旁边搀扶你一把，或者说几句切实的安慰的话，但你永远是乐观的，永远是谦和的，你从不怨恨别人，只是苛责自己。六年来你就没有畅快地休息过一天，你忠实地守着你的工作，你终于死在你

的岗位上。固然，你的事业并未完成，你的抱负并未实现，但是你已经尽了你的职责死去了，你是不该有遗憾的。以后的责任应当由那些活着的人担负，希望他们能好好地继承你的遗志，实现你的抱负，让你更光辉地活在你的事业里罢。

门外寂无人声，夜是这么深了。我还坐在方桌前面拿起一支笔，写你的事情。这方桌就是你从前工作的地方，厅子里除了新添的一张写字台外，一切跟你在时完全一样。但这已是我写了开篇以后的一个多月了，也就是你离开我们以后的一个多月了。在灯光的四周聚着一团黑影，仿佛有一对眼睛在向我注视。我忽然听见了一声轻微的咳嗽，声音是这么熟。桌上正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浓茶，我说：“你坐下喝杯茶罢。”我惊喜地抬起头，可是只看见映在墙壁上的热水瓶的影子，没有一个人，我原来在对自己讲话。你是永远不会回来的了。

门外是一个落着细雨的夜，在那边，润湿的泥土下面一定很冷。但愿叫号似的风不要惊醒你的长眠。我想到伴着你的一片黄沙、一堆山影和几棵枯树，心隐隐地发痛了。原谅我这个自私的人，我独自享受了温暖的灯光和热气腾腾的浓茶。……对着这一屋子的凄凉的静寂，我只有愤然掷下我这管秃笔。

1943年3月在桂林

写给彦兄

在报纸上看到你的死讯，我觉得心里很空虚。我躺了几个钟头，没有讲一句话。这时候我愿意我能忘记一切，但十几年前的往事偏偏来到我的眼前。是的，我的眼睛不肯休息，它们找回来那些我以为我早已忘却的事情。我看见你穿着一件白衬衫，带着一个本地小孩走到鼓浪屿一家滨海的旅馆里来。在二楼那间宽敞的房间里，畅谈了一点多钟以后，我们成了朋友，那是十四年前的事。那次并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而我知道你的名字，却更早六七年。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你的《灯》、你的《狗》感动过我。那种热烈的人道主义的气息，那种对于社会的不义的控诉，震撼了我的年轻的心。我无法否认我当时受到的激励。自然我不能说你给我指引过道路，不过我若说在那路上你曾经扶过我一把，那倒不是夸张的话。我们十三四年的友情就建立在这一点感激上面。我始终没有让你知道我这小小的秘密。其实我何必要告诉你呢？在我们这些分多于聚的十三四年中间，我们也曾一同经历过苦难的日子，分享过朋友畅谈的欢乐。不论在泉州黎明高中的教室里，上海法租界华北公寓的小房间里，或者上海信义邨的住家，或者桂林福隆街的寓楼，我没有看见你有过十分畅快的笑容。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在你瘦削的肩上，它从没有放松过你。这些年你一直在跟它挣扎，你始终不肯屈服，你要畅快地吐一口气。可是你愈挣扎，愈透不过气来，好像这就是对你的惩罚一样。我知道，要是你肯屈服、肯让步、肯妥协，你一定会过得舒适、安乐。你并不是不喜欢舒适和安乐的生活。然而你的性格不让你有片刻的安宁。你的性格使你拖着一家儿女在各地漂流。在某一点上，你有些像罗亭。这并不是说你不能说不能行，我是说你不能适应环境，你不能为自己建立一个安定的窝；你不能为了个人的安乐，忍受任何不公平的待遇。你到处撞，到处碰壁，可是长期的困苦并不曾磨去你的锐气。就是在患病以后，不管躺在床上，或是拄杖缓行，你还是昂着头在撞，你还是因碰壁而恼怒。后来你的声音哑了，结核菌蚕食着你的咽喉，肉体的痛苦跟随死亡的逼近一天天在增加着，你还是不肯放下你的笔，你还是不断地为你创办的《文艺杂志》焦心。到最后，你只能用铃子代替你的语言，你还是没有失去对生命的热望，你还是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在先，没有人称你做一个战士。事实上许多年来你一直在奋斗，你想为你自己，也为别的一些人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可是结果你终于痛苦地死在寂寞和贫穷里，像一个死在战地上的兵士，你没有看见胜利的希望就闭了眼睛。即使有人说你没有留下光辉的战绩（其实你一部分的作品不就是光辉的成就么？），但谁能否认你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呢？

虽然我们之间有着十几年的友情，可是我没有资格论断你。我这里说的只是一个朋友的意见。认识你的人都有着他对你的一种看法。不管他看重你的好处，或者注意你的缺点。你两样都有，因为你是一个人。而且我们谁又没有更多的缺点呢？况且作为一个十几年的朋友，我在你的苦难中给过你够多的助力么？我分尝过你些许的痛苦么？我做过什么减轻你苦难的努力么？那么我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絮絮地谈到你，夸张地叙说我们的友情呢？

不，彦兄，你多少知道我一点，那么你会明白你的死使我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正是在两年前，有一天傍晚你从桂林三家村寓所把我送到洋桥，我

要你陪我进城，到一家小馆里吃点东西，多谈个把钟头，你因为天晚身体不舒服，不肯进城。我们站在洋桥头，随便地谈了一刻钟的闲话，然后你支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了。我望着你那歪斜地走着的身影在逐渐加浓的夜色中消去，我的心忽然隐隐地痛起来，泪水迷糊了我的视线。彦兄，我不是在为你哭，我是在哭自己。我那时就想到在你身上也活着我一部分活动、快乐的岁月，它们快要跟着你死去了。这些年我哭过世弥、哭过范兄、哭过憾翁，现在又轮着我来哭你。每次我都在埋葬，我不是在埋葬你们（自有你们的亲属来使你们的遗体得到安息），我是在埋葬我自己的一部分。那就是跟着几个朋友遗体埋葬了的一些岁月，在那里面也许还有些金沙似的发光的东西。现在即使年岁能够倒流，我也找不到像你们那样的印证的人了。

今天，我坐在那间陈设凌乱的书店办公室里，对着一盏昏暗的电灯，给你写这封诀别的信，这一封你已无法看见、而我不得不写的信。门外是一条热闹的大街，隔壁戏园刚刚散场，一大群人的脚步和笑语，潮水似地在门外流过。接着又是小汽车急驶的声音，然后又是一男一女在大声相骂。一个卖炒米糖开水的小贩走过了。两个女人叽哩刮啦地走过了，又有人在大声喊“煮两碗抄手”。只隔着一堵墙！在门外，人们在享乐，在活动，在笑，在吵。在我这里却只有老鼠啃字纸的小声音，伴着我的，是寂寞，是一些折磨着我的回忆，还有一颗饱受熬煎的痛苦的心。永别了，我的亡友，在敌骑践踏的星子岩的土地中，你的睡眠不会是安适的罢。但是我们不久就会回到你身边来的。那时我要在你墓前背诵《灯》里面求母亲收回那颗爱人类的心的哭诉，《狗》里面那些漠视弟兄痛苦的自责。我还要告诉你，我怎样在我们两人都喜欢的地方“鼓浪屿”去寻找我们的足迹。当你知道你是怎样地活在朋友们的心中时，你或者会原谅这个未能在你最痛苦的时刻来到你身边的友人罢。

1944年8月在重庆

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

今天在街上看见一个背影跟你很相似的人，我几乎要叫出你的名字，可是我立刻想起你已经在三个月前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大半年以来，我的生活特别乱，我的心特别烦。过去的每个日子都给我带来新的追悔，新的苦恼，“生命的浪费”的感觉压迫着我。我像是一个被判定在监牢里憔悴一生的囚人，我不敢用思想，我怕触动我对于无法达到的东西的渴望。我又回到写《灵魂的呼号》的时代了。可是那时候我还有我的一支笔，可以整天写出我心里话，现在我有的却是那无数琐碎的事情。我无法摆脱它们。我始终绝望地挣扎，我在跟它们挣扎。这时候我多么需要友情的安慰和鼓舞。我想找个机会去你那里同你畅谈一两个整夜，因为在朋友中你是比较了解我而又愿意听我发牢骚的人，正如你自己所说，你“一直在系念着”我，而且恐怕再没有像你这样系念着朋友的人。并不是我没有机会。我知道你随时都欢迎我去。还是那些杂事耽误了我。于是我等着你进城，你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里还提过“不久就要进城‘就业’”的话。我一直在等着……等着。可是一月十八日早晨我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死讯，是用小五号字排的，不过短短的三四行。我不能相信那是关于你的消息，你不能用这模糊的铅字的痕迹向朋友们告别。然而过了三个钟点，同你住在一个地方的左兄的快信到了：

崇群今晨三时二十五分长逝于江苏医院，因医院不能久停，无法俟友好齐至一瞻遗体始行安葬，爰定后日（十七日）上午九时落土，心痛笔重，容缓详告。

一切可能有的疑惑和希望都消灭了。想不到一张薄薄的信笺却能够毁灭那么多的东西。朋友，这次真是永别，你竟然一声不响地悄悄走了。这封短信在邮路上走了四天，我到十八日的下午才看到它。我赶到你长眠的地方，却只能看见一堆新土和两个纸制花圈。花圈上贴着白纸条：“崇群先生千古……”。除了你的名字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使人相信躺在这松松土堆里的会是你本人。那是一个斜坡，旁边有两座简单的坟墓。不知道是怎样的人做了你的邻舍。你躺在那里应该是多么寂寞。

我在你墓前站了五分钟光景，我没有向你讲一句话，或者行一个礼。我默默地跟着朋友们走到渡口去。要是在一个月前你一定会跟我们同去，可是现在我们却撇下了你。十四年的友谊就这样梦也似地结束了。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在心里暗诵着你从前写给我的那句话：“我们无端的相聚又无端的别离了。”

无端！难道这真是无端的么？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我睡在江的彼岸，半夜里风敲着窗，窗门被吹开了，寒气从洞开的窗户扑进来，把我从梦中惊醒。屋子里一片黑，外面是砂土飞舞的声音。我不能睡。寒风从四面八方袭来。身子的颤抖使我的脑子特别清

你一定记得十三年前我在你住的那个北平小小公寓里开头写的那篇短文。我知道你那善良的心对朋友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忘记。《灵魂的呼号》在天津写完，发表在上海《大陆杂志》上，后来又作为“代序”印在《电椅》集的卷首。——作者注

见缪崇群著的《一对石球》。

醒了。我想到躺在土里的你……那个光秃的斜坡，那些经不住风吹雨打的松
松的土块……最后我想到这天傍晚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你临死的情形：

“他真是太善良了，他一直到死都不愿意麻烦别人，”朋友在叹息地说。

“我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善良的人，”左太太说，眼圈已经红了。

我蜷缩在被窝里，一边低声念着他们的话，一边流着眼泪。

只有在这时候我才知道我的损失是多么地大。我失去了一些永远找不回
来的东西，一些我应该珍惜却没有好好珍惜的东西，在我们相识的十四年中
间，我不知错过了多少次和你相聚、和你通信的机会。我没有好好地认识你
的纯白的心灵，我也没有尽我的力帮助你跟疾病、跟困苦挣扎，我也没有尽
我的力帮助你安排一个较好的生活。我给你的只是一些空话，一些不能实现
的希望。一直到你死，我没有能给你一点安慰，减轻你一些寂寞和痛苦。作
为一个朋友，我辜负了你的信任了。

在这不眠的寒夜里，我重温着我们十四年的友情。在这动乱的、漫长的
十四年中间，我目睹了够多的人世的兴衰，我忘记了不少的事。可是我们相
识、相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我回想着，回想着，我的心慢慢地温暖起来，黑夜也逐渐淡去，你那温
和善良而带苍白色的面颜出现了，还是你那包着水的眼睛，微笑的嘴唇，带
痰的咳声，关切的问询。这一切仿佛是永不会改变的东西。从最初的相识到
最后的会晤，我没有看见你改变过一点，甚至不治的痼疾，甚至人世的苦辛，
都不曾毁损了你的面容和心灵。

“九·一八”事变的前几个月，我去南京访左兄，在成贤街一个小楼上，
我们第一次见面，没有经过第三者的介绍，我们各人说出自己的名字。我读
过你的文章，你也读过我的作品。在我等候左兄的两个钟点里面，我们谈了
将近一点半钟。这不是普通的寒暄，这是肝胆的披沥，心灵的吐露。我没有
谈起我的过去，你也不曾说到你的身世，可是这天傍晚我们握手分别时，却
像是相知数十年的老友。

过了一天我便回到上海。我们中间信函的往返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当
时你正代左兄编辑一份文艺杂志，我做了这杂志的长期写稿人。每个月在一
定的日期我为你寄出一个短篇。你收到我的稿子，总是老实地写出你读后的
意见，有时也不客气地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这态度，这习惯，你一直到死
前两个月还保持着，虽然你早已不做杂志的编辑了。去年十月我的小说《憩
园》出版，你还是它的一个精细的读者，你甚至为我指出那书中的一个“小
毛病”（你客气地说，那是“小毛病”），而我自己和别的一些读过这小说
的朋友都把它看漏了。

有一次（还是在“九·一八”前）我寄你一篇《我的眼泪》，这小说是
为了纪念那个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优美的精神”的意大利卖鱼者樊塞蒂写的。
你第一封信向我叙说了你的感动，可是接着又来了第二封信，你愤慨地告诉
我你为了我这篇文章跟杂志社负责人发生了争执。第三封来信说负责人已经
让步，不再阻止发表这篇文章，却只要求将稿子压一期付排，你还预备以去
就力争要我的小说早与读者见面。我感谢你对朋友的热诚和做事的认真，可
是我不愿意你为这一件小事就放弃你的工作。我便另外写了一个短篇为你寄
去。这就是我收在《短篇小说第一集》里的《一封信》，它占据了《眼泪》
的地位。但《眼泪》在下一期杂志上也居然堂皇地与世人相见了。你应该是
我见过的一个最有责任感的编辑罢。后来我又为你的杂志写了长篇小说

《雨》，可是它只刊出一半，你就因病或者因为别的事情离开了杂志社，离开了南京。从这时起我就没有看见你的名字印在任何文艺刊物上面了。

“一·二八”沪战爆发的那个夜晚，我正在由京开沪的火车里面，车子开到丹阳又折回了南京，使我在那里同你多聚几天。在我那篇《从南京回上海》中，我这样写着：

……下午醒来，到一个朋友那里去。朋友看见我便惊喜地说：“原来你回来了！我们正在替你担心。”我很感激朋友的关心，但是我看见桌上的一张《新民报号外》，我的心又被沉重的石头压紧了。……

“看这情形，上海是没法回去的了，天津恐怕也危险，你还是准备在南京多住几天罢。住旅馆不方便，搬到我这里来住好些。”这是朋友的殷勤的劝告，在平时我很喜欢听这样的话，但是这时候它们却把我的希望杀死了。……

在朋友那里所谈的只有愤激的话和痛苦的话。朋友也是一个有心而无力的人，他的身体比我的坏得多。他患肺病，最近还吐过血。他是需要静养的。我和他多谈话，只有增加他的痛苦。我看见他那没有血色的脸上怎样燃起了愤怒的火。……我们的口只能够在屋子里叫，我们的手只能够拿笔。……

一个星期以后我安全地回到了上海。过了几个月你也就到了北平。

这年九月我去北平看你，我在你那个小小公寓的小小房间里住过几个夜晚。那时你新结了婚，但是你让你太太住在岳母家，你一个人睡在公寓里养病。还是你那包着水的眼睛和微笑的嘴唇，只是精神较差一点。

关于这次的相聚，你写过一篇短文。你写着：

记得你来的时候，你曾那样关怀地问：

“在这里，听说你同着你的妻。”

“是的，现在，我和她两个人。”

我诚实地回答你，可是我听了自己的答话却觉得有些奇异，从前，我是同你一个样的：跑东奔西，总是一个单身的汉子。现在，我说“我同她两个”——竟这样的自然而平易！

你来的那天白日，她便知道了她的寂寞的丈夫还有一个孤独的友人。直到夜晚，她才喘嘘嘘地携来了一床她新缝就的被子。

我于是为你们介绍着说：

“这就是我的朋友；这就是你适才所提到的人。”……

那夜，她临走的时候我低低地问：

“一张床，我和朋友应当怎样息呢？”

“让他在外边，你靠里。……没听说过——有朋自远方来，抵足而眠啊。”……朋友，你在我这里宿了一夜，两夜，三夜……我不知道那是偶然，是命定，还是我们彼此的心灵的安排？

有一次你似乎把我从梦呓中唤醒，我觉出了我的两颊还是津湿。我几次问你晨安，你总是说好，可是夜间我明明听见了你在床上辗转。……

你把这篇文章题作《一对石球》。那对有红色斑点的石球是我在颐和园里买来的，我打算把它们带回上海，却放在你那间小屋里忘记带走。你说要

给我寄去，我更愿意把它们作为纪念物留给你。那次在北平我玩了好些地方，却只有两次拉着你和你太太同路。一次是游三殿，你们让我一个人进去，却坐在进门处石阶上等候我。你喘着气告诉我你委实没有力走到里面去了。你那时身体似乎很坏，连走路都很费力。你整天就坐在公寓里安静地度着日子。还有一次，我们坐车去看电影，到了戏院门口，你用力拖住我，好让你太太去买了票。我知道你的性情，我必须让你那愿意使每个人欢笑的心灵得到满足。从电影院出来我又跟着你们到附近一家广东酒楼去。我默默地看着你们夫妇红着脸（病态的红），带着欢笑张罗一切，我脸上露着笑，心里却只想哭。我也许只是一个卑微不足的利己主义者，可是在这一刻我却愿意拿我一生中最好的时间来换取你们的健康。我不能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我活着不就是在浪费我的生命？

酒浇在我痛苦的心上，我醉了。回到公寓里我不想说话，我却拿出稿纸写起我的《灵魂的呼号》来。

第二天下午我离开了北平。你扶病送我到车站，你太太也去了的。开车的时候我从三等车厢里伸出头来，你们还站在月台上频频对我挥手。我万想不到这一别就是三五年，而且我永远见不到你那位好心的太太了。

在车上我想起了几句话，一到上海我就把它们写下来寄给你：

我无端的来，无端的去。打扰了你们好几天，分享了你们一些快乐，我带走了一些东西，也许还留下一些东西。可是过去的终于过去了。……

第二年秋天我又去北平，但是你们已经到南京去了。在一篇短文里我这样写着：

火车在细雨蒙蒙中离开了浦口，时候是十一点钟。我没有留我的足迹在南京，我是有遗憾的。……尤其使我挂念的是那个害肺病的朋友和她的夫人。他最近还写信给我说：“你的心灵的纯洁，生活的洒脱，只要在我得到一刻沉静的时候，我便追怀着你。我是渐埋渐深的成了一个泥人了。我常常希望着因为我有痼疾而早结束了我的生命。”去年我在北平承他款待了一个多星期，和他在一张床上度过了那些夜晚，听了 he 多少次的咳声和梦呓。……我带走的他的印象到现在还没有褪色，依旧是去年那样地鲜明。“心灵的纯洁”，只有他可以接受这个评语。但是没有人了解他。他如今在艰苦的生活的斗争里、社会的轻视的眼光下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了。每次我读着他那些混合着血和泪的散文，我的整个心灵都被扰乱了。我常常在心里狂叫着：“他是不能够死的，他应该活下去，强健起来，去享受生活里的幸福。”但是谁能够使这愿望实现呢？……没有人回答我这个呼吁，后来连我自己在忙乱的生活也忘了常常给你去信。我只寄过你两三册我著译的书，《秋天里的春天》便是其中的一本。这应该归罪于我，因为你困居南京，实在追不上我的足迹。

但是在我去日本的前两夜，我还有机会在上海一家公寓里同你相见。记得你那时刚从南京来，暂住在一个朋友在公寓里定下的房间。小小的屋子里已经坐了四五位客人，他们应该是那位朋友的友人罢，里面有一个偶尔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一两篇短文的作家。我平日很讨厌他，看见他那油滑的面孔，我无法和你谈话，在那个不通风的房间里坐了不到半点钟，我就匆匆地告辞

见《旅途随笔》中的《三等车中》。

走了。我没有对你说明我匆匆告辞的原因，正因为“匆匆”，也忘了向你讨一个通信地址。

第三天早晨，浅间丸载着我向横滨驶去。三天后我到了那个地方。在那个岛国的居留期中，我改换了我的姓名，除了两三个朋友，没有人知道我的行踪。从这时候起整整有二十二个月我们没有通过信。我失去了你的地址，你也不知道我的踪迹。

然而两年以后，一个秋天的傍晚，我在上海意外地接到了你的信，我认出你的字迹，我高兴地对自己说，“我又找回他了！”可是拆开了信，我看到的却是这样的话：

……你还记得在南京，不，在这个广大世界上，有一个你系念过的人，你曾为他祝福，希望他生活下去，得到生活里的幸福……并且他也一直在系念着你。病没有使他灭亡，还如你所希望的在生活着……就是你曾经把一对石球遗忘给的那个人，也是写了《一对石球》寄赠你的那个人。

朋友，五年的时光一霎间的过去了。如今除了我还在系念着我的几个私自景仰、私自向往的友人之外，怕再没有如我这样的在系念着我的友人了。我是一无所有的。你所希望于我的，生活下去，这便是我生活下去的一条荒凉的寂寞的路程。

朋友，你还记得你一度闯入我们蜜蜂一般的生活圈里，不但不曾把你看作生客，还把你当作蜂王，当作长老的我们么？一个人小心翼翼的为了你抱了新缝的被衾而来，一个人诚诚恳恳的留着你抵足而眠么？那一个是你知道的祖英，也许经过了五年你早已把她忘记了。她是一直的和我在一起，她是一直的和我一样为生活而苦苦挣扎。她在上月二十五日傍晚已经死去了，她想挣扎再也不能挣扎的向生活永诀了。

想到那些日子，才是我们生活的日子，想到那些日子里有过你，我们生活的日子才仿佛有过记录。现在什么都完了，祖英一死，连那些生活里有过记录的日子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一个人谈起了。

想到前年秋天她每天给我读一节你赠我们的《秋天里的春天》，我们每每随声对泣。爱巴达查尔师，又怨他。谁还料到祖英死后我再对你提起这个书中人物呢？

祖英临死的时候还说：她死，我将是世界上一个飘泊的人。我飘泊到什么地方去，又为什么飘泊，她就没有给我接话，连我也不知道！

正因为我是一个平凡地想平凡生活下去的人，我想我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打扰你了，我想着祖英，想着你，想着我还有自由可想的人……我就这样地再可以生活下去了吗？你该应我一声！

我读着这封信的时候，另一个和你相熟的朋友正坐在我旁边，他也是两年多没有得到你的信了。我把信拿给他看。我们默默相对，许久讲不出一句话。

我回想着那个红红脸的年轻主妇的面影，我暗暗地问自己这不是梦么？为什么她这么年轻就离开这个世界？

可是这一次我不能再沉默了。我立刻写了回信。我盼望着“明年的春风会给你煽起生命的烈焰，给你吹散痛苦的回忆”，使你能够强健的活下去。

那个朋友也给你去了信，他当时正在上海编辑一份文艺月刊，要求你寄稿子来。你并没有寄过文章，可是我们间的通信却不曾间断过，并且一直继

续到“八·一三”。

那个朋友在北平住得比较久。有一次我们谈起你，他才告诉我，你在北平还有一个老家。你住在那个湖南人开的公寓里的时候，你家里人知道你在北平，却不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后来你父亲去世，你的兄弟登报找你，你才回到家里去主持你父亲的丧事。那个朋友就是在你的老家里和你第一次见面的。

你始终没有对我谈到你的身世和你的家庭，我也始终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过去。可是从那个朋友的口中知道你还有一个老家以后，我不久又读到你的一篇题作《棘人及其他》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早已写好，早已发表了，可是这时我才读到它。读你的文章仿佛在听你谈话，亲切、温柔，还夹杂了一点点哀伤。

我这次回到家里，已经隔了好几个寒暑。到家的那天，距父亲的死已是六天之后了。倘使我六天之前归来，也许在父亲衰老的脸上还弛下一条笑纹，在将要模糊了的脑中添一个还存在着之儿之印象罢？……

几年前我离开这无母的家，几年后又回到这没有父亲在的家了。……

父亲躺在漆黑了的棺里，弟弟被满头满身的缟素包裹着父亲生前到学校用的书包，还原封搁在他的房里，所有的父亲用的东西，也都统统锁在一起。……

这篇文章写成的日期是“一九三三年一月”。离我们那次在北平的相聚不过三个月光景。三个月！这么短的时期，你的生活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却无法在你的信里找到一句与它有关的话。为什么保持沉默呢？虽然这篇文章告诉了我一些你没有对我讲过的事，可是我现在还不明白你为什么脱离家庭。这中间也许有一段痛心的故事。但你为什么不让我做朋友的分担一点你的痛苦？

现在你抱着你的痛心的“秘密”到永恒里去了。那里有你的妻，你的母亲，你的父亲，希望你能够在那里找到一个温暖、和睦的家罢。那么过去的就应该让它静静地过去了。

抗战的第二年，我在广州遇到左兄，从他那里打听到你的通信处。我寄了一封信到桂林去。不久你的回信来了。是一封短短的信。可是你告诉了我一些我愿意知道的消息：你活得相当强健，体力和精神都比从前好多了。你甚至兴奋地说起渴望看到抗战的胜利。

但是这封信带给我的快乐并没有继续多久。敌人在大亚湾登陆，接着广州沦陷，我和几个朋友沿着西江辗转到了桂林。

到桂林的第二天我就在一家北方饭馆里遇见了你。还是那包着水的眼睛，微笑的嘴唇，苍白的面颜。你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可是我觉得你胖了些，气色好看些，精神也好了一些。我的眼睛证实了你的话，我当然高兴。你还告诉我，你现在能吃能走，还可以陪我走很远的路，游遍桂林的山水。

这以后，你果然陪我玩了不少的地方。在这个古城里我们常有聚谈的机会。后来你决定离开广西时，为了等候便车，你曾搬到我的寄寓里，同我们过了好几天愉快的日子。我说“我们”，因为当时在一块儿聚谈的还有一个“害怕过桥的少女”，她同你还是在那个古城里第一次相见，可是她不久就

见《寄健康人》。

对着拾来的炸弹片为你编织绒线背心了。在《希望者》中你称她做“一个好心的孩子”。这些年来她一直没有把你忘记。现在她作了我的妻，也作了你一个永不相忘的友人。前天她还捧着《眷眷草》垂泪，她一定在追忆漓水边上的美丽的日子，那些连炸弹同大火都不能使它们褪色的光辉的日子罢。

一别又是两年。这中间我走过不少地方，你也走过不少地方。可是后来我们终于在一处碰到了。那是重庆—北碚—北温泉：这三个地方，现在都还保存着我们的足迹罢。

这次你还是没有什么改变，或者你故意不让我看见你有什么改变。我相信你的健康在逐渐恢复，我相信我们还有够多的聚首的机会，我坚决地相信着未来，也相信着在“未来”里我们可以在一起过着比较理想的生活。在这时期我开给你的不兑现的支票更多了（在前一个时期我逼着你写文章，却只为你印过四本小书）。我给过你不少的希望，却终于看着它们一个一个地毁灭。我三次来重庆，三次和你在北碚见面同游北泉，都没有能够帮忙你减轻一点你心灵的痛苦的重压（我不说“物质”，因为你的生活原是那么简单）。尤其是最近这一次——我动身来渝的前一天在贵阳先后遇见你的两位老友（左兄和云兄）。他们都同我谈到你。一个说你的身体还可以支持（他用了“拖”字）若干年；一个说你渐渐地逼近险境了。我说去渝后一定设法为你安排一个较好的生活。

可是在北碚看见你，我给你的还是一个空的希望。你对朋友始终无所要求。每次同游北泉，都是你殷勤款待。你为朋友，可以舍去你最后的汗衫。我存在上海的行李中还有你在桂林送给我的一件毛衣（我从桂林穿到上海，就没有能带出来），有一个时期它曾使我的身体得到了够多的温暖。

如今你终于没有得到朋友的帮助，静悄悄地死了。活着你没有麻烦朋友，临死你也没有麻烦朋友。你病，我不知道；你死，我没有和你诀别。我未能到病床照料你的病，也未能送你的棺木入土。十四年的友情就这样静悄悄地结束了。想起你去年八月十二日夜间接给我的信里的那一段话：

你说了我的话：我们几个朋友终于有一个时候可以长久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的。战时我们分别或同住在帐篷里，战后我们更要建造一条船，一个小舢板也好，一齐在里面当作家，不只是家，恐怕还要渡过一面风不平浪不会静的大海，操作着，努力着，驶向我们真要向的一个港湾，或一片处女地去。我的身体也许不会支持太久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念头。……

说这些话也许还渺茫，我也活得实在渺茫啊！

还有十一月十六日信里写的：

《希望者》：见缪崇群著散文集《眷眷草》的第五辑。

你病中不让人为你写信通知朋友，就是在你得不到适当的照料使病势加重时，你也保守缄默（听说有一次你叫了一夜口渴，到天明才得到一杯水喝）。后来左兄知道你的病状，坚持着送你进医院去，那时你已经没有充分的生命力，跟那压迫了你多年的疾病继续战斗了。据说你一直到死并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也没有留下一句告别的遗言。你死后脸上罩着和平的笑容，人看不见一点痛苦挣扎的痕迹，你好像是没有遗憾地安安静静死去的。你死后身边还留着可以偿付医药费的钱。并且你生前就已经把后事安排清楚，好像准备着随时随地死去，都不致烦累别人。——作者注

我现在希望着我的希望如同一坛酒，让它愈埋藏愈醇郁罢。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放我的这一颗心！你对我从没有说过一句怨愤的话，但是我能够宽恕我自己么？

你的善良的宽恕一切的心已经在土里得到安息了。可是我，活着的我是得不到安息的。我每想到我那些没有兑现的空头支票，每想到我那些骗了你几年的空的希望，我的心怎么能熬得住那长期的苦刑！

四

风静了，我的四周是一片死寂。夜凉得像水一样。黑暗中闪起一股灰白光。我知道寒夜快到了尽头。我的回忆也快到了尽头。在这短短的两三小时里我经历了十四年中的聚散和悲欢。现在这一切都得跟着寒夜逝去了。在那光秃的斜坡上，在经不住风吹雨打的松松的土块下，人们埋葬的不止是你的遗体 and 那些没有实现的希望，还有我过去十四年的岁月。那应该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日子。青春、热情、理想、勇气、快乐……那些编织幻梦的年龄……它们已经跟着可以为印证我的友人同逝了。……

想到这，我只有痛哭。

但是崇群兄，我不是在哀悼你，应该哀悼的倒是我自己。我失去了我的一部分，我的最好的一部分；我失去了一个爱我如手足的友人。那损失是永远不能补偿的了。

永别了，我纯洁善良的友人。听说你在病中说过，你不愿意死，不应该死。是的，你是不会死的。你给我们，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九本小书。那些洋溢着生命的呼声、充满着求生的意志、直接诉于人类善良的心灵的文字，那些有血有泪、有骨有肉、亲切而朴实文章，都是你的心血的结晶，它们会随着明星长存，会伴着人类永生。

记得你说过：

惟有爱才是向荣的，正当的，幸福的。

又说：

我铭感着人间还有熏风，还有灵雨，还有同情，还有自然的流露，还有爱。

你说了真话。正因为这样，你的充满了爱的心便不是那不治的痼疾所能毁灭的了。

1945年4月在重庆

《晞露集》（星云堂）、《寄健康人》（良友）、《归客与鸟》（正中）、《废墟集》（文生）、《夏虫集》（文生）、《石屏随笔》（文生）、《眷眷草》（文生）、《现代日本小品文》（翻译——中华）。还有一本散文集，我正在替他编辑，拟题作《碑下随笔》。《碑下随笔》已收入《文学丛刊》第十集，一九四九年初出版。——作者注

见《石屏随笔》。

纪念我的哥哥

我第二次回到上海来，坐在你从前常常坐的沙发上，望着油漆剥落的墙壁和尘封的书架，我仿佛做了一场大梦。梦醒了。我疲倦。我闭上眼睛。我想休息。可是你来了，你站在我的面前。我睁开眼睛，我觉得你坐在写字台前，背向着我，埋着头在写什么东西。我站起来，我想唤你，我要像从前那样地和你谈话。我先咳一声嗽。你的影子没有了。写字台前空空的没有人。屋子里这时候除了我，也没有别的人。我唤你，听不见回应。我提高声音再唤，那空虚的声音使我自己也吃惊。我用不着再骗自己了。我看见你病，我看见你躺在死床上，我看见你的棺木入土。我还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你呢？

我痛苦地、无可如何地叹了一口气。我又在沙发上坐下。我真应该休息了。我倦得很。我又闭上眼睛。可是我的脑子不肯静下来。它动得厉害。二十三年前的情景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两个年轻的孩子（不，那时候我们自以为是“饱经忧患”的大人了）怀着一腔热情，从家里出来，没有计划，没有野心，甚至没有一个指导我们的师友，我们有的只是年轻人的勇敢和真诚。一条小木船载走了我们，把我们住惯了的故乡，送入茫茫人海中去。两只失群的小羊跑进广大的牧野中了。现在大概没有人记得我们当时那种可怜而可笑的样子，可是近几年来在重庆和桂林，每当寒风震摇木造的楼房时，我总会想起在南京北门桥一间空阔的屋子里，我们用小皮箱做坐凳，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埋头在破方桌上读书的情景。我们在那间空阔的屋子里住了半年，后来又搬到前面另一间狭小阴暗的屋子里住了一年。在那些日子，我们没有娱乐，没有交际，除了同寓的三四个同乡外，我们没有朋友。早晨我们一块儿去上学，下课后一块儿从学校走回家。下雨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撑着一把伞，雨点常常打湿了我们的蓝布长衫。夏天的夜晚我们睡在没有帐子的木板床上，无抵抗地接受蚊虫的围攻。我们常常做梦，梦是我们的寂寞生活中唯一的装饰。此外就是家信。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中间的唯一的连锁。他常常把我们的心的拉回去又送出来。每个星期里他至少有一封信来，我们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们的心的不知奔跑了多少路程。我们并没有把那一年半的时光白白浪费，我们的确给自己的脑子里装进了一些东西。于是安静的日子完结了。在学校生活结束以后，我开始了飘泊的生活。那天你在浦口车站送我上火车，你温和地微笑着，嘱咐我“小心饮食，注意身体”。你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在我跑了好些地方，碰了若干次壁，甚至在我靠着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的时候，我想到你，我还觉得自己有着无比的勇气。我不肯让你知道我真实的生活情况，我不愿使你为我的苦恼分心。固然你一直过着安定的生活，但你的日子也并不是快乐的，况且你的心很细，你顾念别人常常多于顾念自己。以后无论在东吴或者燕京，你都是过着一种苦学生的生活，有时你还不得不做家庭教师，领一笔微小的薪金来缴纳学费。你从不羡慕别人的阔绰，也没有为自己的贫苦发过一句牢骚。我的生活方式连累了你，我这个叛逆使你也失去了家人的信任。“家”渐渐地跟你离远了，信函的往来也常常中断。你心中的寂寞是可以想到的。你最后一年的求学生活应该是怎样痛苦的挣扎啊。但是你终于

指当时苏州的东吴大学和北平的燕京大学。

带着孤寂的微笑熬过去了。

毕业改变了你的环境，也给你带来一线的希望，你可以“自食其力”了。你找到了职业：天津南开中学的英文教员，——虽然待遇不好，但是这与你的兴趣相合。你借了债，做了两套可以穿上进课堂见学生的西服。你还为自己订下了一些未来的计划。可是打击来了。大哥突然服毒自杀，留下一个破碎的家。“家”需要我们。你毅然挑起这个担子，你按月寄款回去。你有限的收入变得更“有限”了。那些未实行的计划像空中楼阁似地一下子完全消失了。一块大石头压到你那刚刚昂起的头上，从此就没有看见你再抬起它来。像一只鸟折断了翅膀，你永远失去高飞的希望了。

你默默地忍受一切。或者更可以说，你放弃了一切。你在南开中学的宿舍里住了十年。你过得不算太苦，但也并不舒适。看电影是你唯一的娱乐。天真的年轻学生是你的朋友，他们给你的单调生活增加了色彩，他们敬爱你，你也喜欢他们。可是没有人知道你的内心。我到天津去看过你三次，最后一次却只住了一个夜晚。我看出你的疲倦、寂寞和衰老。我屡次想和你谈你自己的事，可是我始终无法打开你的心。你关心我倒多过关心你自己。有时我逼着问你，你总是拿“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一句话来封我的嘴。讲话时你常常带着笑容，但你的微笑是寂寞的，疲倦的。不知是什么东西消磨了你的勇气和热情，你不诉苦，但是你也不再挣扎。你默默地过着这平凡而和平的生活。可是你的脸颊却渐渐地消瘦，身体也渐渐地坏下去。离开你时，我总担心是否还能够和你再见。第二次我来到你的身边，你还是带笑地说你过得很好。但是你真的过得“很好”么？

十年毕竟过去了。为了换取这漫长的岁月，你不知花了多大的代价。抗战后第二年秋天我从香港写信约你到上海，起初你还说打算再做一年教员，后来你改变了主意，离开大水中的天津来上海了。我比你早一个月回到上海，却一直没有得到你动身的消息。有一天下午我在楼上听见了你的唤声，我从窗里伸出头去，你站在大门前也正仰起头来看我。是那样一张黑瘦的面孔！我差一点不认识你了。

我握着你的手，我对你说我要让你在上海过几年安静的生活，你默默地点点头。我们在一块儿住了十个月，你得到了休息，但是没法治好你心上的创伤。音乐和翻译工作做了你排遣寂寞的工具。对工部局交响乐队星期日的演奏会你从没有缺过席，西洋古典音乐的唱片更是你分不开的伴侣（你尤其爱好声乐，自己也喜欢唱歌）。岗察洛夫的名著《悬崖》在这十个月中译成了，你又开始作翻译《奥布诺莫夫》的准备。可是这一切并没有减轻你的寂寞，相反的它们还使它增多。你的生活圈子似乎变得更狭小了。

我在法国战败后一个月离开了上海。你把我送上直航海防的轮船。开船时，我立在甲板上对你挥手，在你旁边还站着后来被日本人捉去至今生死不明的友人陆圣泉。你在岸上对我微笑，圣泉也对我微笑。我当时哪里想到这便是映入我眼里的你们两人最后的笑容了！

一眨眼就是五年，这五年中间我们整整有二三十个月不曾通过一封信。日本兵占了上海租界，普遍的迫害开始了。圣泉遭了毒手。你小心，我也不愿给你招来意外的麻烦。在桂林我还接过你的短函，在重庆我却无法知道你的生活状况。路完全隔断了。后来我才听说你也在暗中打听我的消息。你也许担心我在湘桂大战中做了一件不值得的牺牲品。事实上我却很健壮地活在重庆。

“胜利”意外地来了。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我可以和留在上海的你们见面。我打了电报去上海。回电说你大病初愈，圣泉下落不明。你要我即刻去沪。可是交通工具全被“官”字号的人占去了，我们这类于抗战无功的人是没有资格“复员”的。我等待着。等了两个多月，我赶到上海，你已经躺在病床上了。据说你是在两天以前才病倒的。病势不重，就是体力太差；上次的病是肋膜炎，还经过危险期，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靠着朋友一家人的照料，终于好了起来。

那个晚上我们睡在一间屋子里，你很兴奋，拉着我谈了许多话。我要你休息，劝你少讲话。你说你不累，你一定要跟我谈个痛快。你还说，每天谈几段，谈两个星期便可以把你想说的话谈光。我一定不让你多谈，我说有话等你病好了慢慢讲。

我在上海住下来，我过的仍旧是忙乱的生活。我还避免和你单独谈话的机会，我害怕多说话使你伤神。你说你的病不要紧，我也以为你的病不要紧，你需要的只是休息和营养。我相信你不久便可以好起来。并且看见你在朋友家里得着很周到的看护，我十分放心。每天大清早，我刚睁开眼睛就听见你在病床上自语：“好多了，好多了。”那是你量过温度后用高兴的声调说的话。我也高兴，又蒙着头睡去了。我万想不到你这样骗了你自己，也骗了我。但我的疏忽是应该受指责的。我起初并没有注意到你病势的加重，后来还是一个朋友提醒了我，要我送你进医院去。我的劝告你不肯接受，我又无法强迫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我向你谈过几次，都没有用。最后你回答我：“过两天再说。”这样又拖了两天。终于你认输似地说了出来：“那么还是早进医院罢，今天我觉得体力不成了，起床大便都感到吃力了。”

靠着另一位朋友的帮忙，第二天你便住进了医院。你喜欢静。病房外面便是一个幽静的小花园。透过玻璃窗你可以望见一片绿色。关上房门，屋子里没有一点声音。“三哥，你满意吗？”有人问你。“满意，”你点头回答。我们预备让你在这地方至少住两个月。谁也没有料到，你就只有七天的寿命。

在这七天中你似乎并没有痛苦。对于询问你病状的人，你总是回答：“蛮好。”就在你临死的前两天，你还是觉得自己“蛮好”。没有呻吟，没有叫号，你安静地躺在床上，并不像一个垂危的病人。那个晚上，我在病房里陪了你一个整夜，你时眠时醒，好像要对我说些什么话，却始终讲不出来，我听见的只是一些断续的字。你似乎有些激动。可是第二天你又得到了安静的睡眠，而且清醒地对我们讲话。看得出来你的精神更差了。我们虽然担心你的体力支持不下去，却没有想到你那么快就离开我们。你自己不相信你会死，我们也不相信你会死。可是死突然来把你抓走了。

你死的时候我不在你身边。早晨我刚起床就得到医院里来的电话。“三哥完了，”一个朋友这样告诉我。我没有流泪，站在电话机前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好。我把这个消息转告朋友的太太，她立刻哭起来。这个好心的女人，这些年来她一家人在最黑暗的时期中给了你友情的温暖。为了挽救你的生命，他们已经尽过力了。

我赶到医院。病房的门大开着，你静静地睡在床上，白色被单盖着你的身子，我揭开面纱，看你的脸。一夜的功夫，你变得这么瘦，这么黄，这么衰老！两眼紧闭，脸颊深陷，嘴微微张开。我站在床前，咬着嘴唇，我在心里讲了一句话，我等着你的回答。

你没有声音。朋友把面纱给你盖上。另一个友人带来两束鲜花放在你的

身边。看护小姐要我们退出病房。我们站在窗前阶上等候殡仪馆的柩车。这等待的时间是很痛苦的。我们谁都不愿讲一句话。我不平地问着自己：这就是死么？你一生就这样地完结了么？我不忍回答。死毁坏了一切。你原说过你等着我回来有许多话要对我讲，有一些梦要我帮忙你实现。现在这一切都成了一阵烟，一阵雾。你没有能讲出什么来，也不曾从我这里得着什么安慰。你默默地走了。据那个朋友说，你临死时只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下午两点钟你的遗体在上海殡仪馆中入殓。九天后我们把你葬在虹桥公墓。活着你是孤零零一个人，死了你也是孤零零一个人。你留下两部未完成的译稿（岗察洛夫的名著《奥布诺莫夫》和威尔斯的长篇小说《莫洛博士岛》），一部已译完待整理的中篇小说《女巫》（亚·库普林著），一本已付印的三幕剧《战争》，一本法国通俗小说《无名岛》，和十多篇零碎的短篇译文。此外便是朋友和学生对你的敬爱的纪念了。

从墓地回来，我非常疲倦。我已决定两天以后回重庆去。我坐在你住了五年的楼房里，回想着我这一个月来的上海生活。我来，我去，你病，你死，一切都是这么匆匆。我再想到在这短短的聚合中你对我说过的那些话，那些事，我才明白你是这世界上最关心我的一个人。可是在我多么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永远离开我去了。

“活了四十多年，没有做出什么事情，这是多可悲的事，”你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可是你死得并没有遗憾。你活着时没有害过谁，反而常常把你有限的收入分给别人。你做过十年的中学教员，不少的学生得过你的益处，他们常常带着敬爱谈起你，但是你自己却喜欢谦逊的平凡生活，始终不让人把你看作青年的导师。你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你虽然默默无闻地过了一生，可是你并没有白活。你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又悄悄地走了。你不愿意惊动别人，但是你却播下了爱的种子。再过四十年你的纪念也不会死的。……

我睁开眼睛，屋子里还是静静的。有人在二楼讲话，还有人在笑。在半点多钟的时间里我又经历了过去二十三年的悲欢。现在是你死后的第六个月了。我真疲倦，我想休息。我应该暂时把你的事忘掉了。我站起来。

可是在离我们家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称你做“亲爱的爹爹”的女孩，我不能忘记她。那是我们大哥的女儿，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过房”给你的。这个多情的孩子没有见过你，却十分爱你。她把许多梦寄托在你的身上。在八九岁的年纪，她就常常说：“我要到下面去找我的爹爹。”现在她已经做了两年小学教师，却始终得不到跟你见面的机会，而且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不愿伤害她的心，把你的死讯瞒着她。但是她那敏感的心已经猜到了一切。人告诉我，有好几个星期天，她回到家里不笑，也不讲话，最后她生母问她为什么不给她的“爹爹”写信，她哭着回答：“用不着了。”她知道她一切的梦全破了。为什么不让她和你见一面，住一个时候？为什么不给她一个机会，让她对你倾吐她的胸怀，叙说她的梦景？她喜欢音乐，像你一样；她热诚待人，像你一样；她正直，她无私心，也像你一样。你们在一块儿，应该是一对最理想的父女。为什么她这个小小的要求也不能够得到满足？让她在这样的年纪就尝到永不磨灭的悲哀？

没有人来回答我这些不平的疑问。你已经和平地安息了。可是那个善良的孩子前面还有长远的岁月。她最近还来信诉说她的悲痛。我无法安慰她。我希望你的纪念能够给她勇气，使她好好地活下去，让她能够得到一般年轻

人应当享受的人间幸福。可怜的孩子！
1946年5月在上海

忆施居甫

朋友居甫去世快四年了。四年中我只读到两篇短短的纪念文，是两位老友写的，文章都不错，但好像不曾得到人们的注意。居甫死得很寂寞，生前似乎也少有人看重他，何况死后。他富于热情，待人宽厚，对朋友很热心，学、识都不差。并且他还有理想，不是那种认为“人单是靠着吃米用钱活着”的人。可是他穷，又有不治之疾（肺病）。他老实，又不喜欢装模作样。所以他虽有一颗“黄金的心”，却不受那班喜欢赶热闹的人欢迎。他朋友亲戚中发财的，并非没有，可是他从不向他们求助。后来他的肺病到了第三期，他还支持着病躯，靠“舌耕”来养活自己一家人。临死，他只是个平庸的中学教师。唯其平庸，他的真诚才能够感动年轻的心灵，在病中他教的一班学生自动地凑了一笔医药费送给他，使他得到几个月的休息。他一个人、一家人所需要的有限得很，可是连这一点点，他也没有得到。他是一个愿意为社会牺牲自己的人，而社会对他却非常残酷。我和两三个朋友曾经商量好一个帮助他养病的计划。但是这计划也不能救活他。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伏在床上，脸压在枕上，屁股翘得高高的，样子非常痛苦，似乎昏昏沉沉地睡去了。我第二天早晨便要离开成都，我是来向他辞行的。我和他太太谈话时，他忽然醒了起来，抬起头看我。

“你睡罢，我就要走的，”我说。“反正我明年还要回来。”我又加了一句，只是为了安慰他。

“好的，明年回来，我们可以多在一起谈谈，”他含笑说。“那时我身体该比现在好些了，”他也加了一句。

“一定的，一定的，”我微笑说。我怕引起他多谈话，会增加他的痛苦，便匆匆地告辞走了。他紧紧握着我的手，送我到房门口。

第二天，我动身去重庆。四个月后，我在桂林得着他病故的消息。以后我就没有听到人提起他。他的死似乎不曾惊动别人，犹如他活着、他生病时也不曾惊扰过人们一样。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的遗体葬在什么地方。我没有写信到他家里去问过。我原以为前年、去年我会回成都，至少可以在他的墓前停留片刻，我作过两次旅行的准备，结果我一步都没有走。最后我离开四川到上海来，跟他的家、他的墓离得更远了。现在，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成都去。

我认识居甫，早在二十五年前，我们一块儿编印过一份刊物，我们常常在印刷所里见面，那时我还是十六七岁的孩子，他似乎比我年长许多。可是我们处得好，谈得来。这些日子多么值得人怀念！但是后来刊物夭折，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就少了。

我们一别便是十八年。他并没有改变多少，除了身体差一点。其实他以前脸上就没有血色，现在也只多了一点病容。那次我只在故乡停留了一个多月。过一年，我再回去，又住了一百多天光景。这两次回乡，我和居甫聚谈的机会很多，并且谈得很痛快。他告诉我，他过去十八年间的工作与生活，也说了他未来的工作计划。他希望过几年安定的生活，不必为一家人的衣食奔走。那么他可以安静地做他的社会与经济两方面的调查工作，完成他计划中的几部著作，关于四川，特别是成都，他知道的实在不少。过去的掌故和现在的情况，无论关于哪一方面，你向他问起，他总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详尽的答复。他肚子里装了不少的东西，他本身就是一部大书。“你快点写出

来罢，”我和几个朋友常常这样催促他。“我会写的，”他笑着回答。

可是他怎么能从容地整理那一堆材料，从容地写出他那些著作呢，当他一家人必须活下去，他的孩子们必须进学校念书的时候？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住他瘦弱的肩头，压倒了他，甚至压死了他。他那些未写成的著作，也被它压毁了，最可惜的是他那颗“黄金的心”。

居甫是一个能够安贫的人，可是命运对他太坏了。我第一次回成都，听见他谈起他的大女儿的种种好处。她确实是一个可爱的孩子，能干，温厚，勤勉，和顺。她爱父亲而又了解父亲，她是他生活里最大的安慰，我庆幸他有了这样一位“千金”。她那一学期就要在高级师范学校里毕业了，她正计划着暑假后怎样分挑她父亲肩上的担子。但是一年后我再去他家，他却含泪地对我叙说他那个女儿的死亡。这以后，朋友们就很难看见他展眉的时候，他终日悒郁，一直到死。

他是一个从不知道自私的人。他为别人，常常忘了自己。我两次在成都，得他帮助的地方很多，我欠了他一笔不小的友情的债。我知道这是出于他对友人的热诚，他不望报答，我也不敢对他说报答的话。在这些时候，我每次见到他那没有血色的消瘦的脸，听到他那空洞的声音，看见他那迟缓的脚步，我会惊奇地想：

这个人，他受着社会的歧视、疾病的侵蚀，他的呼吸随时都会断绝，眼睛随时都会永闭，他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另一个世界，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还有那么多的热情，那么多的友爱来慷慨地分给朋友！从他的温和善良的眼光里，我认识了一个美丽的精神。我感到惭愧，我受到鼓舞。

居甫颇像我的另一个朋友范予，一直到最后都在撒布生命。不同的是范予用笔写了不少的文章，影响较大；居甫用行为，替别人奔走，只有少数人对感激。但是影响不论大小，辗转相传，永远有人受益，而且生命永在，撒布生命的人也可以不朽。

居甫“死”得寻常。但是我想他不应该有遗憾。而且生当“乱世”，凡有善行善言的人往往不得“善终”。居甫虽死得寂寞，但是他能够在妻儿陪伴中安然逝世，也算是幸运。他得到了解脱与休息，我没有理由为他悲。只是失去了这样一个好心的朋友，我更要感到寂寞了。

1946年7月28日

怀陆圣泉

六年前一个夏天的早晨我坐“怡生轮”去海防。圣泉赶到金利源码头来送行。开船时，他和我哥哥都立在岸上对我微笑。我对他们说，两年后再见。我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我和圣泉的最后的一面。

我离开上海后第二年，在成都得到圣泉被捕的消息，那是从桂林传来的，后来又听说他已经出狱。但是我到了桂林才知道他入狱后下落不明。我各处打听，一直得不到确实消息。朋友们见面时，常常谈起圣泉，我们想念他，暗中祝他平安。有时在静夜，我们三四个友人对着一盏油灯围着一张破旧而有油垢的方桌寂寞地闲谈。桂林郊外的寒气从木板壁缝侵入。我们失去了热情。怀念和焦虑在折磨我们。我们的谈话变得没有生气了。我们便安慰自己：“等到抗战胜利了，圣泉就会回到我们中间来的。”

四年来我们就用这个希望来安慰自己的焦虑的心。时光在木板壁缩裂时发出的清脆响声（那是我们静夜中的音乐）中匆匆逝去。抗战终于胜利，我们几个朋友也终于回到上海。可是圣泉一直没有消息。他就这样令人不能相信地失踪了。

我不愿相信他已经死亡，所以我不想写纪念他的文章。一个像他那样爱憎分明而且敢爱敢恨的人不能死得这么简单。他有着那么强烈的爱，绝不能不留下一点踪迹。我们固然不能相信他活，但是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死。只要希望未绝，我们愿意等待一生。

虽然他是一个视死如归的人，但他为什么必须死呢？他与其说是被捕，不如说是自首。日本人找不到他，他自己走到捕房去，准备跟那些人讲道理，辩是非。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他相信敌人也会在正义面前低头。据说他唯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口供强硬，他对敌人说，汪精卫是汉奸，大东亚战争必然失败。他可能为这几句真话送命。可是许多干地下工作的人都保全了生命，为什么敌人偏偏毒恨这个赤手空拳的书生，必欲置他于死地？有人揣测他受不了牢中苦楚，患病身亡。但他是一个身心两方面都健康的人，再大的磨炼他也必能忍受。

以上是议论、猜想、耽心。而事实却是他那时和两个朋友守着书店，书店被抄去两卡车的书，他失去了踪迹。书店保全，他却不见了。

我和圣泉相知较晚。“一·二八”沪战后一年我在福建泉州看朋友，在一个私立中学里第一次看见他。可是我们没有谈过十句以上的话。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抗战前两年我参加了书店的编辑工作，第二年他也进来做一部分事情，我们才有了谈话的机会。抗战后，书店负责人相继离去，剩下我们三四个人维持这个小小的事业。我和他都去过内地，但都赶回来为书店做一点事情。共同的工作增加了友情，我们一天一天地相熟起来。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我们常常在书店见面。一个星期中至少有一次聚餐的机会，参加的人还有一位学生物学的朋友。我们在书店的客厅里往往谈到夜深，后来忽然记起宵禁的时间快到了，我和那位生物学者才匆匆跑回家去。在那样的夜晚，从书店出来，马路上不用说是冷冷清清的。有时候等着我们的还是一个上海的寒夜，但我的心总是很暖和，我仿佛听完了一曲贝多芬的

书店：指文化生活出版社。

即《蛋生人与人生蛋》等书的作者朱洗。

交响乐，因为我是和一个崇高的灵魂接触了。

我这种说法在那些不认识圣泉或者认识他而不深的人看来，一定是过分的夸张。圣泉生前貌不轩昂，语不惊人，服装简朴，不善交际，喜欢埋头做事，不求人知。他心地坦白，忠诚待人，不愿说好听的话，不肯做虚夸的事。他把朋友的意义解释得很严格，故交友不多。但是对他的朋友，他总是披肝沥胆地贡献出他的一切。他有写作的才能，却不肯轻易发表文章。他的散文和翻译得到了读书界的重视，他却不愿登龙文坛。他只是一个谦虚的工作者。但这谦虚中自有他的骄傲。他不是“文豪”、“巨匠”，甚至他虽然真正为“抗”敌牺牲，也没有人尊他为烈士。他默默地活，默默地死（假定他已死去）。然而他并不白活，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情，而且也有一些人得到他的好处。但是这一切和那喧嚣的尘世的荣誉怎么能联在一起呢？那些喜欢热闹，喜欢铺张，喜欢浮光的人自然不会了解他。

在我活着的四十几年中间，我认识了不少的人，好的和坏的，强的和弱的，能干的和低能的，真诚的和虚伪的，我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然而像圣泉这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自己生命、重视他人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得不多。古圣贤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可以当之无愧。

有了这样的朋友，我的生存才有了光彩，我的心才有了温暖。我们平日空谈理想，但和崇高的灵魂接触以后，我才看见了理想的光辉。所以当我和圣泉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充满快乐地想：“我不是孤独的。我还有值得骄傲的朋友。”我相信要是我有危难，他一定会不顾一切地给我援助。

我和他就是这样的朋友。我认识他的心灵，而且和它非常接近。我对人说我了解圣泉，我谈到他的刚直，他的侠义，他那优美的性格和黄金的心。然而要是有人向我问起他的生平，他的家世，甚至他的年龄，我却无法回答，唯一的原因是我不知道。我认识的只是他的人 and 心，此外便是他的文章。别的，他从未对我谈过，我也始终没有向他问起。胜利后回到上海，我才知道他台州的家里还有年老的双亲和他前妻留下的女儿。在上海我才见到他新婚的太太。听说他和她只过了一个半月的结婚生活。现在她已经空等了四年了。

朋友们登过报找寻他，又曾在各处打听他的下落。有一个时期，我们还梦想第二天早晨他提着一只箱子在外面叩门。又有一个时期我们等待一封不识者的来信，告诉我们圣泉死在何时，埋骨何处。又有一个时期我们盼望着他从太平洋某岛上集中营里，寄来信函，向我们报告他还健在。

但是，这一切都成了一场空，我们又白白地等了一年了。自然我们还得等待下去。难道真要我们等待一生么？

一个崇高的心灵就这样不留痕迹地消失了，这是可能的么？我常常这样问自己。

我知道，万一他还活着，万一他能看到我这篇短文，他一定会责备我，“在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在受苦，你们为什么只关心到我一个？”

是的，在我们中国每天有千千万万人死亡，许多家庭残破，生命像骨头似地被随意抛掷。一个读书人的死活更不会有人关心，然而就在这样的中国，也有人爱理想，爱正义，恨罪恶，恨权势，要是他们有一天读到圣泉的书，

他用陆蠡的笔名出版了三本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和三册翻译小说《罗亭》、《烟》（都是屠格涅夫的作品）和拉丁的《葛莱齐拉》。——作者注。

知道圣泉的为人，明白他的爱和恨，那么他们会爱他敬他，他们会跟着我们
呼唤他，呼唤他回来，呼唤那个昙花一现的崇高的心灵重回人间。

1946年11月在上海

巴金小传

巴金，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本名李尧棠，字芾甘。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宦宦家庭。“巴金”是他1928年8月写完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时启用的笔名，此外，他还用过芾甘、佩竿、余一、王文慧、欧阳镜蓉等二十几个笔名。

巴金自五岁起在家塾就读，十三岁时，跟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的香表哥学习英文，持续两年。十六岁考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从补习班到预科、本科，在该校读书两年半。十九岁考入上海南洋中学，不久转赴南京，进国立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学习，半年后进入该校高中三年级，并开始课余学习世界语。1925年夏毕业后，只身北上，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因检查出肺病，不得不回到上海养病。1927年初自费去法国，在巴黎法国文化协会附设的夜校学习法文，因家里破产，很快便停止了正式学习。1928年底回国。

目前所见到的巴金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是1922年7月21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44期刊登的新诗十二首：《被虐者的哭声》，但巴金早年的志向并不在此。对封建家庭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的憎恨，促使巴金积极接受富于批判精神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尤其是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渴望投身社会革命。他曾参加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翻译和编译了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著作文章。1929年《灭亡》在《小说月报》连载，在文坛引起反响，是巴金进入文坛的奠基之作。其后的《死去的太阳》、《雾》、《雨》、《电》等都是以革命为题材的小说，反映了二十年代中国一部分决心反叛旧世界却又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知识青年的精神风貌和亢奋焦躁的情绪。

在巴金众多的小说中，由《家》、《春》、《秋》组成的《激流三部曲》，是影响最大的巨制。其中，第一部《家》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杰作之一，它对于三四十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冲出旧家庭的藩篱，走向革命，起到启蒙的作用。《憩园》、《寒夜》是巴金另外两部以家庭为题材的小说，也是巴金创作中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作品。巴金晚年创作的《随想录》既把笔触伸向社会和历史的深处，又坦率地挖掘自己的灵魂，表现出巴金的高尚人格，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尊敬。巴金一生创作甚丰，1958年至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金文集》十四卷，约四百万字；从1986年开始又陆续出版《巴金全集》，达二十六卷。

巴金的一生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香港、广州、汉口、桂林和“孤岛”上海之间，编书刊，写文章，以高昂的热情，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活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巴金重新拿起被夺去十年的笔，活跃于文坛，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旗帜。在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巴金和郭沫若、茅盾等一起，并列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文学巨匠”。1981年巴金被选举为中国作协主席。198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巴金的著作被译为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流传。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巴金主要著译书目

〔创作书目〕

- 五一运动史（史话）1926年4月，上海，民众社
支加哥的惨剧（史话）1926年5月，美洲，平社；又名《自由血——五一殉道者的五十周年》，1936年，福州自由书店
灭亡（中篇小说）1929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理论）与克刚等合著 1927年4月，上海，民钟社
革命的先驱（传记）1928年5月，上海，自由书店
断头台上（传记）1929年1月，上海，自由书店
俄罗斯十女杰（传记）1930年4月，上海，太平洋书店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理论）1930年7月，上海，自由书店
死去的太阳（中篇小说）1931年1月，上海，开明书店
复仇（短篇小说集）1931年8月，上海，新中国书局
雾（中篇小说）1931年11月，上海，新中国书局
海底梦（中篇小说）1932年8月，上海，新中国书局
春天里的秋天（中篇小说）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
海行（散文集）1932年12月，上海，新中国书局
光明（短篇小说集）1932年5月，上海，新中国书局
雨（中篇小说）1933年1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沙丁（中篇小说）1933年1月，上海，开明书店
电椅（短篇小说集）1933年2月，上海，新中国书局
抹布（短篇小说集）1933年4月，北平，星云堂书店
家（长篇小说）1933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
萌芽（中篇小说）1933年8月，上海，现代书局
新生（中篇小说）1933年9月，上海，开明书店
旅途随笔（散文集）1934年8月，上海，生活书店
将军（短篇小说集）1934年8月，上海，生活书店
巴金自传（传记）1934年11月，上海，第一出版社
电（中篇小说）1935年3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点滴（散文集）1935年4月，上海，开明书店
俄国社会运动史话（史话）1935年9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神、鬼、人（短篇小说集）1935年1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生之忏悔（散文集）1936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沉落（短篇小说集）1936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忆（回忆录）1936年7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发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36年12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长生塔（童话集）1937年3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雷（短篇小说集）1937年6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短筒（散文集）1937年3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控诉（散文集）1937年11月，上海，烽火社
春（长篇小说）1938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
梦与醉（散文集）1938年9月，上海，开明书店
感想（散文集）1939年7月，重庆，烽火社

黑土（散文集）1939年10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旅途通讯（通讯报道集）1939年4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秋（长篇小说）1940年4月，上海，开明书店
利娜（中篇小说）1940年8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火（第一部，长篇小说）1940年12月，重庆，开明书店
火（第二部，长篇小说）1941年1月，上海，开明书店
无题（散文集）1941年6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
龙·虎·狗（散文集）1942年1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
还魂草（短篇小说集）1942年4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
废园外（散文集）1942年6月，重庆，烽火社
小人小事（短篇小说集）1943年4月，成都，文化生活出版社
憩园（中篇小说）1944年10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
火（第三部，长篇小说）1945年7月，上海，开明书店
第四病室（中篇小说）1946年1月，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
旅途杂记（散文集）1946年4月，上海，万叶书店
寒夜（长篇小说）1947年3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
怀念（散文集）1947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
静夜的悲剧（散文集）1948年9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散文集）1951年3月，上海，平明出版社
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散文集）1951年3月，上海，平明出版社
慰问信及其他（散文集）1951年7月，平明出版社
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散文通讯集）1953年2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报告文学集）1953年3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雄的故事（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3年9月，上海，平明出版社
保卫和平的人们（散文、通讯集）1954年11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谈契诃夫（理论）1955年5月，上海，平明出版社
大欢乐的日子（散文集）1957年3月，北京，作家出版社
坚强战士（散文集）1957年3月，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明珠和玉姬（短篇小说集）1957年4月，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报告文学）1958年10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巴金文集（1—14卷）1958—1962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友谊集（散文集）1959年9月，北京，作家出版社
猪与鸡（短篇小说集）1959年2月，北京，作家出版社
赞歌集（散文集）1960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
李大海（短篇小说集）1961年12月，北京，作家出版社
倾吐不尽的感情（散文集）1963年8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贤良桥畔（散文集）1964年9月，北京，作家出版社
大寨行（散文）1965年8月，山西人民出版社
随想录（第一集，散文集）1979年12月，香港，三联书店
探索集（《随想录》第二集）1981年4月，香港，三联书店

真话集（《随想录》第三集）1982年10月，香港，三联书店
怀念集（散文集）1982年12月，宁夏人民出版社
病中集（《随想录》第四集）1984年，香港，三联书店
无题集（《随想录》第五集）1986年，香港，三联书店
巴金全集（1—26卷）1986—1994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翻译书目〕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阿里斯著，1927年，上海，民钟社
面包略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7年11月，上海，自由书店
狱中与逃狱（回忆录）俄国克鲁泡特金著，与李石曾合译，1927年5月，
广州，革新书局
薇娜（短篇小说，剧本合集）波兰廖·抗夫著，与李石曾合译，1928年
6月，上海，开明书店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8—1929年，
上海，自由书店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短篇小说集）英国普利洛克等著，1929年10
月，新宇宙书店
一个卖鱼者的生涯（传记）意大利凡宰特著，1928年12月，上海，自
由书店
地底下的俄罗斯（传记）俄国司特普尼亚克著，1929年8月，上海，启
智书店
蒲鲁东的人生哲学（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9年，上海，自由书
店
骷髅的跳舞（剧本）日本秋田雨雀著，1930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
前夜（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0年4月，上海，启智书局
丹东之死（剧本）苏联A·托尔斯泰著，1930年7月，上海，开明书店
草原故事（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31年4月，上海马来亚书店
秋天里的春天（中篇小说）匈牙利尤利·巴基著，1932年10月，上海，
开明书店
过客之花（剧本）意大利E·亚米契斯著，1933年6月，上海，开明书
店
自传 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3年9月，上海，新民书店
狱中记（传记）美国柏克曼著，1935年9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史话）俄国司特普尼亚克著，1936年8月，上
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门槛（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等著，1936年5月，上海，文化生活
出版社
夜未央（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7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告青年（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7年10月，美国旧金山，平社
出版部
西班牙的斗争 德国若克尔著，1937年10月，上海，平明书店
战士杜鲁底 俄国高德曼著，1938年8月，上海，平明书店
西班牙（通讯集）德国A·苏席著，1939年4月，上海，平明书店
一个国际志愿兵的日记 瑞士A·米宁著，1939年4月，上海，平明书店
西班牙的日记 西班牙C·罗塞利著，1939年4月，上海，平明书店

巴塞罗郡的五月事变（通讯）德国 A·苏席著，1939 年 4 月，上海，平明书店

一个家庭的戏剧（传记）俄国赫尔岑著，1940 年 8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叛逆者之歌（诗集）俄国普式庚等著，1940 年 9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一个反抗者的话 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41 年，上海，平明书店

父与子（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53 年 5 月，上海，平明出版社

迟开的蔷薇（短篇小说集）德国斯托姆著，1943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处女地（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4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散文诗（散文诗集）俄国屠格涅夫著，1945 年 5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快乐王子集（童话、散文诗合集）英国王尔德著，1948 年 3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笑（短篇小说集）保加利亚奈米洛夫等著，1948 年 6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狱中二十年（回忆录）俄国妃格念尔著，1949 年 2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蒲宁与巴尔林（中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等著，1949 年 12 月，上海，平明出版社

六人（短篇小说集）德国鲁多夫·洛克著，1949 年 9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回忆契诃夫（回忆录）苏联高尔基著，1950 年 1 月，上海，平明出版社

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录）苏联高尔基著，1950 年 4 月，上海，平明出版社

回忆布罗克（回忆录）苏联高尔基著，1950 年 7 月，上海，平明出版社

回忆屠格涅夫（回忆录）俄国巴甫洛夫斯基著，1950 年 8 月，上海，平明出版社

草原集（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50 年 11 月，上海，开明书店

红花（迦尔洵小说集之一，短篇小说集）俄国迦尔洵著，1950 年 11 月，上海出版公司

一件意外事（迦尔洵小说集之二，短篇小说集）俄国迦尔洵著，1951 年 6 月，上海出版公司

癞蛤蟆和玫瑰花（迦尔洵小说集之三，短篇小说集）俄国迦尔洵著，1952 年 1 月，上海出版公司

獭獭（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著，1952 年 5 月，上海，平明出版社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 俄国屠格涅夫著，与肖珊合译，1959 年 6 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写照（回忆录）苏联高尔基著，1978 年 10 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前夜、父与子（长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著，与人合译，1979 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往事与随想（第 1 卷，回忆录）俄国赫尔岑著，1979 年 10 月，上海，

